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IDO OREN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美] 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王义桅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博雅藏书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IDO OREN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美] 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王义桅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美)奥伦(Oren,I.)著;唐小松,王义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Our Enemies And Us
ISBN 7-208-05275-1

I.美... II.①奥...②唐...③王... III.政治学—研究—美国 IV.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875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徐晓明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美〕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王义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17,000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275-1/D·916
定价 20.00 元

中文版前言

19世纪，成千上万的美国研究生蜂拥至德国，当时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几乎所有学院的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的奠基人都到德国留过学。回国后，这些学者试图把德国研究性大学的方法移植到美国本土。他们对德国的学术顶礼膜拜，并要求其学生掌握德语。

20世纪，美国两次打败德国，继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和学术大国。英语成了学术界的通用语，美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吸引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研究生。我也是这些外国学生中的一员，1983年从以色列来到纽约攻读政治学。

我进入的这门专业叫政治学，而非美国政治学。它理应是一门客观的、普适性的学科，不应理会马克斯·韦伯的告诫：社会科学知识“总是来自特定观点的知识”。在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和随后的数年里，我的研究领域处在该学科的主流范畴，我毫无疑问地接受政治学是一门客观科学的观点。确实，在我接受的教育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暗示这一观点会（更不必说应该）受到挑战。

后来，由于我在本书原序中所说的原因，我开始质疑我的专业的客观性。这部书就是我知识转型的产物。在该书中，我试

图展现美国政治学史与美国外交关系史之间的系统关系。我要指出,政治学家对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斯大林苏联的描述在这些政权成为美国的敌人后都变得黯淡无光了。我同时还要指出,美国与这些政权的冲突引发了美国政治学家对美国自身描述的重大转变,他们往往夸大美国与其敌人的差异。此外,我还引用大量素材证明本学科领域的重要人物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间存在亲密的关系,并追踪这些关系如何成为了重大的研究项目。基于这些发现,我还指出,政治学是以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不是一门客观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其潜在而未被承认的理想是美国。我希望这一观点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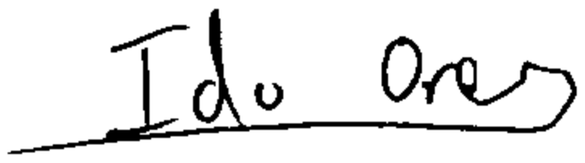
许多美国和中国分析家预言,21 世纪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其中一些分析家还预料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日益挑战美国的霸权。

如今,在研究我过去的专业讲义时,我不断幻想未来,可结果一直带有大量诸如此类的痕迹。现在分别预测中国和美国的相对兴衰可能也是错误的。但是,假如这些设想得以实现,那么 20 世纪的美国的经历就会表明,中国全球影响的上升会像经济和军事一样表现在学术领域。将来,越来越多的杰出科学著述可能来自中国。中国的大学即使不超过也会与美国竞相争夺,成为海外学子的磁场。到时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也会愈来愈主张独立于美国,就像 20 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家疏远德国的国家科学(Staatswissenschaft)一样。

假如中国的确成为世界顶尖的政治学研究国家,那么中国的政治学亦将产生美国那种傲慢感。中国的政治学家将设法把他们的学科描述为一种真正客观、具有普世效应的知识体,并可

能把我这部著作当作一个迹象来证明惟独美国的政治学才被标识为国家观点。不过，我希望他们抵挡这一诱惑，希望中国的政治学比它的美国对手更多一份知性上的卑微，更敢于反省，更清醒正视韦伯的警告：社会科学知识“总是来自特定观点的知识”。

伊多·奥伦



2003 年 11 月 26 日

英文版前言

十年前,我对军备竞赛(属主流政治学的实体和认识论研究范围)进行数学与统计学研究。我把研究结果发表在一些专业期刊上,并一直为这一工作的质量感到得意。但是,即便粗略地浏览一下该书,就会看出我的知识视野有了很大的变化。这部书对我进入政治学的前提提出了质疑。这种方向的改变是如何出现的呢?

冷战结束后,先前对一度流行的军备竞赛主题的学术兴趣消失了。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和民主在世界大张旗鼓地传播,许多学者被"民主和平"的前景激起了兴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国家彼此不战争的假设——几年前还没有产生多少反响——被广泛接受。它得到了大量统计分析的证明,而且克林顿政府援引它作为其"民主化"的外交政策的合理依据。尽管我怀疑国家间和平是由它们政权之间共有的民主属性来提升的这一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国家间关系的统计学研究在技术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对这些研究的批评必须更多地建立在一种基点上,而不是它们自己的科学根基之上。

鉴于此,我脑海里萌生了一个疑问:威尔逊为何不是在1917年他宣布战争以"维护世界民主安全"的那一刻而是二三十年前认识德意志帝国呢?威尔逊的遗产明显受到民主和平论

的支持者的拥护，我想，如果我们证明威尔逊是在德美冲突发生后而不是之前把德国称作“独裁国”的话，那么这种命题（民主和平论）也许就站不住脚了。我隐约知道，威尔逊进入政治圈之前曾是一位政治学家，但我对政治学史却知之甚少。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能向一位博学的同事吉姆·法尔（Jim Farr）请教学科史方面不可或缺的知识。吉姆建议，除了众多事件外，我的研究还应包括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这位狂热的亲德派，他创立了美国第一家政治学研究生院。

在我的军备竞赛研究中，我最终推崇数学模式引发洞察力的力量，而其他方法则没有这种明显的效力。当我致力于研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约翰·伯吉斯时，我意识到，尽管历史考察不同于数学推导，但它给了我一种同样的令人振奋的发现感。使我着迷的是，我发现，威尔逊和伯吉斯习惯使用的一些分析分类法和概念后来成了事实上的禁忌[例如，“雅利安”（Aryan）和其他种族分类法]，而一些现今普适的概念在一个世纪前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一些概念的当前意义也有别于它们当时的内涵。

尽管我沐浴于现代思维的政治学文化中，但是这一概念的反弹却是一种启示，为批评民主和平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我终于明白，政治学家当前对“民主”的理解部分是由美国的国际敌手所塑造的历史过程的产物。那些使美国看起来像它的敌人的民主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淡忘了。相反，那些夸大美国与其敌人的明显距离的方面却处于有利位置。因此，当我们把当前的民主概念投射到过去时，我们的分析能够确保民主国家间相互和平的科学论断的有效性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民主概念正是这一论点得以“检验”的相同历史范式的产物。我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发表在《国际安全》杂志上，是本书的敲门砖，

它刺激了我更深层地探讨美国政治学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

在我的“历史转型”期，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同事积极支持我新的研究路径，他们甚至引导我对该学科的假定客观性以及它所谓的致力于民主等方面提出苛刻的疑问。其中两位特别值得一提。吉姆·法尔不但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导师，而且是指导和鼓励的源泉。我对吉姆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支持深表敬意。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从一开始就热情支持本研究计划。在课题早期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用更精确和清晰的术语澄清了我的论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要感谢很多人。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在我萌发写此书念头之前就建议我这样做。彼得一直亲切地为我提供咨询意见和鼓励。西蒙·赖克(Simon Reich)两次阅读了整个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丹·蒙克(Dan Monk)使我对历史分析的重要哲学内涵大开眼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杰出编辑罗杰·海登(Roger Haydon)自我的设计摆上他的案桌之日起，就一直不知疲倦地料理这一研究计划。罗杰提出要求、建议和观点，并提供资料。没有他的这些帮助，这部书绝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另外，提供过忠告、信息或精神鼓励的人包括(对那些我疏漏的人表示歉意)塔拉克·巴克韦(Tarak Barkawi)、萨米·巴尔金(Sammy Barkin)、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拉里·多德(Larry Dodd)、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杰夫·埃利(Geoff Eley)、玛丽亚·范妮斯(Maria Fanis)、詹姆斯·费斯勒(James Fesler)、佩吉·科恩(Peggy Kohn)、弗里德里克·克拉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马克·拉菲(Mark Laffey)、杰夫·勒格罗(Jeff Legro)、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

mer)、约翰·欧文(John Owen)、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路易斯·E.罗宾斯(Louise E. Robbins)、布雷恩·施米特(Brain Schmidt)、罗杰斯·M.史密斯(Rogers M. Smith)、乔·昂德希尔·卡迪(Joe Underhill-Cady)、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以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本书的早期研究得到了来自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变换世界中的和平与安全麦克阿瑟基金会博士后流动人员"奖学金的资助,另外还得到了佛罗里达大学文科学院人文学术促进基金的资助。

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国际安全》第20卷(1995年秋季)第147—184页,第四章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第6卷(2000年12月)第543—573页。我感谢这些期刊的出版商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和塞奇(Sage)出版社允许我在这里翻印这些资料。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戴维·伊斯顿非常友好地允许我引用他们存档于肯塔基大学图书馆的口述史资料。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的遗嘱保管人迈克尔·赖斯曼(Michael Reisman)允准我发表存档于耶鲁大学的拉斯韦尔论文资料。我还按照一些图书馆的规定使用了下列档案文件集:卡尔·弗里德里克(Karl J. Friedrich)文件集、布鲁斯·坎贝尔·霍珀(Bruce Campbell Hopper)文件集(都来自哈佛大学档案)、詹姆斯·费斯勒(James W. Fesler)文件集(耶鲁大学图书馆)、詹姆斯·波洛克(James K. Pollock)文件集(密歇根大学本特利文史馆)以及赫伯特·施奈德(Herbert W. Schneider)文件集(哥伦比亚大学珍稀书稿图书馆)。

本书的出版给了我答谢两位导师的机会,他们极大地增长了我的知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史学系的格肖尼(Gers-

honi)指导了我的论文,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他教育我:一名学者意味着什么。随着我本人成为一名学者,我越来越欣赏这一典范。我的学位论文导师克里斯·阿肯(Chris Achen)既把我看成学生又当作同事。他教导我拓宽理论视野,批判性地思考和严密的分析。

我的父母米里亚姆和平彻斯·奥伦(Pinchas Oren)向我灌输学问的价值,他们对我的智商一直非常自信,尽管我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事业奉献给他们。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母亲正遭受癌症的折磨。要是她看到本书的付梓,我该有多骄傲,我谨以此书纪念她。我最应感谢乔迪(Jodi),没有她的关爱和支持,就没有这部书的问世,更不用说有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阿维格尔(Avigail)、梅阿(Maya)和艾顿·奥伦(Eytan Oren)。

伊多·奥伦

于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 1

英文版前言 …… 4

导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政治学 …… 1

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 19

知识关联:建构主义、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社会学 …… 24

第一章　德意志帝国 …… 36

约翰·伯吉斯的民族主义理论 …… 41

伍德罗·威尔逊的中央集权理论 …… 49

德美冲突的后果 …… 61

第二章　纳粹德国 …… 76

“犹太种族的最恶劣代表” …… 79

德国政府的诉求 …… 86

对希特勒“最开明的评论” …… 122

与纳粹主义碰撞的影响 …… 126

第三章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 142

极权主义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政治学 …… 142

两次大战期间的妥协主义者形象 …… 151

程序式民主的胜利 …… 184

第四章　冷战政治 …… 199
公共行政与发展中国家 …… 200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双重生涯 …… 210
白鲁恂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 225
艾弗隆·柯克帕特里克的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学会 …… 236
越战的影响 …… 248
结论　走向沉思的政治学 …… 275

译后记 …… 290

第四章　冷战政治 …… 199
公共行政与发展中国家 …… 200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双重生涯 …… 210
白鲁恂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 225
艾弗隆·柯克帕特里克的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学会 …… 236
越战的影响 …… 248
结论　走向沉思的政治学 …… 275

译后记 …… 290

导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政治学

美国政治学家很少反省其学科的身份(identity)。他们本能地把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宛如他们的讲道代表一门客观科学的戒律。因此,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出现了一种悖论:一门独立的科学附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

业内人士认为,政治学与自由民主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除了例行公事如美国政治学会(APSA)主席的年度发言中提及这一主题外,二者的关系几乎无需赘述。例如,哈佛大学政府学伊顿(Eaton)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该学会1987年的年会致辞中说,“没有政治参与就不可能有政治学家”;“民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紧密相连”。他强调:“哪里的民主强大,哪里的政治学就强大;哪里的民主弱小,哪里的政治学就弱小。”并进一步指出:“二者的关系再没有比二战前的德国和意大利更一目了然的了,这些国家在历史、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方面有独立的学术传统,在政治学上却没有这种传统。”[1]

然而,仔细审视这些观点,我们不免对政治学与民主之间这种所谓牢不可破的联系产生怀疑。亨廷顿文章的主要思想是,民主改革应该缓慢、逐步和非常谨慎地实施,不能对独裁国家逼

得太厉害,因为"一个现行的邪恶政体不管多么恶劣,总是有可能而且经常会出现更邪恶的政体:看看古巴、越南和柬埔寨的不幸经历就可想而知……因而,政治学家只能怀疑像智利一名持不同政见者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提出的一种观点,'我们再也看不到比皮诺切特将军更坏的了',或者怀疑一位反种族隔离制人士的观点,'南非第一届非洲人政府……绝对不比当前的政权更坏了'"。比它更坏的情况明显是"由非洲国民大会革命者"领导的政府。[2]

亨廷顿提及南非并非偶然。数年前,他到约翰内斯堡会见了南非官员,并在南非政治学会做了一次关于政治改革的演讲。[3] 他这次南非之行的背景是,该种族隔离政权试图对宪章进行有限的修订,让该国的混合种族和亚洲人种享有某些权利,而把黑人排除在外。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担任《纽约时报》驻南非记者(后来为该报的主编)的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关于此次努力所做的评论值得长篇引述,因为它一方面为思考政治学与民主的关系提供了佐证,另一方面预示着我下文的研究途径:

> 由美国政治家发明并适应此类种族革新方法的行话,总是不可思议地引人注目……,手握统治权的国家政党现在能端起一面镜子对着自己,发现它有希望成为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罗伯特·罗特伯格(Robert Rotberg)所说的"改革寡头政治的样板"。像"限度"(parameter)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类的术语如同冰镇威士忌饮料中的外来水果片一样,在白人政治家和官员的谈话中传诵。南非斯特伦伯什市(Stellenbosch)一位教授告诉我,该政党努力策划"范式转变"(paradigm switch)。第一份关于宪法修改的主要文件,即由被称作"总统委员会"(President Council)的

多种族咨询团体委员会出台的报告，是由一位拥有康奈尔博士学位的国内大学教师起草的。在起草纲目中，他引用了约三十位美国政治学家的观点。所有的观点都试图装点这样的论点："……在当前和可预见的环境下"，黑人不能"进入一个成功的民主政府内"，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差异、相对数目、相冲突的利益和不同政治目的"。换言之，存在多数人把民主滥用于其自身利益的危险。因此，该报告呼吁在白人、有色人种和基于"分割自治"的印度人之间实施"有限度的联合"，这样才能确保"至少不打乱现有的权力关系"。[4]

莱利维尔德提到的委员会报告中引用亨廷顿的观点几乎比任何其他美国学者的都要多。[5] 例如，报告里一段很长的引注来自亨廷顿在南非参加会议时的论文，它称，虽然"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这种自由主义观点"对美国人很有吸引力，但是"这种（自由主义）原则是否适合南非的传统，在南非是否行得通，在我看来是值得怀疑的"。[6]

莱利维尔德指出，亨廷顿在论文中也考虑过这样的理论命题，即"独裁主义的强化对改革而言实际上是必要的"[7]。亨廷顿说，"限制民主的参与范围可能是最终拓宽这种参与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不是不可想象"，而且"权力集中化（centralization of power）也有助于政府控制暴乱，是进行重大改革的需要"。[8] 无论亨廷顿所说的"权力集中化"等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正如国家警察署长约翰·科特兹（Johan Coetzee）所称，南非官员已经使用"亨廷顿命题"为他们的行动合法性提供依据。莱利维尔德评论说："在约翰内斯堡提出如此论题，而不考虑南非'控制暴力'所采取的实际做法……是一种故弄玄虚的行为（比如人与人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改革是何其艰难。"[9]

莱利维尔德直言不讳的评论，并不表明美国大多数政治学家赞同亨廷顿的观点，更不用说他们支持种族分离政权所采用的那些观点。公正地说，大多数政治学家并没有认可它，而且被南非总统委员会报告所引用观点的那些学者也不见得同意这一报告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政治学家如麻省理工学院威拉德·约翰逊(Willard Johnson)还在反种族斗争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10]但莱利维尔德的评价确实说明了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学者如何使镇压合理化。莱利维尔德的著作还暗示，由美国培养的南非政治学家乐意为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政权服务，政治学在南非白人大学里一直是一门生机盎然的学科。它提醒我们，在南非白人斯特伦伯什大学里的知识层，“神学和政治学课堂是南非前总理亨德里克·维沃尔德(Hendrik Verwoerd)的‘大种族隔离’之梦”。[11]这一事态粉饰了亨廷顿“哪里的民主弱小，哪里的政治学就弱小”的观点。

总之，莱利维尔德的观察表明，虽然作为个人的政治学家有可能投身于民主政治，但是政治学家的理念和政治学专业与非自由和非民主政体本质上并非不相容。自由民主价值观与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如亨廷顿所宣称的那样绝对。

亨廷顿本人的传记不但质疑政治学附属于民主的观点，而且对美国政治学自我形象悖论的其他成分——客观性前提——也提出了怀疑。在漫长而卓著的学术生涯中，亨廷顿不但给国外官员提过忠告，而且更广泛地向他自己的政府提出过建议。他的学术生涯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政治学实际上是否更贴近美国本身而非贴近“民主”。

1961 年 7 月，亨廷顿给政治学家、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长期顾问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写信，感谢他帮助亨廷顿入选宇宙俱乐部(Cosmos Club)。“我一直认为宇宙俱乐部

是绅士学者在华盛顿的合适家乡，”他写道，“鉴于目前（肯尼迪）政府当政，我希望能经常借用俱乐部的权威。”[12]

亨廷顿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对外政策部门的亲密关系比“现任政府的任期”还要长。他不但建议约翰逊政府继续越南战争，而且当过“许多政府部门的顾问”，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中央情报局等。亨廷顿还在“空军战争学院”（Air War College）、“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武装力量工业学院”（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以及“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演讲过或做过顾问。他曾在“总统国际发展特遣部队”（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69—1970）、“美国-拉美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U. S.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1974—1976）、“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Long Term Strategy）（1986—1988）以及“保护与缩减政府秘密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otecting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Secrecy）（1995—1997）供职。1977—1978 年，亨廷顿在他的密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安全计划协调员。亨廷顿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13]

在与美国政府各外交政策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亨廷顿出版了一些 20 世纪最具影响的政治学著作，包括《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美国政治：不和谐的承诺》（1981）、《第三波：20 世纪晚期的民主化》（1991）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亨廷顿的学识为他赢得了令人称羡的奖励和荣誉，包括“古根海姆奖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美国政治学会（APSA）主席以及格劳迈耶世界秩序奖（Grawemayer World Order Award）。

我关心的不是个别学者为政府工作的行为道德规范。[14]学者也是公民,他们有资格——有人会说他们有义务——为国家服务。我关心的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政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亨廷顿的学术生涯是独立于他的外交政策生涯之外还是二者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呢?亨廷顿的学术丝毫没有受到他所积极参与的美国外交政策政治的影响吗?他的生涯是不是说明了美国的政治学更附属于美国政权而非民主政治本身呢?政治学家声称他们研究的专业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者与研究目标是脱钩的,那么政治学家对政治的纷繁理解会产生何种后果?

虽然近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观点,特别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政治与学术是一体关系,但是关于这一观点的相关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知识,要上溯到更远。[15]60 多年前,英国学者 E. H. 卡尔(Edward H. Carr)很有想象力地采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社会学知识,揭露英美国际关系学的意识形态根基。[16]而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关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一文中强调:"所有涉及文化现实的知识……总是来自'某特定的观点'。"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是由历史背景塑造的:

> 文化问题推动人类自我革新,日新月异,在为我们获取意义和重要性的无穷尽的具体事件中,文化领域的界限……在不断变化。文化接受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知识背景也会变动。在无限的未来,文化学的起航点会不断改变……一种文化学体系只从明确、客观可行、体系稳定的角度看待问题,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学术"观点"不但因时而变,而且因民族血统而异。他的观点不是说,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学者不

能就经验式和逻辑式事实达成一致。相反,“社会科学中一个体系上正确的证据,如果能达到目的,那么它肯定会得到甚至中国人的认可……另外,对一种理想和它的最终法则的成功逻辑分析以及用逻辑和实践方式发现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也是行得通的”。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的伦理规则中可以缺乏‘理性’,他能够而且无疑经常会摒弃理想本身和来自其中的具体价值判断”。

因此,韦伯认为,要追求一个普适性的阿基米德(Archimedean)式的观点并从中解析人类事务不断变化的复杂事实是徒劳的。有意义的社会科学有必要从特定的观点中建立,改变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为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对象,塑造“用于研究的概念体系结构”[17]。

尽管韦伯和卡尔已成为现代政治学的规范化形象,但就社会科学知识的历史和地理相关性而言,他们的观点还不是学科的内在成分。卡尔成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想的偶像,但是,那一亚领域的当代学者几乎从未拿卡尔应用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意识形态(ideologiekritik)工具解剖他们的学科。同样,尽管自二战以来,美国政治学家对韦伯敬仰有加,但是,他坚持知识属性的局限性以及他对一门系统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所持的怀疑态度,几乎没有在该学科中产生多少共鸣。有关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更近争论,除了在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亚领域的狭小范围外,并未引起任何兴趣。

虽然在私下里或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政治学家也常常承认,他们的研究议程一直受到一系列国家和国际事务或个人参与政府和政治工作的影响,[18]但是,事实上,业内有关方法论方面的著述对这些问题三缄其口。这些著述向学生提供有益的建议,教他们如何验证理论命题的实证事实,而很少讨论这些命题

由何而来。他们的“重要性”概念是统计学上的，而不是文化历史上的。从有关政治研究范围和方法的书本上，人们很难猜出观点是社会科学认识论的重要问题。这些书本也不会邀请政治研究者对照他们研究的对象，苛刻地调查他们的立场。由于疏忽，来自政治学讲道的政治学形象成了一门研究政治而表现为外在政治的客观科学，它的问题和概念的构建并不根植于任何历史或民族背景。美国的政治学可能反映一种明显的美国观点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关注。[19]

关于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形象，我在本书中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种形象的两个成分究竟有多精确？政治学是独立于它的民族血统和历史背景的客观科学，还是带有明显的美国特征？政治学如何忠于自由、民主？第二个问题我在结论中做了说明：如何解释该学科自我形象的内在矛盾？如果从纯客观和偏向民主价值观的角度看待政治学，又会怎样？

尽管南非个案不是本书讨论的中心，但是约瑟夫·莱利维尔德的批评启发了我的分析方法：把国外政权以及美国与这些政权的关系当作反映本学科面貌的镜子。更具体说，本书探索该学科在塑造 20 世纪美国主要敌人的画像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它对美国的性格刻画（我常称之为“US”）以及它与美国对敌战争的实际牵连。我着重研究的敌人——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以及斯大林苏联（我还简要讨论了法西斯意大利）——在其成为美国的死敌之前，都与美国有过正常甚至亲密的关系。[20]为了验证政治学是从明显的美国视角（而不是从客观层面）而著，我引证了美国的敌人在与美国发生冲突前后的形象变化的系统模式。为支持我的个案分析，我引证了美国的战争与政治学的理论转型同时发生的模式（它与美国版本的政治学转型同步）。我还进一步引证了政治学界的重要圈子与美国政府的亲密关

系，揭示政治学的美国性，并追踪这一政治权力与政治学的亲昵关系如何产生重大的理论概念和研究项目。

探讨政治学中的美国敌人特征，有助于严格检验政治学可能的客观性和它是否附属于民主等问题。美国的主要敌人包括20世纪最危险的政权。然而，在与法西斯和斯大林式的独裁政府发生冲突前，政治学的主要刊物和教材对它们并不苛刻，有时还带有明显的友好态度。

在一至三章里，我把与美国敌对政权的冲突后形象（post-conflict）和标准评价与同期的形象刻画进行比较。所有个案表明，冲突开始后，美国政治学家提供的敌人画像要黑暗得多（与美国的形象全然不同）。在第一章中，我证明了，把德意志帝国看成与美国“民主”对立的“独裁”形象，并没有得到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学家约翰·伯吉斯和伍德罗·威尔逊的认可。伯吉斯这位美国第一所政治学研究生院的缔造者认为，德国的政治体制仅次于美国。尽管今天的政治学家认为德皇缺少议会职责是一个严重缺陷，但伯吉斯却把威廉德国这种保守特征看成它的优点。同样，19世纪80年代，威尔逊把德意志帝国看作宪政国家，认为它卓有成效的政府是美国政府的改革样板。尽管当今的政治学家指责普鲁士三级选举制（three-class electoral system）是对平等选举权的侵害，但威尔逊却建议美国城市采用那种体制，因为它给社会中“更优”的成员以特权。因此，相比今天政治学家对这些政体进行比较的标准，伯吉斯和威尔逊认定的标准更能说明德意志帝国看上去像美国。

墨索里尼意大利身上的典型标签——“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现在意味着特别残酷的独裁类别。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学家对法西斯意大利几乎没有说过好话。然而，20世纪20—3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对墨索里尼政权从不加批

评。有些人把墨索里尼的独裁刻画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力量,适合像意大利这样的落后国家。[21]其他人则相信,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方面可能对现代美国很合适。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对墨索里尼在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上"成绩斐然的实验"颇有兴趣。梅里亚姆还发起了一项针对法西斯政权培育公民忠诚的方法研究。他把这些方法称为"对学生的公民培训具有重大意义",完全可能为美国所借鉴。[22]梅里亚姆对法西斯意大利毫无批评的态度将在本书第二章讨论,也是这一章的主题序幕:政治学对纳粹德国的画像。

希特勒德国现在是十恶不赦的典型。纳粹德国也有"优点"的话题在当前政治学(更坦率地说是指美国文化)中是一个禁区,而战前它却在很合法的讨论范围内。1934 年 2 月,《美国政治学评论》英文版刊发题为《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评论文章,称赞编辑人员展现了"非常公正的希特勒画像",包括希特勒"对国家理论和政府属性最富启发性的评论"。[23]这一评论文章并非反常。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学家建议冷静地研究纳粹德国,认为纳粹政权并非没有积极的成就,尤其是在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领域做出了成绩,美国可以向其学习。直到 1939 年,这种看法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的一系列文章中仍然清晰可见。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学家尤其是最著名的默尔·芬索德(Merle Fainsod)和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Friedrich)两位学者,在阐述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苏联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冷战高潮期,这一概念被政治学界普遍接受,它带有斯大林与希特勒政权为一丘之貉的贬义,暗含一种比传统独裁政府要可怕得多的暴政。[24]但是,正如我在第三章所指

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政治学家以非常正面的措辞刻画斯大林苏联的现象并非少见。例如,1934年,默尔·芬索德对苏联的中央计划试验很感兴趣,极大地克制自己把苏联政权称为独裁国家。1938年11月,芝加哥大学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塞缪尔·哈珀(Samuel Harper)威胁要起诉他的发行人,试图阻止后者把"哈珀著作"收集到题为"欧洲的独裁国家"系列丛书之中。[25]

总而言之,此时的德意志帝国、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形象与它们在成为美国的敌人之前的形象大相径庭。德意志帝国从一个进步的宪政国家变成了反动的"独裁政府"。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从合法的社会与政府试验场堕落为"极权主义"邪恶的化身。

20世纪美国另一大敌——日本的形象也有相同的经历。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已对这一事例进行了考证,他的研究结果与我的非常相似。他的结论是:"这个国家有关日本研究的知识历史反映了与美日关系变化的紧密关系。当美日关系友好时,学界对日本在美国的形象予以积极的评价,而两国关系一直敌对时,学界对日本的形象就变得苛刻起来。确实,美国的日本问题学术扎根于双边关系的政治文化要比社会科学深入得多。"[26]

因此,美国的敌人在政治学中的形象其历史变化模式非常系统化:在下文所有事例以及日本的例子中,敌人的形象都明白无疑地朝消极方向改变,而且这种变化与冲突的起始点是同步的。这一模式很清楚地表明,这些变化既受到美国对手的改变这一因素所驱使,又受到这些政权新凸现的事实所推动。我的观点不是说基于事实的知识没有出现,而是美国敌人形象的总体变化模式太系统,无从通过合理的知识从根本上对其加以解

释,更不用说以理性的学识对其进行独立地诠释。

美国外交关系的历史对美国政治学历史的影响还有更多其他方式,它引起了宽泛的理论变化,这种变化日积月累,导致美国本身形象的改变。这种理论“重塑”(re-imagining)现象,部分由于政治学家在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部门任职时积极参与美国的战争策划,充当顾问、咨询者和意识形态勇士等角色所产生的灵感。

有鉴于此,后面的章节将根据美国的主要战争介绍美国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作为一门学术专业的诞生始于南北战争之后。国家分裂的创伤提出了一项紧迫任务:要求为国家的凝聚力奠定知识基础。政治学专业的先驱们主要以美国的日耳曼遗产打下这种基础,其学说也是他们的德国导师们介绍而来的“国家”主权至上法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几种方式塑造了美国政治学的轨迹。首先,与德国的冲突打碎了美国是雅利安/日耳曼(Aryan/Teutonic)民族的形象。其次,战争导致了国家学说的急剧衰落,这种学说就像与它的德国口音关系密切一样,与其批评者所指出的分析缺陷极其相关。第三,1917 年和 1918 年,政治学家参加了一场向世界宣传美国政治目的的大规模运动,说服不情愿的美国公众支持政府参战的决定。这场宣传运动的巨大成功,提醒政治学家关注人类事务中的非理性因素,并告诫他们,大众舆论是毫不留情的。这一“教训”的结果是,在政治学界有影响的圈子里,尤其是查尔斯·梅里亚姆领导的芝加哥政治学系里,出现了对美国民主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幻想。

在战时意大利担任过美国首席宣传员的梅里亚姆没有放弃对民主的希望,但到 1920 年,他在民众的可陶冶问题上失去了

一切信心。他转而认为,进步的改革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技术专家的努力获得成功,他们会用心理学、社会学和优先学解释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因,提高公众的福利,加强公民和谐。梅里亚姆的社会控制说被他的优秀学生哈罗德·拉斯韦尔进一步发展了。哈罗德详细阐述了政治技术精英如何利用宣传技术净化政治冲突、训练公众接受正确的改革路线。

与德国展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推翻了日耳曼理论,严重损害国家理论(the theory of the state)。需要另一场战争摧毁另一个带有德国印记的理论领域: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行政一直是政治学的核心亚领域,吸引了许多顶尖智囊的目光。此领域被一个范式归并了:这一范式把行政的概念定义为技术而非政治上的努力,褒扬官僚机构的理性和效率。该领域的创始人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他们试图把广大的决策领域从政党政治的腐败和低效率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接受精英领导管理的行政事务。由于对美国公共行政的落后深感失望,这些学者把目光转向国外模式以寻求灵感。他们尤其倾慕德国官僚的效率和敬业精神。一战后,公共行政对大众政治的不信任及其对科技的关注,与突然出现的社会控制观点恰相吻合。20世纪20年代后期,查尔斯·梅里亚姆建立了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Public Administration Clearing House),这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一家财力雄厚的附属机构,其职能是建立培养行政专家的国内和国际网络。

德国行政效率的显赫声名在大战中得以幸免。以芝加哥为基础的情报交流中心1933年之后与德国学者保持合作关系。纳粹夺权后,美国行政学学者并没有放弃对德国的朝拜。这些朝拜者尽管不认可纳粹的政治目的,但他们把行政看成不关心

政治的传统促使他们不存偏见地研究纳粹的行政改革，并考虑应用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浩劫——表明了长期受仰慕的官僚机构如何非常合理地推行恐怖的政治计划——最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行政带有政治性，使政治学家（已经太迟地）意识到马克斯·韦伯对官僚机构的悲观看法。纳粹“教训”解释了为什么此次战争之后公共行政很快陷入了长期的身份危机，也表明为何它丧失了先前在美国政治学界所拥有的地位。[27]

美国的下一次大冲突——冷战——给政治学留下的烙印，将在第三和第四章讨论。美国与苏联的冲突使政治学抛开了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理想和观念，尽管这一联系是单薄的。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业内的领导者自觉地认定政治学是一种“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因为在一些政客和基金会成员的头脑里，“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含混不清（不同于业内流行的观点，新标签与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概念毫无关系）。[28]“社会控制”这一术语（及其幻想）的消失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年事已高的查尔斯·梅里亚姆坚决维护“有计划的社会一定是民主社会”的观点，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那种浓烈的反共产主义气氛下，任何带有“计划”二字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太苏联化，不被政治学概念词典所收纳。

20 世纪 30 年代非常流行的先进“民主”概念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期间，政治学家以相同比重的经济与政治术语、理想与选举程序给民主下定义。默尔·芬索德 1934 年说过：“民主关心根除贫穷……和减少失业一样关心普选权。”查尔斯·梅里亚姆则部分根据理想如“人类的完美性”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利润的公平分配来定义民主。

然而，19 世纪 50 年代，政治学家得出结论认为，信赖人类的“完美性”与“极权主义”政体属同一病症，他们放弃了民主中

的大量幻想,因为这种民主倾向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研究中所倡导的程序定义(procedural definitions)。这十年中,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把美国民主政府解读为由民主社会舆论协调一致的多元化社会过程。那种把美国看成由技术政治精英从技术上控制团体间冲突并引导社会朝目标挺进的强大国家的幻想,已让位于这种思潮:美国的政治不再需要不关心政治的、思想开明的行政官员来拯救。就如特伦斯·鲍尔(Terence Ball)所说,正当被罗斯福新政——20 世纪 30 年代梅里亚姆和许多政治学家为此奋斗过——寄予厚望的国家变成具体现实之际,国家被美国政治学的概念清单淡忘了。只有冷战的背景能解释这种悖论。[29]

20 世纪 50 年代的政治学表明了另一种悖论。就在国家机器——设计者、行政官员、政治技术专家——被政治学讨论所忽视之时,著名的政治学家们狂热地把其专门技术随心所欲地用于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部门。政治学与国家的交织程度前所未有。[3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家参加了威尔逊政府的宣传运动,此时政治学与国家安全部门开始了短暂的亲密接触,并在二战期间迅速发展为一种持久关系。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政治学家成群结队地涌入华盛顿迅速膨胀的联邦政府里任职。其中一些人加入了情报和心理战争部门,这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和整个政治学专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像战略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以及国会图书馆哈罗德·拉斯韦尔宣传分析部,扮演一种非正式的研究生院角色,美国许多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云集于此,指导年轻才子的研究方法。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从与哈罗德·拉斯韦尔的接触中受益的学者听起来就像战后社会科学的

名人录,包括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海因茨·尤劳(Heinz Eulau)、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等。他们和其他学者的战时作品不但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研究技能,而且容易使他们形成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在回应由冷战产生的新要求时处于有利位置,是心理学和意识形态战争专门知识的需要。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学术生涯是一个相关个案,我将在第四章加以详细论述。20 世纪 30 年代,阿尔蒙德在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名下从事研究,并在战争期间一面继续他的非正式教育,一面研究宣传与公众道德。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和 50 年代,阿尔蒙德在空军大学(Air University)、国务院、海军研究部(Office of Naval Research)、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空军、白宫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of the White House)等政府部门担任过顾问。阿尔蒙德的著作《共产主义诉求》(*The Appeals of Communism*)(1954)是在美国阻遏意大利和法国共产主义的背景下研究完成的,而且阿尔蒙德使心理战略部与他的研究结果同步。此书的部分研究任务交给了民意测验专家埃尔莫·威尔逊(Elmo Wilson)。二战期间,后者曾与阿尔蒙德一道任职于战争信息办公室。威尔逊的民意测验机构与美国新闻总署(U. S. Information Agency)关系密切,也为阿尔蒙德后来的杰作《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承担过大部分的本领域学科研究。《公民文化》明显是由“正在形成的国家”为赢得人心和思想的需要而激发的,阿尔蒙德自觉地把他的研究视为梅里亚姆对市民教育研究的续篇,这又反过来激起

了梅里亚姆为赢得意大利人民的人心和思想而战。因此,《公民文化》被认为是政治学学术与外交政策政治彼此支持和融合轨迹的顶峰。[31]

第四章列出了政治权力与政治学在冷战背景下鱼目混珠的三种方式。一是,战后公共行政学科地位的下降被公共行政学者积极参与美国对不发达国家(包括越南)的对外援助项目的热情所缓解。政治学依恋于政治的另外两个事例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建立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的智囊团)的冷战研究事业以及与埃夫伦·柯克帕特里克(Evron Kirkpatrick)相关的故事。柯克帕特里克 1954 年离开国务院情报部门,当上美国政治学会执行主任。在投身于民主党自由反共派并与美国中央情报部门保持秘密联系的同时,柯克帕特里克把政治学的身份提高为一门客观科学。

所有这些情况已经清楚地(如果不是完全地)表明了冷战期间美国政治学与美国外交政策部门之间的亲近关系。政治学与美国外交政策政治之间的这种亲昵现象,对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即研究者与研究目标互为分离的前提假设提出了挑战。

第四章还讨论了越南战争给政治学的说教打上的烙印。首先,越南的经历在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调解下,为比较政治学"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方法的兴起播下了种子。波普金先是为五角大楼发起的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研究项目工作,后来因拒绝配合政府调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事件而进了监狱。他反对以拉斯韦尔、阿尔蒙德和阿尔蒙德的弟子白鲁恂(Lucian Pye)为代表的著述中所提出的心理与文化方法,并首次推出了重大理性选择,分析第三世界的政治。[32]

越南战争是造成内在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政治学学会中产生了强烈的(倘若是短暂的)民主复

苏。另外,越南战争也是对美国政治中盛行的多元论幻想提出严重挑战的背景。对政治学理论和美国政治学的学生而言,对多元论的觉醒引发了他们对社会民主或参与民主等观念的兴趣。就比较政治而言,逃离多元论促使学者思考那些重视“国家”(the state)自治的概念,尤其是社团主义(corporatism)*。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这些对多元论正统观的挑战消逝了,今天,美国政府多数大学的教材仍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多元化民主国家。

最后,在另一逐步展开的政治学、国家、国家概念间的荒谬关系中,越南战争在回应“把国家重新纳入理论框架”呼声的同时,引发了政治学与现实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33]战争升级和战后紧缩防御开支所造成的预算压力,对国务院在政治研究方面的慷慨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减缓了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风靡政治学界的行为(科学)革命的发展势头。越南经历也在政府和学术机构之间打进了楔子,在美国的大学里产生了一种思潮:社会科学家与政府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被视为缺乏职业道德。

冷战结束以来,反对学术与政治勾结、呼吁规范的呼声已经消失。正如一位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耶鲁大学政治学家 2000 年底所指出的,教授们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合作“现在就在咫尺”[34]。为回应 2001 年 9 月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而发动的“反恐”战争,可能再次拉紧美国政治学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依旧是,在为美国政府利益服务的同时,政治学能否成为一门客观、公正的科学。

为突出重点,我在本书中把美国外交政策作为反映该学科

---

* 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组合的理论与实践。——译者注

外观的一面镜子，探讨美国政治学的客观性及其对民主承担的义务。美国政治学家对国外专制政权不加批评的历史记录，已经对政治学与民主之间的所谓联结关系提出了疑问。国外政权从朋友到敌人的转变与政治学家对这些政权的看法之间的一致关系，证明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点而述。

然而，一旦我们注意到美国的战争与政治学家对美国自身形象描述的改变是一致的，认识到这些战争对政治学与美国政府之间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属于一致模式，那么这一典型的美国学科特征也就见怪不怪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政治学家为回应内战后提出的挑战而采用的理论：美国的德国（日耳曼）身份理论和国家主权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那些受不关心政治的开明专家控制的美国幻想以沉重打击。冷战破坏了“民主”与社会经济学理想之间的关系，呼应了多元化（pluralistic）、程序式（procedural）的美国民主观点。冷战也增加了政府对专业政治学家的需求，政治学家对此非常乐意效劳，尽管他们从自己的理论中去掉了国家机器成分。越南战争拉开了学科与政府的距离，但是，这种疏远关系恐怕会因反恐战争的升级（如果不是从冷战开始的话）而划上句号。

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政治学家如何给带有国家和历史观点印记而又不承认那种观点的思想体贴上标签呢？什么样的国内社会科学术语能描述那种无需自我检验并自视为永恒和普遍皆准的人性化思想呢？政治学家也许把这种思想称作意识形态。遗憾的是，他们几乎从未反省他们自己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属性（然而实际上，缺乏

反省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痕迹)。就像一门有目的的科学一样,美国的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国家根系的意识形态。

我使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按思想家如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的理解,它的知识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它的传播者被错误地(如果真诚地)认为是普世的。[35]我并不是说,美国的政治学成了带有"主义"(ism)的意识形态——一种导向清晰规范目标的固定、僵硬和严密的思想体系。确实,把意识形态概念定义为"主义"本身就是美国的国际对手的产物。它在冷战的高潮期得到普及,当时美国知识分子把意识形态的僵硬和热情归因于极权政体而在美国本土却宣称"意识形态终结"。[36]美国的政治学不是一个固定的"主义",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不是僵硬和一以贯之,而是随着争论和分歧摇摆。但是,在反反复复的变幻中暗藏着一个永恒的潜流:美国。

美国的福祉是该学科的主要价值所在,而且政治学表面上的客观概念掩盖了对美国的规范梦想。当政治学家争论抽象的概念——特别是涉及民主概念时——他们实际上是争论美国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应该是什么。而身份或曰自我认识(self-understanding)其实是空洞的,除非将它放在与"他人"(Other)的关系中去比较。只有通过与"他们"(Them)比较异同,"美国"才能凸现意义。[37]因此,美国政治学家不断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比较美国与国外政权制度的方式,来确定美国的身份。虽然"美国"是政治学永久关心的主题,但是,"美国"身份也不断受到质疑,且容易变化。因为身份是一个理性概念,因此,对"美国"的想象与修正(revision)必须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修正。美国形象和世界形象的彼此构建,具有三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图景。第一,对美国形象的看法,政治学家中可能存在"抵制派"(oppo-

sitional)，认为美国的制度结构上不健全，并寻求大刀阔斧的改造。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很可能认为美国至少比一些海外国家低下，他们可能希望按国外某一革命模范形象彻底改造美国。第二个可能的意识形态图景是“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在这一观点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健全的，不需要学习或借鉴国外制度。民族主义有两种形式。就其低调形式而言，它等同于“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即美国的制度是优秀而独一无二的，因此不能传授给其他人。从其“必胜性”(triumphal)形式看，民族主义意味着，美国如果变得更像世界，美国会一无所获，而世界如果变得更像美国，世界会收获颇丰。第三，在“抵制派”和“民主主义者”之间，还存在一种“妥协主义”(accommodationist)观点。然而，民族主义和抵制派的意识形态分别表现为保守和激进，而妥协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则以改革主义者面目出现。从妥协主义观点看，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健全的，但受重大缺陷所困扰。妥协主义改革者也许会从国外寻找解决办法，矫正他们在美国发现的缺陷。他们可能不会照搬国外的整个模式，但会选择性地借鉴这些模式的某些特质，弥补美国的可能缺憾。

概括地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观看，美国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向世界学习的地方；从抵制派的观点看，美国必须从根本上吸取世界的经验。而对妥协主义而言，美国应该学习世界，只要这种学习是适度的，并具有选择性。[38]

抵制派的意识形态很少能调和政治学中已有的共识，更不用说主导这一学科。诚然，从来没有哪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能被冠以“知识分子取向的激进者”之名(至少在他们赖以成名的著作中所表现的取向未表明这一点)。抵制派的意识形态边缘化倾向有一个惟一的例外出现在 20 世纪 30 和 60 年代。在大

萧条期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大学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迎合了年轻政治学者的想象。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有许多朋友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林肯·布里格兹(Lincoln Brigades)并肩作战。他在1938年完成的论文对美国的"富豪阶级"大加挞伐。[39]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达尔、戴维·伊斯顿、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和二战后成名的其他学者,都与各种社会主义有瓜葛或有过短暂的暧昧关系。[40]同样,当今政治学界一些很知名的高级学者在他们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时代也支持过激进的政治。在这两个时期,大多数是研究生或年轻的教员被激进的左翼冲击波一扫而空,而且这一冲击波大起大落。

历史上,政治学讲义一直在民族主义和妥协主义立场之间来回摇摆或分裂。在大萧条期间,该学科很极端地摆向妥协主义。虽然有些政治学家对激进主义暗送秋波,但该学科的主要倾向还是接受"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气息——这一气息把美国诊断为重病在身而不是病入膏肓,它开的药方是让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的万能药来医治病症。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家指望包括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内的国外政体成为美国行政效率和社会规划的典范。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该学科摆向保守的民族主义。就低调表现形式而言,民族主义在罗伯特·达尔的名著《民主理论的前言》的结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指出,虽然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为了输送给其他人",但它是一个"在不平静和极端的人们管理一个巨大、多样和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中维持社会和平的相对有效体制"。就其必胜性表现形式而言,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体现在西摩·利普塞特的表述中:美国式

的民主“是运作良好的社会本身”,而“解释20世纪中期西方民主的实施情况有助于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斗争”。这种必胜性表现的民族主义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悉尼·维巴(Sidney Verba)大获成功的著作《公民文化》中也清晰可见,该书毫不掩饰地歌颂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的政治天才,而把其他的政体排在发展梯级上的较低位置。[41]

在其他时期,政治学的说教则同时阐述了民族主义和妥协主义两种观点。例如,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的大量内容是围绕“民主化”和“民主和平”来布道的,明显把美国放在了世界典范的位置。[42]而与此同时,政治学的讲义又对美国公民精神的衰落表示忧虑。此种担忧反映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成功之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该书是对《公民文化》的继承。在本书和随后的著作中,帕特南把意大利北部描述为值得美国人学习的公民结合模式。因此,帕特南摆出一副妥协主义架势,与《公民文化》一书中充满必胜信念的民族主义形成鲜明对比。[43]

这种意识形态二元性有时反映在政治学家对个别国外政体的理解上。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意大利研究专家亨利·R. 斯潘塞(Henry R. Spencer)认为,墨索里尼的独裁是合理的。他的理由是,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太先进,不适合落后的意大利(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姿态)。同时,我们已经看到,也有其他学者把法西斯意大利看成是可以潜移到美国的技术试验场(这是一种妥协主义姿态)。[44]这两种意识形态特性甚至在单个学者的学术中同时具备,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伍德罗·威尔逊事例一样。在威尔逊的眼里,美国既出类拔萃又有瑕疵,既是世界的模范又需稍加改造。

我关于美国政治学中美国与它的敌人相互构建形象的观点

变化，现在可以用这些意识形态图谱重新加以解释。在本书详细考察的所有个案（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中，政治学家过去常常隔着透镜看这些政体，这至少带有部分妥协主义成分。当代一些著名学者迷醉于这些政体的某些方面，寻思向它们学习，以改革美国生活中的相应方面。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当敌对状态开始后，政治学家对这些政体的看法都无疑向民族主义方向转变。至于他们过去的妥协主义倾向，他们一个个都患了健忘症。他们一致认为这些政体与美国的民主是对立的。

知识关联：建构主义、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社会学

虽然本书的中心主要是学科的历史，但是，它里面出现的问题不是由政治学年鉴中的优先兴趣所引发的，而是由我对“民主和平”论发起的批评所触发的。“民主和平”是当前我所研究的国际关系亚领域中讨论的中心思想。[45]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我这部书与冷战结束后一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建构主义”流派的轮廓吻合。建构主义研究取向的要旨是国家“身份”（identity）。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自我（selves）即身份是一个变量，它们依赖于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建构主义关心国家身份或文化自我认知（cultural self-understanding）如何由它们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历史来形成。[46]我重点研究的美国对外关系与政治学家对美国的观念演变之间的关系，正好赶上这个议程。

建构主义学者引证不同政治行为者思想的社会和历史内在属性（embeddedness），产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然而，像其他政治学家一样，他们回避了对他们自身学科产生的思

想的内在属性进行反省。缺少这种自我反省的结果是,建构主义者对他们本思想流派的开创者似乎一无所知。虽然“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是国际关系中较新的概念,但是它所关注的主观认识、表现、国家形象的社会演变以及身份等概念并不是前所未有的。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在为赢得世界人心和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内容中,有些政治学家对国家共同体如何彼此想象对方(并对其他国家如何看待本国的形象)的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德·霍普夫(Ted Hopf)指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是远远超出他时代的建构主义者,他(在他的开创性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研究中)认为,个人不可能参与没有共同体主观性的有意义的行动”[47]。

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sacs)关于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形象认识,是冷战意识形态竞争中另一项独具见解的建构主义研究。伊萨克斯总结说:“形象对事件的作用难以捉摸……但事件对形象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重大事件如战争强制地侵入许多人的私生活。”20 世纪,伊萨克斯指出:

> 至今,一大群朋友和敌人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仅仅数年内,人们被号召转变“东方残忍分子”的形象,先是从中国转到日本,后又从日本转到中国。单是一代人里,德国的主要形象就从和善的资本阶级变成磨刀霍霍的军国主义,再变成纳粹杀人犯,最后又回到旧式的形象:分为西部(友好的)和东部(不友好或被禁锢的)有效率的勤劳人民。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美国人们被要求摒弃日本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之征(Bataan Death March)的形象,接受它为一个改造的罪人和诚实的民主主义者……就在同一时期,美国人对斯大林的形象从清洗年代的独裁者迅速飞跃为战争年代的“约瑟夫大叔”(Uncle Joe),然后又回到自大

狂(megalomaniac)。[48]

我在本书中试图建立这样的论点:就像重大战争给美国人脑海里留下伊萨克斯所说的"抓痕"(scratches)一样,它们给美国政治学家的学术也打上了印记。[49]

通过我的观察,美国政治学缺乏反省是普遍现象,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近年来,也有几位学者在政治学发展问题上,对不同的章节书写了充满想象的批评史。[50]当然,把政治学置于它的学科背景之外考虑或指出政治学献身于科学与献身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我的著作并不是第一部。[51]我也不是第一个指出政治学带有明显的美国意识形态性质的学者。多罗茜·罗斯(Dorothy Ross)官气十足的美国社会科学历史的主要论点是,她的研究主题的"明显特征在于它与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国家意识形态有瓜葛,这种思想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占有例外地位"。[52]这些学术历史给我以很大鼓励和启迪,我无法在注释里一一加以说明。[53]

然而,这些现存的研究成果并非没有缺憾。虽然他们详述了美国社会科学演变的国内社会历史背景,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了国际环境对美国社会科学取向的影响。[54]从美国社会科学包含一个例外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看,全面忽略美国思潮的国际背景尤其成问题,因为"例外主义"概念就其定义看是理性的:某物只有参照其他物才能成为例外。因此,在缺少用来比较美国社会科学的精确检验方法,以及同美国进行比较的相关国外社会的情况下,美国例外主义作为解释社会科学历史的万能钥匙的观点,无疑是一个先人为主的公理了。

本书把美国政治学明确地放在它的国际历史背景下考察,试图纠正目前国内有关学术历史的论述中所存在的偏见。它同时修订了政治学历史对例外主义的解释,指出,例外主义只是更

广义的民族主义的一支[它的其他分支我称其为必胜主义(tridmphalism)],而且民族主义学术内涵常常与妥协主义共存(有时甚至被妥协主义掩盖)。

事实上,正如其他知识思想和意识形态一样,我此项研究是站在社会学知识创始人的宽大肩膀上——从卡尔·马克思到卡尔·曼海姆——它揭示了知识思想的相对性。[55]曼海姆在魏玛共和国(Weima Republic)争吵不休和具有政治性的知识氛围中写作。他希望,社会思想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能被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想家所淡化,希望政治和意识形态能发挥"社会独立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全面孤立于社会纷乱。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以及其他战后美国社会学家也对这种非意识形态、学究式的社会科学寄予相似的期望。他们赞同冷战观点,即意识形态是禁闭于另一端的"主义",这样,他们就避免了反省自己的社会科学疏于揭露学科的意识形态根基。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默顿式的观点受到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和科技研究中多学科领域里的年轻学者的极大挑战。他们[部分因为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思想的鼓舞下]避开了国内对科学进程的论述,倡导对科学实际进行现实、历史和社会学上的分析。[56]通过这一研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总体方法与下列观点具有密切关系,即:与曼海姆的观点相反,社会科学知识即便置身于学术自由的制度下,也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

注 释

1. Samuel P. Huntington, "One Soul at a Tim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Refor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以下简称 *APSR*) 82 (1988): 3—10, 引自第6—7页。

2. Ibid. , 5, 9.

3. 该演讲稿以题为“现代化多元种族社会中的改革与稳定”(“Reform and Stability in a Modernizing, Multi-Ethnic Society”)一文发表,*Politikon*8 (December 1981): 8—26。

4. Joseph Lelyveld, *Move Your Shadow: South Africa,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5), 67—68.

5. Ibid. , 68.

6. Huntington, “Reform and Stability,”引自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First Repo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of the President's Council* (Cape Town: Government Printers, 1982), 36。

7. Lelyveld, *Move Your Shadow*, 68.

8. Huntington,同注6。

9. Ibid.

10. 约翰逊(Johnson)是美国最大的反种族隔离团体“泛非洲”(TransAfrica)的创始人。见 Isabel Wilkerson, “After Weeping for Mandela, Many Prepare to Savor Visit,”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90。另外,南非本国的一些政治学家也勇敢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例如,纳塔耳大学(Natal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理查德·特纳(Richard Turner)告诫他的白人学生质疑这个国家种族法律的道德性,结果 1973 年受到政府的查处,并于 1977 年遭不明袭击者的暗杀。见 Emma Daly, “Search for an Assassin,” *Independent* (London), October 16, 1996。

11. William Claiborne, “The Birthplace of Apartheid May One Day Become Its Deathbed,” *WashingtonPost*, October8, 1989. 我感谢格伦达·摩根(Glenda Morgan)和安妮特·西格斯(Annette Seegers)向我传授南非方面的知识。

12. Samuel P. Huntington to Harold D. Lasswell, July 26, 196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box 45, folder 625.

13. 引自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97 年登录的《马奎斯完全名人录传记》(*Complete Marquis Who's Who Biographies*), www. ga-

lenet. com。此外,我还从下列资料来源中发现了相关的传记信息:亨廷顿登录的《现代作家》(*Contemporary Authors*), www. galenet. com; George Will, "Professors Who Play Politics," *Washington Post*, May 7, 1987; Philip Boffey, "Prominent Harvard Scholar Barred by Science Academy,"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87; Loch K. Johnson, *America's Secret Power: The CIA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8—59;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319 n. 16; Chalmers Johnson, "The CIA and M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no. I (1997)。

14. 我也不关心亨廷顿作品的质量(或者本书中讨论的其他作者的作品质量)。亨廷顿无疑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一位博学且思维清晰的作者。

15.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1972); ide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1977);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16. 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6).

17. Max Weber, "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1904), in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and ed. 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81, 84, 58—59.

18. 例如,对约瑟夫·克鲁泽尔和詹姆斯·N. 罗西瑙的许多贡献,参见 Joseph Kruzel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Thirty-four Academic Traveler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9)。

19.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106 (1977): 41—60; and David N. Gibbs, "Social Science as Propagand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Bias," *In-*

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 (2001): 417—427,这些是国际关系亚领域的突出例外。

20. 关于意大利个案的更多讨论,见 Ido Oren, "Uncritical Portrayals of Fascist Italy and of Iberic-Latin Dictatorship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2 (2000): 87—118。

21. 例如,这种观点在业内研究两战期间意大利政治最著名的专家亨利·拉塞尔·斯宾塞(Henry Russell Spencer)[后来他被选为美国政治学会(APSA)主席]的著述中非常明显。同上。

22. Charles E. Merriam, *The Making of Citize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hods of Civic Trai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ix, 223.

23. Karl F. Geiser, "Review of 'Germany Twilight or Dawn?' by Anonymous, and 'My Battle' by Adolph Hitler," *APSR* 28 (1934): 136—138.

24. 见 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3。

25. Arnold Lien and Merle Fainso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Its Government: A Textbook for Students In Introductory College Courses and for the Active Electorat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4); Paul Harper, ed., *the Russia I Believe In: The Memoirs of Samuel N. Harper, 1902—194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240—241.

26. Richard J. Samuels, "Japanese Political Studies and the Myth of the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Foreign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Essays in Honor of Lucian W. Pye*, ed. Richard Samuels and Myron Weiner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1), 19.

27. 关于公共管理的战后危机,见 Donald Kettl,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ed. Ada Finifter (Washington, D. C.: APSA, 1993), 408; Vincent Ostrom,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3)。

28. 见 Karl W. Deutsch, "A Path among the Social Sciences," in Kruzel

and Rosenau,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18。

29. Lien and Fainsod, *American People and Its Government*, 441; Charles Merriam, *The New Democracy and the New Despotism* (New York: Whittlesey, 1939); David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Knopf, 1951); Robert A. Dahl, "Socialist Program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An Analysis" (Ph. 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40); idem,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Terence Bal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in Its Postwar Political Context," in *Discipline and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James Farr and Raymond Seidelm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218.

30. 这种悖论是由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提出的,他说"抛弃(国家)这一概念的原因不在于国家本身的变化,而在于美国政治学与美国政治权力之间的战后关系的改变",见他的文章,"The Limits of the State: Beyond Statist Approaches and Their Critics," *APSR* 85 (1991): 79。

31. Gabriel A. Almond,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见 Ido Oren, "Is Culture Independ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How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Shaped 'Political Culture'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2000): 543—573。

32. Samue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33.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4. Bradford Westerfield, 引自 Chris Mooney, "For Your Eyes Only," *Lingua Franca*10 (November 2000): 36。

35. 下列引用的资料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和意义的理解有帮助: 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erso, 1991); Mark Goldie, "Ideology," *in Political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ed.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l Ha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Warren Samuels, "Ideology in Economics,"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ed. Sidney Weintraub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36. 例如,参见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0); Robert E. Lane, "The Decline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 (1966): 649—669。

37. Said, *Orientalism*; William E. Connolly, *Identity: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38. 我从下列书中借用这种分类法,用于我的目的: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1—63。

39. 该学位论文60年后才发表,见 Gabriel Almond, *Plutocracy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Boulder: Westview, 1998);另见 Kathleen O'Toole, "A Man of Conviction: 60-Year-Old Thesis Published at Last," *Stanford Online Reporter*, April 29, 1998, at www. stanford. edu/dept/news/report。

40. 罗伯特·达尔与戴维·伊斯顿的访谈记录, APSA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y; Herbert Simon, *Models of My Life* (New York: Basic, 1991); Seymour Martin Lipset, "Out of the Alcoves,"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1999; 有关伊锡尔·普尔的传记,见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www. anb. org。

41. Dahl,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151;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9), 439, 456; Almond and Verba, *Civic Culture.*

42. "民主化"流派最显著的例子可能是亨廷顿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关于"民主和平",见 Ido Ore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hanging U. S. Perceptions of Imperial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995): 147—184。

43.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North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作者同上,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David D. Laitin, "The Civic Culture at 30," *APSR* 89 (1995): 168—174, 把帕特南(Putnam)的书称作《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在为政治文化研究设立标准方面的继承者。

44. Oren, "Uncritical Portrayals of Fascist Italy."

45. Oren, "Subjectiv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我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摘述了这一批评要点。

46.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998): 176. Hopf and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 (1998): 324—348, 霍普夫(Hopf)和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 Checkel)都对建构主义做了有益的评论。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1992): 391—425, 这是一篇有影响的文章, 该文强调国家间互动是国家身份的来源。

47. Hopf,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178;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3).

48. Harold R.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John Day, 1958), 405—406. 伊萨克斯属麻省理工学院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员。他严密的研究成果表明, 亲近政府的工作未必是低质量的工作。我这里关心的是政治学与作为一门客观的政治学的学科身份的政治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感谢波普金提醒我关注伊萨克斯的书。

49. 历史学家已经出版过无数有关改变国家形象而无须明确采用建构主义的研究。美国对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的形象研究, 我认为也有帮助, 包括: John P. Diggins, *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eter G.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Henry Cord Meyer, *Five Images of Germany: Half a Century of American Views on German History*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60); Frank A.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The "Red Decade" Revisit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50. 见 David Ricci,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Raymond Seidelman and Edward Harpham, *Disenchanted Realists: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American Crisis, 1884—198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John G. Gunnell, *The Descent of Political Theory: The Genealogy of an American Vo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James Farr, John Dryzek, and Stephen Leonard, eds., *Political Science in History: Research Programs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gers Smith, "Science, Non-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Terrence McDona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Brian C. 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51. 特伦斯·鲍尔(Terence Ball)对民主与科学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更为刺激的解释,见 Terence Ball, "An Ambivalent Allia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Farr, Dryzek, and Leonard, *Political Science in History*;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Smith, "Science, Non-Science, and Politics"; and various essays in David Easton, John G. Gunnell, and Michael B. Stein, eds., *Regime and Discipline: Democ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52. 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xiv.

53. 我还得到了邻近学科的前后历史的帮助和启发，它们包括：Ellen Herman，*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Expert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Novick，*That Noble Dream*；Christopher Simpson，*Science of Coerc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945—19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54. 两个显著的例外是鲍尔（Ball）和艾拉·卡曾尔森（Ira Katznelson）的观点，见 Two Notable Exceptions are Ball，"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in Its Postwar Political Context"；Ira Katznelson，"The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Political Science as Liberal Guardianship，"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Toward an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twar Years*，ed.，David Montgomery（New York：New Press，1997），171—194。

55. Karl Marx，*The German Ideolog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trans.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1936；reprint，San Diego：Harcourt Brace，1985）.

56. 关于有益的评论，见 Barry Barnes，David Bloor，and John Henry，*Scientific Knowledge*：*A Sociological Analysi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Steven Shapin，"Here and Everywhere：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1995）：289—321。

第一章　德意志帝国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是美国最痛恨的敌人。纳粹的恐怖和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文化和思想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对美国政治学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本章和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探讨这些重大历史经历对该学科的影响。我对德意志帝国——即第二帝国（1871—1918）——的政治制度在当前美国政治学的画像与当时美德战争还未发生时它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形象进行比较。今天，对德意志的看法带有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色彩，把德意志政体涂描成完全低于它们的对手美国。可是，19 世纪晚期的政治学家却持有一种混合的妥协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立场，把美国刻画为至高无上但美中不足的政体，它仍需向德国学习，同时也可以指引他们的政府艺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常常把德国的过去理解为纳粹德国的序幕，突出德国的（特殊）政治发展与英国、美国甚至法国的（正常）路线之间的分歧。鉴于此，德意志帝国自然被描述为官僚独裁的军国主义社会，它快速发展的经济现代化没有浇灌出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之花。

对现代德国历史的这种理解，战后一些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有很明确的解释。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

exander Gerschenkron)把德意志第二帝国描述为受容克(Junkers)*贵族统治的"半封建君主国"(semi feudal monarchy)。他指责这些德国贵族地主耽误了德国真正民主的发展,把他们的哲学定性为"纳粹意识形态的真正先驱"[1]。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悉尼·维巴推举英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为他们的理想。他们认为,美国一直追随英国的自由民主道路,而在19世纪德国,一种"参与者"(participant)公民文化未能扎下深深的根系,极权主义伴随强制性的普鲁士"官僚独裁"(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模式在整个国家播下了种子。阿尔蒙德和维巴还指出,在英语国家,"自由"的概念意味着保护个人的自由,而在德国,它历来是"国家摆脱外来约束的自由的同义词"[2]。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英国、美国和法国采用的这种通向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民主"(capitalist-democratic)路线与德国、日本实行的并最终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反动"路线进行了鲜明对照。根据摩尔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政治自由铺平了道路,而在德国和日本,资产阶级出卖给了贵族阶层,他们把统治权换成了牟取金钱的权力。摩尔把德意志帝国的议会制度看成一个"保守甚至独裁政府"的正面像。[3]

20世纪80年代,以戴维·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和杰夫·埃利(Geoff Eley)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德国过去"特殊道路"的解释提出挑战,认为这种解释带有1933—1945年事件的浓重色彩,没有公正地将德意志帝国的过去与理想的盎格鲁-美国的过去进行比较,也没有把德国的过去与大陆欧洲的经历进

---

* 意为地主之子,原为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19世纪后开始资本主义化,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译者注

行对比,更没有与英国单独对照。[4] 这些批评者认为,早应该“改变对德意志帝国专制政体定性的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应将它放在它的同时代背景下考察。[5] 布莱克本和埃利的批评在历史学家中挑起了激烈的争论,激发他们更公正地看待德意志帝国。[6]

然而,历史学家调整德意志帝国的形象对美国政治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最近大学里所使用的比较政治学教材仍在沿用格申克龙、摩尔、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解释。阿尔蒙德本人所著的流行教科书,把德意志第二帝国称为“只穿着民主外衣的独裁国家”,“公民是服从政府官员命令的法制拥戴者”。查尔斯·豪斯(Charles Hauss)的《比较政治学》把德意志描述为军国主义国家和“欧洲最独裁的国家之一”。迈克尔·柯蒂斯(Michael Curtis)的教科书把第二帝国称为“工业封建社会”,它的“工业化未能在英国和法国产生现代政体……其帝国体制中明显缺乏人权和其他保障”。[7] 其他教科书同样把德意志帝国描述为与英法对立的独裁主义。[8]

对德国历史的特殊道路(path)的解释在当前比较政治研究中留下的痕迹与大学教学中一样多。这些痕迹并不轻易显现,因为它们被表面上的客观数据表如流行的政体(polity)论掩盖了。政体论为现代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提供了描述性数据,包括为“民主政治”和“专制独裁政治”一年一度的综合考评。政体计划(polity project)的创始人特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是德国犹太流亡者、普林斯顿政治学家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的弟子。埃克斯坦的民主理论激励了阿尔蒙德和维巴以盎格鲁为中心的“公民文化”理论。[9] 根据政体手册,有关“民主国家”(democracy)和“专制国家”(autocracy)的大量解释部分受到了这一概念的启发:现代政治

参与的扩大“采用了两条道路中的一条，要么取多元民主制，要么取多党独裁制度”。在大部分西欧国家，民主化进程“已剥蚀得只剩下寥寥几个传统独裁制度的象征性遗迹”。相比之下，“中东欧帝国——德国、俄罗斯和奥匈帝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只从表层而不是实质上实现了有效的民主参与”。[10]无怪乎，政体计划给1914年前的德国打的分要比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分数要低得多。所选的评分标准正好得出这一结论（奥匈帝国和俄罗斯排在德国之后，美国几乎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获得了最高的民主得分）。

政体计划中的个案表明了数据表在原来有关政治发展的解释方面的客观化概念上所起的作用。今天，政体数据被普遍用于民主因果关系的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些问题与美国对外关系史没有明显的联系。[11]那些采用数据表的人常常把其政权类型的种类看成是特定的。他们对这些种类的由来和他们所给的历史解释全然不知，这一解释把民主的外衣与美国的敌人以及民主的实质与美国的盟国联系了起来。借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说，政体论是一种机制，通过它，美德关系的历史进程“轨迹”“沉积”于当代政治研究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12]

战后现代政治发展的最主要诠释者的学术，根植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期间反纳粹的斗争非常残酷。例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哈里·埃克斯坦这两位犹太人亲身经历了纳粹主义的恐怖，几乎不可避免地把德国的政治发展视为美国的对立面。

因此，当前美国政治学界对德意志帝国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美国的盟国英国和法国被描述为在19世纪晚期一直是自由和民主的，而德国被刻画成一个

非自由、军国主义和独裁的政权。然而，与德意志帝国同时代的人是如何刻画它的呢？19 世纪晚期的政治学家在比较政治体系中使用何种标准？在这些标准下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将受到何种待遇呢？

19 世纪晚期美国政治学界两位杰出学者约翰·伯吉斯和伍德罗·威尔逊就体现了连续两代人的观点。伯吉斯是由德国培养并在美国创立政治学专业的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一员。威尔逊属美国第一批博士群体中的一员。这两位学者也是明显的两种制度框架的代表。伯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政治学研究生院(1880)——这是该国第一家也是长时间内最著名的政治学研究生工程。[13]威尔逊在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受过教育(1883—1885)并在此任教数年，后来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竞争该学科领导地位的对手。[14]伯吉斯是一个亲德派，而威尔逊的文化和情感取向偏向英国。因此，伯吉斯和威尔逊是 19 世纪晚期美国政治学家不同理论关切、政治观点和职业经历的缩影。

可是，就一个重要方面而言，伯吉斯与威尔逊的区别决不是细微差别和缩影那么简单。尽管威尔逊对 1917 年的德国的定性——当时他向德国宣战，“试图确保世界的民主安全”——要比他以前的观点暗淡得多，但是伯吉斯对德国的肯定观点经受住了美德关系恶化甚至 1917—1918 年反德狂潮气氛的考验。直到 1931 年他生命的终点，伯吉斯仍然认为美德冲突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是日耳曼的内部冲突。一些人的摇摆观点和另一些人的坚定立场表明，美国的国外敌手和美国政治学之间的联系更多是在“社会”层面而不是个人层面建立的。威尔逊和伯吉斯的差异说明，“社会学”而非政治心理学是理解这一过程的钥匙。在这一过程中，该学科的概念、标准和国外政权的观点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伯吉斯的个案说明,学者个人不见得是历史力量手中的傀儡,他们也不轻易改变他们的态度以适应变化的政治现实。但它同时表明,这种由学者个人创设和信奉的知识容易被未来的学者群体所遗忘。约翰·伯吉斯可称得上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学家,可是,今天很少有人肯定他的名望,更不用说知道他的理论了。而另一方面,伍德罗·威尔逊的遗产却被人们烂熟于心。但即便在威尔逊个案中,集体记忆也是有限的。正是1917年指责德国专制制度并铭刻在我们记忆中的威尔逊形象而不是稍早憎恶法国"民主"的威尔逊赞成德国的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并仰慕普鲁士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控制。

约翰·伯吉斯的民族主义理论

两个塑造约翰·伯吉斯生活的关键事件同时塑造了美国政治学学术的起源:美国内战和对德战争。内战和冲突的创伤经历"为美国政治学从诞生时起就提供了一项合理而迫切的任务:为持久、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政治单元打下基础"。[15]在为民族主义的战后冲动提供"彻底和科学"的理论基石方面,伯吉斯是他同时代政治学者中最有影响的。[16]

伯吉斯于1844年生于田纳西州一个笃信工联主义(unionist)法则的家庭,他参加过联邦军队,亲眼目睹内战的恐怖场面。[17]当他战后从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时,美国实际上还没有为宗教研究生提供社会科学训练的学术机构。像成千上万的其他美国年轻人一样,伯吉斯被吸引到了德国,当时那里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18]

美国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学术缔造者

都在德国学习过。19 世纪 70 年代,伯吉斯在德国获得他的博士学位,1880 年被他招募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队伍的三位年轻学者都在德国求过学。[19]在约翰·霍普金斯政治学系主持历史和政治学项目并指导过威尔逊学习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德国受过训练,威尔逊的其他两位老师也一样。[20]回到美国后,这些学者试图把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方法移植到美国国内。[21]他们对德国的学术推崇备至,举办德国式的研究生讲习班,并要求其学生掌握德语。[22]

然而,德国的魅力不止是其学术优点。德国提供了一个民族团圆和统一的极好样板。1871 年,伯吉斯达到柏林时,他目睹了从普法战争中凯旋而归的部队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并把它与"六年前通过华盛顿的共和大军的游行"进行比较。[23]这一经历预示着他一生对德国制度和文化的爱恋。

民族、国家、自由、政府

约翰·伯吉斯的主要理论著作《政治学与比较宪法》(1890 年)包含四个部分:"民族"、"国家"、"自由"和"政府"。[24]第一部分从一个"德国"式(即精确而科学的)定义开篇:"居住在一定地理范畴的种族群体就叫民族。"[25]

伯吉斯认为,民族并不生来就平等。他们性格中的潜在天资很大程度上由其人口中的种族成分决定。种族等级的底层是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他们甚至不值得"科学地对待");居中间层次的是非日耳曼欧洲人。希腊和斯拉夫种族在艺术、哲学和宗教方面有超凡的才能,但他们的政治组织形式"明显处在政治天赋的低级序列"。凯尔特人"从未表现出任何政治法则意识或对政治目标的恒心"。罗马人有一种建立帝国的天赋。然而,最先进的政体是由"那些被称为出类拔萃的政

治民族即日耳曼民族所建立的。如果这些民族的奇特创造能用一句话表述,那就是:它们是民族国家的缔造者”。因而,对伯吉斯来说,民族国家是政治发展的最高形式,这一形式只有日耳曼民族才能企及。[26]幸运的是,在美国,“一个融合的日耳曼民族是其主导因素”,尽管日耳曼的“盎格鲁-美国人、德国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未完全混合他们的血统”。日耳曼人同时也是德国、英国、荷兰、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虽然法国血统被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成分稀释)。[27]

伯吉斯赞同“国家”的理想主义概念,这是他论述中的第二部分的主题。国家不是自由的个人通过相互的契约而形成的集合产物,而是长期向着某一理想成长的有机体。沿着国家的革命路径,一个民族君主制(national monarchy)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政治时代的开端”。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有了国家意识,迫切想参加他们客观认识的工作(国家构建)”。人们“簇拥他们的国王(king)”并“推举他为国家的首要公务员”。一旦国王变成一名纯粹的公共事务的承担者,从属于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国家才能称得上民主。民主体现在宪法制定中的革命大众行为,以民族和谐与凝聚力为前提:“民主国家一定是民族国家,当国家的人民成了真正民族的人民,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民主国家。”[28]

基于这一历史轨迹,伯吉斯发现,德国和美国是(日耳曼)人民民主国家(popular democratic state)中最先进的一类。在伯吉斯看来,德国的制宪过程并不比一个世纪前它的美国对手缺少革命性和进步性。在这两个事例中,人民都自觉地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伯吉斯把普鲁士君主——不管是作为普鲁士国王还是作为德国皇帝的才能——看成一个合法的公共事务的承担者(constitutional officeholder),是现代民选民主国家形成的

信号。[29]

伯吉斯是个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把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看成是自由的最好担保人，保护个人免受政府和多数人暴政的侵害。虽然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个人都享有相同的自由，但在美国，这些自由是保护得最好的。在美国，自由的基本法则“由国家写进宪法，其最终、权威的解释权由国家交给了一个司法机构，使他们的官员独立于政府的政治部门”[30]。

如何衡量其他现代民主民族国家呢？“在欧洲三部主要宪法中，只有德国的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美国宪法所提供的充分个人自由保证。”德国缺少美国的理想，它的体制优于法国，后者“没有一丝个人自由的宪法保障”；它也优于英国，英国的“整个权力归属于政府，而且国家与政府之间没有多少差异”。因此，就宪法上的自由而言，伯吉斯认为德国仅次于美国，但远远优于英国和法国。[31]

伯吉斯对国家——一个抽象的有机概念——与实际的政府做了详尽的区别。事实上，国家形式和政府形式未必协调一致。“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前最具优势的政治体制不是拥有贵族政府的民主国家，倘若只有贵族政府是一个真正优秀而不是劣质的政府。如果这不是共和（即美国）形式的政府的真正标准，那我得承认我不知道它的标准是什么。”[32]在表示偏爱拥有知识精英领导的（meritocratic）政府的民主国家的同时，伯吉斯期望伍德罗·威尔逊和他那一代人的计划——他们寻求选举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服务于其民族——但他未能完全清楚地阐明这一日程就停顿下来了。

在详细阐述国家与政府的差别后，伯吉斯评估了不同政府形式的优点。一个“代议制政府”是好的，只要它在宪法上受到约束，即“只要国家列出政府的权力或清楚地规定和捍卫个人

自由,并且授予政府的权力要比其整个权力少、比人民主权少”。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把整个权力交给政府,不为个人留任何自主空间,那么政府就是无约束的。它虽然理论上是专制的,但实践中可能是自由和慈善的。”[33]伯吉斯关于自由的早期论述,对于代议制政府的原型之“好”与“坏”的身份认定是非常清楚的。英国的体制把“国家的整个权力交给政府”,是一个恶劣而无约束的代议制政府的缩影。它难以确保不会滑向专制。美国是一个至善而有约束的代议制政府。从伯吉斯早期有关自由的论述可以推出,德国比英国和法国更接近这一理想。

在伯吉斯的政府分类法中,另一个区别是关于“政府领导人的任期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政府要么是世袭制(hereditary)要么由选举产生(elective)”。伯吉斯没有对二者的优越性提出标准的判断。在辨别出四种世袭制标准后,伯吉斯得出结论:“男性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似乎是最有益可行的。”[34]因此,这正好是普鲁士的标准也就不奇怪了。[35]

伯吉斯也对总统制和议会制政府作了区别。在总统制下,“国家、主权(sovereign)在任期和特权方面都独立于立法机关行使行政权,并赋予他权力以阻止立法机构侵占国家划定的行政和特权范围”。伯吉斯高度赞扬总统制政府:“它是保守主义者。它把责任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再也没有其他政府制度如此深思熟虑和不偏不倚地关注各种利益了。”[36]

德意志帝国是伯吉斯的“总统俱乐部”的一员。在《任期和德皇的权力》(Tenure and Powers of the German Emperor)一文中,他一再把德皇称为德意志联邦的总统或“共和国总统”。普鲁士国王是德国的总统这一点已被写进德国的宪法,伯吉斯这样指称它(把宪法的形式看作它的实质)在1888年完全没有争议。皇帝没有通过选举产生这一点对伯吉斯来说似乎不是问题

(毕竟,皇帝是通过最好的世袭制继承下来的);如果一个"共和国总统"同另一人竞争,那么它可能是向它的更强大的德国对手学习的美国行政官。伯吉斯清楚地把作为普鲁士国王能力范围内的德皇的否决权誉为:"这些是在现有条件下非常明智的条款。没有这些条款,我不知道德皇如何向其民族尽他最大的义务。"[37]

伯吉斯认为,议会制政府不如总统制政府。这明显是指英国。他认为,议会制政府的成功运作依赖于特定的条件:一个"拥有忠心耿耿和忠诚群众"的世袭制君主政体、一种保持"民众道德"的民族宗教,以及"明智、保守和温和的阶级握有政治权利的有限选举权"。英国公民权的扩充正威胁着这一体制。因为:"即便最发达的国家拥有目前这种普遍的知识程度,这些品质(稳定性、礼貌)又怎能在一个由普选或普遍扩充的选举权下产生的立法机构中得到保证呢?"[38]伯吉斯喜欢的自由主义英国,正是保守的辉格党(Whiggish)自由主义人士如沃尔特·巴奇霍特(Walter Bagehot)所想象的那种英国,而不是19世纪晚期越来越民主的英国。

德国:"欧洲和平的最好保证"

在《任期与德皇的权力》一文中,伯吉斯探讨了皇帝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宪法上授予德皇"与国外大国结盟、宣布(防御)战争和议和"的权力。但是,"他宣布进攻性战争的权力却受到了极大阻碍",因为这种行为"需得到联邦议会的准许"。尽管作为普鲁士的国王,德皇在联邦议会中控制17个席位,然而为了获得宣战所需的30张选票,他要"获得除普鲁士以外至少3个国家的君主首脑的同意"。德国不但"守旧"和"保守",而且他们"敌视德意志帝国的权力集中,他们知道战争往往导

致这一结果”。因此，德国的宪法为“专断、欠考虑和不必要的宣战提供最好的预防”[39]。

伯吉斯在文章的最后是这样评估德国的帝权的：

> 它充满保守主义精神，很好地受法律监管。它的宪法使它极好地戒除了皇帝和王子的个人专断或犹豫不决，并防止它对人民的恣意妄为和暴力。它通过权力实施和平，是欧洲和平的最好保证。一句话，它是宪法上的总统职位；如果他需要何种改造的话，它应朝更加强化而不是弱化的方向发展。[40]

英国：“海上独裁者”

1888 年，当约翰·伯吉斯把德国描述为和平的堡垒之时，德国的外交政策重心大体上集中于欧洲事务，而且美国和“德国化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Germany）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但是，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开始为巨大的海军打基础，并堂而皇之地介入国际政治，就像美国启动其本身的帝国冒险一样。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随着两国在萨摩亚群岛（Samoa）、菲律宾、中国和委内瑞拉出现利益冲突，它们的外交紧张关系开始升级。[41]在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德国的积极形象包括德国学者的声誉在美国也开始恶化，而且反德国的书籍开始摒弃过去更为美化的内容。[42]

然而，伯吉斯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德派。1908 年他在美国“德国协会”的发言，与当时对德美友善关系降温的担心极不相符。[43]1912 年，伯吉斯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1914 年他仍不甘寂寞地为德国唱赞歌。但总而言之，当他出版《1914 年的欧洲战争》一书时，他面对舆论仍“知难而进”。[44]在试图转移人们对德美冲突视线的同时，伯吉斯固执地坚持其亲德和刻毒的反

英观点。他不但把英国描绘成“专制的海上军国主义”(despotic and navalistic-militaristic),而且毫不客气地把这一“海上独裁者”与“陆上独裁者”(俄国)进行类比。而德国是与英国“相反的对手”:

> 它的经济体制是目前乃至过去世界上所有体制中最有效率的,是真正最民主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德国化的美国”一样如此全面地普及文明成果。无论国家大小,没有任何国家的文明程度有如此之高。[45]

显而易见,伯吉斯对德意志帝国的描述与今天美国政治学家的看法大相径庭。伯吉斯不是把德国描写为一个独裁的半封建君主国,而是一个宪政民主的总统制民族国家,其公民享有自由的程度几乎与美国人一样多。在伯吉斯眼里,德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沿着其他日耳曼民族一样的道路发展。而且在日耳曼诸国家中,他认为德国是政治上更为先进的国家,比英国和法国更像美国。

伯吉斯的政治理论具有民族主义取向,它把美国的政治体制刻画为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制度。另外,在伯吉斯的观点里,德国是惟一能给美国传授政府经验的国外民族。它是民族融合与巩固的积极样板,也是强大且保守的总统制的典范,避免了来自群众的奇想。因此,在关于德国的观点中,伯吉斯的民族主义被一剂很大的调和主义所稀释。

伯吉斯对德意志帝国的看法与它当前形象的差异与其说是因为新事实的出现,还不如说是由于评判标准和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与英国相比,德国有一部成文的宪法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今天的政治学家根本不重视这一事实。对伯吉斯来说,它意味着英国比德国更容易走向专制。伯吉斯和巴林顿·摩尔都把德国的政治体制刻画为本质上的“保守主义”,尽管

摩尔不赞成这种保守主义,但伯吉斯却为之拍手喝彩。简言之,对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结构没有一个一致意见,分歧主要在于,这些制度究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实质”(substance)还是“招牌”(trappings)。

伍德罗·威尔逊的中央集权理论

1856 年,伍德罗·威尔逊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年轻的伍德罗·威尔逊赞同他父亲的邦联的观点,但成年后,他开始支持联邦事业。[46]内战经历对威尔逊思想的影响不亚于它对伯吉斯思想的影响。威尔逊的著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有组织的(organic)、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概念。尽管对伯吉斯来说,国家仍是民族的抽象表达,但威尔逊试图赋予民族以具体、高效的政府国家。[47]

威尔逊是一个高产政治学家,但他从未完成他的“政治哲学”,使其成为自己最终的理论著作。按照威尔逊的论文编辑的说法,该著作本应包括有关“现代民主国家”的一系列论文和言论以及《国家》一书中的历史章节,尤其是他关于行政、法律和法学演讲的记录。[48]这些材料大部分是在威尔逊获得博士学位(1886)后的十年中创作的。这期间,他在布琳·默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卫斯理学院(Wesleyan College)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从 1890 年开始)任过教。[49]我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威尔逊的作品和那一时段的记录,因为它们是他从未写成的巨著中的核心所在,因为他在那一时段的的确确完成的一本书(《国家》,1889 年)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也因为那十年是威尔逊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成果最多的标志。[50](后来的年月,他越来越投身于大量的写作和演讲以及学术行政)。

在谈到威尔逊的“政治哲学”之前，先对他的早期作品做一些评价。伍德罗·威尔逊是地地道道的亲英派。他的家庭与盎格鲁-苏格兰祖先维系着很大的情感牵连，[51]而且年轻的威尔逊倡议在美国采用议会制。[52]迷恋于英国并不预示着他的反德态度。威尔逊特别崇拜俾斯麦(Bismarck)。威尔逊写道，这位大臣不是搞什么阴谋诡计或骗人把戏，而是一位最有“创造力”、“眼光”和“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一个较小和实际上独立的王国能在八年时间里被仅仅一个人的天才提到令人垂涎的头号大国地位，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53]

威尔逊也表示了对法国的极大敌意。在他未发表的文章《法国的自治政府》(1879)中，他提出，法国人民没有为自治政府做好准备。农民“几乎无知之极”和“默无声息地顺从”，资产阶级“不是由可信赖的公民组成的”[54]。受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的启示，威尔逊把法国人描述为“鲁莽”(impetuous)的形象，他们试图采用革命方法建立自治政府，而这些方法只能成功地适应于英国和美国，它们在这里随着时间自然演变。[55]“自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法国历史，无非是一段中央君主体制下的集中民主与帝国主义交替出现的历史，实际上向专制偏摆。”议会制对法国“就像父母的权威独立对孩子一样有害，”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它的形式一直受到关注”。[56]

这些贬损的语言以各种微妙的方式重现于威尔逊的后期作品中，在这里，他把法国的政体(polity)称为“痴狂”(intoxicated)、“有害”(poisonous)、“机械”(mechanical)、“不稳定”(unstable)和“鲁莽”(impetuous)。[57]法国的政体与法国的国家特征不协调、法国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民主国家以及法国政府不如俄罗斯等观点在威尔逊的“政治哲学”中经常出现。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德国是政治发展的畸形个案不同，威尔逊把法国

看成特殊个案。在他的政治理论中，德国处在它的政治发展自然轨迹中的正常位置。而“鲁莽”的法国则不是这样。

当威尔逊掌握德语以及他的知识视野扩展到包括除英国之外的国外政体时，他零散地写过“政治哲学”。[58]威尔逊的学术带有他时代的典型特点：把政治发展的历史因素与当前的国家间对比结合起来。

如同伯吉斯一样，威尔逊的政治发展理论带有种族等级观。为了推定现代政府的起源，威尔逊写道，人们不应研究“失败”的原始部族的“灾难”传统，而要研究“幸存的优秀”部族特别是由雅利安人组成的部族之贡献。[59]从幼年的斯拉夫村落社会开始，威尔逊沿着雅利安人足迹追踪到整个希腊人、罗马人、德国部落和英语民族的政治成熟期。每一个部族都吸收了它前辈的积极实践，并增加了与其本身性格相符的要素。日耳曼人“带来了德国传统与罗马法律的融合，并提出了现代政治生活环境的概念”。他们也遗赠给英国“代议制原理”。在英国，“从不动产所有权和当地自治政府中生成了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并从宪政国家中产生了那种最伟大的政治发展以及自由、有机、自觉和自我取向的民族，它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伟大机构和宪法保障下的自由”。最终，英语民族“诞生了美国”[60]。总之，落在雅利安种族后面的是笨拙的种族，他们朝着政治发展缓慢行进。雅利安政治发展的巅峰是有机、自由和立宪民族国家，而美国是它的最好榜样。

威尔逊比伯吉斯更看重民族国家的有机天性。[61]国家是“一种持久的天然的关系”，它是“高于个体的生活形式，即远离个体生活的共同生活”。[62]进化最完善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化身是宪政国家：“自觉、成熟和自我调节的（民主）国家。”[63]这一概念表明，“民主国家”是一个图标，是最先进政治形式的最彻底形

式——宪政国家。宪政国家的特征有四个要素。首先,“人民有某种形式的代表权(representation)。至于什么样的代表权无关紧要,只要它具有足够的广泛性”[64]。第二,政府服从法律;第三,有一个独立任期的独立司法官队伍;第四,多少要有个人自由权利的完全表述。[65]

威尔逊把德国联邦及它的主要成员普鲁士与英国、美国、法国、瑞士、瑞典-挪威、奥匈帝国一道看成“宪政国家”。这些是《国家》一书中“国家章节”的主题,经常被用来阐述威尔逊关于宪法和政府的论点。在威尔逊眼里,最重要的国家似乎是英国、美国、普鲁士/德国、法国和瑞士。在他有关现代宪政国家的讲稿中,威尔逊明确地把这些国家的宪法与美国宪法进行比较。这些国家的宪法并非完全相似,它们也不应该相似,因为“它们来源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尽管它们各有差异,但彼此并不劣于对方。所有这些国家都拥有四个现代宪政国家特点的要素,而且宪法是至高无上的。例如,“普鲁士国王不能改变他制定的宪法:他感到它牢不可破,愚弄它是不安全的。一旦出台,就不能被撤销”[66]。

威尔逊的有机政治发展理论(theory of organic political development)强调实际法律和政治制度(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与完全受益于这些制度的民族“习惯”之间和谐的重要性。我们看看威尔逊对(当时)新日本宪法的评论:“它基本上是照搬普鲁士的宪法。”二者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大臣对皇帝而不是对立法机构负责……这里的模式不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意义上的责任政府”。用今天的观点看,这听起来就像对普鲁士和日本方式的控告,但威尔逊却说:“考虑到日本本身的发展阶段,普鲁士是制度效仿的绝好样板。她选择它作为典范是特别睿智、深思熟虑的另一证据,这是日本最好的宪法和成功的保

证。”[67]这不但是对日本宪法的直接肯定，而且是对普鲁士宪法的间接褒扬。普鲁士因为没有随意照搬英国的宪法而受到褒奖。普鲁士的法律制度（legal institution）与它的民族“习惯”（habit）正好协调一致。相比之下，法国的历史说明了，形式上照搬英国的做法并采取“不受习惯支持”的法律制度是危险的。[68]

民主国家

在威尔逊的思想里，“民主国家”是“现代宪政国家”的亚类。这一类的成员局限于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甚至英国，这些国家仍有“一些反叛的冲动”，并且“自由还没有灌输到所有的阶层”[幸亏“输送到美国的是（英国）训练有素的阶层”]。法国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除非“她在自制（self-control）上有更多艰难的教训”。[69]另外，对法国和西班牙而言，民主是一剂“慢性毒药”（slow poison），而南美则遭受着民主制度的“严重旱灾”（maddening drought）。[70]

虽然威尔逊以肯定的态度使用“民主”一词，但他对这一词条的理解与该术语的当前意义迥然不同。首先，民主的概念像“宪政国家”的广义类别一样黏附于有机民族发展的理念。民主与“民族”是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当民族成熟到可以接纳民主时，民主才有可能。因此，威尔逊没有责难大陆国家缺乏足够的民主，因为他认为，它们在“危险”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处于劣势。[71]英国民族很幸运（像“闭塞”的瑞士一样）地远离带有大陆经历的“民族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陆国家不成熟地采用在英语世界缓慢而有机发展的制度，比在民族习惯下不民主的状况更糟。[72]

其次，威尔逊极度贬低选举作为民主固有试金石的作用。

一个民主国家是被“受过正统教育、训练、指导的人”统治的国家。只有这些人得到公平统领国家的机会——通过投票或通过文官考试(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民主的条件才会具备。公务员遴选方法是“非常民主的”,因为“它从这些适合该职责的人当中提取所有统治资源”。择优录取(selection by merit)“是另一种代表形式”[73]。可见,在威尔逊的眼里,民主与其说是选举过程(electoral process),还不如说是知识精英统治(meritocracy)。威尔逊的论文显示,他对选举平等并不在乎:“普选权不是民主的要素。普选权可能强化破坏自由的政变(coup detat)。”[74]他对美国参议院不由普选产生以及南部黑人被剥夺公民权的事实并不感到困扰。在《国家》一书中,他以完全实际的姿态对普鲁士三级表决制的细节进行了评论,明确认可这一表决制度为美国地方选举的蓝图。[75]以知识精英为身份的民主——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的统治——是防止群众无知的堡垒。就像他争取舆论的力量一样,他的大众观点也直言不讳。一般民众的头脑是变幻无常的:“你不可能期望它们‘深信’银元问题(silver question)、对白令海(Behring Sea)争端发表诸多看法或对巴西局势提出创见。”[76]

因此,威尔逊主张把国外事务与国民大会的详细审查(the scrutiny of popular assembly)分离开来也就不奇怪了。注意到下议院对英国外交政策行使微乎其微的控制权后,他强调,有些事情“本身很细微,不宜拿到议会公开讨论;有些计划特别是外交政策一旦不成熟地被泄露出去,只会令其受挫……对于某些将要公开的事务,必须允许大臣们具有某种宽泛的自由决定权”[77]。

简言之,威尔逊与其说是某种选举式民主的拥护者还不如说是伯克(Burkean)式的保守派。他的目的是肃清与(法国)大

革命、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Populism)以及未开化的平民(demos)统治有关联的民主概念。“只有到了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判断能力之际”,选举平等才会有益。但是,由于那一阶段至多是“大致接近”,所以政府必须托付给一个受过教育、未必经过选举的行政精英层。[78]普鲁士就是一个合理政府的典范。

威尔逊论行政

20 世纪初,地方和联邦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是美国政治学议程的中心。伍德罗·威尔逊是行政学术研究的先锋之一。在他 1887 年发表的关于该主题的第一篇文章中,威尔逊哀叹“城市政府的恶毒气息和国家行政(state administration)中不诚实的秘密”以及联邦“腐败”,它“不让我们相信,形成良好行政的任何清晰观念已经在美国普遍盛行”。解决办法在于研究“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提出”的行政学(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在法国,行政机器一直被拿破仑修整得很完美。在普鲁士,一个“令人羡慕的行政体制”一直被伟大的国王和改革家们“研究和完善到了极致”,它们“把傲慢和敷衍塞责的办公室变成了政府生机勃勃的工具”。而另一方面,英国民族“在控制方面做得多,而在增加政府活力方面却做得少”。美国人必须学习大陆的行政智慧,“滤去它的外来毒气”,以适应美国的体制。[79]

随着威尔逊对德国语言和大陆知识的增加,他调整了自己有关大陆是“外来毒气”的观点。特别是在城市政府领域,威尔逊认为,普鲁士体制本质上不如“泛日耳曼”(Pan-Teutonic)那样带有外来气息,它是最高形式的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80]他同时得出结论认为,法国的理念比普鲁士的更有害。

威尔逊想象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被认为是仿制

中央集权(statist)* 的德国模式,它履行很多职责,这对华盛顿政府来说还非常遥远(其中一些职责仍有效)。这些包括:"贫困救济、保险(养老金和其他);储蓄银行;森林管理;狩猎和渔业法";"通过……邮件、电报、电话等方式提高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铁路维护和管理……建立信托制度"。[81] 威尔逊也羡慕柏林大学——这所为国家服务的大学——这一典范。[82] 总之,关于国家的职能,威尔逊毫不含糊地希望美国更像德国而不是英国。[83] 在这一点上,他绝不是当时美国政治学家中的个别现象。

在政府结构问题上,威尔逊习惯上根据"首脑的地位类型"把国家分为三类。像俄罗斯和土耳其的"专制"政体,"完全缺乏任何宪法手段来控制国家首脑的行为"。像美国、法国和瑞士的"共和"政体,"国家首脑完全受制于法律,而且他有遵守这些法律的个人责任"。在第三类——"宪政"体制下,国家首脑受"宪法控制",尽管"他本人没有强制性的个人责任或其他惩罚"。英国和普鲁士代表第三类(另外巴伐利亚、西班牙以及意大利也属此类)。在宪政国家,王室的主权"今天是间接的;而间接的主权根本就不是主权"。因此,现代的君主只是象征性地行使主权,因为他参与到国家最高机关的决策里。[84]

为了探讨"联邦制国家"首脑的身份,威尔逊将美国与德国进行了比较。美国的国家首脑是"中央政府的行政代理人",而在德国,他是"作为首席成员国(普鲁士)首脑的主权体——德意志联邦议会的一员"。然而,"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国家首脑都严格受制于法律,服从宪法的管制和程序;尽管在有些事例中,责任是直接的、个人的,而在其他事例中,它只是以内阁代理人(ministerial proxy)的身份来表现"[85]。后一句话表明,1894

---

* 主张国家(中央集权下)统制经济者。——译者注

年,威尔逊把德皇看成一个负间接责任的执行官。大体上说,威尔逊的演讲和《国家》一书把德皇(kaiser)刻画为世袭的国家政府首脑(chief executive),他“根本没有被看成我们时代最强大的统治者”,而是受到一部完善宪法机器的约束。“德皇的权力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标志着并突出了该帝国的联邦性质,以及由法律而不是特权来治理国家的特征。”[86]

在那一时期威尔逊的任何作品中,我都没有发现他把德皇——无论他作为联邦总统还是普鲁士国王身份——称为独裁者。那一标签是为专制的沙皇(czars)和哈里发(caliphs)*预留的。它不是与民主统治而是与共和及立宪形式的政府相对立的。

像对国家政府一样,威尔逊对地方政府有同样的兴趣,因为“地方自治政府机构……毕竟对政治自由的生命力与活力至关重要”[87]。美国城市政府(city government)缺乏活力,而且“主要因为它的体制缺陷而惹人注目”[88]。在法国,中央集权“对地方事务的干预……越来越细微,导致地方政府窒息”[89]。普鲁士提供了有关自治政府的最好典范。高度集中的法国体制“疏于关注生命法则(principle of life),这不是一致性而是多样性。”而普鲁士的“集中”(中央集权的疏忽,但不是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模式确保了“地方的多样性与活力而不丧失至关重要的整合”[90]。在诸如威尔逊的框架里,只强调有机的民族生命(organic national life),“活力”(vitality)一词是最高赞誉。

自治政府不是关于群众投票,而是“在于参与政府:比如,倘若我们给了较好的中层阶级以整个政府权力,那么我们早就该发现自治政府了……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如何把人民套在国家

---

* 伊斯兰教执掌政教大权的领袖的称号。——译者注

的四轮马车上,使他们拉着它走”[91]。威尔逊把柏林——“普鲁士地方自治体制的最完美之花”——看成这种理想体制的最好例子,这里“较好”的公民[而不是普通民众(demos)]积极参与行政,权利(right)与服务(service)联结在一起。[92]在柏林,“除了带薪的公务员外,还有10000多人与政府有联系”。它们必须无偿服务,“否则会丧失(他们的)选举权(franchise),并使他们的税款提高”。柏林的选举制“带有普鲁士体制的性质。根据对税收的贡献,投票者被分成三个等级”。虽然各等级规模不等,“但每一个等级选出相等的人数进入市议会(Board of Alderman)”。所列的这些事实得到了威尔逊的高度肯定,等于是对英国族系的证明。柏林不是一个外来例子,而是“恰如一个英国事例。‘泛日耳曼’进程的例子正是我们民族古老政策中的固有部分……所以回到柏林时,我们不会发现自己处在异乡僻壤”[93]。总之,柏林体现了最高形式的自治政府:行政高效率与广泛参与的最成功融合,是美国改革者效仿的杰出典范。

虽然威尔逊拥戴民主的激情高于伯吉斯,但是威尔逊的“政治哲学”之保守性不亚于那一长者的政治理论。威尔逊赞同伯吉斯对难以驯服的平民统治的担心。而且他通过肃清激进的法国民主内涵,试图在宣称反其道而行之前使它安适这个世界。威尔逊的理想政体(polity)是经过挑选而未必由选举产生的教育精英管理的立宪(雅利安)国家,脱离(insulate from)无知的群众。在威尔逊1890年前后的理想看,与今天用选举过程和行政责任作为民主试金石的标准相比,当时的德国看起来更“正常”,更像美国。如果说威尔逊批评任何沿用政治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话,那一定是指法国而不是德国。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威尔逊政治哲学融合了民族

主义和妥协主义倾向。在民族主义方面，威尔逊把美国刻画为世界最先进的（雅利安）种族的先锋。而在妥协主义方面，威尔逊认为，尽管美国政府先进，但它仍受严重的缺陷困扰。在他第一部书中，威尔逊悲叹美国国会政府的弱点，主张美国按照英国议会制路线改革。[94]

威尔逊常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公共行政的腐败和低效，并把目光转向普鲁士行政学，寻找激活美国政府的方法。对照当前对威尔逊政治发展——哀叹德意志未能效仿美国的民主样板——的解释，威尔逊把德国视为改造美国民主的思想源泉毫不亚于他把美国看成德国的民主模范。

威尔逊 1898 年后摆向民族主义

1898 年，紧随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在马尼拉海湾（Manila Bay）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德国海军驶进了这里。尽管德国人很快撤出并接受美国对菲律宾的吞并，但这一事件还是激起了美国的反德舆论，损害了美德外交关系。[95]

在美西（西班牙）战争之前，威尔逊对外交政策几乎未予关注，而且起初他还怀疑过吞并菲律宾的想法。但他很快相信，强硬的外交政策是民族强大的关键。[96]1898 年后，他的作品和言论越来越强调美国的独大（singularity）。因此，威尔逊向扩张主义的转变使他走向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而远离妥协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转向，可见于威尔逊 1901 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民主与效率》一文。在该文中，威尔逊表达了对美国帝国扩张的支持，肯定了对菲律宾的占领："我们的兴趣必须朝前迈进，尽管我们是利他主义者；其他民族清楚，他们必须远离我们，不得试图阻挡我们。"现在，其中一个想避免"阻挡"美国而又不得不"远离"美国、忙于推进它本身帝国步伐的民族

就是德国。但在这一点上,威尔逊像他在 1917 年所做的一样,似乎仍一直十分热衷于德国中央集权制(statism)和行政效率,他放弃了学术,未宣布德国为一个“独裁政府”。他仍信奉德国的“效率”和“自治政府”,尽管没有给其定性。虽然威尔逊呼吁激进主义政府、专业的行政事务以及城市政府(city government)改革,但他不再强调这些概念的大陆身份。而稍早,他把美国和德国模式比作“联邦政府”的两个亚类,彼此不分伯仲。在“民主与效率”一文中,他声称:“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联邦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的模式上建立和巩固它们的宪法。”虽然威尔逊继续提倡行政机构中的“集中”(concentration)原则,但是他现在不再说此类集中是建立在普鲁士模式上了。[97]

威尔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不仅腐蚀了他对德国的崇拜而且也腐蚀了他对英国的尊重。[98]可是,在他以往的文章中,威尔逊无一例外地把英国引述为一个接近民主的国家,紧排在美国和瑞士之后。在《民主与效率》一文中,他把英国从这一名单中去掉了。威尔逊承认整个 19 世纪英国一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的例子”,但他也承认,“直到 1888 年英国才拥有我们应称之为地方自治的政府”,因为“各郡人们在挑选它们的地方长官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些被加冕的地区绅士“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原则上都不是民主的”。因此,到 1901 年,威尔逊试图让美国与它的英国传统拉开距离:“我们自己(自治政府)尽管孕育于相同的(英国)氛围和精神,但是在一种非常不同的模式上建立起来的,适用不同的社会秩序。”[99]

德美冲突的后果

威尔逊对德国的逐步失敬，体现了20世纪初美国政治学的特点。尽管19世纪80年代美国学生仍蜂拥入德国，圆他们的政治学研究生教育之梦，但1900年后，这些教育旅居现象已经不多了，而且德国的学术声誉也慢慢下降。例如，一篇发表在新创办的《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于1907年）杂志上的文章主张，虽然德国的法学学者“聪颖”和“敏锐”，但是“他们将不会对英国和美国学生的实用型头脑有什么吸引力”。[100]确实，《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早期期刊第一次把德意志帝国刻画为与美国民主对立的“独裁主义”。

另外，稍早赞许德国的观点一直持续到大战爆发。约翰·伯吉斯从来没有缓和他的亲德情结，他不止是教育他的学生接受德国是民主国家的观点。例如，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雷蒙德·格特尔（Raymond Gettell）在他《政治学导论》（1910）一书中就说过：“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都是民主的。”[101]对德国法律思想、官僚政治的效率以及地方自治政府的仰慕仍在继续。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第一届主席、伯吉斯的优秀学生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在1909年写道，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城市政府的工作做得像普鲁士那样完美无缺地服务于人民的利益”[102]。而且《美国政治学评论》毫不掩饰地连续发表了数篇为德国政府说好话的研究成果。[103]

随着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形象已完全没有了光彩。“专制”德国与“民主”美国的二分法对立加剧。整个国家的大学匆忙介绍爱国“战争问题”，他们展示的主题是“光明力量与黑暗力量的明确对垒”[104]。政治学家不但把政治

宣传带进了他们的课堂,而且有些人还参加了威尔逊政府的海外宣传活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梅里亚姆是美国在意大利的首席"政评作家")。[105]其他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一道急切地出版廉价的劣等书籍,把政府的战争观美化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摩尼教(Manichean)斗争。[106]甚至《美国政治学评论》都变成了战时宣传工具,装扮成高尚的学术舞台。例如,该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试图反驳这样的神话:美国新结交的盟友——俄罗斯人——属"亚洲人"(言下之意:低等民族),以确立"俄罗斯斯拉夫人在他们民族存在的早期是民主的"观点,并把俄罗斯专制归因于无处不在的德国影响。[107]因而,这篇文章附和了威尔逊战时的含糊观点:俄罗斯独裁政治"实际上不带有俄罗斯的血统、性质或意图"[108]。

那些胆敢挑战 1917—1918 年反德狂潮的人冒着丢失工作和职业声誉的危险。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威廉·沙佩(William Schaper)因为说了战争的责任不完全在于德国的话而被校董事会草率地解聘了。[109]哥伦比亚大学同样解雇了怀疑美国战争目的的教授。[110]伯吉斯已于 1912 年退休,不再有被哥伦比亚大学解聘教授的机会,但他确实丢掉了声誉。美国政治学的创始人今天基本上被遗忘了,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屈不挠的亲德主义。[11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明确了德意志帝国的独裁形象,而且还给两大主要政治学理论带来了怀疑:日耳曼/雅利安民族主义理论和国家学说。

现代美国政治学创始人的中心任务是为内战后民族的凝聚力奠定知识基础。伯吉斯绝不是试图把那些基础建立在德国文化和血统中的惟一者。伯吉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搭档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德国学习时

吸收了亨利·梅因(Henry Maine)的雅利安理论。[112]回到美国后,亚当斯拜牛津大学教授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这位十足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者为师,并开始为"新英格兰城镇的德国起源"搜寻证据。[113]亚当斯试图把美国制度嵌入比美国历史更久远的历史中,建立它们与"母国(英国)、祖国德国以及整个雅利安世界的村落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114]

尽管20世纪初美国政治制度中日耳曼理论的影响下降了,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该理论仍在可接受的政治学话题范畴内。1910年,很多政治学学生仍接受这样的教育:"代议制原理(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on)和民族国家法则是日耳曼人的杰作","在所有民族中,日耳曼人展现了最伟大的政治才能"。[115]甚至伍德罗·威尔逊直到1918年还在其修订出版的《国家》一书中坚持这一观念,并采纳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的观点,即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制度与雅利安人相吻合。[116]然而,1918年后,美国是较大日耳曼(或雅利安)文明的一部分的观点突然从美国知识分子的言论中消失了。从1920年开始,政治学刊物和教科书不再提美国的政治制度源于德国的观点,只剩下嘲笑它的份了。[117]

这次战争的另一个主要理论牺牲品——国家主权学说(doctrine of state sovereignty)——把国家定义为"对个人和所有主体具有绝对、无限制权力"的自然有机体。[118]国家学说是伯吉斯、威尔逊和19世纪后期其他著名政治理论家的政治理论之核心,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一直支配着该学科的主题。[119]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ely)的《政府的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实际上它在1908年首次出版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然而,仅仅十年后,国家学说中的霸权论让位于一种广为传播的观点:"旧式的标准不再

有效”,“一种新的更为恰当的(多元论)社会理论迅速升起”。[120] 20 世纪早期,国家理论已被描述为“过时的绝对论”(absolutism),很快被多元理论所淹没,后者把国家刻画为“只是拥有法人个体的无数团体单元中的一个”[121]。只有此时,本特利的著作才开始赢得赞誉。[122]

国家理论的批评者把它的衰亡归咎于它不能解释“最近人类社会已变得无限复杂的事实”,新形式的工业和社会组织都在以牺牲国家为代价证明自身的价值。[123]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它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对旧理论的不满只是在 1919 年和 1920 年而不是十年前更为明显。诚然,对德战争对该理论中霸权论的损害一点也不亚于该理论内在缺陷造成的自伤。在美国,此理论已由在德国受训的学者推广,其中一些创立者是德国学者,他们的著作一直是美国研究生的必读物,而且其中一位主要捍卫者伯吉斯由于他的亲德情怀而声名狼藉。因而,国家学说听起来带有德国口音,其突然衰落有美国对外关系的范式变化和工业社会性质的改变两方面原因。

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损害了国家理论,破坏了美国民族主义中的雅利安理论。需要另一次战争来捣毁另一个美国早期政治学的核心学说:公共行政的“效率”学说。

注 释

1. Alexander Gerschenkron,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30, vii. 在他后来的经典著作,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中,格申克龙(Gerschenkron)清楚地比较了英国与德国的历史发展。

2.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36—37.

3.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1966), esp. chaps. 7—8; 引片 xv, 437。

4. 参见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David Blackbourn, *Populists and Patricians: Essays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 Geoff Eley, "Liberalism, Europe, and the Bourgeoisie, 1860—1914," in *The German Bourgeoisie: 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Middle Class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d. David Blackbourn and Richard Evans (London: Routledge, 1991)。

5. Blackbourn and Eley,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33.

6. 关于对"特殊道路"争论的反映,参见 Peter Paret, "Some Comments on the Continuity Debate in German History," in *German-American Interrelations: Heritage and Challenge*, ed. James F. Harris (Tubingen: Tubing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83—88。受特殊道路论题批评影响的历史著作包括 George Steinmetz, *Regulating the Social: The Welfare State and Local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以及 Dolores L. Augustine, *Patricians and Parvenus: Wealth and High Society in Wilhelmine Germany* (Oxford: Berg, 1994)。

7. Gabriel Almond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5th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240; Charles Hauss, *Comparative Politics: Domestic Responses to Global Challenges* (St. Paul, Minn.: West, 1994), 132—133; Michael Curtis, ed.,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Government*, 2d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0), 181.

8. Roy Macridis, ed., *Modern Political Systems: Europe*, 6th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7), 170—171; John D. Nagle,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4th ed. (Chicago: Nelson-Hall, 1995), 29—36.

9.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承认了这一激励因素，见 Gabriel Almond, "The Civic Culture: Pre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manuscript,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1995。

10. Ted R. Gurr, *POLITY II: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Regime Change*, 1800—1986(*Codebook*) (Ann Arbor: ICPSR, 1990), 36—37.

11. 最近采用"政体"数据的研究包括：Stephen Knack and Philip Keefer, "Does Inequality Harm Growth Only in Democraci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997): 323—332; James Morrow, Randolph Siverson, and Tressa Tabares,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ajor Powers, 1907—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hereafter *APSR*) 92 (1998): 649—661; William Dixon and Bruce Moon,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Patter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6 (1993): 5—25; Yi Feng, "Democracy,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1997): 391—418; Michael D. Ward and Kristian S. Gleditsch, "Democratizing for Peace," *APSR* 92 (1998): 51—61;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引自 Roxanne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163。

13.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67), 7—21. 另见 Wilfred McClay's introduction to the recent recent reissue of John Burgess,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 (1933; reprint,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94); and Daniel T. Rodger, *Contested 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Basic, 1987), 164—168。

14. 关于威尔逊的学术生涯，参见 August Heckscher, *Woodrow Wilson: A Biography* (New York: Collier, 1991), chaps. 2—3; Henry W. Bragdon,

Woodrow Wilson: The Academic Year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5. McClay, "Introduction," vii.

16. Charles Merriam, *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03), 299. 总体而言,美国精英都专注于民族凝聚力,不只是限于政治学家。参见 Frank Trommler, "Inventing the Enemy: German-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1900—17," *in Confrontation and Cooperatio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ra of World War I, 1900—1924*, ed. Hans-Jurgen Schroder (Providence: Berg, 1993), 110。

17. McClay, "Introduction," xiii—xv.

18. 19 世纪期间,大约 9000 名美国学生蜂拥至德国大学,其中大部分是 1870 年后去的德国。柏林这一普鲁士民族大学的故乡,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它在 19 世纪 80 年代共录取了 1300 名美国学生。见 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5; Somit and Tanenhaus,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15—16; Konrad H. Jarausch, "Huns, Krauts, or Good Germans? The German Image in America, 1880—1980," in Harris, *German-American Interrelation: Heritage and Challenge*, 148; Jurgen Herbst,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1800—1870 (Port Washington, N. Y.: Kennikat, 1972), chap. 1。

19. Somit and Tanenhaus,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17.

20. Richard Ely instructed Wilson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George S. Morris in philosophy. 参见 Niels A. Thorse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 1875—191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 4; John M. Mulder, *Woodrow Wilson: The Years of Prepa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75, 83。

21. Somit and Tanenhaus,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34—38.

22. 例如,威尔逊异常地把德国学者刻画为"勤奋"和"博学"。参见 Woodrow Wilson, "A Book Review," April 17, 1887, in *The Papers of Wood-*

row Wilson, ed. Arthur S. Link et al., 69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94)(以下简称为 *PWW*), 5:494。

23. McClay, "Introduction," xvi.

24. 伯吉斯(Burgess)后来准备了该书的缩略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他同情德国,该书的出版合同被废除了。那一版后来改为《政治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3)一书出版。我的讨论是以 1994 年的再版为基础的。

25. Burgess, *Foundations*, 3.

26. Ibid., 31—38. 关于 19 世纪美国知识分子话题中种族主义的合法性和普及性问题,参见 Rogers M. Smith, "Beyond Tocqueville, Myrdal, and Hartz: The Multiple Traditions in America," *APSR* 87 (1993): 558—60;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2d ed.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 6。

27. Burgess, *Foundations*, 20, 16.

28. Ibid., chap. 5, 引自 66, 70, 85—86.

29. 关于德美经历的类比在约翰·伯吉斯的下列作品中最为明显,见 John Burgess, "Laband's Public Law of the German Empir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March 1888), esp. 124—26。关于普鲁士君主问题,见 John Burgess, "Tenure and Powers of the German Empero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John 1888): 335。

30. Burgess, *Foundations*, 106.

31. Ibid., 106, 108, 109.

32. Ibid., 75—76.

33. Ibid., 114.

34. Ibid., 121—122.

35. Burgess, "Tenure and Powers of the German Emperor," 337.

36. Burgess, *Foundations*, 124.

37. Burgess, "Tenure and Powers of the German Emperor," 334, 335, 347, 349.

38. Burgess, *Foundations*, 127—128.

39. Burgess, "Tenure and Powers of the German Emperor," 345—347.

40. Ibid., 357.

41. 见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 Diplomatic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 2。

42. 参见 Robert E Herzstein, *Roosevelt and Hitler: Prelude to War*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chap. 5; Jarausch, "Huns, Krauts, or Good Germans?" 146—49; Trommler, "Inventing the Enemy"。

43. John W. Burgess,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German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1908).

44. John W. Burgess, *The European War of* 1914: *Its Causes, Purposes, and Probable Results* (Chicago: McClurg, 1915).

45. Ibid., 92—94.

46. 威尔逊改变观点的原因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要大于对种族公正态度的关心。见 Bragdon, *Woodrow Wilson*, 11—12, 21。

47. 关于 19 世纪晚期政治学重心从"民族"转向"国家"的问题,参见 James Farr, "From Modern Republic to Adminstrative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Regime and Discipline: Democ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ed. David Easton, John Gunnell, and Michael Stei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48. "Editorial Note: Wilson's First Treatise on Democratic Government," *PWW* 5: 58; Wilson, *The Stat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 (Boston: Heath, 1889). 对《国家》(*The State*)一书的所有引用都出自该版本。威尔逊的课程笔记读起来更像初期著作的原稿,而不是演讲纲要,因此为了解他的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49. 1888—1895 年,威尔逊也每年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授行政学,因此,他与一个研究生的研究环境部门保持必要的联系。参见 Bragdon, *Woodrow Wilson*, chaps. 8—10。

50.《国家》一书英文版中的大量知识原来只有高级学者才能弄懂。它非常成功,并在 1898 年和 1910 年两次修订。该书第一部分是历史考察;第二部分包括比较"国家章节"。在比较章节中,威尔逊尤其倚重一部

政治和行政实践与理论原理百科全书式的比较研究“巨著”:*Handbuch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der Gegenwart*。参见“Editorial Note: Wilson's 'The State,'”*PWW* 6:245。《国家》一书被翻译成好几国语言,包括德语。参见 Bragdon, *Woodrow Wilson*, 173—178。关于该书“可能是威尔逊最伟大的学术成果”的观点来自于他的传记作者阿瑟·林克(Arthur Link),引自 Mulder, *Woodrow Wilson*, 103。

51. Bragdon, *Woodrow Wilson*, chap. 1.

52. 特别参见 1885 年出版、后来成为威尔逊的学位论文的《国会政府》(*Congressional Government*)一书。该书再版见 *PWW* 4:13—179。

53. “Prince Bismarck,” November 1877, *PWW* 1:313. 另见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PWW* 4:42—43,认为格莱斯顿(Gladstone)在英国议会的地位与俾斯麦(Bismarck)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地位相似。

54. “Self-Government in France,” September 4, 1879, *PWW* 1:515—538;引自 529, 527 页。

55. 后来的岁月,威尔逊拜伯克(Burke)为他的主要导师;见 Mulder, *Woodrow Wilson*, 126—27。

56. “Self-Government in France,” *PWW*1:523, 524, 533.

57.《现代民主国家》(December 1885, *PWW* 5:63)一文把法国民主描述为“剧烈麻药或慢性毒药”,《民主与效率》(October 1900, *PWW* 12:6)一文也把“毒药”一说加给法国。关于法国“不稳定”的立宪制度的说法,见《“政治哲学”的前言纲要》(“An Outline of the Preface to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January 12, 1891, *PWW* 7:98)一文。在同一纲要中,威尔逊也把法国政治发展称作“机械地相似”(101)或“冲动”(102)。从威尔逊的“正常”有机政治发展的观点看,这两个术语都带有否定涵义。

58. 关于威尔逊为德语奋斗的内容,参见威尔逊致埃德温·R. A. 塞利格曼(Edwin R. A. Seligman)的信(April 19, 1886, *PWW* 5:63)。他赢得这一努力并能广泛阅读德国政府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资料的说法在威尔逊的“工作目录,1883—1890”(*PWW* 6:562—611)中明显表现出来。威尔逊的著述和讲演稿中大量引用了著名德国学者的资料。

59. Wilson, *The State*, 2. 雅利安主题出自英国学者亨利·梅因爵士

(Sir Henry Maine)和威廉·赫恩(William Hearn),而达尔文主题出自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参见《国家》一书的参考书目部分(15)。

60. *The State*,4—5, 154, 580, 577.

61. Wilson categorically rejects the social-contract theory of the state; ibid., 11—15.

62. "Notes for Lectures at the Johns Hopkins," 1891—94, *PWW* 7:124.

63. "Notes for Lecture on Public Law," 1894—95, *PWW* 9:12.

64. "Report of a Lecture at the New York Law School," March 11, 1892, *PWW* 7:477.

65. "Notes for Lectures on Public Law." *PWW* 9:13. 另见"Report of a Lecture at the New York Law School," *PWW* 7:477—479。

66. "Report of a Lecture at the New York Law School," *PWW* 7:474.

67. WW to Daniel Coit Gilman, April 13, 1889, *PWW* 6:169—172.

68. "Minutes of the Johns Hopkins Seminary of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March 15, 1889, *PWW* 6:153.

69. "A Lecture on Democracy," December 5, 1891, *PWW* 7:358.

70. "The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December 1, 1885, *PWW* 5:63.

71. "A Lecture on Democracy," *PWW* 7:358.

72. "The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PWW* 5:63. 在其他地方,威尔逊写道,英国幸运地在地理上与"欧洲的战争和革命的可怕扫荡"隔离开来了。但英国不像法国那样逃离了德国那种命运,"国际强制性迫使法国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军事专制国家"。由于天然的边界保护,英国人"无论如何比起法国更像德国(即'更好')"。见"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1890—91, *PWW* 7:12—14。

73. "A Lecture on Democracy," *PWW* 7:356. 关于知识精英是一种民主形式的观点,也可参见:"Notes on Administration," 1892—95, *PWW* 7:392—393。后来,威尔逊使用中世纪天主教堂作为"绝对民主机构"的例子,因为它的等级对任何合格的人开放,无阶级之分。参见"Address a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 January 7, 1910, PWW 19:743;以及一位名叫霍默·津克(Homer Zink)学生在1904年威尔

逊课堂上做的笔记,见西利·马德(Seeley G. Mudd)手稿(Library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Woodrow Wilson Collection, box 6)。

74. "The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PWW* 5:85.

75. 见《国家》(*The State*), 285, 296;另见 "Notes for a Public Lecture at the Johns Hopkins," March 16, 1888, *PWW* 5:713—714。

76. "A Lecture on Democracy," *PWW* 7:354.

77.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1890—1891, *PWW* 7:36—37.

78. Homer Zink notes.

79.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1887, *PWW* 5:363, 365—66, 376, 367, 378.

80. 在1887年的论文中,威尔逊把它描述为"不完全的"自治政府。ibid. ,380.

81. "Notes for Lectures on Public Law," 1894—95, *PWW* 9:24.

82. 参见"Random Notes for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 January 25, 1895, *PWW* 9:130。

83. 例如,参见"A Newspaper Report of a Lecture at Brown University," November 12, 1889, *PWW* 6:417—23;另见"Marginal Note to '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by Richard Ely," *PWW* 5:560; and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ugust 22, 1887, *PWW* 5:560—563。

84. "Notes For Lectures on Public Law," September 1894, *PWW* 9:26—27. 在威尔逊时代,维多利亚(Victoria)占有的英国王冠不像今天那样没有说服力,而且维多利亚的孙子威廉大帝(Kaiser Wilhelm)的消极形象则完全体现出来了。

85. Ibid., 27.

86. Wilson, *The State*, 254.

87.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October 1890, *PWW* 7:41.

88. "A Newspaper Report of a Lecture on 'Systems of City Government,'" April 8, 1890, *PWW* 6:612—613.

89. "Notes for a Classroom Lecture," February 14, 1889, *PWW* 6:91.

90. "Notes for Lectures at the Johns Hopkins," February 1892, *PWW* 7:

388—391.

91. "A Newspaper Report of a Lecture on Municipal Government," January 19, 1889, *PWW* 6:53.

92. "Notes for a Public Lecture at Johns Hopkins," March 16, 1888, *PWW* 5:712.

93. "A Newspaper Report of a Lecture on Municipal Government," *PWW* 6:53—54.

94.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95. Jonas,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55—60.

96. 见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8—29; "Edward G. Elliot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Wilson," *PWW* 14:324。

97.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PWW* 12:13, 7, 17.

98. 关于法国,威尔逊摆向民族主义并没有引起在德国和英国问题上的那种困境。在《民主与效率》一文中,威尔逊仍然把法国民主制度称作惟一的"毒药",而法国只是形式上的民主。ibid., 6。

99. Ibid., 15—17.

100. Walter J. Shepard, "The German Doctrine of the Budget," *APSR* 4 (1910): 52—62.

101. Raymond G. Gettel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Boston: Ginn, 1910), 175.

102. Frank Goodnow, *Municipal Government* (New York: Century, 1909), 386.

103. 例如,见 Joseph T. Bishop, "The Burgermeister, Germany's Chief Municipal Magistrate," *APSR* 2 (May 1908): 396—410; J. W. Garner, "A Review of The German Empire' by Burt E. Howard," *APSR* 2 (1908): 105—8. 几年前,加纳(Garner,他将任美国政治学会第19届主席)发表了有关司法问题的两篇引人注目的论文:"The Judiciary of the German Empire I,"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7 (1902): 490—516; "The Judiciary of the German Empire II,"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 (1903): 512—530。

104. David M. Kennedy,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8. 1918年后有关"战争问题"的讨论进入了"当代文明"的课程。见"Columbia to Celebrate 75 Years of Great Book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94。

105. Ross,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454.

106. 例如, Karl F. Geiser, *Democracy versus Autocracy* (Boston: Heath, 1918). 盖泽(Geiser)是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政治学教授。关于在国内和海外从事宣传努力的著名史学家的作用,参见 George T. Blakey, *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0). 另见 Jarausch, "Huns, Krauts, or Good Germans?" 150。

107. Simon Litman, "Revolutionary Russia," *APSR* 12 (1918): 181—91; 引自 187, 182。

108. 引自 N. Gordon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2—43。

109. Charles McLaughli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7). 在明尼苏达大学,翻录机就摆在教室内,有不爱国嫌疑的教授的课桌在夜间遭到洗劫。见 Robert Morlan, "The Reign of Terror in the Middle West," in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 ed. Arthur S. Link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76。

110. 见 "The Case of the Columbia Professors," *Nation*, October 11, 1917, 388—89, reprinted in David F. Trask, *Word War I at Home* (New York: Wiley, 1970), 159—162。

111. Somit and Tanenhaus,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3.

112. Howard Odum, *American Masters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Henry Holt, 1927), 108.

113. Herbert B. Adams, *The Germanic Origins of New England Tow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882).

114. 引自 John G. Gunnell, *The Descent of Politic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38, On Adams's Teutonism, 另见 Ross, *Ori-*

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72—73。

115. Gettel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39, 37.

116. Wilson, *The State.*

117. Charles Beard, "The Teutonic Origin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PSR* 26 (1932): 28—44.

118. Burgess, *Foundation*, 56.

119. 除了威尔逊的《国家》和伯吉斯的著述,国家学说的主要成果还包括: Theodore Woolsey, *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 (New York: Scribner, Armstrong, 1877); and Westel W. Willough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New York: Macmillan, 1896)。

120. Walter J. Shepard, "Review of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 by Harold Laski," *APSR*13 (1919): 494.

121. Walter J. Shepard, "Review of Laski's 'The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ty,'" *APSR* 16 (1922): 131; idem, "Review of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re,'"491. 见 John G. Gunnell, "The Declin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lu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History: Research Programs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 ed. James Farr, John S. Dryzek, and Stephen T. Leon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2. Paul Bourke, "The Pluralist Reading of James Madison's Tenth Federalist,"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9 (1975): 277.

123. Ellen D. Ellis, "The Pluralist State," *APSR* 14 (1920): 399.

第二章　纳粹德国

当前，包括政治学家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把希特勒德国看成邪恶的典型。今天，任何有名望的政治学家都不会认为纳粹德国有什么值得美国借鉴的积极经验。我们完全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纳粹德国。可是，这种情况从来如此吗？

1980 年，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受到他过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纳尔逊·波尔斯比（Nelson Polsby）的邀请，参加美国政治学会的口述史项目。达尔回忆说，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他拥有一位政治学导师弗兰克·乔纳斯（Frank Jonas），乔纳斯“从德国回来，他对纳粹在德国的所作所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波尔斯比对“哦，我的上帝”的反应，达尔回应道：“乔纳斯是那里的一位年轻导师，我不得不分清我的立场……我的意思是，我从来不同情纳粹主义，但我得弄清那里到底会发生什么。”[1]

波尔斯比的反应正好体现了今天政治学家对纳粹德国的过去事后诸葛亮式的评价。他们认为难以置信的是，同时代的学者对纳粹政权的看法一点也不消极。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美国政治学家仍在“琢磨那里发生的一切”，并非所有的人对纳粹主义都怀有敌意。诚然，许多学者对纳粹某些政策和实践也表示过肯定的好奇甚至明显的羡慕。这些政治学家的专业水平都不低。下面引用的一些话语都是由 20 世纪 30 年代或

后来在美国最著名的学府如哈佛、芝加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密歇根等大学的政治学系担任教授级别的人士写的。其中五位做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 也做过《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编辑，出版过其中许多资料。这里引用的两位其他学者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和地区政治学会主席。

本章考察的著述展示了一种对纳粹德国的妥协主义立场。他们并非提倡在美国实行整个纳粹型的独裁政治，而是不带偏见的研究纳粹的纲领，以便分清它令人不快的极端面与合理面。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学习纳粹主宰下的某些功绩，尽管它带有反民主和反犹太性质。下面引述的大多数学者相信，纳粹政权有它“好”的方面，正因为此，它值得赞许。在他们的眼里，一个最大的可取之处在于纳粹的行政改革。

其他政治学家要么对纳粹主义毫不含糊地非难，要么对其只字不提。这里考察的见解不一定代表大多数观点。重要的是学者们表达的这些观点被他们的同辈视为重要的东西。它们大部分发表在业内王牌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因此，在该学科众多声音中，这些观点是正统而令人尊敬的声音。

尽管正如罗伯特·达尔后来回忆的那样，“（纳粹主义）性质很早前就一目了然”，但是20世纪30年代学者的著述不可能从二战的恐怖和大屠杀的后见之明中受益。[3] 还有一个事实是，20世纪30年代，反犹太人主义和对纳粹德国的敬仰之情在美国文化和政治中普遍可见。政治学家在表达对纳粹主义的不批评观点时并不感到孤单。这一时期很清楚，与他们的专业自我表述相反，美国政治学家并没有隔离于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更为广泛（不管好坏）的潮流之外。然而，我这里关心的与其说是质疑学者个人的伦理完善性，还不如说是想了解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如何把不批评德国的画像作为该科学内涵的合理组成

部分。

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塑造了这种情绪所具有的合法性背景。第一,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出现在大萧条期间。当时,许多美国人感到他们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在这种深刻内部危机的时刻,美国的知识分子正认真(尽管并非总是紧迫)地寻找解决美国危机的药方,因此,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冒出的社会形态感到好奇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横扫美国的反犹太人主义浪潮容许了对纳粹主义的积极兴趣。虽然种族歧视不是吸引政治学家的纳粹主要特征,但是潜藏于业内的反犹太人偏见助长了一种普遍情绪:犹太人的悲情完全不是谴责纳粹德国的主要原因。

第三,到 1933 年,包括政治学家在内的一些美国主要知识界人士,已经对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持有一种妥协主义立场。[4]两个独裁政权都被看成有价值的社会或经济试验的创始者,它们的成果值得美国学习。因此,独裁政治尽管苛刻但仍有积极属性的观点在 1933 年就已经有了一席之地,无需一个伟大的头脑把那一观点安插在德国身上。

第四,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普遍存在的主要弱点之一,是它的粗陋的行政结构。对关心这一事件的政治学家而言,研究纳粹行政方法的诱惑极大,因为普鲁士的公共行政和城市政府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受到业内的崇敬。这些学者认同这一观点:行政方法可跨国境转移,不管政权结构和政治目的差异如何。

最后,对纳粹德国采取妥协态度对政治学家似乎没有什么大碍,因为其他领域的学者当时也在考察与它们自己行业兴趣有关的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优生学(eugenic)家和社会工作专家把德国看成他们的思想实验室。[5]《美国社会学评论》

1936 年卷刊载的一篇论文，报道了对德国绝育（sterilization）项目的一手发现。该文作者声称："法律完全公正地得到实施，为个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周全地考虑到绝育，那种阶级、种族、信条、政治或宗教信念歧视不是该事件的一部分。"作者得出结论说："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公共健康措施、预防医学的方法以及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纳粹绝育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6]

总之，1933 年，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对普鲁士行政的羡慕和从概念上区别行政与政治的这种遗产，与美国知识界稍后将独裁方法与他们的目的分离开来的倾向相互影响，使美国政治学产生一种容忍对纳粹德国采取不批评、妥协态度的知识氛围。

"犹太种族的最恶劣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一次反犹太人主义高潮。20 世纪 20 年代，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广受欢迎。当时，它显然代表了有关"国际犹太人"的系列观点。[7] 紧接着，20 世纪 30 年代，许多位居高层的美国人宽恕了纳粹的反犹太人政治。例如，威尔逊总统以前的好友、后来成为罗斯福总统顾问的爱德华·M. 豪斯（Edward M. House）"陆军上校"称，希特勒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犹太人不得像他们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统治柏林的经济和知识界"。[8]

学术世界也受到反犹太人浪潮的触动。名牌大学严格控制对犹太人的录取，犹太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工作市场遭到公然的歧视。[9] 在历史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犹太求职者的秘密推荐信经常附上声明，大意是，候选人是"一个犹太人，虽然不是例外考虑的那一类"，或者，他"绝对不是犹太人，如果有人

顾虑令人不快的种族因素”。[10]

没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时期,政治学家仍怀有“令人不快”的犹太人因素的老套。1923 年,当时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导师的哈罗德·拉斯韦尔出游欧洲时,遇见了一位旅伴。拉斯韦尔在给他父母的信中把这位旅伴称为“一位哈佛大学的生化学调研者。他是不正常的聪颖德国犹太人中的一个,长着鸟喙般的鼻子和滑稽的小眼睛,一副自傲和踌躇满志的神情。但他绝不令人讨厌”。拉斯韦尔还“在船上遇见许多典当商。他们说话太多带着依地语* 口音,这是犹太教所规定的。一个样子邋遢的小鹰钩鼻烂醉如泥,他一直进出医院”。[11]在后来对欧洲的出访中,拉斯韦尔向他的父母汇报说,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身体外形表明“年长的犹太人有腹部搭拉和下垂的趋势”,而“匈牙利** 受地主寡头和犹太金融家的操纵”。[12]

拉斯韦尔在他出版的著述中没有表达此类反犹太人的老调。他的许多学生和信徒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都是犹太人。而且 20 世纪 60 年代,拉斯韦尔被犹太神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3]我这里并非指责拉斯韦尔的人格,而是表明,社会上潜藏着反犹太人的偏见,19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政治学从中提取其禀赋。这种潜在的反犹太人主义势必导致对德国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反应迟钝,这种态度在允许宽容德国的情绪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有些情况下,反犹太人主义在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中都有

---

* 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译者注

** 据作者向译者解释,句中的匈牙利不是指匈牙利本身,而是泛指欧洲国家或美国。因为在欧美社会,犹太人被刻画成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银行家,同时,他们还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受指责。——译者注

表述。在这些著述中,反犹太人主义与对纳粹主义的不批评态度之联系是更为明显和直接的。

在一篇来自柏林、发表在 1931 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文章中,凯特·平斯道夫(Kate Pinsdorf)试图消除"目前对纳粹政党的矛盾和混淆观点"。希特勒"对所有犹太人的极端厌恶"可以用一个事实"解释",那就是"在维也纳,他与犹太人种中最坏的代表如东加利西亚(Eastern Galician)犹太人接触过"。确实,"在过去的冬天,民族社会主义著述与其说是针对自 1914 年来进入德国的东加利西亚犹太人,还不如说是针对整个意义上的犹太人。从这一事实看来,我们可能发现一种修正对所有犹太人的彻底指控"。因此,平斯道夫间接地宽恕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只要局限于他们中的"最坏"成分。[14]

平斯道夫绝对仰慕纳粹的资源,并反复提到纳粹运动的"理想主义热情和牺牲精神"。他把希特勒描述为一名中立派议员,"成功地把他所在的追求暴动的右翼党派和指责把权力用于社会革命的合法途径的左翼党派引向中间道路"。希特勒是一位"中产阶级人士"和精明的政治家,他"具有组织异己人士并把他们捆在一起的才能"。这些人士中的救世军"使勇往直前、苛刻命令和集体行动的德国人感到满足,就像橄榄球满足美国人的欲望一样"。[15]

凯特·平斯道夫 1901 年出生在巴西的德国移民家庭。1928 年,她被录取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并赴柏林研究"德国保守党"。回国后,她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教历史。1934 年,与巴西的一位美国商人结婚,明显离开了学术圈。[16]因此,平斯道夫文章的重要性与其说源自她本人在政治学方面的声望,还不如说来自于它出版时的销售途径——该学科的正式刊物——以及它的编辑的声望。1926—1949 年担任

过《美国政治学评论》编辑、威斯康星大学的弗雷德里克·A.奥格(Frederic A. Ogg)在编辑中没有删除平斯道夫涉及"犹太人种的最坏代表"的内容。[17]

与平斯道夫不同,弗朗西斯·格雷厄姆·威尔逊(1901—1976)绝不是一位含糊的学者。威尔逊从得克萨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他受聘于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很快晋升为副教授,并于1934年升为教授。[18]至20世纪30年代中叶,威尔逊在政治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思想已闻名遐迩,他采取一种如他所说的保守立场。[19]四十年后,他的悼词说,威尔逊的整个学术生涯"避开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自他在得克萨斯大学转变以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信奉一种客观道德规范,因为明显的人文条件限制,这一道德规范在尘世至多是近似的"[20]。

如果威尔逊逃避伦理相对主义,那么他的厌恶情绪几乎不会体现在他的教科书《现代政治学要素》中,该书的前言作于1936年4月。在题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章节中,威尔逊盛赞纳粹主义的客观性优点。在"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事实上矛盾的哲学"的冲突方面,他写道:"让憎恨胜过理智是容易的……一种世界观的代表能达到另一个世界观的彼岸之惟一途径,是采用另一世界观的基本前提假设。"自由主义者对纳粹哲学持敌视态度,"惟有使德国人相信自己的立场本质上是正确的"。为了说明指责纳粹意识形态会起反作用,威尔逊指出:"犹太人在全球联合抵制德国的现象,被许多人视为这一指责的证据,即德国人反对犹太种族。这种抵制也是另一指责的证据,即犹太人从来没有完全被他们的居住国所同化,德国的犹太人不是德国人。"[21]

威尔逊认为,具有"精雕细刻"优点和经过不偏不倚检验的

那部分纳粹哲学是“日耳曼文明的种族理论”,“这类思想的极端形式此时是正统合法的,但有许多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可能错位了,一种更冷静的激进哲学能派上用场,大多数批评家也会承认,假如国家社会主义在最近的将来被逐出政治生活,种族法则仍会是很重要的,尽管它不是以极端形式出现”。[22]

因此,威尔逊认为,假如只是纳粹种族理论从“极端”成分中被清除,那么它本质上是健全的。事实上,威尔逊暗示,纳粹正在使它们的理论变得更“冷静”。例如,纳粹并不支持“现代德国是纯雅利安人”的观点。而是赞成更为温和的观点:

> 在德国,雅利安成分仍然强大,这是有目共睹的。该国激进政策的任务是给这个国家各优良种族尽可能多的利益。这样,在经历一代又一代后,他们将逐渐恢复其日耳曼文明的种族根基。国家社会主义者肯定美国和英国的移民政策。我们的新移民法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步骤,因为它们表明了保留我们国家的北欧族种的愿望。这些法规将朝健康人种的目标发展,因为它们减少了劣等的东欧人的涌入,东欧人带来腐朽的古老文明,这已经损害了一些北欧文化的势力。[23]

威尔逊在这一章的结论中袒护纳粹的外交政策:“严肃的学者很少会怀疑一般德国人骨子里的和平意志……这也许能从德国领导层的声明中找到根据:德国要的是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安全、自由、平等和尊敬。”[24]

1939 年,弗朗西斯·威尔逊被聘为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该系是当时业内六七家最著名的系所之一。[25]他 1967 年退休,担任了一届系主任。他去世时的悼词写道:“在他整个学术生涯中,威尔逊活跃在与国内事务、西部、中西部以及国家资

本领域有关的政治学会，表现出很专业的才华。”[2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7—1940 年间，威尔逊在美国政治学会执行委员会供过职。并在 1941 年担任过中西部政治学家联合会主席。他学术之外的荣誉还包括“人权与义务特遣部队”（Task Force on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成员和“宪法完善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al Integrity）名誉主席等。[27]

威廉·贝内特·芒罗（William Bennett Munro，1875—1957）是另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他对纳粹主义的描述偏离了反犹太人情结。20 世纪 20 年代，威廉·贝内特·芒罗高居哈佛大学政府史特朗布尔（Trumbull）主席一职，并于 1927 年当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他是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缔造者之一，1929 年他加入这所学院。[28]芒罗的比较政府学教科书于 1925 年首次出版，每年销售 5000 册，并于 1931 年和 1938 年再版。[29]

在他 1938 年版的教科书中，芒罗表达了对纳粹独裁的反对，猛烈抨击纳粹德国对个人自由的践踏。然而，他更多地是关注其他德国人的自由，而对德国境内犹太人的自由关注不多。在题为“纳粹与犹太人”一章中，芒罗解释说，纳粹成功掌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利用反犹太人的偏见”。根据他的说法，“犹太人通过控制银行业和信贷以及把持大量工业、百货公司和报纸，在战前（威廉）德国敛取了大量经济权力”。在魏玛年代，“犹太人就开始在德国公共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新政权来到之时发生这一切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里，只有律师、银行家、商人和报商而不是贵族或大地主全面控制权力”。芒罗接着指出，在大萧条时期，“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自然要比固定收入阶层受益多”，而且“很巧合，这些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大都是犹太人。就像所有银行家和大商人一样，处于前列的犹太族银行家和商人与国外有联系。由于

这个原因，他们被指控与德国的邻国勾结，强行赔付，使国家贫困潦倒”。[30]

在不加批评地反复提及这些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后，芒罗提出了问题：“在历史上所有种族中，为什么惟有犹太种族受到的迫害更多呢？”他认为，其中一个答案在于“嫉妒他人”：

> 犹太种族有某种内在的能力，尤其是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犹太人通常勤劳、精明、节俭、攒钱、有投资赢利的眼光，而且在以往其他人长出一个谢克尔(shekel)*的地方，他们能生成两三个谢克尔。在与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种竞争时，犹太人准赢。但在他们到达成功顶峰的道路上，常常背后留下嫉妒和怨恨的痕迹。现代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对犹太人的许多憎恨都并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31]

还有其他原因可解释反犹太人的敌意：

> 大部分犹太人并不清一色地投身于所有行业和职业，而是倾向于集中于其中几个。他们不随便与其他种族通婚，而是小心地呵护其种族的完整性。这一种族散布在地球表面上一千多年而没有自己的祖国，但令人惊奇的是，它一直如此好地保持团结。然而，这种表现也使它的成员在一旦出现任何种族歧视运动时，很容易与其他广大民众区别开来。还有，犹太人往往是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者。通常，他不像其他大多数种族的普通人一样俯首听命。他往往自行思考，而不是让其他人代替自己去做。虽然他理智、忠诚地履行他的公民义务，但犹太人的爱国精神不属好斗那一类。因此，他从来不愿接受他周围的德国人、俄国人、

---

* 以色列的一种基本货币单位。——译者注

西班牙人或其他任何人种是社会中坚分子的观点也就很自然了。[32]

最后,“也许要提到这一事实,当经济灾难袭击任何国家时……犹太人似乎比其他大多数人的遭遇更好些。部分因为该种族长期来的教育:在麻烦来临时寻找一个安全港湾的艺术”。在谈到纳粹的反犹太人宣传时,芒罗得出结论说:“这其中一些指控没有根据,但它们却受到普遍的认可,这为纳粹的动机赢得了追随者。”[33]

因而,威廉·贝内特·芒罗的言下之意是,纳粹某些反犹太人的指控“是”正当的。他实质上暗示,犹太人的问题源自并重的两方面:犹太人本身的顽固天性和加害者的堕落。他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含沙射影地说,虽然反犹太人政策太过分了,但是把犹太人减少到与他们的经济规模相符可能是正当的,只要以一种不那么残酷的方式实施。

德国政府的诉求

美国政治学家对纳粹行政实践的兴趣是由几个知识潮流一并塑造的:19 世纪晚期对德国官僚效率的崇拜之遗产;行政技能与政治目的分开的普遍信念;以及对 1933 年前的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妥协主义的盛行。

“如果我看见行凶的家伙……”

在公共行政(已在第一章讨论过)的开创性论文中,伍德罗·威尔逊这位美国政治学会第六届主席哀叹美国的行政滞后性,并赞扬由普鲁士改革者改善的公共行政是“令人羡慕的体制”[34]。这些观点得到了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于 1903 年)缔造者

的普遍认同。[35]

该协会的第一届主席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1859—1939)就是他那一代人中典型的行业代表,他把他的全部生涯奉献给了行政学研究。古德诺尤其批评美国的市政状况。他试图通过去掉城市政府的政治色彩、使其专业化的方式,削减城市政治机器的权力——这是他和他的同仁以及改革者指责为腐败和低效的方面。他清楚地目睹过普鲁士城市,"那里的行政效力可能比其他地方更高",美国城市改革者可从这一样板中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古德诺写道,其他国家的"城市政府工作很少像普鲁士那样如此全面地符合整个城市人们的愿望"。[36]美国政治学会第二届主席、威尔逊的朋友艾伯特·肖(Albert Shaw)也是城市政府的热心学者。德国从农业社会相对快速和轻松地向发达工业社会转化,给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注意到,德国成功的秘诀是它拥有一套"任何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更经济、有效的公共行政体系"。肖相信:"(德国)城市内务处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具优势是有多种原因的。"[37]

总之,对20世纪早期的职业领导而言,普鲁士行政代表了令人垂涎的政府职业道德和效率的典范。普鲁士不是他们考察的惟一国外范例。古德诺、肖、威尔逊及其同仁也对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的行政实践感兴趣。但普鲁士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行政典范,常常是最好的一个。

这些政治学家并不希望用其他国家的画像重塑美国的政治体系。相反,他们的观点是,行政是一个技术领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相异不应阻碍行政技术的输入。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说:

> 正是行政与政治的区别……使得行政领域的比较方法非常安全。当我们研究法国和德国的行政体制时,就知道

我们不是在寻找政治法则，我们不必在乎法国和德国人用来指导实践的宪法和政治原因的细小方面。如果我们看见一个行凶的家伙聪明地磨快刀子，我可以借用他磨刀的方式而不是他用刀行凶的可能动机。因此，如果我看见一个十足的君主主义者在公共机构方面管理得很好，我可以学习他的运营方法，而不会改变我的共和体制本身。他能效忠他的国王；而我可以继续为我的人民服务；但我会为我的元首效劳，就像他效忠他的君主一样。[38]

在谈到一个“行凶的家伙”时，威尔逊明显不是直接指他那个时代的法国和德国。它是一个夸张的比喻，是借以放大政治学与行政学差别的修辞手法。但对威尔逊的继任者而言，这种抽象概念会变成一种具体的道德困境。

意大利和苏联：“惹人注目的试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美国国家身份中日耳曼理论的死亡和以日耳曼为中心的国家学说的急剧衰落。战争也破坏了德国行政的名声。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只有寥寥无几的美国学者赴德国研究行政，一些先前崇拜普鲁士官僚体制的学者变成了批评者。[39]例如，尽管 1909 年的威廉·贝内特·芒罗无条件赞扬城市政府的效率，但到 1927 年，他在同一部书的再版中却批评普鲁士体制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来保证高效率。[40]

然而，德国行政的名声理论上说受战争的震荡较轻，因为它并没有依赖于文化和政治亲合力这一前提。因此，当战争经历消退和德国不单独对战争负责的论点赢得尊敬时，美国公共行政学学者恢复了对德国的朝拜。这一时期的最显著的研究成果是布鲁金斯学院研究员弗雷德里克·布莱克利（Frederick Blachly）和米里亚姆·奥特曼（Miriam Oatman）的《政府与德国

行政》(*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Germany*,1928)。该著作比战前对德国行政的研究成果更全面,里面不乏褒奖之辞。例如,它称赞德国行政体制"非常高效、充满活力和远离腐败,为政治家、行政官员和公民提供许多类似的有益启示"[41]。因此,在魏玛时代日薄西山之际,德国公共行政恢复了大战前在美国一直拥有的光泽。

但是,复活的德国官僚体制名声会从德国的纳粹化中幸免于难吗?魏玛民主消失后,美国政治学家会继续黏附于"聪明"的行政技术吗?以20世纪后期的德国行政研究为基础是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的。布莱克利和奥特曼研究德国之时,正是人们赞扬魏玛政权的民主和高效之际。也许,一种美国政治学家在魏玛民主死亡后仍对德国技术感兴趣的明显迹象存在于他们对意大利和苏联的态度之中,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都已成了独裁国家,并稍后与纳粹德国一道被贴上"极权国家"的标签。[42]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间,一些顶尖的美国知识分子对法西斯意大利或苏联采取妥协主义立场,把它们描述为正在进行有价值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试验的实验室。这些知识分子未必希望美国遭受无产阶级革命,更不想让它走向民族独裁,也并不是没有察觉这些政权制度中令人讨厌的特点,但他们乐于提出这样的建议:美国应该模仿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中更为积极的方面。[43]这一妥协主义情绪在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n,1874—1953)和其他人的学术中非常明显。[44]梅里亚姆是这一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领导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并把它建成为业内最具声望的两个系之一。[45]后来主持美国政治学会的学者中绝大多数在梅里亚姆所在的政治学系接受过研究生教育,或希望自己曾经拥

有这一段经历。[46]

梅里亚姆倡导的科学至上主义使芝加哥的知识氛围变得特殊。梅里亚姆所在系的研究生将它作为令人兴奋的知识场铭记着。这里极大地鼓励学生参与调查研究,关注来自交叉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梅里亚姆以前的学生(以及其他学科史编年史家)把他称为席卷 20 世纪 50 年代的科学革命的先驱。[47]现在,芝加哥观点作为科学至上主义的早期堡垒是无疑的。但是,如果认为梅里亚姆的科学概念导致今天学科中流行的概念是浅的知识进步,那就过于单纯了。因为政治学家的抱负今天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构建和检验理论的适度范围,梅里亚姆渴望创造的不过是"由现代科学改造的新世界"[48]。今天,政治学的科学研究常常受经验主义的"知识空白"和理论困惑所激发,梅里亚姆受一种进步冲动所激发:利用科学——优先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作为"控制"实际问题的方式。[49]因此,尽管这期间该学科在方法论上更加完善,而且梅里亚姆 20 世纪 20 年代那种顽固的科学想象也被摒弃了,但是政治"科学"发展的经历既是一种衰退也是一种进步。

大概从 1925 年到 1931 年,吸引梅里亚姆的主要实际问题是民族建设(他更喜好称之为"公民教育")问题。这也是令约翰·伯吉斯这一代人神往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再度出现的背景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伯吉斯的民族主义冲动受内战经历的触发,而梅里亚姆(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伯吉斯的课)则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的深刻影响。[50]就国际而言,此次战争产生了民族自决原则,而在国内,"百分之百美国主义"的鼓声在威尔逊政府的协奏下,再次唤醒了本土主义者(nativist)的冲动。[51]1917—1918 年间,梅里亚姆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及史学家一道为政府的主要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

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工作。[52]他被安排负责“意大利的美国宣传”,在这里,他利用电影、演讲者和传单,试图鼓动意大利人民低落的士气,为美国的战争理由赢得人心。[53]正如多罗茜·罗斯(Dorothy Ross)所说,梅里亚姆从意大利带回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即这种“宣传”技术“如果运用于公民教育,一定会颇具效果”。[54]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梅里亚姆对美国出现的爱国主义公社情绪的挑战开始醒悟,但是,这种情绪比一些非常流行的组织如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和三 K 党(Ku Klux Klan)大肆宣传的本土主义态度要温和些。

与伯吉斯试图把美国民族主义扎根于历史和文化相比,梅里亚姆把爱国精神的特征定格为一种技术上的“控制问题”(control problem)。[55]他针对“比较公民教育”发起了大规模的跨国研究计划,并要求参与者评估“针对灌输公民兴趣和忠诚”的各种机制或方法的效果。[56]想象一下,梅里亚姆致信给一个预期的合作者,试图解释这一计划的性质:中国政府邀请我们“在中国发展爱国情绪,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认为什么样的机制和方法最有效并建议其投入应用呢?……这就提出了一个与问话人不同的问题,即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理论的历史是什么”[57]。因而,梅里亚姆在比较公民教育领域运用的是与四十年前伍德罗·威尔逊运用于比较政府领域相同的价值中心标准。梅里亚姆相信,民族建设技术可以被拷贝,而无需采纳外国技术员提供的政治目的。

梅里亚姆选择研究的国家包括“更现代的两个体制:法西斯意大利和俄国的苏联体制”。[58]正如梅里亚姆提到的,[59]意大利和苏联的“显著试验”对他来说似乎是“正在重新创造对事物新秩序的一种政治忠诚和兴趣的最为有趣的(尝试)。俄国的革命当然要重要得多……但意大利的情况同样出色”[60]。

1926 年,梅里亚姆与他招募参加苏联公民教育项目研究的学者——芝加哥大学的塞缪尔·哈珀(Samuel Harper)——一道到苏联旅游。[61]哈珀是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首席专家,然而,尽管他完全意识到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残酷无情一面,他还是把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他认为该政权较光明的一面:它在各个领域的"坦率的试验"是革命的精髓,使苏联成为公民教育方法研究的有趣领域。把苏联说成伟大的实验室已是家喻户晓。[62]该项目的一本成书是梅里亚姆"公民形成研究"的系列著作,他在该书中详细描述了苏联的出版社、学校、青年运动、市民团体、政治活动以及庆祝仪式等在激励苏联公民兴趣方面的作用。该书得到了《消息报》(*Izvestia*)的肯定式评价。[63]

由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前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赫伯特·施奈德(Herbert Schneider)以及历史学家谢泼德·克拉夫(Shepard Clough)撰写的《使成为法西斯主义者》(Making Fascists)一章也是梅里亚姆编辑的比较公民教育系列的一部分。[64]施奈德稍早在《政治学季刊》发表过一篇有关法西斯意大利的文章,并出版一部书叫《使成为法西斯国家》(*Making the Fascist State*)。在这些著述中,他对法西斯的暴力轻描淡写,赞扬意大利向"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转变。[65]正如约翰·迪金斯(John Diggins)一针见血指出的,施奈德实质上把墨索里尼的社团国家理解为实现社会团结的涂尔干梦想的先锋。[66]施奈德对 1926—1927 年意大利该领域的研究产出了《使成为法西斯国家》这一研究成果,该研究是由当时查尔斯·梅里亚姆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梅里亚姆对施奈德的研究计划表示了"良好的兴趣",并致信施奈德说,他"发现(《使成为法西斯国家》)极有价值、催人奋进"[67]。他同时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的评论中给予极佳的评价。[68]随

后，梅里亚姆再次把施奈德派往意大利，这一次是研究法西斯的公民教育；施奈德把谢泼德拉进来协助他。

施奈德和克拉夫发现，“法西斯政权在引起人们的宗教想象以及为该民族提供表达政治信仰的具体象征和形式方面比其前辈进步了许多”。法西斯的“宗教仪式和典礼”，如“黑色制服、黑色三角旗、罗马式军礼……在国外人看来也许似乎矫揉造作甚至虚假”，但是“即便偶尔了解一个法西斯分子（fascio）的精神和内部生活，也足以展示该民族年轻一代的情感诉求和想象力……这是大多数法西斯主义者身上相当明显和毋庸置疑的宗教信念成分，它超越了政治斗争和党派策略的限制”。该书的结论部分指出，法西斯主义者旨在迎合意大利战后紧急情况的“公民教育方法与理想”，“可用来教育那些仍在躲避这些紧急事件的人们”。[69]梅里亚姆写信给该作者说，他对他们的“开创性”研究感到“莫大的高兴”。[70]

在《公民的形成》一书中，梅里亚姆总结和综述了他的合作成果。在总结苏联个案时，梅里亚姆忽视了苏联对公民权利的压制，而是满意地认为，革命已经产生“一种民主民族主义形式”。他总结说：“这是世界上关于公民教育最有趣和最具启发性的实验，为研究公民过程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至于意大利，梅里亚姆承认墨索里尼采取“铁腕”统治，但他把法西斯手段定性为“对公民教育的学者充满意义”，“是在俄国之外发展公民情感最系统化、最完整的尝试”。[71]

梅里亚姆对为鼓动公民忠诚而假造普遍情感的高招非常着迷。在苏联，“红旗、《国际歌》、大规模群众聚会、游行、示威、节日、假日以及革命艺术等象征着新的秩序，为抽象的理论注入了栩栩如生的色彩和格调”。在意大利，“制服、礼仪、军队举手礼、咿呵咿呵的喊声以及流行歌《乔凡内扎》（Giovanezza）”都是

"建立法西斯象征的极大努力的一部分,代表新政治实体的新精神,为新忠诚的画面装点感情色彩"。在这两个国家中,新象征的教育潜力"特别显著"。梅里亚姆写道:"那些特征如红黑衬衣的精美图案,加上一系列丰富多彩和鼓舞人心的祭礼和仪式……很可能会纳入未来公民教育之中。"[72]

总而言之,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都态度鲜明地认为,法西斯意大利和斯大林苏联为美国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尽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大体上,没有理由表明,梅里亚姆对在象征意义和群众动员方面技艺超群的另一政权——阿道夫·希特勒政权——不会采取相似的妥协主义立场。

查尔斯·梅里亚姆在柏林布里斯托尔(Bristol)旅馆度过了 1932 年的夏天,在那里,他近距离观察了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的选举活动。他加入了被保护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和赴莫斯科的塞缪尔·哈珀的行列。哈珀在自传中回忆自己与梅里亚姆一道参加了几个选举会议,包括"令人吃惊"的希特勒集会:

> 艾维·李(Ivy Lee)就坐在我身后,他和梅里亚姆二人都参加过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他们对我指出,共产主义者已被纳粹的宣传技师超过了。体育场上聚集着巨大的人群,行进的运动员、手持火炬的青少年、反复演奏的简单锣鼓军乐逐渐为演说者准备着……最后,希特勒和戈培尔(Geobells)驶入了场地。当时,戈培尔是柏林的至爱。希特勒控制自己的话语节奏让回声消逝,这样,他的演说就成了一系列爆炸式的声音。当我们离去时,梅里亚姆把这次会议概括为三 K 党、黑人复兴和比利·斯旺德(Billy Suanday)冗长演说的结合。[73]

艾维·李是一位成功的美国广告代理人，他在美国商业领导中擦亮了墨索里尼的形象。而且他很快将成为一个受益的纳粹宣传者。[74]根据哈珀的记载，梅里亚姆似乎在 1932 年时把希特勒看成理想宣传者的首要化身：才华横溢的演说家、聪明的符号操作者以及精神上的治疗者。在梅里亚姆被可恨的内容征服时，他显然对希特勒富有艺术性的信息传递着迷。

这种着迷现象在《政治权力》一书中显而易见，这部书首作于柏林，当时希特勒正参加德国国会大厦的竞选，完成于芝加哥，即希特勒放火烧掉国会大厦的几个月后。[75]实际上，这部书成了维持政治权威的一本手册。梅里亚姆问：

> 如果世界上的领导为准备一部“权力指南”而聚集在一块，那么他们会得出结论认为那种特殊情况比任何可能的普遍性更重要吗？或者，斯大林、麦克唐纳（MacDonald）、甘地（Gandhi）、赫里欧（Herriot）*、希特勒和罗斯福会发现一系列值得效仿的内在法则、普遍真理以及原理吗？他们会就立法者、“好”行政官、“好”法官、“好”领导或“好”将军的衡量标准达成一致吗？……他们会不会从其他群体中发现能为己所用的人员、管理和技术等东西呢……？[76]

梅里亚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是”。他列出了一些权力原则，它们“普遍适合外部组织及功能不同的一系列体制，同样适应于民主和专制、精英（或曰法西斯主义）及苏联政府，而且他们在大量不同权力技术的运用中也是适应的”。梅里亚姆认为，一旦“党派怨恨被抛置一旁”，你就会发现不同政府面对的问题“惊人地相似”。例如，“商品生产问题就存在

---

* 法国政治家，1924—1925 年及 1932 年任法国总理。——译者注

于所有的权力体制中，无论这样那样的经济情况，也无论是此种或彼种民族团体。德国、美国和俄国对大规模的批量生产感兴趣，而法国采用另一种体制，意大利和英国则使用其他类型的生产模式。当这些不同单位的专家凑在一起时，他们讲的是同样的技术语言，只是口音不同而已”。同样，“伦敦、柏林、莫斯科、罗马和华盛顿”都面对“控制人员的选择和继任”问题：至于遴选领导干部，“世界不同权力体制的代表们最难达成共识。但在较为狭窄的公共行政领域，不同的掌权者更容易彼此理解和领会，并讨论竞争计划的不同优势”。而且所有的掌权者也必然面对“三个群体的平衡”，即“专家或技术人员、统治者、消费者与生产者”：

> 在某种程度上，有名无实的统治者可被视为经纪人，运筹于群众与专家之间，彼此可相互诠释。何种声音最终起决定作用或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是权威的声音、专家的意见还是群众的声音？苏联必须像英国政府、天主教派、德国、日本政府一样仔细考虑这些问题。[77]

因此，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几个月内出的著述中，梅里亚姆在提到罗斯福和甘地的同时，也偶尔提到福勒(Fuhrer)的名字。而且他坚持这一观点：在行政和其他许多领域，政府技能具有跨意识形态和政治边际的可互换性。

但是，《政治权力》不仅仅是一本手册。从更深层意义上说，它是了解梅里亚姆对政治发展的解释以及他对它未来道路的构想。以往，梅里亚姆认为，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胁迫和暴行之上，特别受绝对统治者神圣权威的神话支持。在18世纪晚期，专制主义者，即权力国家(Macht Staat)开始让位于法制国家(Recht Staat)。不幸的是，消除专制主义政府的冲动堕落为彻底贬低政府的倾向。在右翼看来，

“资本主义者抨击国家，是对他们生机勃勃贸易的一种威胁，并想方设法限制它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联合抵制政府的倾向，特别是在美国”[78]。在左翼看来，马克思揭露了自由放任政策，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物质利益的意识形态面具。然而，可悲的是，马克思和他的资本主义敌人一样希望政府消失。因此，就出现了其他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对现行政治权威的挑战，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拥戴者揭露潜伏在宪政自由国家民主表象背后的寡头现实。

因而，梅里亚姆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精英理论学家所宣传的现实、反传统形式的宪政国家之解释感到宽慰。他认为[回应同时代的观点诸如进步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的法制现实主义等]，宪法和法律体制是霸权利益的产物，没有体现绝对原则。然而，梅里亚姆刚刚认可这种对资本主义和宪政意识形态属性的批评，他就把批评的武器对准了批评者本身：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也只是为狭隘的阶级或民族利益服务。[79]

如果自由放任宪政国家是商业利益的一种掩饰，而且除了党派意识形态外，站出来向它提出挑战的主要思想就是它们本身，那么何来乌托邦呢？梅里亚姆自信地认为，未来要变得光明，只有通过真正客观的力量和“既非法律又非道德亦非政治体制方面的崇拜”力量，即科学。未来属于聪明的统治者，他们欢迎那些以最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武装起来的专家的建议。现存的运动和意识形态：

> 也许由于行将来到的人类行为控制的演变而变得黯然失色，这种行为控制的演变可能破坏当前政治的意义。当今许多灾难建立在人性失调之上，这种人性失调在很大程

度上可通过采用已知的科学手段加以遏止……人类的命运主要因物质精神平衡以及公民教育的再调整而改变。

教育学、预防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心理分析学、精神生物学是：

逐渐进化的新的释放和控制形式，成为现代权力问题的中心。少了它，就无法研究未来……由于现代机器技术已打乱了经济学的分类和计划，新的社会技术正倾覆权威的基本模式……如果（这些控制）彻底变革公民教育，或破坏法庭程序，或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送进垃圾堆，或重组代表、责任，或使民主、贵族政府或独裁者毫无用途，那么它就会变得如此。[80]

虽然梅里亚姆担心现存的意识形态运动可能在短期内彼此激烈冲突，但他非常乐观地认为，长远看，他对“由现代科学改造的新世界”的后政治（postpolitical）构想一定会实现。1934年，他仍怀抱这样的希望（今天看起来似乎很天真），即科技上发达的医疗控制法将消除权力政治。

希特勒什么地方符合这幅画像？梅里亚姆不是纳粹，他绝不会接受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但他确实从希特勒的领导技能中看到了后政治时代的统治者必要的“新权力手段”。在整个这部书中，梅里亚姆在不同场合把希特勒描述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罗斯福、墨索里尼、希特勒、俾斯麦和克里蒙梭是这一[演说]领域的大师”）、社会团结的绝对促进者（“希特勒，是德国的奥地利人，劳埃德·乔治是英国的威尔士人——这些表明了群众调和的可能性”）、一位有效的群众组织者（这是当代内部组织可见于德国的有趣例证，在这里，希特勒军队曾一度由多达40万招募的志愿军组成）和宣传大师（“苏联、德国法西斯者以及纳粹的象征主义是以不同方式对群众欲望或潜力的更新形

式的象征性诠释”）。[81]

未来，这些“权力手段”将由“被称之为‘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更为科学的手段”、以人性为身心基础的知识以及与个人和群众有关的象征主义知识来补充。梅里亚姆不无赞扬地写道，权力是“由那些懂得大多数人的行为和人性秘诀的人所掌控，不管他们是科学地还是艺术性地掌握这些数据”。希特勒不是科学家，这一点可以肯定，但他对群众疗法的直觉把握促进了那一领域的科学发展：

> 可能确实存在某种与群众示威行动中的奇迹相距不远的东西，即从一种态度向另一种态度不可思议的转变，导致个人行为的根本改变……社会和政治态度、感情色彩的失调可通过曝光于大型集会的射线下和来自演说家或群众本身的声波得以“治疗”。托洛茨基（Trotzky）或希特勒的艺术非常像彼得隐士（Peter the Hermit）或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的艺术……在这些群众示威中……一种所谓精神“转化”（conversion）的物理“疗法”自那时以后就具有政治态度和行为再定位的相似性。

梅里亚姆进一步指出，精神上的“立宪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段“很早以前就为人所知和运用，但最近对它们的使用是基于一种更广泛的群众参与，或对群众心理和组织的更深了解，并建立在对大众广告和要求更为彻底了解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是将其当作艺术性的象征主义使用的话。人们只要想一想墨索里尼、希特勒，就可注意到权力调整新技术的效果，并看出它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某些意义”[82]。

总之，在1934年出版的《政治权力》一书中，梅里亚姆把希特勒刻画为一个聪明的受压迫者（underdog），属甘地和萨沃那洛拉（一位凭借传教士的天赋领导佛罗伦萨的精神改革者）一

类,而不是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王子"类型,后者的准则最终建立在武力之上。[83]梅里亚姆暗示,希特勒对人性的直觉理解和对群众动态治疗潜力的把握为未来的社会工程师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梅里亚姆显然把《政治权力》的早期手稿寄给了卢瑟·久利克(Luther Gulick)这位行政学杰出专家,后者是纽约公共行政学院的院长,后来还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久利克写信给梅里亚姆,并附上两点对手稿的评论,这些评论是受"希特勒在德国的屠杀"激怒的。首先,希特勒正用犹太人"作为替罪羊——我记不起你在书中详细阐述过这种替罪羊手段"。其次,希特勒"把经济地位从犹太人手里转移到(他)自己的追随者手中"不是经济庇护的新手法。"这正是威廉征服者在英国对贵族所做的一切,它与罗斯福在新政期间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梅里亚姆回应说:"德国的情况确实令人着迷,我想我会按您(久利克)的建议更多地利用它。"[84]

魏玛"冬天",纳粹"太阳"

1934 年 8 月 16 日,美国报纸报道说,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伯特·莱珀斯基(Albert Lepawsky)受到一名纳粹党员的攻击。莱珀斯基参加了柏林纽考恩(Neukoeln)体育馆的集会,集会的主要演说者是纳粹的新闻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当他(莱珀斯基)观看一列纳粹党员举着旗子走进体育馆时,其中一名纳粹党员从队列中走出来,朝他脸上捅了一拳,原因明显是,他在希特勒的举手礼中未能抬起他的手臂。"《芝加哥论坛》补充说:

> 莱珀斯基教授,26 岁,1932 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自那时起,他一直作为研究人员与政治学系保持联系。

他在芝加哥地区进行一项司法组织研究，研究成果以书的形式出版，且在教育界颇受欢迎。他在政治学系主任查尔斯·梅里亚姆博士的指导下继续从事研究，直到去年夏季被授予社会科学研究奖学金，给了他去国外学习的机会。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休假止住了这次厄运。

1933 年被任命为驻德大使的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多德(William Dodd)在他 1934 年 8 月 14 日的日记中写道，莱珀斯基在事故后来到大使馆。莱珀斯基未受到严重伤害，但他要求德国外事办道歉。多德建议他向美国总领事报告该事件。[85]莱珀斯基照办了，德国方面告诉领事说，袭击者将受到惩处。[86]

该事件发生后不久，查尔斯·梅里亚姆从巴黎给多德这位密友写信说，他“读到报纸上有关莱珀斯基遭殴的消息后非常沮丧，他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主要助手”。他相信，作为一位美国公民，莱珀斯基应该受到保护。然后，梅里亚姆补充说：“就在几周前，我在巴黎向地方政权联盟(Gemeindetag)主席杰塞里克(Jeserich)博士以及他的助手戈斯克(Goertsch)博士说起过这件事，他们对莱珀斯基的工作表示浓厚的兴趣，并想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他。”[87]

莱珀斯基当时在纳粹德国研究什么？为何他要亲临现场观看戈培尔的可憎言论？梅里亚姆当时在巴黎干什么？杰塞里克是谁，他为什么对莱珀斯基的研究感兴趣？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莱珀斯基作为梅里亚姆的主要助手时从事的那项研究计划结出了二人合作研究芝加哥地区市政的成果。他们合作的著作是把“效率”方法运用于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典型事例，该书批评芝加哥地区组织结构“混乱”，并推荐旨在使该地区政府集权化的改革。[88]

尽管该书是梅里亚姆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研究行政学的学术专著,但是他对该领域的兴趣远非于此。作为1899年柏林的一名研究生,梅里亚姆就德国的市政组织了一个讨论团,并崇拜在柏林市议会任过职、后来成为魏玛宪章起草人的雨果·普罗伊斯(Hugo Preuss)教授。1901年成为芝加哥大学教员后,梅里亚姆成了市政改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像普罗伊斯一样被选入市议会。1911年和1919年,梅里亚姆依赖亲改革的共和党人的选票竞选市长失败。在经历第二次失败后,他从选举政治中退休,并把他的大量组织技能转移到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地方的社会科学制度化研究中。[89]梅里亚姆所"创立"的一个重要机构是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PACH)。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成立于1931年。当时逐步加深的大萧条,迫切需要旧的改革冲动来简化美国臃肿的行政结构,并使公共事务职业化。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而设立的,其下所有致力于改进政府技能目标的不同职业机构"集结在一起,以获得信息和经验交流的即时优势"。该机构有意设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而且它与这所大学的政治学系有着亲密的关系。大萧条期间,该系三分之一的研究生主修公共行政专业,交流中心在他们的教育培训中担当主角:其中一些官员被指派到该系的教学岗位,同时它还为学者和一年级博士生提供带薪工作的机会,这在那个年代是少有的。[90]

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的负责人是路易斯·布朗洛(Louis Brownlow),一位由前新闻记者转变而来的职业市政官员。布朗洛很乐意与芝加哥大学的高官(mandarins)打成一片,并与梅里亚姆发展了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们这种联结关系的最大表现是,二人与卢瑟·久利克一道于1936—1937年成了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委员会成员)。二者都相信,政府目的不得与方法混淆。

布朗洛吸收了梅里亚姆用政府方法进行比较国际研究的做法。根据他自己的记载,他“坚信这一观点:行政技术可从一种语言移用于另一种语言,从一国移用到另一国,从一种形式的政治组织移用到另一形式的政治组织”[91]。

1934 年 7 月,布朗洛在巴黎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旨在促进公共行政中的信息和研究成果交流。当时,布朗洛回想起,他和梅里亚姆(也参加了会议)“仍然信奉这一理论:行政方法和实践是可移用的,尽管政治控制中存在种族差异”。因此,在布朗洛邀请与会的三十七位代表中有两位德国人。其中一位是柏林大学市立科学院院长、纳粹化的德国地方政权联盟的执行主席库尔特·杰塞里克(Kurt Jeserich)。布朗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杰塞里克的行为(他当时加入纳粹党的申请被搁置下来了)为此次会议“布下了浓重的阴影”[92]。但在他同一时期有关这一会议的报告中,布朗洛称,尽管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Engelbert Dollfuss)遭暗杀事件——发生在会议期间——制造了政治紧张气氛,但是“会议继续平静有序地进行,讨论更科学的行政运作方法,因此明确了科学与行政艺术本质上的统一,尽管在政治方面存在至深至大的差异”[93]。

另外,布朗洛在回忆录中坦陈,巴黎会议后,他仍然相信行政技术的可转移性。[94]他从巴黎前往柏林,探访来自芝加哥的友人多德大使(梅里亚姆在巴黎时获悉莱珀斯基遭袭一事)。多德在 8 月 23 日的日记中写道:“布朗洛对美国城市问题的了解程度绝不亚于这个国家的任何人。他正同德国城市的官员讨论关于纳粹政权是否忽视了城市住宅工程的问题,这里的行政特别有效率,这种情况存在了一个世纪有余。”[95]其中一位与布朗洛交谈的德国官员就是杰塞里克。[96]

尽管杰塞里克已成了一名纳粹官员,其他美国行政学专业

的学者仍继续与他合作,并赏识他的学术成就。政治学家罗杰·韦尔斯(Roger Wells)把杰塞里克于1934年编辑的《地方科学年鉴》(*Jahrbuch fur Kommunalwissenschaft*)第一卷称作那些希望与德国市政发展并驾齐驱的美国人之"必读物"。[97]《年鉴》第二卷于1935年在柏林出版,当中收入了包括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的分支机构美国市政协会(American Municipal Association)主席在内的英美专家所写的文章。罗兰·埃格(Rowland Egger)对该刊的年刊评价极高,他是弗吉尼亚大学一位年轻的政治学家,曾被布朗洛指派为其联络员,驻该领域著名国际机构所在地布鲁塞尔。[98]埃格写道:"由于杰塞里克博士和他的同事在保持地方政府信息的现时性问题上所作的独到而犀利的批判,全世界地方政府方面的学者都欠他太多。"[99]埃格在布鲁塞尔一直呆到1936年,并在那儿建立了一个国际公共行政中心(Interna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er)。这个中心的成员包括"比利时、英国和德国人"。他在1937年写道,至少有一个方面,"国际合作可以进一步发展"[100]。埃格随后回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在那里教授公共行政课程,并担任政治学系主任(自1957年起)。1964年,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教授头衔。埃格于1979年逝世。[101]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是什么促使查尔斯·梅里亚姆在1934年夏天前往巴黎,以及他如何见到纳粹市政联盟主席库尔特·杰塞里克。用梅里亚姆的话说,从事实中知道杰塞里克"对莱珀斯基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莱珀斯基在德国承担的官方研究任务属市政(municipal administration)的范畴。的确,艾伯特·莱珀斯基被授予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奖学金并得以前往欧洲的研究项目中,就包括大都市地区行政结构的比较研究。

莱珀斯基获得奖学金之际大约是希特勒上台之时。到达汉堡时，莱珀斯基意识到，纳粹统治本身已感到“我有关大都市地区的特定研究已与法西斯运动脱不了干系”。于是，他决定在对城市管理（city administration）进行详尽的研究之前，更全面地观察纳粹革命。1933 年 8 月 6 日，莱珀斯基在写给芝加哥一位友人的信中谈到：

> 德国的法西斯理论尚未健全，但我相信这一理论将日臻完善。目前，更多的是民族哲学、焰火、烟火、示威、讲演和社论式的。我乐于了解德国人的所思所想，这是认识德国政治社会的第一步。至少德国有了不少新的转机，以便它可以用一种政治魅力和组织机构这些美国人既不产生共鸣也不理解的方式进行可能的实验。而我只是倾听，尽管今日的德国令人难以捉摸，我还是遇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纳粹同情者。[102]

第二天莱珀斯基给查尔斯·梅里亚姆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报告说：

> 德国现在的一切都“gleichgeschalten”（协调一致、心无旁骛）。在公众读物中宣扬纳粹主义表明了官方平等化及目标进程的狭隘性。纳粹党竭力想建立一个社团式的一党民族国家。贸易、经济企业、体育、音乐、法律，几乎所有重要的门类，都有他们派遣的政党委员，政策和人事也受到相应的影响。这就是你在公民教育乃至大都市政府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民意识的一种类型。

莱珀斯基继续描述希特勒“难以置信”的声望，接着转到宣传问题：

> 尽管有些宣传幼稚肤浅，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年轻

的戈培尔将在往后4年的暑期中成为(芝加哥)大学一位有趣的宣传教授。新闻、海报、电影、广播都被他牢牢控制。但有时他的表演实在高明。听不到演讲,纳粹的举手礼和光头也不像美国报纸谎称的那样普遍,但成千上万的人确实走出了家门,音乐和游行激起人们内心翻腾的渴望,焰火和炮击引起震耳欲聋的掌声。[103]

在信中,莱珀斯基几乎没有谈到戈培尔宣讲的内容,只用了评价性的形容词——"总体不错"——仅就宣传技巧方面而言。有趣的是,艾伯特·莱珀斯基是犹太人。[104]

在信中,莱珀斯基还向梅里亚姆简单介绍了他的研究计划:他打算在汉堡多待十到十二个星期,然后在柏林停留四个月,再去英国半年。事实上,似乎莱珀斯基并没有履行信中的计划,就算他当时确实去了英国,他也可能缩短了在那里的行程。据报道,只清楚他在柏林停留的时日大大超出了原定离开德国的时间。我们一直不清楚是什么促使莱珀斯基在1934年8月到纽考恩体育馆的。但是,从他给梅里亚姆的信件以及莱珀斯基的导师也参加了纳粹在柏林体育馆(也许是同一体育馆)的集会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推出,莱珀斯基因为迷恋上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宣传方法才这样做的,他这种迷恋明显是从梅里亚姆那里吸收过来的。

尽管莱珀斯基最终对纳粹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策的全盘内容感兴趣,但他没有忽视他的公共行政研究。他在汉堡和柏林大学拥有客座教授职称,尽管不清楚他是否亲自与杰塞里克一起共过事,但他可能与杰塞里克在柏林市科学院的同事有往来。回到芝加哥后,莱珀斯基向《政治学评论》1936年4月刊提交了一篇题为《纳粹改革德意志帝国》的文章。从文章的脚注参考文献可以发现,该文的最后版本是1935年9月或之

后(纽伦堡法律是9月中旬颁布的)提交的。[105]

莱珀斯基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说的:“革命改变权力不但从一个经济阶层到另一个阶层,而且从一个政府层到另一个政府层。”革命政权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常常留下一种持久的行政遗产:

> 难道1790年约40个法国省份的消失和代之而起的83个行政区不是法国革命相对持久的创造,即使当时这些政府改革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振聋发聩的喊声盖过?难道7个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联盟(更不用说苏联24个自治区和共和国)不是民族共存的重大实验,尽管最显著的位置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振奋人心的口号所占据?……而且,在当前的美国,尽管有最高法院的限制性条例,华盛顿与州府之间以及州议院与市政厅之间不也有了权力平衡的改变吗?

莱珀斯基进一步声明,“内部的权力平衡可能在今天的纳粹德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并指出,美国的新政拥护者能从第三帝国正在进行的中央行政集权化中吸取经验。他向他的读者保证,“帝国改革”不是一种新颖的纳粹思想:毕竟,中央集权国家“甚至是‘卖国’的魏玛代表中的犹太人、普罗伊斯教授本人”要求的;然而,“纳粹所表现的地方只是其他人筹划和研究的东西。他们把德国从一个联邦国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整体”。莱珀斯基承认,在纳粹革命的早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清洗出了德国官僚机构,但他同时郑重地指出:“经过最初的政治化风浪后……德国官僚机构的权力多少在得以重建。”他得出结论说,“纳粹分子本身可能会死亡”,但“他们肯定已为改革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进程做出了一些贡献”。

这篇文章包括关于德国市政最近发展的评论。莱珀斯基写道,虽然纳粹分子“强劲有力”地支持境况不佳的城市政府的财

政,但是“城市的政治协调比预期的要难”,主要因为城市中心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家园”。

> 德国人意识到这些困难,正用广泛的手段,尽一切可能缩减城市的无产阶级性,在前共产主义中心如汉堡,正进行着一项周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标出和界定失职、非常态以及共产主义投票重叠的地区,分离出所谓“反社会行为的内核”。作为紧急问题的样本,我们很有趣地看到德国学者和教授在研究城市政治生活过程中采用美国社会科学家的技术——事实上这正是芝加哥生态研究的污点所在(spot map)。因此,纳粹学者和纳粹政治家也意识到,城市无产阶级性(proletarianism)以及城市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可能是使城市协调变得比国家清算更为困难。[106]

诚然,像莱珀斯基描述的纳粹社会研究项目,似乎听起来不像当时芝加哥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领衔研究的项目:对芝加哥群众中共产主义宣传有效性的决定因素之社会心理领域研究。[107]

艾伯特·莱珀斯基是喜好在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任职的芝加哥政治学系研究生中的一员。1936—1938 年,他先是在该系担任副主任,后在同一地点任税务行政人员联合会(Federation of Tax Administrators)主任。他同时还是政治学方面的兼职讲演者。珍珠港事件后,莱珀斯基志愿参加美国空军,1945 年以中校军衔退役。随后,他在阿拉巴马州大学谋得一份公共行政教授的职位,并担任公益事业教育项目主任。1953 年,莱珀斯基加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一直到 1976 年退休。莱珀斯基获得的职业荣誉包括美国政治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1949)、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1956—1957)以及西部政治学会主席(1963—1964)。他于 1992 年去世。[108]

克拉伦斯·里德利(Clarence Ridley)(生于1891年),一位从锡拉库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1927)的前城市管理人员,1929年被路易斯·布朗洛带到芝加哥,领导国际城市管理者协会(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rs' Association),并很快成了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的负责人。应布朗洛的请求,查尔斯·梅里亚姆给了里德利一个职务,并让他担任政治学系副教授。作为该系的一员,里德利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积极参加公共行政专业研究生的培训课,特别是(从1936年开始)后来摘取诺贝尔桂冠的赫伯特·西蒙的培训课。[109]

1933年夏,里德利和美国市政专家代表团一行访问了几个德国城市。他在《国家市政评论》1934年4月刊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110]里德利集中探讨了"市政信息局这一实际上在所有德国较大城市都存在的机构",其职能是负责市政事务公共信息的发布。他的报告指出:"与汉诺威八家报纸的代表私下会晤后披露,市政厅的新闻没有受到丝毫的审查,而且报道局没有任何企图对新闻发行物'润色'以维护当前政权。"总之,里德利对这类信息局的效率印象很深,他把信息局的成功归咎于其领导人的"高素质":"确实令人振奋的是,该职位的威望吸引了一些特别高素质的人进入该局。"里德利没有提及几个月前已有数千德国行政官员甚至一些市政信息官员实际上被赶出了他们的办公室这一事实。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一段,里德利写道:"美国公务员基本上对他服务的公众报道漠不关心,他们有许多地方要向德国市政信息局所采用的技巧学习……我坚信,将来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像德国一样欢迎更多的公众报道,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

在美国政治学会1953年版人物传略辞典中,里德利仍被列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成员和国际城市管理者协会主任;但

1961 年版的辞典中却没有提到他。里德利在芝加哥的任期很可能随着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在 1956 年的死亡而寿终正寝。[111]

正如我们看到的,路易斯·布朗洛在他的备忘录中承认,1934 年,他和查尔斯·梅里亚姆"仍然"坚持行政技术的政治中立性理论。至少他们的两位资深同事艾伯特·莱珀斯基和罗兰·埃格(Rowland Egger)在 1935 年底还明显赞同他的观点。布郎洛和梅里亚姆是什么时候放弃这一态度的呢?

1936 年似乎是一个分水岭。几家美国机构在与参加德国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有关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美国奥委会不得不决定美国的运动员是否要参加柏林的比赛;美国主要大学被邀请派代表参加海德堡大学的 550 周年庆典;而路易斯·布朗洛和他的同事则必须决定是否参加定于初夏在柏林和慕尼黑举行的地方政府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会议。最终,美国代表团的运动员悉数去了柏林。美国的著名大学——包括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邀请。[112]在德国东道主保证会议不会受纳粹官员干扰后,路易斯·布朗洛也带领由二十个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去了德国,此行部分得到了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的资助。代表团成员包括查尔斯·梅里亚姆、芝加哥大学资深公共行政学者伦纳德·怀特(Leonard White)以及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然而,德国人违背了避免此次会议政治化的诺言,邀请包括布郎洛在内的来访代表团拜见希特勒。在会议接近尾声之际,库尔特·杰塞里克(Kurt Jeserich)提议任命他负责该组织设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尽管该动议被否决了,但会议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结束。[113]

不久后的1936年7月，布朗洛、怀特、梅里亚姆以及赴柏林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第六届国际行政学大会。在此次会议上，法西斯独裁政权的代表公然指责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是争吵不休的社会团体。他们搅乱议会中的发言权程序，试图强行通过一项决议，认可行政权力的最高权威，并把国家官僚机构看作总统个性的真正延伸。该决议最终被挫败了，导致杰塞里克突然离开柏林。然而，法西斯分子坚持对职业官僚机构和政治首脑不加区分的做法，似乎最终消除了布朗洛和梅里亚姆的幻想，即纳粹的行政方法（administrative methods）可能适合民主政体。柏林会议的政治化、法西斯代表团在华沙厚颜无耻的行为以及他们对民主的攻击，似乎引起了某些真挚的自我反省，使人们感到民主和宪政自由是重要的价值观，值得保护。因此，这一不愉快的经历——发生在布朗洛和梅里亚姆正起草“总统对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的职责”这一报告之时——促使他们在报告中加进明确保证行政职务的民主属性之概念。[114]1936年夏天的事件恰与查尔斯·梅里亚姆学术成就的明显变化相符。1936年前，他一直把宪法权利看成意识形态面具，幻想一种社会控制技术可以取代民主政治的世界，而从那年后，他开始重整旗鼓，视民主和自由为规范的理想，并为其辩护。[115]

梅里亚姆和布朗洛的一些同事甚至在1936之后仍相信纳粹的方法可以移植。1935年，莱尔·贝尔斯利（G. Lyle Bellsley）来芝加哥指导美国和加拿大公务员大会（Civil Service Assembly），该组织的总部刚刚在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建立起来。像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其他资深成员一样，贝尔斯利也是该政治学系的助手。该组织的使命就是要与杰逊式（Jacksonian）民主——“政治分肥体系”——的低效率作斗争，以行政人

员的实力任用制度(merit system)* 为基础的体系取而代之。[116] 1938 年,大会倡议出版 1937 年版"德国公务员法"(German Civil Service Act)的内容,并由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波洛克(James Pollock)和他的研究生艾尔弗雷德·博尔纳(Alfred Boerner)翻译。[117]

詹姆斯·波洛克(生于 1898 年)1921 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并于 1925 年从哈佛大学获得政府学博士。随后,他回到密歇根大学,并于 1934 年迅速升为教授。波洛克很快成为研究德国政治的美国杰出学者之一。他对纳粹在 1930 年的竞选胜利感到惊诧,刚开始他把他们的计划称为"一派胡言"。然而,尽管他认为纳粹的种族主义令人厌恶,但他同时对魏玛政治的意识形态极端化不再着迷。在一份标有 1933 年 2 月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波洛克事实上赞同希特勒夺取总理一职,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从 1930 年起,魏玛民主就是一场闹剧。波洛克认为,富勒(Fuhrer)与其说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人物,还不如说是一个传统(如果不是极端)的德国反动分子。他希望内阁中的非纳粹成员牵制希特勒,同时希望希特勒执政后会变得更负责任。他预计,犹太人不会饿死,《凡尔赛条约》也不会被推翻。[118]

波洛克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事件。1934 年冬,他和一群美国学者周游德国,此次出游由卡尔·舒尔茨协会(Carl Schurz Verein)共同发起,该协会当时已成为纳粹宣传的前沿。[119] 回来后,他在给一个同事的信中称他在德国"过得很开心"[120]。波洛克刻意对纳粹政权保持客观态度,并避免从伦理角度纠缠纳粹主义。正像评论家所说的,在他 1938 年出版的德

---

* 根据个人实力而非政治关系或忠诚程度来任命和提拔公务员的制度。——译者注

国政府学教科书里，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政治力量、意识形态动机和该政权的方法和成就的社会与道德意义，而在于组成第三帝国的政府机器”[121]。

波洛克对纳粹德国的价值中立姿态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39年2月刊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波洛克所评论的这部书的作者，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利希滕伯格(Henri Lichtenberger)认为，虽然纳粹主义肯定要受批评，但德国实验的重要方面令人钦佩——例如，同志之情、纪律和德国劳动营培养出来的友善态度。[122]波洛克写道，即使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利希滕伯格偶尔攻击一下纳粹主义的方法，该书也“从未表现出痛苦和反唇相讥”。总的来说，“与其他对纳粹主义激烈的谴责或辩护相比，利希滕伯格教授对纳粹的评价算是给了我们一个不偏不倚的解释”。人们不得不“同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政治学家)尼古拉斯·巴特勒(Nicolas M. Butler)所作的序：‘该书作者对最近德国历史的评论既客观又公正’”。简而言之，1938年，波洛克仍然认为，无论对希特勒德国的“激烈谴责”还是“辩护”一样不可取。[123]

整个20世纪30年代，波洛克同样在积极参与密歇根的文官系统改革(civil service reform)事业。他是密歇根文官系统研究会(Michigan Civil Service Study Commission)主席，并与其他人共同开创了密歇根公务员考察实力任用制协会(Michigan Merit System Association)。根据一家媒体的报道，在向当地公民团体公布之前，他不知疲倦地鼓吹“消除政治分肥体制是获得更有效政府的最本质问题”。根据这一报道：

> 波洛克博士也引证了伴随“那一古老的权力分离定理”而来的困难。……“该定理的逻辑极端面就是要停止行动，”他说，“我们从现在欧洲各地涌现的专制制度中学

到的一件东西是，当时机成熟和危机出现时，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们的政府已到了一个我们需要一个对领导阶层发展有利的体制的时期。”[124]

纳粹1937版的《公务员法》(Civil Service Act)的颁布给了波洛克一个整合他的对德兴趣及对人事改革兴趣的机会。1937年6月，他在写给莱尔·贝尔斯利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正在一个研究生的帮助下翻译该法案。他提出要“为之写一个前言，并指出其重要性”，并敦促贝尔斯利出版译文：“由于德国文官系统(civil service)历史悠久，因此这部法典的重要性非同寻常，而且我想它会有着广泛的用途。”然后，他向贝尔斯利简要地介绍了密歇根的文官改革(civil reform)进程。贝尔斯利很快就同意出版该部法典。[125]

在译文的前言里，译者波洛克和博尔纳称赞纳粹分子完善了德国行政长达两个世纪的计划。在起草“世界上最完整、彻底的人事问题的法典”后，纳粹取得了连魏玛宪法都无法取得的成绩——向所有公务员制订了统一的条例。这不但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清晰和详尽的表达、逻辑结构上，而且对于重要的条款法典特别小心。该法典无出其右”；“即使粗略浏览一遍，也会发现它的价值对研究人事问题的学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波洛克和博尔纳都承认，纳粹实行的“政治可信赖性”(political reliability)已在德国公务员中引起了“一些士气消沉”，但谢天谢地的是，“美国的政治分肥制没有出现这种苗头”。[126]在关于德国政府的教科书里，波洛克以同样的口气承认，纳粹已“清除”了犹太人的文官系统和其他“敌对”成分，但他指出，“在技术部门和外事部门，变化很少”，而且，“总体而言……大量公务员仍如以前一样，按美国人方式的大清洗并未发生。实际上，大多数被解雇的公务员得到了养老金”。[127]因此，纳粹的

清洗行动虽令人不快,但总体而言,相比于美国选举变化带来的行政人员解雇,这不算太可悲。

布赖恩·摩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罗杰·韦尔斯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38 年 10 月刊上发表了对这部行政事务法典的专论。他称赞波洛克和博尔纳“唤起了人们关注这部最健全的人事法典的显著特点”。早些时候,波洛克写信给韦尔斯,告诉后者,这篇专论“很受欢迎”,它的成功“使我相信如果发表题为‘德国市政法典’(German Municipal Code)的相似专论或小册子,相同的事务也能铭记人心”。波洛克已经把法典翻译完毕,他请求韦尔斯写一个前言,便于他与国家市政联盟(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另一家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协商它的出版。[128]韦尔斯回复道,虽然这一主意“不错”,但他事务缠身,恕不能帮助他。[129]

与此同时,波洛克的硕士生艾尔弗雷德·博尔纳写了一篇关于纳粹行政改革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39 年 10 月刊上。博尔纳表达了失望:“迄今为止,传统的德国分离主义势力和强大的地方政党头目的反对,阻碍了德国沿着更理性的经济和地理概念重新规划。”然而,所幸的是,德国可以利用它从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回归”省份,达到检验新行政“模式”的目的,这些模式可潜在地“推广到全德国”。博尔纳认为,这些实验是否会成功“有待观察”。但他总结说,目前来看,可以肯定新法律“不仅仅瞄准地方行政改革的成功;用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的话来说,它们将是“未来帝国重建的重要基石”[130]。(弗里克是纽伦堡法律的起草人之一,后来他在这里被判处死刑。)[131]

博尔纳很快退出了政治学圈子,而他导师的学术生涯却飞黄腾达。[132]从 1945 年到 1946 年,詹姆斯·波洛克担任美国在德

国的占领区总督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特别顾问，后来他数次回到德国，为美国占领当局行使顾问使命。由于他的贡献，他被授予象征国家公民最高荣誉的“丰功奖章”(Medal of Merit)。20世纪50年代。他积极参与促进美德相互理解的活动，赢得联邦德国政府的褒奖。在密歇根大学，波洛克于1948到1968年间担任默芬(Murfin)协会主席，并在1947年至1961年任政治学系主任。1950年，他当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并于1955—1958年任国际政治学会主席(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波洛克退休后不久，便于1968年去世了。[133]

由于韦尔斯是德国城市管理(city administration)的权威，波洛克请他为德国市政法典写一个前言。他于1932年出版的《德国城市》一书被罗兰·埃格称作“宏作”。[134]在书中，韦尔斯哀叹大萧条和因此产生的丧失自治使德国遭受经济上的苦难。他指出，如果一个共产党人接管德国权力(尽管不太可能出现)，势必破坏城市自治政府；更可能的是，设若第三帝国在德国建立起来，那么地方机构则不会发生巨大改变，因为希特勒主义迷恋过去，而且因为城市自治政府是第二帝国最宝贵的特征之一。[135]

因此，在纳粹统治前夕，罗杰·韦尔斯与詹姆斯·波洛克一样，似乎都认为希特勒是一名德国保守党分子，可以稳定经济，使市政(municipal administration)回复到往日的光辉，从而为德国做一些好事。他1934年夏天的纳粹德国之旅更加巩固了他对希特勒的信心。[136]这种信心在他1935年为《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写的一篇书评中表露无遗。威尔斯承认，该书——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舒曼(Frederick Schuman)对纳粹主义的批评分析——“写得十分精彩”，但“作者有时过分迷恋于夸张，譬如，他说该党‘是希特勒控制帝国的手段，他对帝国的统治比古代

东方最专制的暴君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就算不是'新德国的朋友',也会认为舒曼教授不合时宜地贬低了希特勒主义的实际(与'精神'方面对应)功绩。因而,整个图景比应有的面貌要黯淡"。[137]

在1935年8月《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韦尔斯称赞纳粹把德国城市政府(municipal government)从(魏玛)多党制导致的"极端危险的状况"中拯救出来。他总结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市政法典(municipal code)不会破坏自治政府,相反,它的目的是在一个更安全的基础上重建,以便它能恢复19世纪的光辉,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虽然韦尔斯承认德国的市政清除了犹太人、共和派、社会主义分子和其他"不可靠"成分,但他又加上一句抵消这一事实:"政府已尽力寻找非常称职的人选填补这些空缺。"比起大清洗的不道德,他更关注这种非道德对"城市文官系统"(municipal civil service)职业属性影响的持久性。[138]

接着,韦尔斯向《美国政治学评论》投了一篇有关德国行政结构中央集权化的报告。编辑弗雷德里克·奥格(Frederick Ogg)将它与莱珀斯基上述引用的文章相提并论,并在脚注里解释说,这两篇文章一道"对第三帝国的政治和政治地理学发展作了一次全面而及时的考察"[139]。韦尔斯写道:"德意志国家的清洗现在已相当彻底。从魏玛冬天留下的残雪痕迹还隐然可见,但它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照耀下将不日融化。"然后,韦尔斯详尽、不加批评地评论了纳粹的行政改革。例如,虽然他提到了纳粹"审判工作"(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集权化取得的"快速进步",但在司法集权化问题上,但他没有触及纳粹司法的本质。[140]

罗杰·韦尔斯的悼词是这样说的:"他以对二战后德国的

民主恢复所做的贡献而闻名于世,1945—1947 年,他担任美国军人政府民政处副处长……由于他在德国的工作,他被授予美国自由勋章。”[141](如果波洛克和韦尔斯的情况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德国重新走向民主化则部分是由先前希望美国政府向德国独裁体制学习的那些人导引的,反之亦然)完成在德国的任职后,韦尔斯回到布赖恩·摩尔学院,继续为《美国政治学评论》撰稿。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悲叹道,地方自治政府已被“纳粹统治所破坏”[142]。韦尔斯在布赖恩·摩尔学院担任了一届政治学系主任,还任宾夕法尼亚政治学会主席。他于 1994 年逝世。[143]

然而,艾伯特·莱珀斯基是 20 世纪 30 年代进入行政学研究的那批人中的一员,而克拉伦斯·里德利则代表“中生代”——这代人在那时已达到其职业的顶峰,该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威廉·威洛比(William F. Willoughby)(生于 1867 年)的事业刚有喜色,就于 1933 年从布鲁金斯学院退休了。他是政治理论家威斯特尔·威洛比(Westel W. Willoughby)的兄弟,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 世纪 90 年代,即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伍德罗·威尔逊手下做教授之前,他曾担任联邦公务员。与威尔逊一样,他对多数主义民主的态度模棱两可。实际上,他毕生都在尝试将政治决策的广泛领域与政党政治这种奇想分离开来,把这些领域托付给有教养、公正、有效率头脑的专家。1910 年至 1912 年,威洛比作为塔夫脱委员会(Taft Commission)成员——与古德诺一道——启动了这一议程,他的研究报告大声疾呼提高政府效率。1916 年,古德诺成为新成立的政府研究学院(IGR)(布鲁金斯学院的前身)主席,他还让威洛比来领导该机构。威洛比把在政府学院的头几年用在了为 1921 年《预算与会计法》(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的游说之上,后来他把

精力投向有关各联邦机构的研究专论上。这些专论如此避开“政治”内容,只专注于“效率”问题,以至于它们把一位布鲁金斯学院的史学家骂为“难以置信的蠢货”[144]。1932 年,威洛比被授予美国政治学会名誉主席一职。

行政效率是威洛比毕生的追求,他始终不渝地试图使行政学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无怪乎,在 1936 年版的《现代国家的政府》一书中,威洛比(W. F. Willoughby)曾促请美国人要“深入探究”勃兴于意大利、德国和俄国的革命化的制度,“除在这些制度下可能滋生的过度行为外”,还应关注“民选政府与专制政权的优点之间的可能融合”。美国从中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例如,纳粹意识到一党(unitary)政府要比多党(multiple)(即联邦)政府更具优越性,他们“一举”拆散了该帝国的各联邦共和国。

此外,希特勒政府曾公开宣称要把帝国重组、细分成一个行政区域体系,这一体系将绕开现存的边界,以地理、人口、行政和局部的需求而不是以历史传统为划分的依据……无疑,这一革命性的举措将极大地加强政府的权力;政府结构也将得到大大简化,并给效率和经济带来相应的提高和发展,由此公共事务才能得以开展。[145]

因此,像莱珀斯基和韦尔斯一样,年事稍高的威洛比显然看到,德国的权力集中是美国改变权力均势、把权力从各州转移到华盛顿的榜样。

这里所讨论到的很多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以及其附属机构——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扯上关系。由于查尔斯·梅里亚姆独到的眼光和开创性才略,芝加哥大学进入“新政”年代后占据良机,在政府部门和商界领导高喊行政改革声中,它获益匪浅。但其他大学很快就对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做出了反应。例如,在校友卢修斯·利陶尔(Lucius

Littauer)的资助下,哈佛大学于1936年成立了公共行政研究生院。[146]新学院的师资大部分来自哈佛政府学系,后来成为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争夺至尊地位的对手。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Friedrich,1901—1984)1922年从德国移民到美国,1926年加入哈佛,30年代在政府学系从事行政学研究,后来参与利陶尔学院(Littauer School)的建设。当时弗里德里克还只是行业内的后起之秀,但在战后,他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一部分得益于他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的独裁与专制》一书(弗里德里克于60年代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在此书中,弗里德里克认为法西斯、纳粹和苏联的独裁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自成一格"。这些政权"恶贯满盈",任何人都不得拿它们与过去的独裁政权类比来"恭维"它们。[147]

但是,早在二三十年前,卡尔·弗里德里克就几乎毫无戒心地认同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尽管1956年弗里德里克认为永无休止的对外扩张主义是极权政权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可是1928年,他对法西斯意大利"根据文化与知识的禀赋去征服那些她认为适合的土地"的欲望是持赞同态度的。[148]在1933年2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弗里德里克对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提出指责,认为它的描述对这位纳粹领导人来说过于苛刻:"此书诚然向我们展示了希特勒的特征与本性最真实的一面,虽然与其他受欢迎的领导人相比,作者本应给予他更好的评价。"[149]

弗里德里克还给接下来的一期《美国政治学评论》投了一篇论文,该文似乎已在希特勒执掌大权的前夕发表。在文章中,弗里德里克为总统保尔·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取得独裁权的行为进行激烈的辩护。他的辩解基于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论点:首先,宪法第48条赋予的紧急权力为遏制民选政府(popular government)的过度行为提供

了一个适当的程序机制;其次,威严的德国文官系统对该紧急独裁权的滥用也起到抑制作用。("如果没有官僚机构和一套专业化的文官系统,那么赋予总统的独裁权其实际作用将相当有限。")因为他对德国官僚制度很信任,因此,在德国民主正被埋葬之时,弗里德里克仍对其民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诚然,他在文章的结尾处预言:"伴随强烈的社会化趋势,专业化的文官系统仍将是这一趋势中的中流砥柱,德国仍然是一个党政的、民主的国家。"[150]值得称道的是,1937 年,弗里德里克假借这一预言承认,纳粹使他"看起来像个傻瓜"[151]。

像其他行政学的学者一样,弗里德里克也支持美国新政时期的扩张,包括联邦官僚机构的扩大化和专业化。那一时期,他的主要著述是 1935 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Commission)下属机构公共事务人事咨询委员会(Inquiry on Public Service Personnel)的资助下出版的一部专论。在该著作的结论部分,弗里德里克敦促美国行政官员向外国政权所取得的成就学习,不要对"美国宪法强加给行政工作的固有局限性"视而不见。训练有素的美国公务员"会明白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源于现实中政府失败的极端主义思想,它们不能真正帮助政府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样他(美国公务员)无需破坏本土的根本大法,就会意识到它们什么样的观点是合理的"[152]。因此,尽管弗里德里克珍视宪政自由,亦不想把美国塑造成一个法西斯独裁的形象,但他把法西斯主义看成宪政民主的截然对立面的摩尼教思维仍然很明确,因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他仍从纳粹计划身上发现了一些"合理"的成分。这些成分可能就是纳粹政权为追求官僚机构效率、实现经济合理化和推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所做出的努力。

对希特勒“最开明的评论”

尽管行政改革是纳粹政权中引起美国政治学家正面关注的主要方面，但是，对于纳粹主义的其他方面，《美国政治学评论》也发表了一些不加批评的评论。

卡尔·F. 盖泽(Carl F. Geiser)(生于 1869 年)是奥柏林(Oberlin)学院政治学系成员，多年来一直担任系主任之职。一战期间，他曾轻率地出版了一部为民主辩护、反对专制的专论，为当局的宣传出了力。[153]但是盖泽反专制的情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明显地减弱了，这一变化可以从他发表在 1934 年 2 月《美国政治学评论》上一篇关于《我的奋斗》(*Mein Kampf*)英文节略版的评论文章中体现出来。

根据历史学家罗伯特·赫茨斯坦(Robert Herzstein)的说法，193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其《我的奋斗》翻印本中写道：“该译文删改的地方太多，以致对希特勒的真正所言提供了完全错误的看法。”赫兹斯坦认为“罗斯福是对的。节略版没有真实地传达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成见和他可怕的外交政策目标”[154]。然而，盖泽在《美国政治学评论》里却坚称：

> 那位译者对希特勒的评价是全面而公正的；他概括了希特勒性格中最恶劣的一面：对犹太人过度的褊狭和对国家理论和政府性质的最为开明的评说，如“人权高于国家权利”以及“国家的最佳形态是在体力劳动者得到自然保证的情况下，把社会知识分子精英提高到领导和最具影响力的位置”等。[155]

在同一评论中，盖泽也对一本把纳粹分子看成是进行“一项国家计划的试验”的“理想主义者”的书表示赞赏。那本书提

到:“如果德国真的能成功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可有助于克服当前大量贫困状态的社会与经济秩序,那么,既然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156]

罗尔夫·霍夫曼(Rolf Hoffmann)是纳粹党负责外国新闻出版的副部长,而盖泽是与他接触最多的美国人之一。一封由盖泽写给霍夫曼并寄到鲁道夫·赫斯办公室的信,署名“德国式问候”(纳粹举手礼)字样,证明了纳粹在美国宣传的成功。[157]据1937年6月《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报道,盖泽刚一退休,就定居柏林,并在政治大学(Hochschule für Politik)和其他大学授课。

出于某种原因,《美国政治学评论》曾两度刊发对亨利·利希滕伯格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书的评论。詹姆斯·波洛克对该书表示赞赏;另一位评论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尼斯·马特恩(Johannes Mattern)亦持相同的看法。像波洛克一样,马特恩表扬作者“避免使用通俗、主观方法导致研究对象扭曲的陈述,不偏不倚地刻画政权体系”。马特恩写道:“利希滕伯格走的是温和的中间路线,于是他不得不钝化题材中导致走向两个极端的尖锐面。他承认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必然性,却未对其意识形态的极端性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对于实际中过度行为的细节描写,他也避而远之。或许他意识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与革命家为实现这些理想而采取的过度行为两者间的区别。”[158]因此,马特恩含蓄地把纳粹的理想与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作比较,并暗示只有纳粹意识形态的极端方面是可悲的。

自1911年起,约翰尼斯·马特恩一直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助理,1922年,他在那里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从1938年到1949年,他从霍普金斯大学退休,除了在图书馆供职外,他一直还担任政治学副教授一职。[159]

《美国政治学评论》也发表过一篇有关“希特勒青少年”

(Hitler-Jugend)运动的报告,作者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米勒写道,这个组织由"年轻而狂热"的鲍尔德·冯·希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发起,其组织结构"与我们的童子军(Boy Scount)运动相似"。尽管他不拥护由青少年形成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但他又说:

> 该运动旨在剔除附在手工劳动者身上的一切污名,打破阶级壁垒,摧毁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的统治地位。然而对于一个在民主国家出生、成长的人来说,不管它多么令人反感……人们也不由得承认这是一次彻底的成功,有了它,年轻的纳粹正被慢慢塑造成党派的追随者。今天,德国的青年与他们的先辈们相比,阶级意识要淡得多,体格要健康得多,更迫切地想看到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位。[160]

1946 年到 1954 年间,米勒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政治学。后来他成了密歇根州的审计员,接着于 1961 年担任西密歇根州大学校长一职。[161]

最后,纳粹德国引起一些政治学家好奇心的另一个方面是其"宪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这正是 1938 年 12 月出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的头版文章所谈论的主题。该文作者艾尔弗雷德·博尔纳(波洛克的研究生)承认,纳粹公法设计的目的就是要使"无限制的公共权威"合理化。但他也赞赏纳粹法学家为规范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建立的"复杂机器"。博尔纳极为详细地分析了"第三帝国的宪政理论",言词简练。比如,他在 1933 年年底写道:"通过'维系政党与国家统一'的法律,纳粹党成了公法的法人……从纯粹法律的角度看,这一举动对于纳粹党来说是一大进步。但是对于刚刚取得革命成功的运动来说,这一全新的地位似乎不适合其实际的权威。"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纳粹法学家天才地制定了一项绝妙的法律，保证纳粹“公法法人”（corporation of public law）的特殊地位（例如，与其他团体不同，纳粹党（NSDAP）的制服、徽章、象征、标记在没有得到“纳粹党司库”允许下，不得使用、穿戴、购买、出售或制作）。该文甚至对纽伦堡法律只字不提。[162]

在1936年2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奥柏林学院一位年轻的政治学家约翰·D. 刘易斯（John D. Lewis）对“第三帝国公法首次全面的表述”做了评论。[163]他表示，他所探讨的书是由两位“闻名遐迩”的法学家所作，“他们曾在第二帝国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政府部门内供过职，现在发现自己也适合在第三帝国内工作”。特别是其中一位作者，迈斯纳博士（Dr. Meissner）目前的工作对未来德国宪法的发展竟还会产生影响。显而易见，刘易斯对作者把纳粹法律变更置于历史与意识形态背景下颇为满意，这种背景给法律变更戴上高贵的面纱，并赋予了为重建一个真正德国所需步骤的一致性；不仅如此，他还称赞作者字里行间的“公允”，“不带一点儿意识形态的大吹大擂”。刘易斯一直是奥柏林学院政治学系的成员，直到1972年退休，他任系主任之位达19年之久。他生涯中的辉煌还包括担任《美国政治学评论》书评部分的编辑（1948—1952），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1962—1963），中西部政治学会主席（1967—1968）。他于1988年去世。[164]

格哈特·克雷布斯（Gerhard Krebs），一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师，对另一部纳粹法律论著写过评论，文章发表在1938年12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上。[165]克雷布斯的评论文章详细阐述了德国作者解释的纳粹宪政原则，他对该书惟一的批评就是“作者没能清楚地解释领导者如何从人民的禀赋、力量和使命中，而不是从自我意志里发展出民族的意愿（Volk’s

will)。然而他又向我们保证,'国家主义德国既非专制主义,也非独裁统治'"。克雷布斯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由于"作者身为德国法律协会(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会员,又是一家顶尖的德国公法期刊的合编者,(他的观点)可被看成是当今德国宪政理论的官方表述。换言之,我们必须关注这些观点,而不应考虑我们是否能接受他们或者其中一些概念在我们看来是否仅仅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合理化和正当化"。由于克雷布斯认为"一些"纳粹概念乍看起来好像是主观的合理化,因此他暗示,其他的纳粹观点是客观而健全的。服完战时兵役后,克雷布斯主要在西部预备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任教,之后在美国劳工部工作。[166]

与纳粹主义碰撞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纳粹主义妥协的态度处在合法的学科讨论范围内。相当一部分美国政治学家,包括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纳粹主义的"优点"大加颂扬,批判的只是它的"过度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还把纳粹反犹太主义合理化。这些政治学家并不是狂热的亲纳粹者。他们典型地抱有这样一种态度,认为应该用一种价值中立的方式对纳粹德国加以研究,区别纳粹政权的良莠方面,美国可以从纳粹政权的某些成就(特别是公共行政领域)中得到启示,尽管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反民主和有害的成分。

直到1939年10月即纳粹入侵波兰后不久,《美国政治学评论》还发表了对纳粹德国持妥协主义观点的论文和评论,却没有引起抗议。[167]只有当二战爆发后,罗斯福总统明确表示要支持反德一方时,这份业内的皇牌刊物才不再突出这些观点。直到

这时，妥协主义者和不加批评的言论才让步于直到今天仍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和无条件批评的观点。套在妥协主义头上的“禁忌”是如此的强大，以致连今天资深的政治学家都难以相信这一忌讳曾经是不存在的。

二战对于美国政治学家的影响不只是对纳粹看法的转变，战争以及大屠杀的阴霾在公共行政领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极大地挫伤了它的地位。

正如我们所见，公共行政向来是政治学中最负盛名也是最受欢迎的领域之一。在美国政治学会的成立过程中，公共行政被认为是政治学科的五大分支之一，而学会的前 11 位主席中，有 5 位是公共行政领域的学者。在经济萧条时期，美国学术界都过着拮据的日子，公共行政却能逆势而立，因为其成员能吸引到资金和建起新的研究所。随着路易斯·布朗洛、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卢瑟·久利克进入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并担起领导角色，他们的建议被罗斯福总统采纳并推行，公共行政领域的地位也再攀新高。到 1940 年，五分之一的政治学博士学位来自公共行政领域。[168]

公共行政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信仰的一致性，它使所有成员团结起来，给该领域一种目标感。信仰的准绳就是行政原则在所有政体中都是一样的，而一个好行政体系的特征就是“高效”。从 20 世纪末公共行政产生一直到二战，公共行政专家均一致认为中央集权的等级官僚制度是天然高效的。因此，他们把权力集中到一个单一的中心，权力从这个中心通过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向下传递，以寻求政府的运作更合理化。[169]同时，公共行政专家相信专业的管理者都是慈悲为怀、大公无私的，他们试图对不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委以对广大公共生活领域的控制权，目的是把公众从政治——机器、“政治分肥”和委任

权(patronage)——所导致的腐败、低效中解救出来。

二战后,公共行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机制衰退,与政治学疏远开来。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这一20世纪30年代的业内神经枢纽,由于财政问题于1956年被迫关闭。[170]至于哈佛的公共行政学院,为了适应发展中国家培养领导者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仍在教授着该领域的传统原则。但60年代,这些原则被抛弃了,转而改开一门"公共政策"课程(该学院后来演变为肯尼迪政府学院)。[171]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政治学会的出版物不再把公共行政列为政治学的核心科目。政治学家开始怀疑公共行政是否隶属于政治学,而公共行政学者则怨声载道:"现在我们连在年轻人圈子里都不受欢迎了。"[172]

正如战前公共行政所享有的非凡声望部分来自于业界对信仰的一致认可一样,它在战后的急剧衰落与这一致性的分崩离析不无关系。20世纪40年代,对有效行政学说的抨击,不仅来自外部(例如,有政治学家批评它忽略了对个人行为的关注),也来自于内部。1947年,赫伯特·西蒙对他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那些神圣的有效行政原则给予了"毁灭性打击",他把它们说成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笑柄"。[173]有效学说风光不再,而公共行政则陷入长时间的"批判性自我反省"之中,未能产生出一套替代性的正统派学说。1967年,一位卓越的公共行政学者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感叹"认同危机"自二战以来一直困扰着该领域;1974年,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断言,公共行政学界仍然备受"一种知识危机"(an intellectual crisis)的煎熬。[174]不久之前,唐纳德·凯特尔(Donald Kettl)认为,公共行政依然"岌岌可危","打从二战以来……公共行政磕磕碰碰,数度大起大落,在几次政策失误中栽了跟头,自身在四分五裂。"[175]

"危机"的源头是什么呢？翻开公共行政内部的历史，危机的根源最先可追溯到无数涌入华盛顿、在战时政府各部门供职的学者的所见所感。凯尔特说："很多公共行政专家带着一种新鲜的现实主义心态从华盛顿返回他们的校园。"[176]这些公共行政专家发现："在现实世界里，公共行政好像更多是与非原则性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与原则性的实际行动打交道……理论与实际之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难以弥合。"[177]

对公共行政战后危机的解释与本书的中心思想是相一致的，即把国际战争看成是美国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但我的分析表明，公共行政学家的战时亲身经历之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危机还为另一个事实所引发，那就是在战争中对阵的敌人同时又是历史上行政效率的榜样。效率范式的没落部分由于人们冷静地意识到，德国的官僚体制——这一在美国政治学界备受景仰的事物——在对金融体系或城市的下水道系统都能高效地管理的同时，对纳粹政权中恶贯满盈的"过度行为"的实施也是同样的有效。纳粹的受害者当中存在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合理的、高效的官僚制度必然带来进步与福祉，而政治本身也会产生不合理的、病态的后果。于是，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对库尔特·杰塞里克的著作比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要熟悉得多；然而，战后他们却"相中"了韦伯，大肆吹捧他对官僚体制的合理性表示怀疑的论点。[178]战后对逐渐萧条的公共行政进行不定期批判的时尚观点，不再认为行政与政治无关，也不再认为一个合理的官僚体制会极大地确保合理的结果。

注　释

1. 美国政治学会口述史会谈的抄本存档于肯塔基州立大学（Universi-

ty of Kentucky)图书馆。引文出自达尔(Dahl)手稿第34页。

2. 1933年前,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威廉·威洛比(William F. Willoughby)和威廉·贝内特·芒罗(William B. Munro)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二战后,詹姆斯·波洛克(James Pollock)和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Friedrich)当选该职。

3. Dahl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34.

4. 参见 Lewis S. Feuer, "American Travelers to the Soviet Union, 1917—1932: The Formation of a Component of New Deal Ideology," *American Quarterly* 14 (summer 1961): 119—149; Peter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Robert A. Skotheim, *Totalitarianism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John Diggins, *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5. Stefan Kuhl, *The Nazi Connection: Eugenics, American Racism, and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Marie Kopp, "Legal and Medical Aspects of Eugenic Sterilization in German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1936): 761—770; 引自第770页。

7. Leonard D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277—286.

8. Robert E. Herzstein, *Roosevelt and Hitler: Prelude to War* (New York: Paragon, 1989), 122.

9.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277—286.

10.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3. See also Andrew Winston, "'As His Name Indicates': R. S. Woodworth's Letters of Reference and Employment of Jewish Psychologists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2 (1996): 30—43.

11. Harold Lasswell to his Parents, March 29, 1923, Harold Dwight Lasswell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box 56.

12. Lasswell to his Parents, July 2, 1924, and November 14, 1928, Lasswell Papers, box 56.

13. 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路易斯·芬克尔斯坦致拉斯韦尔的信(Louis Finkelstein)(December 3, 1963, Lasswell Papers, box 34)。

14. Kate Pinsdorf, "Nature and Aims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Labor Par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下简称 *APSR*) 25 (May 1931): 377—88;引自 377, 378, 384。

15. Ibid., 381, 387, 378—379, 380.

16. Marion Pinsdorf, *German-Speaking Entrepreneurs: Builders of Business in Brazil*(New York: Peter Lang, 1990).

17.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美国政治学评论》投稿没有得到同等对待,该刊目前的平等审稿机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才系统化。奥格(Ogg)由于其他人对他的专断作风不满而被解除了编辑一职。但我所读过的记录中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证明对奥格的不满和他的最终离职与他接受对纳粹德国不加批评的稿件有关。见 Samuel Patterson, Brian Ripley, and Barbara Trish,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 Retrospectiv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1 (1988): 908—925;与泰勒·科尔(Taylor Cole)和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的会谈口述史,见 Michael Bear, Malcolm Jewell, and Lee Sigelman, eds.,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Oral Histories of the Discipline*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1)。

18. 见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Biographical Directory*(Washington, D. C.: APSA, 1968); George Carey, "Obituary: Francis Graham Wilso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9 (1976): 393。

19. 见 John G. Gunnell, *The Descent of Political The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36。

20. Carey, "Obituary: Francis Graham Wilson."

21. Francis G. Wilson, *The Elements of Modern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36), 650—651.

22. Ibid., 653.

23. Ibid., 655.

24. Ibid., 662

25. APS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1968);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67), 105—108.

26. Carey, "Obituary: Francis Graham Wilson."

27.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Fellows of the SSRC*, 1925—1951 (New York, 1951), 439; Carey, "Obituary: Francis Graham Wilson."

28. *Remarks Made a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eymour Thomas Portrait of William Bennett Munro* (Pasadena: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47).

29. William Bennett Munr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3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Munro to Carl Friedrich, December 2, 1931, Carl Friedrich Papers,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30. Munro, *Governments of Europe*, 633—635.

31. Ibid., 635.

32. Ibid., 635—636.

33. Ibid., 636.

34. 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1887, 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ed. Arthur S. Link et al., 69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94), 5:359—80.

35. Vincent Ostrom,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 e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4), 9.

36. Frank Goodnow, *Municipal Government* (New York: Century, 1909), 387, 386. 关于古德诺(Goodnow)的生涯,见 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 8。

37. Albert Shaw,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Continental Europe* (New York: Century, 1895), 290, 289.

38. Wilson,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379.

39. 见 Roger Wells, *German Citie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Municipal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2), 3。

40. William Bennett Munro, *The Government of European C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09; rev. ed., 1927);两个版本都引自 Bertram Maxwell, *Contemporary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Germany* (Baltimore: Warwick and York, 1928), 129。

41. Frederick Blachly and Miriam Oatman, *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German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8), 641. 其他褒扬魏玛政府的研究(尽管不全面)包括: Maxwell, *Contemporary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Germany*; and Wells, *German Cities*。

42. 例如, 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43. 例如,参见 John Diggins, "Flirtation with Fascism: American Pragmatic Liberals and Mussolini's Ital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 (1966): 487—506;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Skotheim, *Totalitarianism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44. 我详细阐述了美国政治学家对法西斯意大利不加批评的态度,见 Ido Oren, "Uncritical Portrayals of Fascist Italy and of Iberic-Latin Dictatorship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2 (2000): 87—117。

45. Somit and Tanenhaus,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105.

46. Barry Karl, *Charles Merriam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oral histories of David Easton and Heinz Eulau, in Bear, Jewell, and Sigelman,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47. 例如,参见 Herbert Simon, *Models of My Life* (New York: Basic, 1991), chap. 4; Gabriel A.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90), app. B。

48. Charles E. Merriam, *New Aspects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引自 Ross,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455。

49. Merriam, *New Aspects.*

50. 梅里亚姆私下里把他的战时经历说成一次"海难",把他引向知识的"再定位"。见 Karl, *Charles Merriam*, 184。

51. 参见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chaps. 8, 9。

52. 见 George Blakey, *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0); David M. Kennedy,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3. Charles E. Merriam, "American Publicity in Italy," *APSR* 13 (1919): 541—555.

54. Ross,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454.

55. Charles Merriam to Paul Kosok, April 5, 1927, Charles E. Merriam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以下简称 MP), box 33.

56. Merriam to Shepard Clough, April 9, 1928, MP, box 37.

57. Merriam to Paul Kosok, April 5, 1927, MP, box 33.

58. Draft of Merriam's remarks in SSRC conference, undated, p. 151, MP, box 139.

59. Charles E. Merriam, *The Making of Citize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hods of Civic Trai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ix.

60. Merriam to Herbert Schneider, December 23, 1927, MP, box 39; Merriam to Shepard Clough, April 9, 1928, MP, box 37.

61. Paul Harper, ed., *The Russia I Believe In: The Memoirs of Samuel Harp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62. Samuel N. Harper, *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xiv.

63. Harper, *Russia I Believe In*, 156.

64. Herbert W. Schneider and Shepard Clough, *Making Fasc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65. Herbert W. Schneider, "Italy's New Syndicalist Constitu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2 (1927): 161—202; Herbert W. Schneider,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66. Diggins, *Mussolini and Fascism*, 226.

67. Schneider,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v; Merriam to Schneider, July 26, 1929, and October 11, 1927, and Schneider to Merriam, January 3, 1982, MP, box 39; Merriam to Schneider, December 13, 1927, Schneider Papers,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68. Charles E. Merriam, "Review of 'Making the Fascist Stat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9 (1931): 132—133.

69. Schneider and Clough, *Making Fascists*, 203—204, 74—75, 204.

70. Merriam to Schneider, February 27, 1929, MP, box 39; Merriam to Clough, November 14, 1929, MP, box 37.

71. Merriam, *Making of Citizens*, 222, 224, 223, 232.

72. Ibid., 220, 227, 349, 310.

73. Harper, *Russia I Believe In*, 181.

74. Diggins, *Mussolini and Fascism*, 147; William Dodd Jr. and Martha Dodd, eds., *Ambassador Dodd's Diary*, 1933—1938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1), 131; Herzstein, *Roosevelt and Hitler*, 128.

75. Charles E. Merriam, *Political Power: Its Composition and Incidence* (New York: Whittlesey, 1934), 325.

76. Ibid., 184.

77. Ibid., 229, 286—287, 293, 292—293.

78. Ibid., 299.

79. 梅里亚姆明显受到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一书的鼓励,见 ibid., 73 n., 243 n.。关于法学现实主义者、曼海姆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职业,参见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chap. 6。

80. Ibid., 311, 316.

81. Ibid., 303, 42, 41, 95, 39.

82. Ibid., 310, 305, 237, 311.

83. 在这部书中,梅里亚姆明确地批评了马基雅弗利的思想。马基雅弗利在萨沃纳诺拉(Savonarola)被处死后不久进入了佛罗伦萨政治圈,而他关于君主必须依靠武器的忠告是对传教士垮台的反应。我感谢玛丽·迪茨(Mary Dietz)向我澄清这一事件。

84. Gulick to Merriam, September 18, 1933, and Merriam to Gulick, October 4, 1933, MP, box 99.

85. Dodd and Dodd, *Ambassador Dodd's Diary*, 114.

86. Chicago *Tribune*, *August*16, 1934.

87. Merriam to William Dodd, August 17, 1934, MP, box 34.

88. Charles Merriam, Spencer Parratt, and Albert Lepawsky, *The Government of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of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89. 参见 Karl, *Charles Merriam*。

90. Louis Brownlow, *A Passion for Anonymity*, vol. 2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Louis Brownl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472, 225. See also Karl, *Charles Merriam*, 147; Simon, *Models of My Life*; Leonard White, "Training for Public Servi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8 (July 1939): 570—572.

91. Brownlow, *Passion for Anonymity*, 262.

92. Ibid., 302, 307.

93. Louis Brownlow, "Planning and Cooper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5 (September 1936): 480.

94. Brownlow, *Passion for Anonymity*, 307.

95. Dodd and Dodd, *Ambassador Dodd's Diary*, 155.

96. Brownlow, *Passion for Anonymity*, 310.

97. Roger Wells, "Review of Dr. Jeserich's 'Jahrbuch,'"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3 (November 1934): 639.

98. Brownlow, *Passion for Anonymity*, 231—232.

99. Rowland Egger, "Review of Dr. Jeserich's 'Jahrbuch,'"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4 (May 1935): 286.

100. Rowland Egger, "Hinky, Dinky, Parlez Vous?"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6 (October 1937): 478.

101. APS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1973); Paul David, "Obituary: Rowland Egger,"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2 (1979): 545—546.

102. Lepawsky to Hy (probably Hyman Cohen, another student and assistant of Merriam), August 6, 1934, MP, box 34.

103. Lepawsky to Merriam, August 7, 1933, MP, box 34.

104. Gabriel A. Almond, "Obituary: Albert Lepawsky,"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7 (1994): 282—284. 莱珀斯基是阿尔蒙德的妻弟。

105. Ibid.; Albert Lepawsky, "The Nazis Reform the Reich," *APSR* 30 (April 1936): 324—50. 见 331 n. 44, referring to material published in "Sept.-Oct., 1935"。

106. Lepawsky, "The Nazis Reform the Reich," 324, 348, 349, 350, 342, 345.

107. Harold D. Lasswell and Dorothy Blumenstock, *World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 Chicago Study* (New York: Knopf, 1939).

108. Almond, "Obituary: Albert Albert Lepawsky"; APS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1968); APSA, *APSA Membership Directory* (Washington, D. C.: APSA, 1988).

109. Brownlow, *Passion for Anonymity*, 222; Simon, *Models of My Life*; White, "Training for Public Service," 571.

110. Clarence Ridley, "The Information Bureau in German Cities,"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3 (April 1934): 209—211, 214.

111. Brownlow, *Passion for Anonymity*, 465—466.

112. 见 Michael Zalampas, *Adolf Hitler and the Third Reich in American Magazines, 1923—1939* (Bowling Green, Ohio: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ress, 1989), 96—97。

113. Brownlow, *Passion for Anonymity*, 360—361.

114. Ibid., 362—70.

115. 见 Tang Tsou, "Fact and Value in Charles E. Merriam,"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36 (1955): 9—26。

116. "Civil Service Assembly Makes Chicago Its Headquarters,"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4 (March 1935): 175.

117. James K. Pollock and Alfred Boerner, *The German Civil Service Act* (Chicago: Civil Service Assembly of the U. S. and Canada, 1938).

118. Dennis Anderson, *James Kerr Pollock: His Life and Letters* (Ann Arbor: Michigan Historical Society; 1972).

119. 约 50 位学者包括芝加哥、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参加了此次出游,旅游路线见 James Pollock Papers, Bent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reafter PP), box 85; Pollock to Dr. K. O. Bertling, May 22, 1934, PP, box 1. On the Carl Schurz society see Dodd and Dodd, *Ambassador Dodd's Diary*, 156, 261。

120. Pollock to Arnold B. Hall, August 30, 1934, PP, box 1.

121. Kurt Wilk, "Review of Pollock's 'The Government of Greater Cermany,'"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8 (June 1939): 485.

122. Henry Lichtenberger,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Greystone, 1937).

123. James K. Pollock, "Review of Lichtenberger's 'The Third Reich,'" *APSR* 33 (February 1939): 120—121.

124. Newspaper clip titled "Declares Elimination of Spoils System Essential," PP, box 95. 该报纸的名字和日期都没有出现在剪报上。

125. Pollock to Belsley, June 30, 1937, and Belsley to Pollock, July 9, 1937, PP, box 3.

126. Pollock and Boerner, *German Civil Service Act*, 6, 9, 11.

127. James K. Pollock, *The Government of Greater Greater Germany*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38), 105.

128. Roger Wells, "Review of 'The German Civil Service Act,'" *APSR* 32 (October 1938): 1008; Pollock to Wells, July 18, 1938, PP, box 7.

129. Wells to Pollock, September 13, 1938, PP, box 7.

130. Alfred V. Boerner, "*Towards Reichsreform —The Reichsgau*," *APSR* 33 (October 1939): 853—859; 引自 853, 854, 858—859.

131. William Shirer, *Twentieth Century Journey*, vol. 2 (Boston: Little, Brown, 1984), 204.

132. 博尔纳列在最后,没有学术简历。见 APSA's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1945。

133. Anderson, *James Kerr Pollock.*

134. Rowland Egger, "Review of 'German Cities,'"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22 (February 1933): 75.

135. Wells, *German Cities*, 13.

136. Wells to James Pollock, June 21, 1934, PP, box 3.

137. Frederick L. Schuman, *The Nazi Dictatorship: A Study in Social Pathology and Politics of Fascism* (New York: Knopf, 1935); Roger Wells, "Review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APSR* 29 (August 1935): 678.

138. Roger Wells,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APSR* 29 (August 1935): 653—59; 引自 658, 653。

139. Roger Wells, "The Liquidation of the German *Lander*," *APSR* 30 (April 1936): 350—61; editor's note on 324.

140. Ibid., 350, 357.

141. Elsa Wells Kormann, "Obituary: Roger Well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1995): 123.

142. Roger Wells, "The Revival of the German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after World War II," *APSR* 41 (1947): 1182—87; 引自第 1182 页。

143. Kormann, "Obituary: Roger Wells."

144. Donald Critchlow,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16—1952 (De 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5), 30—40; 引自第 40 页。

145. W. F. Willoughby, *The Government of Modern States*, rev. ed. (New York: D. Appleton, 1936), vi, 111, 182—183.

146. "History of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www. ksg. harvard.

edu/ kennedy / history.

147.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5, 3.

148. Carl J. Friedrich, "review of Michel' 'Sozialismus und Faschismus in Italien,' "*APSR* 22 (1928): 197—99; 引自第 199 页。

149. Carl J. Friedrich, "Review of Emil Lengyel's 'Hitler,' "*APSR* 27 (February 1933): 148.

150. Carl J. Friedric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ecutive Power in Germany," *APSR* 27 (April 1933): 185—203; 引自第 200,203 页。

151. 引自 Gunnell, *Descent of Political Theory*, 138。

152. Carl J. Friedrich, "Responsible Government Service under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n *Problem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Service: Five Monographs on Specific Aspects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74.

153. Karl F. Geiser, *Democracy versus Autocracy* (New York: D. C. Heath, 1918).

154. Herzstein, *Roosevelt and Hitler*, 78.

155. Karl F. Geiser, "Review of 'Germany Twilight or Dawn?' by Anonymous, and 'My Battle' by Adolph Hitler," *APSR* 28 (February 1934): 136—138.

156. Anonymous, *Germany: Twilight or Daw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3), 7.

157. Herzstein, *Roosevelt and Hitler*, 123, 130.

158. Johannes Mattern, "Review of Lichtenberger's 'The Third Reich,' "*APSR* 31 (October 1937): 962—964.

159. APS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1953).

160. James Miller, "Youth in the Dictatorships," *APSR* 32 (October 1938): 965—970.

161. APS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1968).

162. Alfred V. Boerner, "The Position of the NSDAP in the German Con-

stitutional Order," *APSR* 32 (December 1938): 1060—81; 引自 1081, 1061, 1065, 1071, 1076 页。

163. John D. Lewis, "Review of 'Staats und Verwaaltungsrecht im Dritten Reich,'" *APSR* 30 (February 1936): 172—173.

164. Harlan Wilson et al., "Obituary: John D. Lewi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1 (1988): 307—8.

165. Gerhard Krebs, "Review of Huber's 'Verfassung,'" *APSR*32 (December 1938): 1171—73.

166. APS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1953).

167. Boerner, "Towards *Reichsreform* —The *Reichsgau.*"

168. Donald Kettl,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Field*, ed. Ada Finifter (Washington, D. C.: APSA, 1993), 407—428.

169. Ostrom, *Intellectual Crisi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6—28.

170. Brownlow, *Passion for Anonymity*, 465—466.

171. "History of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172. Kettl, "Public Administration," 411—412. The quotation is attributed to Dwight Waldo.

173. Ostrom, *Intellectual Crisi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7; Herbert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4th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29.

174. Ostrom, Intellectual Crisi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aldo quoted on 10.

175. Kettl, "Public Administration," 408.

176. Ibid., 411.

177. Ostrom, *Intellectual Crisi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6.

178. 正如罗斯的《美国社会科学起源》一书第 452 页指出的:"马克斯·韦伯对官僚机构的悲观观点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美国行政学学生没有影响"。

第三章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一度拒绝承认苏联的美国与莫斯科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关系虽然绝对谈不上密切，却远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在本章中，我比较了从两次大战期间至冷战高峰时期政治学话语所构建的苏联和美国的形象。我首先探讨了 20 世纪 50 年代在苏联研究领域出现的“极权主义”论和在美国政治研究中随之出现的“反极权主义计划”（antitotalitarian program）。[1] 这些研究都反映出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取向，将美国的身份定义为极权主义他者（totalitarian Other）的强有力的对立面。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领域两个最好院系的一些学者却不愿意将斯大林政权看成是极权主义专制。他们认为苏联是在朝更大的自由前进，并持欢迎的态度，他们还希望美国在实现经济平等方面要向苏联学习。这些著名院系的其他学者虽然对斯大林实行民主的可能性不抱幻想，却认为苏联实行的中央计划实验可以为深受大萧条困扰的美国提供宝贵的经验。因而，在两次大战期间，政治学家们是透过妥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镜头观察苏联和美国的。

极权主义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政治学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强化了“国家安全部门”。美国的军

事和情报机构急剧扩张，国家安全部门将众多的私立机构纳入了其范围，包括美国重要的学术机构。一些重要的研究性大学的大部分活动经费——在有些情况下超过 50%——开始依赖于联邦资助。[2] 美国政府的慷慨大方让学院社会科学受益匪浅，一些权威人物还和众多国家安全机构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3]

苏联研究领域里的极权主义论

没有哪个社会科学领域能像苏联研究领域那样和国家安全部门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在冷战的头二十年里，苏联研究领域里关于“极权主义”思想的一致论调和政府要求其为之服务的强烈愿望使它的声望如日中天。

“极权主义”这个术语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用这个术语来表达他们意欲实现“极权国家化”(total state)的愿望，进而将人类生活的每个部分都吸纳进来。[4] 正如历史学家阿博特·格利森(Abbott Gleason)表明的那样，“极权主义”这个词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入美国公众话语的，到了 30 年代末期，虽然这个术语被使用时还不够精确或严格，它却越来越经常地被用来指称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独裁统治。但是，在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美国左翼阵营的大部分成员，包括左倾自由主义者在内，都强烈反对将德国和苏联进行比较。[5] 因此，美国国内对纳粹德国-苏联类比的反应是因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正如一位反对将德国和苏联进行类比的重要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大约在 1936 年……(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差别被高度强调；1939—1940 年间，差别被否认；1943—1945 年间，这种差别被认为确实是十分强烈的；1947 年之后，差别被认为荡然无存”[6]。

在 1947 年 3 月 12 日发表的标志着“杜鲁门主义”诞生的著

名演讲中,哈利·杜鲁门总统决定让美国帮助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与"极权主义"敌人进行斗争。杜鲁门毫不含糊地使用了"极权主义"这个术语,从而使它获得了最终的合法性,并且由此流传甚广。[7] 不久以后,极权主义就成了学者的一个研究热门。当历史学家和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开始探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时,分析当前极权主义现实的任务就落在了社会科学家的身上,特别是那些从事苏联研究的学者身上。正如格利森写的那样:

> 拨款行动和美国学术界对极权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和1945年之后的苏联研究或俄国研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美国政府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像福特、卡内基以及洛克菲勒这样的基金会的慷慨援助,一些主要的苏联研究中心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相继成立……冷战是众多基金会和像美国空军这样的政府机构对苏联研究进行投资的主要推动力……基金会、大学、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之间进行公开和秘密的合作,以促进苏联研究的发展,并将那些亲苏分子拒之门外。[8]

有两部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极权主义研究著作便是诞生于这个军事-基金会-学术联合体(military-philanthropic-academic complex),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都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分别是默尔·芬索德所著的《俄国是如何统治的》(*How Russia Is Ruled*)和卡尔·弗里德里克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专制与独裁统治》(*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9]

芬索德是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他帮助中心和美国军方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在写作《俄国是如何统治

的》期间，芬索德参加了一项由政府资助的研究苏联对隐蔽政治战的脆弱性的计划。同俄国研究中心出版的其他著作一样，该书大量取材于对苏联流亡者的采访，这类采访得到了美国空军的帮助和资金援助（美国空军之所以对此有兴趣，是因为他们需要改进目标选择和心理战能力）。[10]芬索德的著作印证了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的观点，即极权主义研究学派和冷战的出现之间虽然存在密切联系，但这无损于他们的学术研究质量。[11]《俄国是如何统治的》是一部博学之作，它不但写得很好，而且相当完整，注释也很细致。该书是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出版的，至少有20年它一直是重点大学和研究生院教授苏联政治的教科书。[12]

芬索德写道，“极权主义胚胎”固有地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在斯大林的培育下，它逐渐成熟，终于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极权主义政权，这个政权无情地压制任何政治异议，控制着每个社会机构，以服务于其目的”。芬索德着重于将苏联社会描述成一个控制对象，强调的是共产党如何通过灌输、宣传、机构控制和集体恐怖来压制社会。他认为这种恐怖手段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重头戏”，而苏联则是“一个巨大的管教所，它的强制劳改营与营外其他地方的主要区别在于劳改营内部的管制要更加残暴和卑鄙”。[13]

虽然芬索德明白无误地指出了法西斯和纳粹政权是苏联极权主义的“模仿物”，但他并没有对它们加以比较，也没有给极权主义下一个精确的定义。[14]于是，将极权主义思想提炼成一个“一般模式”和简洁地描述苏联和德国之间的相似之处的任务就落在了芬索德在哈佛政府系的同事卡尔·弗里德里克身上。弗里德里克在战后曾经在美国驻德占领局工作，他对极权主义的兴趣部分地来自他当时的一个观察，即“西方国家（驻德）军

事机构实行的法规性专制是极权主义模式的一个有趣参照”[15]。1953 年,弗里德里克组织了一场关于极权主义的学术研讨会,他这次发表的会议论文是他对极权主义概念进行提炼的第一次尝试。之后,对德国事务比对苏联事务更为熟悉的他和俄国研究中心的一位年轻成员、他以前的学生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进行了合作。他们的合作成果《极权专制与独裁统治》“在一段时间内是研究极权主义最具影响力、‘最具权威’的著作”[16]。

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强调,20 世纪的极权主义专制政权“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以往的独裁政权根本就不如我们时代的极权主义专制政权那样令人恐怖。”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政权只可能在大规模民主和现代技术的背景中产生”。他们还强调:“试图征服世界……是极权主义的自然倾向”,因此,“面对像极权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帝国,一旦放松警惕,就会导致像二战这样的或更严重的灾难发生”。[17]

尽管苏联、纳粹和法西斯政权的意识形态存在差异,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还是找出了它们的六个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极权主义的“综合病症”(syndrome),它们分别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其特点是致力于实现人类最终的完美状态”;“一个通常由单个人领导的大党”;“一个恐怖的警察控制体系”;“对一切大众传媒渠道进行几近完整的垄断式政党控制”;“对一切武装斗争手段进行几近完整的垄断式政党控制”;和“对整个经济进行中央计划和调控”。[18]依据这些特征,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政治进行了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对苏联政治进行极权主义解释的方法独领风骚,部分是因为,对美国学者而言,苏联几乎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其他原因是,为大众所认定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要么得不到经费援助,进入不了主流学术杂志,要么被辞退,要么谨慎地

封闭自己的思想。[19]当越战开始削弱美国社会关于冷战的一致论调时，极权主义研究学派受到了“修正主义者”的一系列攻击，这包括从“利益集团”和“机构多元主义”视角对苏联政治进行分析的政治学家们。[20]修正主义者成功地打破了极权主义研究学派的一致性，但是，正如修正主义学者艾尔弗雷德·迈耶（Alfred Meyer）所挖苦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刺杀极权主义这头怪兽许多次的事实证明了它的持续有效性，如果不是霸道性的话。[21]我在这里不打算加入他们的争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争论早已经转向别处，而且是因为，有许多修正主义者都承认，极权主义模式还是适用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他们已集中于研究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了。[22]

美国政治学中的反极权主义计划

与苏联政治学相比，冷战对美国政治学的影响更为间接和难以察觉，但意义要深远得多。正如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所言，冷战是作为“条件性要素”（conditioning element）作用于政治学的，并赋予了它某种“焦虑根源”（a source of anxiety）和目的感。[23]确实，只有重新考察弥漫于这个时代的反极权主义，人们才能弄懂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事实，即当美国实际上已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美国学术界与政府的关系比以往更加融为一体的时候，“国家”的概念却从美国政治学的理论话语中消失了。[24]

当然，“国家”的概念早已失去了其在一战后作为政治学理论核心概念的地位。然而，在两次大战期间，政治学家将“多元主义”政治原则视为政治生活的准确描述性解释，而不是作为规范命题。由于担心在缺乏有效的中央权威的情况下，社会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会造成混乱，他们不情愿地放弃了超越狭隘集团利益

的公众利益概念。[25]例如,查尔斯·梅里亚姆虽然将美国的种族、宗教和阶级集团的多样化视为是既定的,但是他的公民训练计划的核心前提却是,这种社会现实造成了一种病症;它有望通过设立一个由专家领导的自治中央权威机构得到缓解,因为这样一个机构能够将各种各样的集团整合到国家整体中去。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美国政治学经典著作,特别是戴维·杜鲁门的《政府过程》(*The Governmental Process*)和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的前言》(*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它们的意义主要在于彻底地接受了将利益集团多元主义作为规范的命题。[26]他们比其前辈更加彻底地抛弃了国家概念,因为他们并没有用替代性的自治机构和(或)公众利益概念来填补"国家"概念留下来的学说空白。杜鲁门宣称,美国政府机构只是"(利益)集团活动和要求的反映"。他将"存在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它和各种集团的利益保持一定距离并优于它们"的观点斥责为过时的"教条"。杜鲁门宣称,"我们不需要去考虑包含一切在内的(国家)利益,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说法让两次大战期间的大多数政治学家都无法容忍,甚至对于那些赞成多元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27]

为什么多元主义会在二战后从描述性解释变为规范命题?学术界抛弃了"国家"概念,甚至拒绝承认存在一致的公众利益,而这恰恰发生在美国公众一致反对苏联和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家将"国家利益"视为美国冷战政策指导原则的时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28]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回答,我们必须承认,美国政治学领域受极权主义焦虑感的影响并不会比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小。正如约翰·冈纳尔(John Gunnell)所评论的那样,美国政治学者对多元主义重新进行的规范性评价是和"(20 世

纪3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美国政治是极权主义和中央集权制日趋明显的政治世界中的民主前哨的认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29]艾拉·卡茨纳尔逊用同样的口气将战后对美国政治进行诠释的主要学者——戴维·杜鲁门、罗伯特·达尔、V. O. 基(V. O. Key)——的学术研究计划概括为“反极权主义计划”。[30]卡茨纳尔逊强调,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虽然有独立的论调并以现实主义为取向,但它们都因其具有一种后来学者所匮乏的道德目的感而增色不少。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杜鲁门试图构筑起重重壁垒来抵抗他所称的“病态”政治,即革命的和极权主义的政治。[31]罗伯特·达尔在回顾历史时承认,对极权主义专制政权的巨大恐惧深刻地影响了他那一代人。当新左派批评家指责政治学只强调稳定性而忽视大众政治参与时,达尔写道:

> 我们近来可能是过多地强调了民主“稳定”的条件……如果人们还记得,“稳定的”民主从未曾出现在苏联、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我怀疑他们还会不会去嘲笑那些一心一意研究民主稳定条件的作者们。这些作者在念及民主“稳定性”的时候,脑子里可能想到的不是内阁发生的变化,也不是政权之间细微的差别,而是民主的失败会最终导致残暴专制的可能性。和这种残暴专制比起来,就连最糟糕的多头政治都似乎是一个理想政体。[32]

从其他几个具体的方面也可以看出,杜鲁门和达尔的学术观点受到了冷战和当时的反极权主义冲动的限制。当杜鲁门蔑视地拒绝接受社会集团(比如社会阶级)的客观“范畴式”定义而坚持(建立在成员间“交流程度最小”的基础上的)行为科学定义时,他的脑子里想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同样地,杜鲁门舍弃了利益根植于社会结构的客观位置这一观点,而认为应根据共同态度来定义利益。[33]罗伯特·达尔强调的是民主的程序性质,以反对它的

实质性,这明显是得益于约瑟夫·熊彼特的分析。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熊彼特认为,世界正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朝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他试图去拯救最低限度的民主形式。[34]达尔在定义"多头政治民主"时主要集中在选举程序上,他清楚地阐述了西方选举和苏联进行的公民投票式选举的区别。[35]发端于熊彼特对国家社会主义之恐惧的程序民主概念直到今天仍在美国政治学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如果不是天下无敌的话)。正如罗伯特·帕特南所说:"我们关于民主的当代概念比大多数观察家看到的要更多归功于经济历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36]

因此,美国政治学战后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所描绘的美国形象是和俄国形象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极权主义苏联从根本上构成了美国身份的不言自明的"他者"(Other)[37]。苏联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而美国是只有社会没有国家——尽管美国实际上出现了国家安全部门。极权主义者受意识形态引导,而美国人追求实际利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客观构成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在美国,根据行为科学所定义的集团之间是友好的竞争。共产党宣称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而在美国,"人民"被区分为各个集团,作为整体的公众利益是根据生存来界定的。最后,苏联在界定"民主"时,将它和经济平等的实质内容联系在一起,而美国则只是用政治的和程序的术语来定义民主。

苏联的极权主义形象和美国的"反极权主义计划"是由一群相互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的学者共同阐述的。考虑到苏联研究和美国政治理论都受到了冷战巨大的影响(如果有不同的话),毫不奇怪地,这些研究计划共同勾画出了一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极端构成的世界,反映和摹拟了冷战的政治两极化。

这种两极化在意识形态取向上的表现就是民族主义。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民族主义缺少一种胜利的论调,这种论调本该成

为后来的经典作品，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及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与悉尼·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的主要特点。这是因为，在冷战最为紧张的时期，达尔、杜鲁门、弗里德里克和芬索德的著作一致认为，美国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芬索德和弗里德里克对于苏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变得更像美国这一点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当达尔警告说“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很有可能并不适合出口到其他国家”[38]时，他清楚地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变体。杜鲁门也是更多地强调要保护美国民主免受“致病”掠夺者的伤害，而不是去向别人传授美国民主。但是，这些学者都暗示，美国没有什么可以让世界学习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让美国学习的，极权主义这个对头更是没有什么可以让美国学习的。

两次大战期间的妥协主义者形象

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美国一些主要的政治学家是透过妥协主义的镜头看待苏联的。在这些年月里，学者们正面描绘斯大林的俄国并建议美国向苏联学习某些经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那些对美国民主持实质观并强调经济平等是民主的前提条件的人将俄国描写成正在向“民主的”方向前进，并展望美国的自由和苏联的平等最终将融为一体。芝加哥大学的弗雷德里克·舒曼十分清楚地表述了这个观点，默尔·芬索德在1934年与人合著的一本教科书中对此也有所暗示。其他关注美国经济产量的缩减甚于其平均分配的学者，将苏联视为国家领导的工业理性化和明智的经济计划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高级苏联研究专家布鲁斯·霍珀(Bruce Hopper)就是持后种观点的学者之一。不管是持何种观点，20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学家往往认为美国和苏联的制度一致性多于差异性。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和美国的“民主”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的观点直到冷战开始时才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

为了证明两次大战期间妥协主义者对待苏联的态度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我集中讨论了哈佛大学政府系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几位学者的观点。这两个系在二战后都成为了这个领域最具权威的研究机构。在 1925 年进行的一次正式的院校排名调查中,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超过了在战前十分显赫的哥伦比亚大学。[39]芝加哥大学的名望之所以急剧上升,是由于查尔斯·梅里亚姆的领导有方和他对学术探索的积极鼓励。哈佛大学的学术探索精神要逊色些,但它拥有像威廉·贝内特·芒罗(20 世纪 20 年代)和阿瑟·霍尔库姆(Arthur Holcombe)这样的学术大家。哈佛大学的政府系还拥有默尔·芬索德和卡尔·弗里德里克这两位学术新秀,他们关于俄国极权主义形象的发言具有权威性。

在证明之前,有三点要加以说明,以免引起误解。第一,我并没有宣称,以下所检视的观点在该学科中甚至在该学科的主要院系里具有普遍性。但是,持有这些观点的学者都受到他们同事的高度评价,除了在这个国家最著名的院系中授课外,一些人还担任了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学界强有力的(如果不是霸权的)声音。

第二,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美国和欧洲知识分子普遍对苏联持妥协主义态度。在以自由杂志自居的《国家》(*The Nation*)和《新共和》(*New Republic*)以及更为保守的《纽约泰晤士》(*New York Times*)上,经常可以看见对俄国毫无批判、甚至是完全同情的文章。《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就是为斯大林辩护的主要西方人之一。[40]无

论好坏,政治学话语都是将其裹挟其中的文化话语的一部分。

最后,我认为,美国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取向是随着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有人会据此反对说,政治学家的观点之所以发生变化,是理性学习的结果。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对苏联的看法变得黯淡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压制强化了,同时学者们也获得了关于斯大林政权性质的更可靠资料,关于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例如,经常积极评价苏联实验的哈佛大学高级苏联研究专家布鲁斯·霍珀于1938年访问莫斯科后,转而开始反对斯大林主义。[41]

然而,"学习"这个说法存在两个重要的局限。第一,一些重要学者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所持有的同情或不批判态度在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初进行了无情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后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也没有因为苏联国内恐怖程度的提高和1936—1938年进行的臭名昭著的莫斯科作秀审判(show trials)而消失。1938年11月,美国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芝加哥大学的塞缪尔·哈珀威胁要起诉他的发行人,以阻止其把他的著作收集到题为《欧洲的独裁国家》的系列丛书之中。哈珀坚持认为,苏联即使不是美国所理解的那种完全民主的国家,它也称得上是"民主的"。[42]另外,1938年《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发表了一篇对苏联实行的"大范围社会主义农业实验"进行技术性评论的文章,该文完全忽视了这场实验所导致的大规模饥荒现象和清算运动。[43]

"学习"观点的第二个局限是,获得新事实这个理由确实可以部分地解释政治学家为什么会改变对苏联的印象,但这并不能恰当地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同时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对美国民主的理解从20世纪30年代的实质观变为50年代的程序观难道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因为政治学家对制度的解释

出现了变化吗？同样，政治学家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城市机构的看法的巨大好转难道是因为城市生活质量提高了吗？在这两个例子中，要恰当地理解对美国政治的阐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就不能脱离二战和冷战的背景，它们促使包括政治学家在内的美国知识分子们更加积极地看待他们本土的社会和政治机构。

与哈佛大学有关联的学者

威廉·贝内特·芒罗是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1926—1927）的第一位哈佛大学政府系学者。他继查尔斯·梅里亚姆和查尔斯·比尔德之后担任该学会主席，这反映了哈佛大学政府系在政治学领域地位的提高。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谈到的，芒罗（于1929年离开哈佛大学进入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于1925年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比较政府教材，并于1931年和1938年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在该书1938年的版本中，芒罗描述了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他写道：

> 美国人在理解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应该不难……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市政府中，我们不时可以发现完全一样的情形。美国人不断地看到，地方长官和市长、立法机关和城市委员会仅仅是批准政党领导们业已通过秘密会议达成的决策。美国人对于政党领导人向政府官员发号施令的情形并不陌生。所有的书都在讨论美国政治的人物：特威德和克罗克们，瓦尔斯及鲁夫们，以及海茵克与欣克·丁克们*。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只不过是美国政党头

---

* 除了欣克·丁克是绰号外，这些都是人名。据本书作者来信解释，这些人都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美国城市政治“机器”的领导者。政治机器政治学（machine politics）指的是庇护人或个人关系的政治学，为政治学家所仇恨并被描绘为腐败与低效。——译者注

目和他那些唯唯诺诺的内部代理官员的翻版而已。同后者一样,俄国的政治官僚们躲在紧闭的门后面开会,之后并不公布任何会议内容,这是为了使会议决策以官方政令形式向公众首次公布,从而获得一种合法的政府权威。[44]

芒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没有好感,他对苏联的描述是果敢的批判。然而,他的描述表明了某种会令妥协主义思想偶尔陷进去的圈套,即通过掩盖外国的污点来支持对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批评的一种倾向。芒罗对美国政党机器的憎恨(自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以来,此种憎恨普遍弥漫于该学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故意淡化斯大林政权的专制性。他虽然对斯大林的俄国持批判的态度,然而他的描述以及他对克里姆林宫和坦慕尼协会会厅(Tammany Hall)所进行的类比与卡尔·弗里德里克后来的论点是不可调和的。后者认为,斯大林专制政权独一无二,它比以往任何的独裁统治都要恐怖许多。[45]如果像芒罗这样的反布尔什维克者都会将对美国政治病症的诊断与对苏联的印象混为一谈,那么,同样的混乱情形影响了那些基本政治本能更为激进的人的思想就毫不奇怪了。

正如芒罗 1938 年对斯大林专制的描述与弗里德里克 1956 年的描述之间形成的对比证明了对俄国的印象发生了变化一样,芒罗对美国城市政治非常负面的看法与罗伯特·达尔关于纽黑文市多元政治的极富影响力的描述之间形成的对比,也很好地说明了政治学家对美国的印象发生了变化。[46]在美国的知识发展史上,没有什么比大约 1940 年至 1960 年间美国政治学对美国地方政府的印象的变化那么令人吃惊的了。奇怪的是,就在达尔为纽黑文市的自治欢呼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白种人,包括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员们,正在涌向郊区。

默尔·芬索德并不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惟一的苏联问题专

家。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芬索德的很多精力都用于研究美国政府,这使布鲁斯·坎贝尔·霍珀(1892—1973年)得以成为哈佛大学苏联研究的高级权威人物。虽然霍珀已经被今天的人们基本上遗忘了,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似乎比芬索德更加闻名遐迩,这主要是因为他作为演说家、作家和苏联事务的政府顾问而声名远扬。[47]

自从他于一战期间在哈佛读大学起,霍珀就同时活跃在学术界和政府安全部门(如此说来,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和苏联研究领域之间亲密的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是在范围上有所不同而已)。霍珀在哈佛大学接受了军事训练,之后前往法国担任"第96日轰炸中队飞行领导"(a flight leader in the 96th Day Bombardment Squadron)。[48] 20世纪20年代早期,霍珀在欧洲、中东和亚洲作了一次广泛旅行。1926年,他被其母校聘为讲师。1927—1929年间,霍珀作为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在莫斯科工作,这个研究所是由芝加哥亲俄工业家查尔斯·克雷恩(Charles R. Crane)创建的(他还支持塞缪尔·哈珀)。霍珀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苏联经济管理",1930年,他荣升为哈佛大学政府系助理教授。[49]

霍珀和哈佛大学校长、政治学家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关系密切,后者鼓励他作些公开演讲。[50]1931年,霍珀在波士顿的洛厄尔学院(Lowell Institute)开设了一系列讲座,讲述了他关于当代俄国的思想。根据这些讲座整理出来的一本著作同时在英国和美国出版。[51]

这些讲座表明,霍珀曾经在苏联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到过像"吉尔吉斯大草原"和"沿着北极圈的科拉半岛"这样的地区。他关于俄国人的看法是一种恩人般的种族主义和超道德的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拥护者,霍

珀认为,理性的政治分析不需要受建立在出于义愤的道德规范基础上的即时判断所强制。与此相反,他是从大国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他欣赏俄国在工业化计划中所迈出的巨大步伐,但是他对此又十分恐惧,因为"(大国权力竞争的)竞技场正在转移到太平洋新的经济中心……(在那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美国和泛苏维埃国家(Pan-Sovietism)将发生冲突"[52]。

对于霍珀来说,要对俄国实行迅猛的工业化进行解释,其根源是俄国的国民性格,它是由种族、语言、地理和历史环境所塑造的。斯拉夫人具有雅利安人的血统,但是在俄国,他们"自由地混合"了其他血统,首先是"亚洲的"(Asiatic)(即劣等的)芬兰人,后来是鞑靼人,他们是"上层社会的蒙古人和平民阶层的土耳其人……(在俄国)经常看见的高颊骨和扁平的脸就是混合了芬兰人血统的结果"。俄国语言是"距离心灵最近的。俄国的诗歌表达的是一种原始的渴望,它把我们带回到了这个种族的最初时期"。地理因素,特别是俄国地形的"单一和无垠的特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俄国的帝制独裁统治和共产党的中央集权控制"。漫长的冬季夜晚,

> 可能可以解释俄国人的饶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俄国人那样多话……我的俄国朋友们整晚不让我睡觉,为的是让我相信一些玄学的观点,这令我疲惫不堪。就在我快要被说服的时候,他们会改变立场,然后用我十小时之前用过的论据来反对我。这就是为什么白海的索罗维特斯基(Solovetsky)岛上会有那么多的政治犯。他们仅仅是"必须"说而已。

霍珀在讨论俄国人性格时继续说道,极冷和极热的气候"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疲乏和懈怠"。"气候的压迫使俄国人学会了压迫人"和剥夺财物:"外国人惊讶于那么多俄国人居于一

室,他们没有我们的隐私观。农民中总是存在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居住在寒冷而又广袤的土地中间的俄国人早已习惯了以集体而非个人的身份一起做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能接受为其他地区所拒绝的社会主义的原因。”[53]

气候对俄国人性格造成的强烈影响因为俄国人的历史沉淀而加强。俄国人“没有真正的自治传统。他们既不知道何为自由,也不知道自由的醉人之处……他们是农民,或者以前是农民,其根基在农村,直到最近不久,他们才走出文盲的黑暗时代”[54]。

充满悖论的是,正是俄国人种族上的低劣和文化上的落后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会大张旗鼓地搞现代化。“清算”和“饥荒”的场景可能“令盎格鲁-撒克逊人痛不欲生”,但是俄国人“早已习惯了牺牲自身利益,即使是连看到世俗天堂的希望都没有”。俄国民众是如此的懈怠和顺从,以至于他们“连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历史含义都意识不到。这意味着,全体民众……正在被注入一个集体模子……其结果似乎是在人类社会中变成一种强壮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有创造性却平庸的、有道德却功利性的和不敬神的物种。人类从来不曾出现如此非人性化的物种和这样一种人造的蜂窝,他们注定要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统治俄国”[55]。

美国如何与这种“新物种”打交道呢?美国如何与出现在太平洋竞技场上的俄国竞争呢?在这点上,霍珀的妥协主义思维尤其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霍珀认为,虽然集体主义“摧毁了许多我们认为珍贵无比的东西”,但是美国人忽视了集体主义突出的“经济成就”,美国人应为此自行负责。美国必须“向俄国学习”,但不要仿效它泛滥的集体主义。他们必须进行“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足够的国家计划,以协调生产和消费的关

系，因为缺少这种协调，才出现了目前的世界性危机……美国人必须采取一些计划性措施，以克服因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失业现象，使工人获得尽可能高的工资，具有一定的就业保障和退休补贴。放任自由的无情竞争必须得到抑制”[56]。

总而言之，霍珀对美国经济活力的信心的减退和对俄国迅猛的经济增长的羡慕和恐惧使他萌生出要向俄国“学习”的妥协主义意愿。霍珀的例子表明，人们在理性地解释斯大林主义时不一定必须是一个左倾的和亲民众（pro-masses）的改革论者。以恩人姿态对待“亚洲的”俄国民众并怀有“经济发展的浪漫思想”的精英分子们也是对斯大林专制持非批判观点的重要来源。[57]

从1930年到1938年，霍珀先后六次访问苏联，每次访问后，他都会向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务院的俄国司报告他的观察结果。[58]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霍珀在每次访问后还会“向战争学院泄漏秘密，后者会将他的讲话作为机密文件存放”[59]。在其无数的机密简报和公开讲座中，霍珀继续表达他对斯大林工业化行动的同情态度。例如，在1933年3月，他对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位大人物说，布尔什维克在提高俄国民众文化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俄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未能改善俄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它在将一个落后国家转变成一个工业强国方面是“尤为突出地成功”。在1937年的一次讲座中，霍珀认为：“苏联在克服资本主义邪恶方面的做法最终比任何其他民主的继承国家给个人带来的自由更大。”[60]直到他于1938年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时，霍珀才得出“美德（已经）从俄国领导人身上消失了”[61]的结论。

1942年，霍珀被派往瑞典，为战略事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监控波罗的海地区。之后他成为美国战略空军的主要

编史家,并和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建立了友谊。在斯帕茨将军担任美国空军司令时,霍珀成了他的特别顾问。当霍珀于 1947 年回到剑桥时,他发现那些在战后立即返回大学的晚辈同事们把他的晋升给忽略了。霍珀的众多研究成果属于机密内容而没有发表,这也影响了他的晋升。霍珀制定了一个计划,斯帕茨将军根据这个计划并利用其政治关系向哈佛校方施加影响,要求其设立空军力量政治学教授一职,但是这个计划可能没有成功,因为霍珀直到 1961 年退休时还是助理教授。霍珀的教学兴趣转移到了他以前的挚爱,即空军力量上,他没有积极参加新成立的俄国研究中心的工作。[62]

在一篇发表于 1949 年的书评中,霍珀非常赞赏作者的观点,即政治自由和经济民主的协调发展取决于苏联人愿意"修正一些他们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概念"[63]。很明显,霍珀改变了他更早些时候的观点,即美国必须修正其放任自由的思想,向苏联的集体主义模式靠近。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他对"亚洲的"人政治能力的轻视。在他退休后所做的一次讲座中,霍珀宣称:"我们的(共产主义)敌人对殖民主义进行了许多恶意的宣传,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真实的情况是,殖民政府和多年来的训练使世界开化了……英国的文职官员前往世界各地,为野蛮人带去了正义、仁慈和启蒙,从来就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富于献身精神或如此出色。"[64]

默尔·芬索德(1907—1972)于 1932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是哈佛大学政府系的讲师。1935 年出版的《国际社会主义和世界战争》(*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ld War*)一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清晰的历史研究展示了他对俄国史料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多种阐释方法无比熟悉。[65]《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一篇书评预见性地评价道,芬

索德未来的著作“注定”要在学者的书架上占据重要的位置。[66]很明显,芬索德已经掌握了足以使他成为美国重量级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历史知识和语言技能。但是该书的历史叙述到1919年就戛然而止了,这样一来,关于同时代的苏联的事实性材料和价值判断就没有被包括进去。在该书的序言中,芬索德表示,他打算继续研究第三国际,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似乎暂时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移到了美国政府和经济方面。[67]

要了解芬索德关于苏联的观点(和他对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的看法),可以参看他与华盛顿大学公法学学者阿诺德·利恩(Arnold Lien)(芬索德和他是大学同学)合著的一本教材《美国人和美国政府》(*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68]。虽然芬索德是第二作者,但他的合作者并不是苏联共产主义问题专家,所以很难相信,那些讨论苏联的章节会没有经过芬索德的认可。而且,芬索德1937年发表的一篇书评表明,利恩和芬索德对美国问题及挑战的诊断和芬索德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69]

从利恩和芬索德著作的书名上可以看出该书的基本观点:研究民主制度“必须先从分析人口本身开始,并且要对人民的权力进行全面调查”[70]。该书的人民取向和从下至上的方法与反映在像威廉·贝内特·芒罗的《美国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71]这种教材中的保守的和从上至下的观点形成了对比。该书表达了对穷人的困苦境况的巨大同情,对受大萧条困扰的普通美国人生活状况的强烈关心和对缩减贫富差距(虽然不是“理想的”完全平等)的坚定支持。利恩和芬索德在讨论民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强调选举程序的因素。相反,他们强调的是积极的大众参与和政治自由与经济福利之间不可分割

的联系：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如果人们被拒绝了过好生活的机会，而且遭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社会阻碍，那么，所谓人类生而平等并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说法就会成为一种嘲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抗和僵化的社会阶层的存在给民主政体带来了长期的挑战……民治的政府并不能总是满足人民的期望。但是，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民主政府从未停止进步。这是因为，它相信人类内在的善和能力，并承诺要使所有的人都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正是这种实现更美好的社会的梦想和对普通人的高贵品质的信仰使民主充满活力，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幻灭之后得以幸存下来，同时使它具有一种吸引力，牵引着世界上每个角落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夺基本权利的人。[72]

利恩和芬索德继续写道，政治民主和自由的进展是19世纪的事业。他们认为，当前的政治民主必须由经济的或“工业的”民主加以扩大：

正如它关注普遍选举权一样，民主还关注消除贫困、保障生存收入和缓解失业……如果必要的话，要用法律来保护弱者免遭强者的侵害。只有当个人获得足够的食物、体面的衣着、基本的住所、来自存款的安全感和一些空闲时间时，他们才能表现出一种公民精神、一种公民义务感和通过教育进行自我发展的兴趣，这是理智公民的标志。工业民主是政治民主不可分割的补充。19世纪的历史主要记录了政治民主的进步。很明显，20世纪的历史似乎注定要主要记录工业民主的进步。[73]

《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进步特点在于其亲民取向、高度的国际主义和反种族中心主义：“两个在方法上大相径庭的政府

政策都可能帮助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要达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这甚至可以从粗略地了解其他市民的成就中明显看到……每个国家都是对人类福利事业发展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实验场。每个国家所获得的发现和所取得的成就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是它们的关注所在。”[74]

利恩和芬索德继续描述了一些其实验和美国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外国“实验场”。很明显，他们将苏联视为这些实验场之一。例如，美国人在寻求减少阶级冲突时可以考虑“在英国、俄国、瑞典、德国以及特别是丹麦发挥巨大作用的……合作运动”。从教育的观点来看，美国人的高识字率使其获益匪浅，但是，他们应该注意到“发生在俄国、暹罗*、土耳其、墨西哥和中国的旨在消除文盲的浩大运动。这种方式允许大众在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时有更充分的参与权”。俄国通过“废除大农场和使其名义上归属于国家”的方式进行的农业改革，是其在朝更大的民主方向所迈出的一步。在工业领域，俄国正在进行：

> 可能是计划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实验……以五年计划为代表的国家计划体制让全世界为之着魔。五年计划及其扩展部分所展望的工业化计划目的是克服俄国技术落后的局面，促使苏联几乎完全独立于外国生产之外，提高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为成功建立社会主义秩序奠定基础……未来计划的构想是劳动人民的乌托邦：所有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保护人民免受衰老、疾病和意外事故的危险，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增加文化、教育和娱乐设施。这些目标能否实现要到未来才能证明。不管怎样，俄国的实

---

* 泰国的旧称。——译者注

验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甚至是世界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的巨大兴趣。[75]

最后,利恩和芬索德赞扬了苏联在与种族偏见作斗争方面所扮演的先驱者角色:

> 在将种族偏见减少到最低方面,法国和俄国作出了榜样。法国在处理殖民地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色人发现他们和白人在公民和社会平等方面几乎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俄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对为数众多的种族和民族进行级别划分。结果是,苏联和法国创造了一个更加紧密团结的社会共同体。如果让种族偏见继续成为分裂性力量,实际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76]

利恩和芬索德拒绝将苏联看成是专制统治。他们提到,俄国"推翻专制主义"是一战后释放出来的"民主情绪的浪潮"的表现,并将苏联从在战后民主已经让位于专制"铁腕"的国家的长名单中去除掉。而且,在"普遍目标和理想"一章中,他们的结论是:"从根本上说,人类已经达到了最终目标之一,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制度是否优劣只能通过其在个人品质和大众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来判断。"[77]

总而言之,《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特点是对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和贫穷现象持妥协主义的批评。它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关于民主的独立观,强调"工业民主是政治民主不可分割的补充"。从这种视角看,苏联似乎比那些采取程序的、完全是政治的民主观点的作者们所认为的要更加民主,或者至少是更不专制,后一种民主观在冷战时取得了学术霸权地位。

正如我们在更早些时候所看到的,卡尔·弗里德里克坚持认为,20 世纪的极权主义专制统治"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自成

一体的”，人们一定不要“奉承”它们，把它们和以往的专制统治，如“欧洲君主专制统治”进行类比。极权主义专制统治并不仅仅是旧式专制的新形式，而是“我们现代工业社会（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某些特点的合理扩展”[78]。这样，弗里德里克将极权主义看作是一种后工业发展形式，现代技术不合人意地方便了一小部分官僚政治精英进行完全的社会控制。弗里德里克暗示道，在西方，工业化所走的是一条正常道路，而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它走的是一条不正常的道路。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弗里德里克似乎并没有将苏联发展看作是独特的。他关于斯大林苏联的更早观点很好地反映在《关于政府控制政治的一些想法》一文中，这是他最初于1935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其目的是为新政政策辩护。其他新政的支持者认为，新政是同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标准分道扬镳，而弗里德里克则不同，他通过展示资本主义从来只是一个神话，试图证明新政的历史延续性。“历史表明……在一个毫无争议地垄断了立法权力的政府的治理下，我们的现代工业生活已经成长并维持了起来。那些伟大的君主和他们的大臣们，那些领土国家的奠基者们，像英国的伊丽莎白与伯利（Burghle）* 以及法国的亨利四世和苏利（Sully）**，他们在打破封建特权的同时，也破坏了现代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这些现代主义者明智地追求着重商主义政策：他们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体，扩大了全国的市场，支持新兴工业，以及使国家政府中央集权化。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们未能认识到，正是这些早期的重商主义政策的成功才使英国后来得

---

* 伊丽莎白女王的枢密顾问。——译者注

** 法国政治家，亨利四世的重臣。——译者注

以繁荣昌盛。而且,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们也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表面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帝国主义控制:“亚当·斯密的利益自然和谐原则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开拓者们的政治神话。美国……不可能忽视这个原则的此类特点。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者(Manufacturers)(1791 年)的著名报告始于这么一个假设,即政府必须纠正殖民法规所造成的状况。”[79]

弗里德里克继续写道,卡尔·马克思“和他那些更加正统的对手一样对政府控制的政治视而不见”。马克思比斯密更加欣赏“以往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他的哲学只是“触及”斯密的哲学,“相信只要消除私有财产的存在所造成的阶级对抗,融入了共同生产的个人和团体的发展就具有‘自然的’和谐性”。确实,“建立了新的官僚机构”的斯大林统治,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期望是荒谬的。弗里德里克认为,未来既不属于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也不属于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二者都希望国家消亡——而是属于官僚—工业的中央集权制(bureaucratic-industrial statism)。[80]

和西方一样,苏联正在朝官僚工业主义前进,但是它的半封建过去和俄国帝制“腐败透顶”的特性迫使它以更快的步伐前进。俄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近在眼前的现代工业主义”的例子。

> 他们面前展现出工业巨大发展的图景……从根本上讲,五年计划是使俄国工业化的计划;它要使国民经济的每个领域都蓬勃发展。正如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对我们所讲的那样,如果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于“偏好长期计划、要求手段严格服务于目的和进行精确的计算”,那么五年计划绝对符合资本主义的精神。然而,只要将松巴特所描述的态度称为“工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人们就不会对这些字眼感到迷惑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精神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具有追求生产和理性化的工业主义热情，尽管它们对于这种理性化行动的最终目标看法不同：资本主义者追求的是扩大他的个人生产事业，而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扩大作为整体的国家经济……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斯大林是伯利和苏利的志同道合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两人对现存经济进行控制、合理化和刺激，促进商业发展，努力……“将整个领域作为服务于经济目的的一个单位，并组织和刺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81]。

上面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卡尔·弗里德里克并没有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看成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际上，他所做的恰恰是他20年后认为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也就是通过将斯大林和以往的独裁者进行类比的方式吹捧了他。弗里德里克不但将斯大林和那些特定的历史人物进行类比，而且为了使新政合法化，试图恢复那些开明的国家奠基者的名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伯利、苏利。

这不是说，弗里德里克希望美国仿效苏联式计划。他承认，因为美国已经工业化了——因为美国的问题“不是刺激生产，而是缩减生产，不是增加产量，而是寻找分配现存或潜在的生产的更好方式和手段”——苏联的五年计划并不适合美国。他依然认为，俄国和美国存在手段上的区别，而不是根本目标上的区别。这两个国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将理性化的‘工业主义’精神扩展到整个经济中”[82]的共同理想。

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联的学者

1900年，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和大学董事查尔斯·克雷恩到俄国作了一次商

务旅行。哈珀关于这次旅行的动人故事给他的儿子塞缪尔·N.哈珀(1882—1943)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哈珀由此成为美国学术界第一位全身心致力于俄国研究的学者。老哈珀于1904年逝世后,克雷恩成为了小哈珀的赞助人。克雷恩资助他频频访问苏联,并让他担任俄国研究学会主席一职长达29年之久。20世纪30年代,塞缪尔·哈珀无可置疑地成为美国学术界最突出的苏联问题专家。[83]

哈珀先后在巴黎、莫斯科和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实质性研究。虽然他从未获得博士学位,但是芝加哥大学于1912年聘任他为助理教授,并最终于1931年晋升他为正教授。哈珀被分配在语言与历史系,但是他对当代俄国政治的兴趣总是比对俄国历史的兴趣更大。[84]这样,用哈珀自己的话来说,他"越来越向政治学靠近,而不是历史学"[85]。哈珀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期间(1909—1911)就获得了政治学系的奖学金。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整个30年代,他经常参加美国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的会议。在芝加哥大学,哈珀和查尔斯·梅里亚姆以及政治学系的其他同事关系密切。[86]1926年,梅里亚姆邀请他开设一门关于俄国政府的政治学课程,并告诉他,政治学者们"希望他将自己当作是我们系的一分子"[87]。简而言之,尽管哈珀和历史学有正式的联系,他却同政治学学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1904年至1917年期间,哈珀多次访问苏联。他友好地对待一些主要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并且坚信,独裁政治最终将让位于西方式的宪政制度。1917年成立的孟什维克(Menshevik)领导的政府似乎证实了他的乐观主义,但是他对孟什维克者的热情使他忽视了布尔什维克者的组织力量及其对大众的吸引力。哈珀对十月革命感到震惊和沮丧,他热心地向威尔逊政府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提供学术建议。[88]他警告道,"一帮犹太人"

正在引导美国走向更加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89]1918 年 9 月，他是由政府公共信息委员会设立的一个专家组的重要成员，这个专家组的任务是证明那些宣称布尔什维克者是德国的代理人的资料的可靠性。令哈珀尴尬的是，这些资料不久就被证实是纯属捏造。从 1919 年到 1922 年，哈珀在国务院工作，他所进行的秘密分析坚定地支持不承认苏联的官方政策。[90]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哈珀经常去华盛顿，和国务院的官员定期会面。但是他逐渐怀疑美国不承认政策是英明之举，并放弃了反布尔什维克立场。从 1924 年至 1925 年，他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看法更加趋于一致，仅仅是对斯大林的“温和性”和托洛茨基领导的、以犹太人为主流的“过激主义”进行区别。1936 年，当斯大林开始策划对他以前的革命战友进行叛国审判时，哈珀觉得：“我不能消除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三个领导人的不满甚至是憎恨的个人情感。列宁和斯大林从未像这三个人那样引起我这颗‘资产阶级灵魂’的痛苦的愤怒。”[91]

哈珀急切地想观察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但是苏联官方拒绝了他的签证，这使他十分沮丧。在查尔斯·梅里亚姆聘用哈珀撰写他的公民训练系列集子中的苏联卷后，苏联人终于大发慈悲。哈珀和梅里亚姆于 1926 年来到莫斯科，哈珀在这个国家呆了三个月，其间前往农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旅行。他发现莫斯科和农村的生活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他向他的合作伙伴——查尔斯·克雷恩的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报告说，苏联政权牢不可破，其改革方向是积极的，斯大林无意发动世界革命。[92]

哈珀对苏联公民训练的研究可能是他对苏联研究作出的最重要贡献。这部著作的客观基调促使查尔斯·比尔德在其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一篇评论中讥讽道，哈珀写作时“有着加法机般的冷静和超然”，除了这个批评外，这篇评论还是非

常有利于哈珀的。《时代周刊文学副刊》(*Times Literacy Supplement*)同样认为,哈珀"总是非常谨慎地作出结论",但是他"倾向于对(苏联)制度进行赞赏性的评定"。[93]确实,哈珀的客观基调并不能掩饰他对苏联实验的赞美。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哈珀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平等是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的研究表明,他对苏联宣称的"民主中央集权主义"持同情态度。哈珀认为,苏联的工人和农民通过工会和合作社对政府政策施加了真正的影响(如果是有限的话);他坚持认为,在苏联国内,领导者是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94]这本书还赢得了《消息报》的赞赏性评论,哈珀再也没有被禁止进入苏联;他于1930年至1939年不止五次访问莫斯科。[95]

1926年下半年,当哈珀还在从莫斯科到芝加哥的途中时,稍早回国的查尔斯·梅里亚姆向他建议道,人们对俄国的好奇心非常强,"你需要再花三个月的时间继续到处转转"。哈珀对他的读者说,苏联的实验既不是彻底的失败,也不是绝对的成功。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使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哈珀的分析。1930年,他再次来到苏联观察斯大林的五年计划,之后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他在写给他国务院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这个计划正在建造一个以"新型公民"为基础的社会,通过集体努力谋求共同利益。[96]在他的公开演讲和书面报告中,哈珀将斯大林描述为"聪明又足智多谋的……操纵机器老板(machine boss)"。虽然他对五年计划的严厉性感到困惑,但他依然对斯大林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赏,并得出结论认为,民众的牺牲对于苏联实验的最终成功是必要的。[97]在他又一次访问苏联时,哈珀观察到"食物匮乏、商品短缺和管理低效率的现象……和其他令人焦虑的严重浪费情况",但是他认为,"在我1930年至1932年访问苏联的两年间,苏联取得了显著的进步"。[98]他在关于这

次旅行的报告中将斯大林描述成“一个意志坚强、大权在握、智力超群的人……一个机敏的政治家”。哈珀继续表达他对苏联现代化前景的乐观态度,对斯大林强制性的现代化行动所造成的人员代价却轻描淡写。哈珀之后再一次访问苏联(1934),并得出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得了“成功”的结论。[99]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哈珀积极参加促使美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运动。他对罗斯福总统于 1933 年作出的承认苏联政权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构想美苏结成联盟,以对抗纳粹德国。哈珀那时提出美苏合作主要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但是等到新的苏联宪法于 1936 年颁布时,他开始认为,美苏两国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在于它们共同反对希特勒,还在于它们的价值观越来越趋于一致。[100]

苏联 1936 年宪法获得批准的时候,哈珀正在莫斯科,他将这份宪法文件解释为苏联政权真诚地追求民主原则的证据。哈珀虽然承认,该宪法并不会带来多党议会制民主,但他还是认为,它将使苏维埃代表对选民更加负责,最高苏维埃“近似于”西方的议会,因为“它的立法程序非常标准化”。在他关于 1936 年的访问情况的报告中,哈珀承认,苏联政权目前强调的是经济民主,但是他预计,政治民主将最终在苏联制度中获得同等地位。同时,他预计美国将在新政下继续朝经济民主前进。[101]

哈珀的乐观态度可以从他 1937 年的著作《苏联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102]中看出。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对该书进行过积极评价的布鲁斯·霍珀注意到,哈珀将苏联描述成“正在向实现更大个人自由的方向前进”[103]。确实,哈珀虽然承认苏联政权有一些“极权主义”特征,但是他深感于苏联的“民主主义”(democratism),即政策制定过程中——如果不是选举过程中的话——有效的民众参与。哈珀坚持认为,虽然一

般革命原则是由党传留下来的,但是,

> 新的社会秩序的具体细则的设计……一定是大众参与建设的实际经验的结果。作为政策的最具体表述的五年计划是党的规划,需要中央集权式管理。但是下层民众对计划提出反对也得到了鼓励和支持,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计划仅仅是由上层机构强加形成而没有获得民众的有效反应,那么它必将失败。这些计划得以实现的程度就是民众反应的证据,而且,实现计划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者所夸耀的"数百万人制定这些计划"是对的。

哈珀又写道,斯大林是"老师",而不是"个人独裁者"。斯大林明显是"根据他最近制定的原则来行动的,即必须将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或不妨说是那些政策的服务对象的经验结合起来"[104]。

苏共于 1936 年开始进行的大规模清洗运动,包括莫斯科作秀审判,和哈珀关于苏联政治自由前景的乐观看法显得格格不入。虽然哈珀在私人信件中表达了他对清洗运动的极度反感,但是他从来没有公开地批评斯大林。相反,他将清洗运动合理化,认为它是苏联走向民主化道路上的一个暂时阶段,是它面对外国敌人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合理反应。在《苏联政府》一书中,哈珀接受了苏联关于有大量德国和日本间谍在其境内活动的说法,并认为叛国审判对于消除外国与国内反对者的接触是十分必要的。[105] 1939 年 5 月,哈珀最后一次访问苏联,他遇见一位朋友,此人"勉强地从毁灭性的极端运动中逃离出来。这位老朋友在告诉我(哈珀)关于这次清洗运动的恐怖一面后评价道:'但是,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希特勒和日本在澳大利亚、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恶行而言,我意识到,斯大林是对的,也是明智的。'"[106] 哈珀基本上也是持这种

判断。

1939 年 8 月，哈珀和其他苏联同情者一起，在一封认为把苏联和“极权主义”国家扯在一起是“荒谬的谎言”的公开信中签字。这封信宣称，苏联坚定地致力于文化自由、工团主义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在公开信发表后不久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许多苏联同情者恍然大悟，不再相信俄国是和平的堡垒，但是哈珀丝毫不为之所动。他卖力地为这个条约进行辩护，认为它是西方民主国家不愿抵抗希特勒从而迫使斯大林采取的自卫行动。对于斯大林随后吞并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他以这个行动可以保护这些国家的公民免受纳粹主义和战争的侵害为由来证明其正当性。然而，没有美国人愿意听哈珀的。1939 年 8 月至 1941 年 6 月期间，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哈珀的同事们对他惟恐避之不及，听他上课的人也少了很多。[107]

美苏战时联盟的形成对哈珀来说简直就是实现了他的毕生梦想，他由此重新获得了公众的尊敬。1942 年 11 月，他主持了一个“向我们的俄国盟友致敬”的群众集会，参加这个集会的还有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以及一些高级政府文官和军官。3 个月后，塞缪尔·哈珀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108]

弗雷德里克·L. 舒曼(1904—1981)在哈珀和国际关系专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的指导下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于 1928 年作为著作出版——严厉地批评了美国对苏联的对抗立场，并呼吁美国改变不承认政策。查尔斯·梅里亚姆“对(舒曼的)学术热情和学术能力印象十分深刻”，并于 1927 年邀请他加入芝加哥大学老师行列。[109]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回忆道：“在 30 年代期间，那时候我还是这个系的一名学生，‘教授们’主要是指梅里亚

姆、(量化方法的先驱者)哈罗德·戈斯内尔(Harold Gosnell)、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弗雷德里克·舒曼。”西蒙把舒曼视为梅里亚姆领导的院系里的众多“明星”之一。[110]确实,舒曼迅速赢得了多产作者、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方法的开创者之一的名声。

舒曼的第二部著作研究的是法国外交政策,受到广泛称赞,因为它具有“卓越而独特的风格”,是“将精确科学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极其成功的尝试”。[111]他的第三部著作《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1933)成为同时代最受欢迎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之一,一共出了7版。舒曼批评“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者过于“条文主义”和未能“采用统一的阐释体系”。舒曼采用了“权力政治”作为他的统一体系;恰如汉斯·摩根索15年后所争论的那样,他认为“所有的政治都是权力斗争,但是国内政治追求权力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国际政治把追求权力作为目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一篇书评认为它是“一部有价值的、有趣又出色的作品……设计精妙、思想深邃、博学精深、引人入胜”[112]。之后,舒曼又发表了一篇分析德国“神经症”的评论文章(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那样,他为此被指责为“过于贬低了”纳粹德国的“积极”成就),出版了许多其他关于世界政治和苏联的著作。[113]他在33年里一共出版了13部著作。[114]

尽管舒曼具有很高的名望,但芝加哥大学并没有晋升他为正教授。1936年,他接受了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的教授职位,一直到1968年。舒曼离开的主要原因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对梅里亚姆聘请本系毕业生的做法十分不满和他对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行为非常厌恶。[115]但是舒曼离开的背景是他和芝加哥大学的其他教授被指控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这是零售大亨查尔斯·沃

尔格林(Charles Walgreen)于1935年公布的。梅里亚姆和哈钦斯一起为舒曼辩护,专门调查这起事件的立法委员会在校园内并没有发现任何共产主义颠覆活动。[116]尽管如此,这起事件还是很可能影响了舒曼的晋升。

舒曼可能是位无党派的大学老师,但是在课堂之外,他是最为坦率地宣称自己是苏联同情者的人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他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还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并在像《新共和》这样的通俗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表达的观点表明,他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rs),也就是说,他虽然在政治取向上不会激进,但是他决不会批评苏联。[117]

舒曼之所以同情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厌恶。他是美国人中最早警告纳粹扩张主义的危险性的人之一,他对国际共产主义于1935年夏季发出的团结所有"进步"力量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号召表示欢迎。这个号召反映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变化,即不再诋毁西方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而是以"集体安全"的名义争取同它们进行更大的合作。[118]舒曼虽然醉心于权力政治理论视角,但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规范式的辩护。

在一篇发表于1936年夏季、题为《再思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中,舒曼试图证明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以便使它们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他写道,马克思哲学体系是构建在"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思想基础上的",因此,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理智的和普通的人都同样信任。舒曼争论道,自由民主国家"通过民主政府形式勉为其难地维持着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希望政治民主能最终带来经济民主;出于同样的原因,共产主义"勉为其难地采取了政治权力的非民主形

式”,目的是为了克服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舒曼坚持认为,宽泛地讲,苏联是个民主国家,因为它的政治制度允许民众选举官员,允许民众批评和参与政治。舒曼由此认为,既然苏联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自由主义都属于“民主”阵营,它们就可以从对方的经验中获得益处。在一篇于 1937 年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文章中,舒曼同样认为:“这些信仰(民主和苏维埃主义)在趋于统一和逐渐同化的过程中,可以使自由获得生命。”总之,舒曼所表达的不是民主的程序观,而是民主的实质观,即倡导民主中的社会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一样重要,同时,他所持的是一种妥协主义的立场,即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必须加以改善,要将苏维埃主义的社会经济特点融入进来。[119]

莫斯科的作秀审判并没有动摇舒曼对斯大林共产主义的进步性的信仰。1937 年夏季,他为审判进行了辩护,认为应该同时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托洛茨基与其他被告的实际罪行两个方面去评价。托洛茨基是个鼓吹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极端分子,而斯大林是和平与资产阶级民主合作的代表。舒曼虽然承认那些被告确实是被迫招供的,但他还是认为,即使对他们的所有特定指控都是捏造的,美国也应该和斯大林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他的托洛茨基敌人们。[120]

1939 年 8 月,舒曼与人共同发起致“民主与和平的积极支持者”的公开信。这封有 400 位美国人(包括塞缪尔·哈珀在内)签名的公开信,赞扬了俄国的进步教育制度、科学无畏精神、开明的社会和种族政策以及巨大的经济成就。它认为,苏联“只是将政治专制视为一种过渡形式,它在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出了不断扩大的民主。制定新宪法这个重大事件确保了苏联民众的普遍选举权、公民自由、就业权利、闲暇权利、接受免费教育的权利、享受免费医疗的权利、疾病和年老时拥有物质保证的权

利、在所有活动领域两性平等的权利以及所有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的权利”。列举出所有这些成就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那些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威胁着民主生活方式的想法，以及用以支持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的观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信发表在曾经报道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121]

苏联在签订条约后改变了集体安全政策并放弃了人民阵线。在发表于1935年12月至1939年5月期间的一系列文章里，舒曼热情地支持集体安全政策，但是到了1939年11月，他改变了立场，与苏联的立场改变遥相呼应。[122]舒曼在《新共和》上撰文，认为斯大林的清洗运动虽然夺去了一些无辜的生命，但有效地阻止了纳粹德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的行动。清洗运动的成功使希特勒确信，进攻苏联是个非常危险的行动，他因而认识到，他在西方有更好的机会。因为英国和法国拒绝了苏联的集体安全号召，所以当苏联转向他处寻求安全时，它们只能责怪自己。舒曼最后断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像美第奇、黎塞留或俾斯麦那样的外交天才的杰作”。[123]

苏联对波兰的侵略暂时削弱了舒曼对斯大林的智慧的信任。他承认，侵略行动“非常盲目和残忍，它既缺少政治智慧，又缺乏法律和道德上的考虑”[124]。但是在美苏战时联盟成立后，舒曼又恢复了对斯大林的信任。1944年，他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对一本将苏联描述为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的书大加赞赏。[125]战后，他继续从所声称的目的而非手段的角度对斯大林主义进行评价。1946年5月，舒曼在《新共和》上撰文，认为虽然“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集体化和工业化行动是痛苦的折磨”，但是它们“成功地奠定了苏联的实力基础，并激发起了苏联人民对自由而富足的生活的期望”。[126]同样，在他1946年出

版的《苏联的国内外政治》(*Soviet 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一书中,舒曼辩论道,斯大林主义所取得的两个重大成就远远抵消了它的残忍面:

> 一个是通过重新整合个性和社会价值与目标治愈了我们时代的民众神经症,这使人们得以摆脱孤独并最终远离阶级势利和普遍嫉妒——这是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所具有的特点。另一个是治愈了经济瘫痪和停滞……建立了一个制度框架,从而使每一个能够和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找到卓有成效的工作。

和战前一样,舒曼还是认为苏联是"民主政体——在于它要实现的目标,在于它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不是总是在于它所采用的手段的话"[127]。

《新共和》的记者海因茨·尤劳(Heinz Eulau)对该书的评价甚高。尤劳是位政治学家,他后来成为了这个学科领域里行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并担任了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一职。他在书评中写道,这部著作纠正了关于苏维埃俄国的许多误解。他表示同意舒曼的观点,即西方的自由和苏联的社会经济平等在未来将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默尔·芬索德对舒曼的著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芬索德注意到,舒曼"缺少关于俄国的第一手材料",他那"出色的言辞"并不能掩盖他思维上的意愿性。"根本的问题是,舒曼对苏联民主发展的希望和理想导致他去遮掩、淡化和忽视独裁现实。"[128]

舒曼反对杜鲁门主义,积极地支持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8 年当年惨遭失败的总统竞选运动,并一直热衷于批评美国的冷战政策。1971 年,在为纪念昆西·赖特而出版的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里,舒曼认为,冷战时期的美国"被一种集体神经症"和同他于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在德国观察到的普遍

神经症很相像的“普遍精神紧张所困扰”。[129]

同约翰·伯吉斯的例子一样,舒曼的例子表明,虽然学者们能够逆战时的爱国主义浪潮而游,但是他们的与众不同可能使他们的学术名声受损。舒曼对国际关系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已经为今天的人们所遗忘,这部分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的缘故。舒曼的《国际政治》第一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受到最高的赞赏,然而这本书的第四版(1948)遭到严厉的批评,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态度更适合于政治煽动和特殊辩护,而不适合用作国际关系教科书”。书评的作者最后断定,“对于没有恰当方法来纠正其中扭曲内容的新手来说,(《国际政治》)是一本不合适甚至是危险的书”[130]。

1950 年,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称舒曼是国务院里所谓的共产主义雇员之一(舒曼从来就没有为国务院工作过)。[131]虽然政治学家们一般都不认可麦卡锡的反共狂言,但他们却总是愿意以更加微妙的方式损毁某个同事的事业。[132]在这个战后成立的俄国研究中心里,舒曼和其他志同道合者被认为是“越轨”[133]。当舒曼的出版商要求哈罗德·拉斯韦尔对另一位苏联研究专家的书稿予以评论时,拉斯韦尔回复道:“他的政治取向和舒曼的不一样,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舒曼作品中的情感基调,你就可能是在帮克诺夫(Knopf)的忙。”1963 年,当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名誉教授托马斯·巴克利(Thomas Barclay)听说舒曼在那里获得了一个临时职位时,他立即致信给教务长,称舒曼的“观点和授课都非常偏执和主观性太强”,他在威廉斯学院造成了不少“麻烦、争论和难堪”。巴克利警告教务长说,如果正式聘用舒曼的话,将会影响到斯坦福大学的筹款行动。[134]

苏联方面也不欢迎舒曼。1949 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和平

之文化和科学研讨会”上，苏联的主要代表对他认为俄国和美国都存在好战因素的观点进行了非难。[135]几年后，《真理报》攻击舒曼是帝国主义的辩护者。《真理报》将《人类共同体》(*The Commonwealth of Man*)——这是1952年出版的、舒曼尤其引以自豪的一部著作——错误地解释为一部“强烈鼓吹通过美国征服的方式建立世界政府”的书。[136]

查尔斯·梅里亚姆在他1931年出版的《公民的形成》(*The Making of Citizens*)一书中写道，苏联“在公民教育方面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富于启示的实验场，对于研究公民进程的学者而言，这里有丰富的材料”。他宣称，苏联实验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采用了民主的社会制度”。和其统治阶层成员大多来自世袭贵族的俄国专制不同，

> 新的公务员队伍主要由工人组成，当然，旧有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但非常强调大众参与治理。政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党和红军，通过民主的吸引力和在工厂里组织工业生活与在苏联农村组织农业生活的民主实践来寻求对整个(文职)人员队伍的广泛支持……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众负责制和普遍教育产生了一种民主的民族主义，这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意料到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们当中一些人所不愿意看到的。[137]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梅里亚姆认为苏联正在朝民主的方向前进，而且坚持妥协主义的观点，即在国家建设方法上，俄国为美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撤除了关于芝加哥大学进行共产主义颠覆的指控后，梅里亚姆帮助劝说查尔斯·沃尔格林——正是他的观点引发了立法机构的调查——资助举办捍卫美国制度的系列讲座。梅里亚姆是这次资助活动中最早的受益人之

一。[138]1940 年,他在沃尔格林基金会的赞助下举办了五场讲座,它们后来发表在一本名为《民主是什么?》(*What Is Democracy?*)[139]的书中。这些讲座的内容主要取自梅里亚姆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这是他决心为美国民主进行规范式辩护的时期——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此时,梅里亚姆已经不再把苏联视为"实验场";他放弃了关于俄国"民主的民族主义"的幻想,而是将它看成是一种"新的专制"。[140]他这里对"民主是什么"的回答很重要,这和他 15 年之后在同个基金会的赞助下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另一种回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 1955 年的沃尔格林讲座——后来出版成著作《民主理论的前言》——中,罗伯特·达尔力图将民主理论的基础置于现实中而不是理想中。前面我已提及,达尔在定义民主时同熊彼特一样,主要使用的是程序的术语。

梅里亚姆在开始他 1940 年的沃尔格林讲座时将民主定义为:"一种政治联合形式,国家共同体的一般控制和指导方向习惯地由社会主体决定,大众参与和获得被管理者的同意被恰当地考虑到了并提供了相应的程序。"但是他坚持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不仅仅是一种机制……民主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待同胞的态度,一种政治合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类价值可以在人的个性中找到最好的和最充分的表达。民主这种形式不是目的,它是实现人类幸福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确实,梅里亚姆对民主的辩护主要在于他对民主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设想"——的阐述。[141]

根据梅里亚姆的观点,民主的目的包括"人类尊严"的进步,圆满实现"不断走向人类完美的人类趋势",以及关于"文明的获益从根本上说是大众的获益,而且必须尽快地和公正地扩散到民众中去"的观念。[142]"对文明获益的公平参与"使下列成

为必需:“每个人在获得最低限度安全方面机会平等……每个人都拥有美国人最低标准的食物、住房和衣物。每个人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和免于失业的保障。每个人都有免受意外事故和疾病威胁的保障。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保障……每个人都有免受衰老威胁的保障。每个人都有参加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娱乐和文化活动的机会的保障。”[143]梅里亚姆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的、实质的美国民主观,这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截然不同。

梅里亚姆一如既往地将明智的“计划”看作是实现民主理想的最佳途径。他强调道:“有理由相信,系统的、前瞻性的计划有助于实行使自然和人力资源最好地服务于我们制度的此项基本目标的政策,可以使我们的产量获得增加和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梅里亚姆不仅以学者的身份谈论国家计划,而且作为国家资源计划部的副主席积极参与到此类实践中去。梅里亚姆在国家计划资源部和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任职使他有机会接近罗斯福总统,成为新政时期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144]

梅里亚姆很高兴自由主义原则“现在受到了普遍批判”,但是他很清楚,“被弱化了的(这个原则)仍然是各种社会控制形式,特别是贴上了‘计划’标签的各种运动的主要反对力量”[145]。令梅里亚姆懊恼的是,在二战期间,这个“被弱化的”反对力量在国会和学术界又得到了强化。1943 年,国会撤销了国家资源计划部这个机构,这对梅里亚姆的民主计划社会的理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反对这个机构的国会议员将它和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等同了起来。在学术领域,梅里亚姆发展的进步世界观也遭到了攻击,特别是遭到了来自保守的移民学者的攻击。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害怕新政主义会蜕变成官僚社会主义,发展了最低

限要求的程序式民主观念，这和梅里亚姆的民主理想主义是相对立的。梅里亚姆家乡附近的一些进步主义保守批评家们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获得了一个学术平台，于1941年成立了社会思想委员会。正如梅里亚姆的传记作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个委员会是那些欧洲访问学者们的集中地。“他们认为像梅里亚姆这样的新政主义者是被误导的对人性有着天真理解的乡下人。”[146]

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是那些访问学者中的一位。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The Road to Serfdom*)中,哈耶克触到了梅里亚姆的痛处。他当时雄辩地指出,政府的经济、社会计划和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并必然导致极权主义专制统治。梅里亚姆极力将旨在实现民主目标的计划和法西斯与苏联的计划区别开来,他很自然地避开了哈耶克的观点。1945年4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向全国转播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会上,年迈的梅里亚姆指责哈耶克曲解了“计划”的含义和低估了民主的功效。哈耶克生气地回应道:“像你梅里亚姆这样的人往往喜欢用民主完成不了的任务来增加它的负担,从而可能导致民主的毁灭。”这使梅里亚姆勃然大怒。数月后,他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撰文认为,“哈耶克的愤世嫉俗和胡乱指责根本就不是受理智的支配,而是受恐惧和怀疑的支配。他的书诉诸非理性的力量而反对各种有意识的社会控制”。梅里亚姆认为《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使人消沉的”、“毫无持久性价值和受到过高评价的书”。[147]然而,最终的结果是,《通往奴役之路》成为了畅销书,一直卖得很好。[148]而梅里亚姆的《民主是什么?》一书却在多年前就停止出版了。

程序式民主的胜利

冷战的爆发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即民主的社会控制不管其目标是多么美好,都可能导致极权主义专制统治。1948 年 12 月,梅里亚姆另一位保守的同事、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阐述了他的民主观。虽然他在发言中没有提及梅里亚姆,但他表达的观点暗指了梅里亚姆:“俄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到处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将‘民主’等同于特定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等同于自由——抽象地讲,这是值得称道的目标——那么,人们不断地给政府新的任务和越来越多的权力,就会使政府不久以后成为所有人的主人,而不是公仆。”[149]

就连以前坚定地支持新政的人都很快地对这个观点作出让步。法学学者阿道夫·伯利(Adolph Berle)——罗斯福总统最具影响力的顾问之一,坚定地倡导政府加大对法人权力的控制力度——1950 年承认:“如果存在对巨大公司的恐惧,那么对巨怪式的国家的恐惧肯定不会更少。亲历了苏联警察国家组织和同它一样令人恐怖的……纳粹和法西斯组织的极端行为的一代人是不会低估这么一种可能性的,即具有压倒性权力的国家同样会成为专制国家。”[150]正如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所观察到的那样,伯利立场的改变,表明了“极权主义对国家的自由观产生了多么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力”。布林克利认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将(自由价值)同其他他们曾经认为是同等重要的价值——经济公平、平等和效率——进行了权衡比较”。然而,一旦美国发现自己正在进行反对极权主义——首先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然后是反对共产主

义——的战争，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就变得更为迫切起来，而中央集权论者的经济改革也开始显得更加危险。其结果是“逐渐地不再对国家予以赞颂，这是20世纪30年代晚期自由思考的一个标志，也是一股忠于‘政府宗教’的退潮。（新政拥护者）瑟曼·阿诺德曾一度采用‘政府宗教’一词”[151]。

自由主义思想的这种重新定位影响了美国政治学。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家们在将极权主义思想提炼成一个“模式”或一种“综合病症”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或“综合病症”的特征包括“某种官方意识形态……其特点是致力于实现人类最终的完美状态”[152]。关于极权主义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政治学界广泛的认可，它和查尔斯·梅里亚姆关于“人类完美状态”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设想”的观点水火不容。

这种更加强调选举程序、自由选择和政治自由的定位的变化典型地反映在罗伯特·达尔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50年代的学术生涯中。达尔写于新政后期的博士论文雄心勃勃地试图从理论上调和政治民主原则和各种社会主义计划。达尔那时是（反斯大林的）美国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他希望“美国通过类似的第二个新政……朝民主的社会主义秩序的方向迈进”。和许多美国左翼人士一样，达尔反对美国参加二战，但是1940年法国的沦陷使他对孤立主义进行重新评价。他离开了美国社会主义党，之后志愿到欧洲作战。

达尔于战后进入了耶鲁大学，他和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合作进行了一项关于计划的研究项目。[153]这项研究的成果后来出版，达尔和林德布洛姆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应增加适合于民主社会中混合型经济的理性计划。他们认为，熊彼特和哈耶克同社会主义辩护者之间的“主义”之争已经变

得毫无意义，熊彼特对“虚构出来的主要替代性选择”——要么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计划”，要么是放任的自由市场——的描述代表的是“一种令人失望的观点”。这本著作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它并没有对这门学科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154]

达尔在下一部著作《民主理论的前言》中不再把民主和经济计划联系起来，他承认熊彼特的“分析非常出色”，并主要用程序的术语来定义民主。塞缪尔·亨廷顿赞许地评价道：“到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民主含义的)争论已经结束，熊彼特获得了胜利。”[155]《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是关于熊彼特通往胜利之路的一个里程碑。

注　释

1. Ira Katznelson, “The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 Political Science as Liberal Guardianship,”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ed. Noam Chomsky et al.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255.

2. 关于美国一些重要大学从“象牙塔”变成依赖于政府的服务机构的有力分析，请参见 Rebecca S. Lowen, *Creating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nfo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R. C. Lewontin, “The Col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y,” in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1—34。

3. 根据 Christoph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xii, “从二战到20世纪60年代，军事、情报和宣传机构向美国社会科学大型研究计划提供了最大份额的资金”。我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了知名政治学家和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联系。

4.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5. Ibid., chap. 2.

6. Carl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 引自 Les K. Adler and Thomas G. Paterson, "Red Fascism: The Merger of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in The American Image of Totalitarian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1970): 1048。

7.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73—75.

8. Ibid., chaps. 6—7; 引自第 121 页。也可参见 Stephen Cohen, "Scholarly Missions: Sovietology as a Vocation," 在他的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ment: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37 中。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5—195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该书详细叙述了美国政府参与哈佛俄国研究中心工作的情况。

9.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0.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x;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chap. 4; Gregory Mitrovich, *Undermining the Kremlin: America's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Soviet Bloc, 1947—1956*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7.

11. Norman Naimark,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The Origins of the AAASS," *Newnet: The Newsletter of the AAASS* 38 (November 1998): 3.

12.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122.

13.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59, 102, 254,482.

14. Ibid., 477.

15.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vi, viii.

16.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123—125; 引自第 125 页。

17. Frien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10,3,13,63,68.

18. Ibid., 9—10.

19. Alfred G. Meyer,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and with One's Older Colleagues," *Russian Review* 45 (1986): 401—408;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chaps. 3—4; Cohen, "Scholarly Missions," 8—19. 例如，科恩(Cohen)报告说，直到1977年为止，向《共产主义问题》杂志投稿的人在发表文章之前都被秘密地进行了"忠诚调查"。也可参见我在本章后面部分关于弗雷德里克·舒曼学术生涯的讨论。

20. 例如，参见 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Jerry F. Hough,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1. Meyer,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401.

22. 这些辩论是由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发表在《俄国评论》(*Russian Review*)第45期(October 1986)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之后在一次"讨论会"上展开。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争议出现在该杂志的下一期(第46期)(October 1987)。也可参见 Cohen, "Scholarly Mission";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128—142。

23. Katznelson,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 236—237.

24. 这种讽刺出现在 Terence Ball, "American Political in Its Postwar Political Context," in *Discipline and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James Farr and Raymond Seidelm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218; Timothy Mitchell, "The Limits of the State: Beyond Statist Approaches and Their Cr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以下简称 APSR) 85 (1991): 79。

25. 参见 John G. Gunnell, "The Declin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lu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History: Research Programs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 ed. James Farr, John S. Dryzek, and Stephen T. Leon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40。

26. 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Knopf, 1951);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27. Truman, *Governmental Process*, 505,50—51.

28. 汉斯·摩根索的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Knopf, 1951) 和杜鲁门的《政府过程》一书由同一个出版商于同一年出版。

29. Gunnell, "Declination of the 'State',"40.

30. Katznelson,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 255.

31.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516.

32. Robert A. Dahl,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Elitist Theory of Democracy,'" *APSR* 60 (1966): 301 n.; 引自 Terence Ball, "An Ambivalent Allia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Farr, Dryzek, and Leonard, *Political Science in History*, 58.

33.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22—23; 参见 Katznelson,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 252—253。

34.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131, 达尔在书中认为熊彼特关于民主的分析"非常出色",他告诫道,他并不同意熊彼特认为选举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影响甚微的说法。Katznelson, "Subtl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Emergency," 244,这篇文章强调了熊彼特对达尔的影响。

35.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67—69.

36. Robert D. Putnam, "Striving for Tocqueville's America," *Los Angeles Times*, June 4,1990.

37. "他者"(Other)这个提法是借自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38.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151.

39.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67), 105—108.

40. 参见 Lewis S. Feuer, "American Travelers to the Soviet Union,

1917—1932: The Formation of a Component of New Deal Ideology," *American Quarterly 14 (1962): 119—149*; *Peter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Frank A.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The "Red Decade" Revisited*, 2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David Caute, *The Fellow Travelers: Intellectual Friends of Communism*, rev.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Edward Mark, "October of Thermidor: Interpretations of Stalinism and the Perception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7—1947,"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1989): 937—962; Jacob Heilbrun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Moscow Show Trials," *World Affairs* 153 (winter 1991): 87—101。

41. Thomas R. Maddux, *Years of Estrangement: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33—1941* (Tallahasse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80), 70.

42. Paul Harper, ed., *The Russia I Believe In: The Memoirs of Samuel N. Harper*, *1902—194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240—241.

43. W. Ladejinsky, "Soviet State Farms, I,"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3* (March 1938): 60—82, 引自第 60 页; idem, "Soviet State Farms, II," ibid. (June 1938): 207—232。拉德金斯基成了亚洲农业发展问题方面的专家。

44. William B. Munro,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3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757.

45.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3.

46. Robert A.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47. 霍珀资历更高的另一个证明是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书评数量远远超过了芬索德。

48. "Notes for a Talk to the Legion of Honor Dinner: Privilege of Being a

Student during World War," February 14,1963; Hopper to Richard Nolte, November 9,1967; 均出自 Bruce C. Hopper Papers, box 27.6,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49. Hopper to Richard Nolte, November 9,1967; Thomas Maddux to Richard Nolte, April 11,1968; Hopper Papers, box 27.6. 关于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正式历史记录出现在 www.icwa.org/history 上。

50. Hopper to Nolte, November 9,1967; various letters from A. Lawrence Lowell to Hopper, 1934—1940; Hopper Papers, box 27.6.

51. Bruce C. Hopper, *What Russia Intends: The Peoples, Plans and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1); item, *Pan Sovietism: The Issue befo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1). 除了伦敦版本将导论一章删除外,这两本书的内容是一样的。

52. Hopper, *What Russsia Intends*, 17,19,11,283.

53. Ibid.,12—16, 20, 19, 22, 22—23.

54. Ibid., 35.

55. Ibid. 200—201, 133, 240—241.

56. Ibid. 240, 259.

57. "经济发展的浪漫思想"这个术语是由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创造的,用以描述许多外国观察家对斯大林的大规模工业化行动的迷恋。参见 David. C. Engerman, "Modernization from the Other Shore: American Observers and the Costs of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2000): 383—416。关于这个主题也可参见 Heil-brunn, "*New York Times* and the Moscow Show Trial"。

58. Bruce Hopper entry in "Fiftieth Anniversary Report, Harvard Class of 1918," Hopper Papers, box 27.6.

59. Hopper to Richard Nolte, September 11,1967, Hopper Papers, box 27.6.

60. 1933 年 3 月 3 日,在海军战争学院举行的一次讲座的笔记; Thomas Maddux to Richard Nolte, November 4,1968; Hopper Papers, box 27.6.

61. Maddux, *Year of Estrangement*, 70.

62. 哈佛大学宣布霍珀退休的新闻稿(1961 年 5 月 28 日); "Fiftieth Anniversary Report"; Hopper to Richard Nolte, September 11, 1967; Brig. General Harold Clark to Hopper, February 24, 1961;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memo from Hopper to General Spaatz, May 23, 1947; Hopper Papers, box 27.6.

63. Bruce C. Hopper, "Review of Julian Tower's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SSR,'" *APSR* 43 (1949): 371—372.

64. 演讲稿:"Background on Colonialism, Civilization and Freedom," December 29, 1966, Hopper Papers, box 27.6。

65. Merle Fainso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ld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66. Arnold J. Zurcher, "Review of Fainsod'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ld War,'" *APSR* 29 (1935): 897—898.

67. 参见 Merle Fainsod and Lincoln Gordon,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41)。

68. Arnold Lien and Merle Fainso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A Textbook for Students in Introductory College Courses and for the Active Electorat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4).

69. Merle Fainsod, "Review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mocracy,'" *APSR* 31 (1937): 729—731.

70. Lien and Fainsod,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v.

71. William Bennett Munr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3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31).

72. Lien and Fainsod,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74, 363.

73. Ibid., 441.

74. Ibid., 492.

75. Ibid., 497, 499—500, 498.

76. Ibid., 501—502. 这段文字非常明显地将法国的殖民政策和苏联同样地理想化了。正如 Brain 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chap. 4 表明的那样，对西方帝国主义持不加批判的态度在20世纪早期的国际关系学科里十分普遍。

77. Lien and Fainsod,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357, 357, 507.

78.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3—5.

79. Carl J. Friedrich, "Some Thoughts on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Control,"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1 (1936): 122—133; 引自第122, 124—125页。

80. Ibid., 127—128.

81. Ibid., 131—133.

82. Ibid., 132.

83. John B. Poster, "A Warmth of Soul: Samuel Northrup Harper and the Russians, 1904—194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4 (1979): 235—251; John C. Chalberg, "Samuel Harper and Russia under the Tsars and Soviet, 1905—1943"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4).

84. Chalberg, "Samuel Harper," chap. 9.

85. Harper, *Russia I Believe In*, 138.

86. Ibid., 61, 157, 197; Chalberg, "Samuel Harper," 382, 420—422.

87. Merriam to Harper, November 26, 1926, Charles E. Merriam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以下简称MP), box 31.

88. Poser, "Warmth of Soul"; Chalberg, "Samuel Harper."

89.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46—47.

90.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y Prof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2; Poster, "Warmth of Soul"; Chalberg, "Samuel Harper".

91. Chalberg, "Samuel Harper," 276—277; Harper, *Russia I Believe In*, 222.

92. Chalberg, "Samuel Harper," 283—285.

93. Samuel N. Harper, *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比尔德和《泰晤士》上的书评引自 Chalberg, "Samuel Harper",451—452。

94. Chalberg, "Samuel Harper," 448—449.

95. Ibid., 451—452; Poster, "Warmth of Soul," 245.

96. Merriam to Harper, November 12, 1926, MP, box 31; Chalberg, "Samuel Harper,"285;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258.

97. Chalberg, "Samuel Harper," 292—294,302.

98. Harper, *Russia I Believe In*, 186.

99. Chalberg, "Samuel Harper," 303—305,329.

100. Ibid., chap. 6;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207.

101. Chalberg, "Samuel Harper," 359—362.

102. Samuel N. Hap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Van Nostand, 1937).

103. 引自 Chalberg, "Samuel Harper," 459。

104. Harper, *The Government of Soviet Union*, 62, 69.

105. Ibid., 189—191; Chalberg, "Samuel Harper," chap. 8.

106. Harper, *Russia I Believe In*, 259.

107. Chalberg, "Samuel Harper," 392,492—499;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184.

108. Chalberg, "Samuel Harper," 537—44.

109. Schmidt,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221*; Chalberg, "Samuel Harper," 422—423; Frederick L. Schuma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Russia since 1917: A Study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28); James P. Baxter, "Review of Schuman'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Russia'", *APSR* 23 (1929): 216—217; Merriam to Harold Dodds, July 31, 1941, MP, box 47.

110. Herbert A. Simon, *Charles E.. Merriam and the "Chicag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7), 4—5.

111. Frederick L. Schuman, *War and Diplomacy in the French Republic: An Inquiry into Political Motiv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cGraw-Hill, 1931); Graham Stuart, "Review of 'War and Diplomacy in the French Republic'", *APSR* 26(1932): 840—841.

112. Frederick L. Sc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 2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31); 引自 Schmidt,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211—214; George Blakeslee, "Review of Schuma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PSR* 27(1933): 840—841。

113. Frederick L. Schuman, *The Nazi Dictatorship: A Study in Social Pathology and Politics of Fascism* (New York: Knopf, 1935).

114. "Obituary: Frederick L. Schuman,"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81.

115. Simon, *Charles E. Merriam*, 7; Barry Karl, *Charles Merriam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286—287.

116. Karl, *Charles Merriam*, 287—288; Ellen W.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McCarthysism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70.

117. 我关于"同路人"(fellow travelers)的定义和将舒曼划为这个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是根据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中的分析得来的。

118. Ibid., 103.

119. Frederik L. Schuman, "Liberalism and Communism Reconsidered," *Southern Review* (autumn 1936): 326—328; idem, "Give Me Liberty," *New Republic*, June 23, 1937, 201; 两者都引自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109—110。

120. Frederick L. Schuman, "Leon Trotsky: Martyr or Renegade?" *Southern Review* (summer 1937):53—74; 引自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164—166。

121. "Letter to the Editor: To All Active Supporters of Democracy and Peace," *Nation*, August 26, 1939, 228.

122. 参见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145—146。

123. Frederick L. Schuman, "Machiavelli in Moscow," *New Republic*, November 29, 1939, 158—160, 引自 Warren, *Liberals and Communism*, 200。

124. Frederick L. Schuman, "Machiavelli Gone Mad," *New Republic*, December 27, 1939, 290; 引自 William L. O'Neill, *A Better World: The Great Schism: Stalinism and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28。

125. Frederick L. Schuman, "Review of Bernard Pares's 'Russia and the Peace'", *APSR* 38(1944): 1017—1018.

126. Frederick L. Schuman, "Review of Victor Krevchenko's 'I Chose Freedom'", *New Republic*, May 6, 1964, 668; 引自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342。

127. Frederick L. Schuman, *Soviet 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1946; reprint, New York: Knopf, 1953), 583; 引自 O'Neill, *Better World*, 126。

128. Heinz Eulau, "New Beginings," *New Republic*, February 11, 1946, 191—193; discussed in O'Neill, *Better World*, 127; Merle Fainsod, "Review of Schuman's 'Soviet 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APSR* 40(1946): 598—600.

129. O'Neill, *Better World*, 130—131, 149; Frederick L. Schuman, "The Neuroses of the Nation," in *The Search for World Order: Studies by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of Quincy Wright*, ed. Alber Lepawsky, Edward H. Buehrig, and Harold D. Lasswell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97), 312—323.

130. Leland Goodrich, "Review of Schuma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urth Edition," *APSR* 43(1949): 153—156.

131. Richard M. Fried, *Nightmare in Red: 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5.

132. 例如,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在1953年发表的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演讲中就表达了反对麦卡锡主义的观点;参见"On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APSR* 47(1953): 961—974。

133.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122.

134. Lasswell to Roger W. Shugg, May 20. 1947. Harold Dwight Lasswell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box 52; Lowen, *Creating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218,286.

135. O'Neil, *Better World*, 164.

136. "Obituary: Frederick L. Schuman,"《真理报》的言论引自 Elliot R. Goodman, *The Soviet Design for a World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411。

137. Charles E. Merriam, *The Making of Citize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hods of Civic Trai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 222, 216,221—222.

138. Karl, *Charles Merriam*,288.

139. Charles E. Merriam, *What is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140. Charles E. Merriam, *The New Democracy and the New Despotism* (New York: Whittlesey, 1939).

141. Merriam, *What is Democracy*? 6.92.

142. Ibid, 8; Merriam, *New Democracy and the New Despotism*, 37; Charles E. Merriam, "Planning Agencies in America," *APSR* 29 (1935): 209.

143. Charles E. Merriam, *On the Agenda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98—99.

144. Merriam, "Planning Agencies in America,"209; Karl, *Charles Merriam*; Alan Brinkey, *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 (New York: Nintage, 1995). esp.246—248.

145. Merriam, *New Democracy and the New Despotism*,6.

146. Karl. *Charles Merriam* .278—279,289.

147. Ibid.290—292; Charles E. Merriam, "Review of Herman Finer's 'Road to Reaction,'" *APSR*, 40(1946.); 133—136.

148.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157—161; Theodre Rosenof, "Free-

dom, Planning and Totalitarianism: The Reception of F. A. Hayek's *Road to Serfdom*,"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of American Studies* 5 (1974): 149—165.

149. Frank Knigh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1950.): 513.

150. 引自 Brikley, *The End of Reform*, 162—163。

151. Ibid., 162, 164.

152.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9—10.

153. 罗伯特·达尔的采访记录, APSA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y; 引自第97页。

154. Robert A. Dahl and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Planning and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Resolved into Basic Social Processe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3), 3—4; 达尔的口述采访记录。

155.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13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6.

第四章　冷战政治

20 世纪 50 年代，在冷战高潮时期，美国政治学向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的民族主义方向偏摆得厉害。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罗伯特·达尔称“多元民主制度在美国运行良好”，但可能“无法向其他国家出口”。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声称美国“是个运行良好的社会”，“美国有最发达的政治和阶级关系形态”，“美国所呈现的正是欧洲的未来”。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言论中，作为一种成功的形式，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非常引人注目。李普塞特还提出“将 20 世纪中叶西方民主政治分类，会对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斗争有所裨益”[1]。

很难讲民族主义的两个派别哪一个在学术层面上在当时更受欢迎。但很清楚的是，许多重量级的政治学家积极投身于塑造“欧洲未来”的政治活动和“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斗争”中。作为各种国家安全机构的顾问、合伙人、受益人，顶尖的学者自觉而积极地投身于捍卫民主的阵营中，反对极权主义敌人。甚至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力求将西方民主的运作用一种科学、冷静的方法进行阐明。以李普塞特本人为例，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从美国空军得到了两个可观的资助：一个是考察“比较国家发展对军事规划的启示”，另外一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领导人”。[2] 于是这门学科就有了不同于政治学的界定。这

种学科的界定在冷战中得到了影响力足以席卷整个学科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大力支持。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政治学家们仍然对他们研究的所谓政治感到迷惑不解。

本章与前三章不同,关注的不在于政治学家对某一特定敌对政权的描述,而在于对他们介入冷战政治的记录。这种介入是大规模的,全面分析它就需要再出一本书了。这里我仅仅叙述这个介入过程的一小部分,但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会分四个部分展开,每个部分论述某个重要的政治学家或者一组政治学家以及他们所属的机构。

这门学科声称与政治无利益上的瓜葛,但实际上却与之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四个部分均会一一阐明。四个部分并不号召去怀疑提倡者的性格或正直。但却提出如下问题:如果该学科是包含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之中的,那么它与研究客体是分离的这一前提假设——这种假设恰恰是政治研究的科学途径之基础——有多少根据?

争夺第三世界民族的民心是这四个部分的大背景。其中三个部分特别涉及越战,描述了政治学家们卷入战争之中,另外还有越战时代的动荡带给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冲击。这些部分之后解释了越战对政治学的影响,包括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妥协主义日益繁盛,同时也使得与国家安全机构的合作逐渐失去合法性。

公共行政与发展中国家

在第二章里,我讨论了战后公共行政领域的衰落,说明了为什么 1956 年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PACH)会关门大吉,为什么原本是美国政治学会官方的核心研究领域的公共行政学会降

级，为什么在哈佛大学的公共行政学院里，这一传统的课程会被一个公共政策项目取代。这种衰落是缓慢的。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他们受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公共行政鼎盛时期的训练，直到退休时仍然坚持这一信念。他们职业生涯的道路很平坦，由于用技术支持建立“新国家”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于是这个衰落的过程便被延缓了。

1955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马克思主义向第三世界扩张，建立了国际合作部（ICA），并与美国的外交援助项目相配合。[3] 在国际合作部和其他美国机构的支持下（间或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支持），美国公共行政专家被派往美国驻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外交使团中，为上述国家的政府提出如何改革行政机器的建议。尽管并不清楚这些专家们在第三世界的活动能为那些东道国留下什么痕迹，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活动影响了这些专家本人。寄居于第三世界国家使这些公共行政学家们享受他们在国内根本负担不起的生活方式，也激发了他们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兴趣，于是关于东道国的学术书籍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

为冷战时期的公共行政学打开一扇窗户（顺便提一下，包括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是应了詹姆斯·费斯勒（James W. Fesler）的号召。他是公共行政学衰落时期的核心人物之一。费斯勒（生于 1911 年）1935 年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1935 年到 1951 年，他任教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并积极投身于公共服务。费斯勒在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之后，应路易斯·布朗洛（Louis Brownlow）的邀请于 1936 年加入了行政管理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二战时期，费斯勒在战争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工作，并于紧缩（stint）时期（1943—1945）担任政策分析与档案委员会主

席。1951 年,费斯勒进入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并担任考尔斯政府学教授(Cowles Professorship of Government)直至 1979 年退休。他担任了两届系主任。这个系原本是由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挑大梁的,成败荣辱仅仅在于这些人。但在费斯勒的领导下,公共行政学成为该领域全面发展的领头羊。费斯勒于 1958—1959 年担任东北部政治学会主席,1968—1969 年任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美国政治学会 1969 年的年会是个吵吵嚷嚷的大论坛,多亏了费斯勒,他遇事不骄不躁又不失公平,这使得那些与会者们还不至于风度尽失。他的若干学生在这个领域出类拔萃,有阿伦·怀尔德伍斯基(Aaron Wildavsky)和西奥多·洛伊(Theodore Lowi),他们分别是美国政治学会 1985—1986 年度和 1990—1991 年度的主席。[4]

1958 年,费斯勒在华盛顿对耶鲁大学及耶鲁大学政府委员会发表演说。他先是表彰了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们的学术成果,之后又回顾了他们对政治和公共服务所作出的贡献。费斯勒开始时说,他和罗伯特·达尔在哈姆登市和北黑文(North Haven,纽黑文郊区)的工作并不成功。接着又说,苏联(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巴洪(Frederick Barghoorn)曾在五年内相继就职于国务院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费斯勒继续说道:

> 瓦尔特·夏普(Walter Sharp)教授曾就职于国务院、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2 年夏天,他到法属印度支那作公共行政咨询员。1954—1955 年他在开罗给联合国埃及公共行政学院作协调员,现在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顾问。

"我为越南政府提供咨询,"费斯勒提到,"我总是时不时地为多个联邦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他还说:"去年一年,哈罗德·拉斯韦尔教授在海军战争学院、空军大学、军事战争学院及

海军陆战队教务中心作演讲,中国学专家饶大卫(David N. Rowe)教授在国家战争学院开课,我在陆军工业学院开课。”费斯勒信誓旦旦地对在华盛顿的耶鲁校友说:“任何人都难以置信耶鲁政治学家与真实世界很少联系。”[5]

费斯勒的解释并不完整。他还应该提到拉斯韦尔与兰德公司的密切关系;饶大卫在中情局的前身——战略事务办公室工作;饶大卫在1954—1956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出资支持的亚洲基金会台北办公室主任;饶大卫1953年在里斯委员会(Reece Committee)作证,里斯委员会是一个负责调查美国各组织对共产主义的合法倾向的会议型机构,饶大卫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赞赏。[6] 如果费斯勒在20年后修订其发言稿,他也许也会提及他们的实际活动。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耶鲁大学的博士,至今仍执教于耶鲁大学,成为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的领导者,并长期担任和平科学界的《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编辑。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拉西特给以下机构担任顾问或开展研究:国防研究院(调查研究员,1962)、美国军控与裁军署(调查研究员,1963—1966)、本迪克斯(Bendix)航空航天处(顾问,1964—1972)、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ARPA,顾问,1967)、系统发展公司(顾问,1965—1966)、兰德公司(顾问,1966—1970)、通用电气技术军事计划指挥部(顾问,1966—1970)、海军战争学院高级研究室(联络人,1973—1974)。[7] 对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而言,拉西特试图发展“定量分析方法及可使用公开获得的数据的理论……以提高预测及对外国行为的理解”[8]。

正如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与现实世界有密切联系的”那样,政治学系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领头的政治学研究生项目基地。于是理所当然地,这个系处于行

为主义革命大潮的浪尖上，想把这个学科变成一门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罗伯特·达尔、哈罗德·拉斯韦尔、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1947—1951 年及 1959—1963 年在耶鲁大学任教)、卡尔·多伊奇(1958—1967 年在那里任教)是这场行为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达尔为这场运动撰写了一份宣言。[9] 但事实的确是一方面这门学科是关于政治的科学，另一方面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们又真正地介入了政治吗？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医学研究人员与他的病人关系亲密，我们常常会怀疑他的专业知识水平。同样，是不是如果学者自身介入——哪怕是部分介入——康涅狄格的城市政治，我们就不怀疑他这方面的知识水平了？[10] 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供职五年之久我们就不怀疑他关于苏联的知识了？

费斯勒曾经提到耶鲁大学的同事沃尔特·夏普提出的“环球路线”(global-trotting itinerary)，给冷战前期的公共行政学科国际化作出了一些提示。这一学科中关于第三世界的观点则多来自于费斯勒和耶鲁校外的公共行政学家们的通信。费斯勒以前学生阿伦·理查兹(Allan Richards)给他写信，信封抬头注明“公立行政学校，市立圣安德烈斯大学与田纳西大学合办，玻利维亚拉巴斯市”(Escuela de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Universidad Mayor de San Andres, en Cooperatción con la Unversidad de Tennessee, La Paz, Bolovia)。田纳西大学的玻利维亚研究中心是由国际合作部出资赞助的，并且它的通信地址是“美国玻利维亚行动组，国务院邮箱(mailroom)，华盛顿”。费斯勒在给理查兹的信中这样说道：“虽然在技术支持工作中总会有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但我觉得你可以在帮助发展中民族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感。……我(和我妻子)为越南人民所深深倾倒，倾注全力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1]

妥协主义者曾有改革美国政府的冲动,却终被民族主义者改革外国政府的要求所代替。另一个常与费斯勒通信的人——弗雷德·里格斯(Fred W. Riggs)的职业生涯恰是最好的证明。从1951年到1955年,里格斯(生于1917年)任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主席助理,当时该中心是这个领域改革者的大本营。后来公共行政情报交流中心由于资金缺乏被迫关门大吉,里格斯被任命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本特利(Bentley)政府学教授,并于1967年离任前往夏威夷大学任教。[12]他与费斯勒的通信表明,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第安纳大学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公共行政咨询“小组”,并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接触。在这个小组的工作中,政治实践和学术工作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例如,1958年,里格斯对费斯勒说:“(在曼谷的)弗雷德·霍雷根(Fred Horrigan)带领的印第安纳大学的咨询小组积极参与了当地政府和行政运作,并无意中得到了一些有趣的资料。他正准备用这些资料来做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论文呢。”[13]

在印第安纳大学,里格斯开始开设发展公共行政学和比较公共行政学的课程。他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1957—1958年,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团资助的里格斯前往泰国研究与生产、运输、大米的分销等问题有关的政府项目。1959年,里格斯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任教于马尼拉的公共行政研究院。在马尼拉,里格斯向费斯勒汇报了“一系列被密歇根大学派遣于此的人们展开的研究和调查”[14]。1963—1964年,里格斯是设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的高级专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泰国官僚政治现代化的书。[15]东西方中心是美国新闻总署的一个分支,是美国政府毫无遮掩的宣传武器。当时它的信笺抬头就是这样写的:“东西方文化技术互换交流中心,美国政

府与夏威夷大学合作项目”[16]。虽然接受任命之后的里格斯似乎能够随心所欲地著书立说,但是其他的学者却没有得到来自东西方中心的类似赞许,也没有得到一些大的基金会的赞助。然而却是他们用更加激进的词,而不是一个涵义颇丰的“现代化”来建构他们的学术体系,也是他们把美国界定为一个“帝国”。

1952 年,费斯勒应卡内基集团的邀请和三个来自耶鲁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一起游历东非,于是开始了他自己与发展中国家的“亲密接触”。卡内基的领导层至今仍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急于要让这些学者们了解到这些地区马上就要非殖民化了。费斯勒描述一次在非洲举行的“野餐会”时是这样说的:参加者们根本没有被邀请作学术演讲。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次“游学”。[17]对费斯勒的学术生涯影响更大的是他与发展中国家的第二次接触。他在 1956 年曾在越南南部呆过一段时间,是国际合作部资助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使团的顾问。

密歇根州立大学驻越南使团的核心人物是政治学家韦斯利·菲谢尔(Wesley Fishel,1919—1977)。1948 年他从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给驻日本的美国士兵授课,还结识了从越南流亡于此地的吴庭艳并和他成为朋友。1951 年,菲谢尔进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当助教,吴庭艳于是尾随他到了东兰辛。吴庭艳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面前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亲美的反共者”,并在菲谢尔的帮助下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美国的支持,方便自己在 1954 年在越南南部攫取权力。应国务院的要求,密歇根州立大学允许菲谢尔和吴庭艳一起返回西贡。菲谢尔在那里住在总统官邸,成为了吴庭艳最信任的美国顾问。[18]

吴庭艳向密歇根州立大学提出给越南提供技术支持的要求,校长约翰·汉纳(John Hannah)很快就表示了赞许。汉纳曾

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共和党人。他和国际合作部的领导者们都认为大学是推进美国国外利益的“人力库”。在汉纳的带领下,密歇根州立大学在13个发展中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这13个国家多数没有实行民主政治。1955年,得到国际合作部支持的在越南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项目是这13个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在它7年的历史中,花费美国纳税人的2500万美元用来给越南“技术支持”。菲谢尔被任命为密歇根州立大学使团的团长,并继续享受与越南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之便,这是在西贡的其他美国人无法享受到的。1959年;他在《新领袖》(*New Leader*)这本书中写了篇文章,把吴庭艳的政权描述为“一人统治下的民主”。两年之后,菲谢尔就把吴庭艳比作了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一样的人物。[19]

离开吴庭艳的官邸之后,菲谢尔住在西贡一个奢华的别墅里,生活优裕。他大学里的同事们生活得同样惬意,赚到的钱接近他们平常工资的两倍。他们的学术生涯进入了繁盛时期。尽管这次任务是实践性的,但多数去西贡的教师在任务期间就升职了,还有一些一回到学校也得到了提升。菲谢尔在1957年升任正教授,虽然他发表的著作并不很多。[20]

密歇根州立大学使团提供安全行政和公共行政方面的培训和咨询。安全行政方面的教师为越南国内武装,包括秘密警察,提供培训,还给他们配给军火。他们还帮助越南政府建立遍及全国的身份证系统,目的是查出并驱逐共产党渗透势力。从1955年到1959年,在西贡提供安全行政培训的部门其实给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小分队很好的掩护。他们公开的真实身份是这个项目的“合法”学者。费斯勒知道中央情报局的这回事,但他回忆说,这在当时根本算不了什么。[21]

这所大学的公共行政部门参与了许多项目的建设,如公务

员学院、国家公共行政研究院、难民安置所。许多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们都参与到了这些项目中,除了菲谢尔,还有盖伊·福克斯(Guy Fox),沃尔特·莫德(Walter Mode),罗伯特·西格利亚诺(Robert Scigliano),拉尔夫·斯马克勒(Ralph Smuckler)及爱德华·韦德纳(Edward Weidner)。这个部门还招募其他大学的政治学家作顾问。1956 年,费斯勒整个夏天都在西贡。他的继任者包括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公共行政学家阿瑟·纳夫塔林(Arthur Naftalin)和来自哈佛大学的约翰·蒙哥马利(John D. Montgomery)。还有一个去西贡的政治学家(费斯勒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帮助南越起草了宪法。[22]

费斯勒去越南之前就说,他的越南之行就是去“作总顾问之类的东西,特别是在行政派出机构(field administration)方面和政府关系问题上提供咨询”[23]。在西贡,他发现越南的行政派出机构模式“效仿法国长官制。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没有一个地区主管来负责政府在本地区的所有活动。这恰是‘行政权力’(le pouvior executif)的具体体现”[24]。在越南的一份期刊上,费斯勒“对行政机构进行了反思”,他还给吴庭艳总统写了份备忘录,并与吴庭艳一起参加了几个讨论会。在备忘录中,他提到越南政府的工作“并没有下达到人民”,这主要是因为地方首领们一个个都像独立的“国王”一样。关于如何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管辖控制和确保政府工作上行下效,费斯勒提供了一系列建议,还包括由法国政府牵头的大幅度缩减行政区域的计划。[25]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公共行政学的奠基人都把法国的官僚政治体系视作行政改革的范例(虽然普鲁士的改革更为迫切),那些美国政治学专家们却都在试图改革法国在它以前的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官僚政治体系。

费斯勒在越南的经历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这段经历对越南本国并没有太大的影响。1957 年，他得到了卡内基集团的资助，研究比较野外行政（comparative field administration）。1961 年，他在一封给熟人的信中写道："最近我研究的首要领域是比较野外行政。我认识到自己其实并没有对法国的官僚政治体系有令人满意的理解，在给越南提供咨询建议的时候捉襟见肘。所以我动力十足。"[26] 费斯勒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比较行政学繁荣起来。[27] 如果费斯勒自己的例子是个很好的说明的话，那么与其说行政学的繁荣是由学科内部的发展动力造成的，不如说是由美国政府对用来制止第三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用知识日益增加的需求造成的。

越南之行还把费斯勒变成了一个南越统一进程的拥护者。返回纽黑文不久，费斯勒在一档叫做《耶鲁报道》的广播节目中对听众们说："越南有能力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一点对美国极其重要，因为越南是东南亚地区自由世界理念的关键输出地——在东南亚，多数国家要么是共产主义，要么就是轻易就被共产主义俘获。"他站在总统吴庭艳一方解释说："只要国内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共产主义者存在，重新建立当地的自治政府就很困难，建立西方式的自由选举制也很困难。"[28] 费斯勒加入了"越南之友"俱乐部，帮助将美国的一些书籍运送至越南的学术性图书馆。但到 1961 年的时候，他与越南的关系却"松散"起来了。[29] 当时，两个脑子里少根弦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使团团员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吴庭艳政府的文章。结果是吴庭艳终止了这个项目。[30]

但是，韦斯利·菲谢尔却一直是美国插手越南事务的支持者——至少他一直是这么说的——即便是在 1963 年他的朋友吴庭艳被暗杀之后。1965 年白宫给菲谢尔拨款 25000 美元用

以建立全国战前发言人机构(prowar national speakers' bureau)和一个信息中心。菲谢尔还与国家安全部门紧密合作招募美国学生到南越的乡村做志愿者工作。这个项目的动员大会1965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举行,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卡尔·罗恩(Carl Rowan)均出席了大会。菲谢尔带领密歇根州立大学"越南之友"分会成员,还在校园的公开辩论中给战争对手冠以"疯子"和"叛国者"的名号。1966年,在Ramparts杂志对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越南使团给予曝光之后,菲谢尔的前盟友,也是他在西贡时的助手、政治学家罗伯特·西格利亚诺辞去了职位,逃一样地前往了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菲谢尔却仍留在东兰辛,坚守阵营,但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无援,还成为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校园的反战抗议活动的头号目标。[31]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双重生涯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生于1911年),是"政治文化"的一个有争议的重要学者,战后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在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都教过书。1954年以来,他任社会科学研究院比较政治委员会主任——这是个很有影响力的机构。他得到过许多学术荣誉,包括1965—1966年的美国政治学会主席。[32]这里,我认为阿尔蒙德的学说产生的大背景是一战后二战前社会科学家们进行政府工作时对于文化操纵和宣传手法的探索。这个学说着眼于美国国家安全和当时的政策,他的学术成就被他在政府工作时期写成的情报战、心理战的著作所掩盖。在美国冷战时期关于政治文化的学说中,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外交政策的政治学之间的界线暧昧不清。

从公民训练到公民文化

由阿尔蒙德和他所设奖学金得主悉尼·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1963)一书,是政治学领域中对"政治文化"研究"响当当"的代表作。[33]这本书迅速成为了经典作品,引起了不少争议,由此还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34]《公民文化》之所以被人关注,一是因为作者将高层人物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实际上对民主有害这一观点理论化,二是因为作者开创性地运用了跨国界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结果(阿尔蒙德和维巴将政治文化定义为"对于政治目标的心理定位",并且描绘了五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情况。这是在专业的民意测验专家开展的对数以百计的公民的采访的基础上进行的)。[35]人们通常认为这本书是比较政治学领域里一本客观的、与实际政治活动无关的学术论著,很少有人说这本书是研究国防安全的。[36]但仔细研究这本书,包括研究本书的内容、主要作者的背景和他的职业生涯,人们发现与其说本书是关于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研究著作,还不如说它是美国国防安全问题的指南。

很明显,《公民文化》一书的创作驱动力是赢得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国家"中人们的心,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起初,阿尔蒙德和维巴说,未来的政治文化是"参与政治的文化",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政治还不确定。正在崛起的国家面前摆着两种参与政治的现代性道路——民主的和极权的……两种道路对这些新兴国家都有吸引力,但哪一种会胜出——如果两种的混合物不出现的话——还很难说"[37]。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哪个会胜出"的问题上很难做到完全的中立。他们下结论说,在建立民主国家的过程中,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们必须明白标志的运用与教育同样重要。"如果一个新

兴国家要创建公民文化……必须要有一个标志性事件，或者有一个标志性的、有极大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或者其他在‘标志’的层面能够促成义务和团结一致的产生的因素。”虽然作者尽量不对政治给予详细的评说、建议，但是在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西方的民主战胜了苏联的极权主义，作者认为自己的观点结论或许对这种胜利有潜在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计划与当时的美国国防安全政策不谋而合，都认为在欧洲，大国力量的战略性竞争已成僵局，要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的是席卷亚洲和拉美的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非战略性”威胁。[38]

但是将阿尔蒙德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视作是国家安全的研究成果这一看法的形成，不仅是由于他与当时的外交政策制定机构持有明显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和目标，还在于阿尔蒙德本人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过。如果把《公民文化》一书与早先同样根植于美国的国际争端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研究著作相比，那么这一看法就更加有理有据了。

在《公民文化》的序言中，阿尔蒙德写道：“写一部民主政治文化研究的书的念头三十多年前就有了，灵感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部……特别是查尔斯·梅里亚姆的著作。我的研究关注的问题很多来自于他的《公民训练》系列书籍。”[39]我在第二章里说，梅里亚姆在一战时期在意大利担任美国首席宣传员，返回美国的时候，他确信“宣传”的技巧同样可以很好地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公民训练”，梅里亚姆大概喜欢用这个词。“比较公民训练”项目是梅里亚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学术工作的重心，结果就是梅里亚姆写了一系列以国家分类的专著，并在《公民的形成》(*The Making of Citizens*)(1931)一书中综合了各方面的成果。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192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开始本科学习,当时梅里亚姆的项目正在开展。10年后,当阿尔蒙德将他的博士论文交给梅里亚姆时,公民训练的专著已经绝版了,这一系列的书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记忆。阿尔蒙德最近在回忆往事时隐约提到这书的命运,说他"从芝加哥研究生毕业后,郁郁寡欢,事业未竟"。对阿尔蒙德来说,《公民文化》是他东山再起的尝试,当时的研究手法也更加先进,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梅里亚姆还为他安排了时间计划。[40]

阿尔蒙德发现,"现在我们可以把梅里亚姆研究的东西称为比较政治文化学和社会化。梅里亚姆叫它'公民训练'和'公民教育',反映了当时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者-唯意志论者的概念术语学"。[41]现在,阿尔蒙德正确地指出了它的导师的课题是研究文化和社会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自己的课题实际上是承接梅里亚姆的研究的。但这个说法掩藏了,抑或跳过了两个研究项目之间的不连续的重要特征。梅里亚姆的改革倾向是妥协主义者希望改革美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促成的,他研究国外"政治文化"的目的是想知道如何用一种开明的社会手段解决美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阿尔蒙德在20世纪50年代变成了自由民族主义者(这在当时美国知识分子中很常见),对美国生活心满意足。当梅里亚姆想方设法要借鉴国外的公民模式的时候,阿尔蒙德却宣称英美公民文化是世界其他文化的典范;当梅里亚姆千方百计要控制、驾驭国内事务时,阿尔蒙德的研究却意在将国外问题和外国民族置于美国控制之下。[4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导师认为"红色"宣传的手法很吸引人,而阿尔蒙德却力求与这种宣传方法战斗到底。不论实际上的分歧有多少,阿尔蒙德自认为《公民文化》是梅里亚姆公民训练项目的延伸,两个课题都表明了他们在国内建设中

对于文化标志的运用有极大的兴趣，两个课题还都十分关注国家安全，重视公民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心理战。

要理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研究的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就有必要了解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个导师哈罗德·拉斯韦尔。拉斯韦尔(1902—1980)是20世纪最多产、最有才气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如果拉斯韦尔庞大的学术体系中有一个统一的中心的话，那就是宣传。他是这样定义“宣传”的：“重要标志人物操控下的对集体意识的管理。”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种学说延续了50年之久。[43]

资历较浅的拉斯韦尔教授曾协助他经验丰富的同事查尔斯·梅里亚姆(也是他以前的老师)一起做公民训练的研究。拉斯韦尔发扬了梅里亚姆在宣传方面的兴趣并对技术层面的社会控制论做了孜孜以求的研究。在他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和后来的一些分析中，拉斯韦尔都认为既然在战争时期，政府要影响敌方的士气、舆论和人心所向，那么理所当然，在和平时期，政府也应该掌控自己民众的舆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宣传成为了舆论控制不可或缺的工具。“就像唧筒柄一样，它仅仅是个工具，无所谓道德不道德。”[44]宣传学家们将社会理解为“一个定义和确定意义的过程”，通过文化标志的运用，它可以重新定义有争议的政治形势，不谈成功，亦不谈失败，只说是一种新的“融合”。因此，宣传有望成为更有效更人性化的控制手段，以取代旧式的冲突、武力和压制的政治手段(“欺骗比压制带来的好处多得多”)。这不是说拉斯韦尔完全放弃使用武力，他主张“事实宣传”——避免提及能引起争斗、导致失败主义倾向的激进行为——是话语宣传和标志性人物宣传的重要补充。[45]

20世纪20年代后期，拉斯韦尔转向心理分析理论，想尝试

理解标志、符号是如何影响人的性格的，并试着控制这种影响。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1930)一书中，他介绍了“人生史”。心理分析采访的方法对这个概念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这种采访是政治学研究的资源。在政治学家们的人生史的基础上，包括从精神病医院的资料室得到的案例，拉斯韦尔下结论认为，“政治活动的动力源于人们私人癖好对于公共目标的置换”，“政治生活似乎使许多同性恋行为变得崇高起来”，“政治危机复杂化的原因是某些原始冲动同时被再激活”。为了战胜病理学，拉斯韦尔提出传统的政治学应让位于“预防政治学”，其理想境界是“通过适当减少社会的紧张来避免冲突”。达到这个理想境界的主体可以是“社会管理者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可以熟练地运用标志、符号来传导人的性格中的潜意识的力量，并导向社会目的。[46]

拉斯韦尔在《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感》(*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1935)一书中，将自己的分析研究拓展到了国际领域。他将自己的观点理论化，认为“战争和革命是解除集体不安全感的良方”。这么说是因为“领导者们有效、熟练地运用标志符号来转移、分散、化解和消除大众的不安全感”。拉斯韦尔所描述的“预防政治学”需要由“世界联合的神话”来取代分裂的、目光短浅的标志。拉斯韦尔解释道：“世界的稳定秩序的前提条件是一个标志性和实践性的普适性实体，该实体支持通过和平的途径宣传自己的精英；而该前提条件产生了很少需要运用到极致的强制垄断。”[47]

然而，拉斯韦尔认识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仍然遥远而不确定”[48]。世界仍然被分隔成主权政治单元，没有真正的全球性精英利用拉斯韦尔的技巧去控制世界的不安全感。如果他将其观念服务于某一精英，这必将是主权国家的统治精英。事实上，正

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不关心美国的不安全感，会给拉斯韦尔机会成为他想成为的宣传家兼治疗专家。

在20世纪30年代末，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人担心大量进入美国的移民对苏联以及轴心国进行宣传这一做法的敏感性，召集主流的宣传专家努力加强美国公众的意识，以便对德作战。拉斯韦尔在其理论基础上从该基金会获得了数目可观的资助。拉斯韦尔建议，美国的社会精英应系统地操纵民众情绪以保护民主免受独裁者的伤害。该项资助帮助建立了位于国会图书馆由拉斯韦尔领导的研究战时沟通的实验处。在那里，拉斯韦尔及其成员倡导定量内容分析并使用新的方法去跟踪战时政党（warring parties）所散发的宣传内容的关键言语标志的流动。[49]拉斯韦尔不久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一实验处。1941年初，他被授予“战争部战争计划处首席心理学家”的职位，为中校衔（他拒绝了）。[50]

实验处成为美国参加二战后建立的情报与心理战的重要机构。战争期间拉斯韦尔还给几家国家安全机构担任顾问，包括战略服务办公室、战争信息办公室、军队心理战分部。“为了分析所有与外国有联系的机构（的沟通情况），他还在司法部安插了一个人”。他将此人描述为与“戴斯委员会*的行政同等重要者”。该委员会是众议院反美行动委员会的前身。[51]

拉斯韦尔的实验处是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学习先进的分析与方法论研究技巧的学术培训中心，同时免除他们的爱国义务。许多受训者在战后社会科学界相继成为学术之星，其中包括社

---

* 因美国众议员马丁·戴斯（Martin Dies）而得名，成立于1937年。戴斯于1931—1945年、1953—1959年间任美国国会议员，是反美行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调查反美及颠覆活动，包括关注美国共产党联邦作家及其他新政项目的可能性。——译者注

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哲学家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及政治学家伊锡尔·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内森·莱斯(Nathan Leites)、海因茨·尤劳、卡尔·多伊奇及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52]这些学者后来继续融合学术与国家安全工作。几乎所有这些人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卷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心理及意识形态战行动。[53]例如,希尔斯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文化自由协会主要积极分子,该协会的使命是从事针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左派的国际文化战(拉斯韦尔、李普塞特、卡尔·弗里德里克及默尔·芬索德也是该协会的成员)。[54]拉斯韦尔自己也继续广泛参与了政府资助的心理战。[55]他在战后还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拥有一个学术职位。但他在华盛顿、圣莫尼卡、加利福尼亚及兰德公司的家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半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兰德公司,拉斯韦尔担任了25年多的"终身顾问"。[56]

1967年,拉斯韦尔邀请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给《世界历史中的宣传》一卷撰文。他给阿尔蒙德写信说"如果不寻求你的帮助来完成这项任务,将是不可想象的……我脑子里不断地想到你(作为撰稿人),是因为我清楚你拥有在当今世界特别行动的各领域的丰富经验;我知道你不断地对之提出不平凡的问题。"[57]所谓"特别行动"是指拉斯韦尔的暗语,那么他是如何获知阿尔蒙德在此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呢?

阿尔蒙德作为一名本科生在拉斯韦尔手下学习,并与他合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58]直到1938年离开芝加哥,拉斯韦尔一直担任阿尔蒙德的论文指导老师。阿尔蒙德的论文是关于纽约市统治精英的社会学研究。阿尔蒙德随后在其理论中加入了对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及其他富裕的纽约人生

活的心理学分析。[59]

在二战前,阿尔蒙德加入事实与数据办公室(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 OFF)。该机构成立于 1941 年 10 月,目的是与外国的宣传作斗争,宣传美国人的道德。在 1942 年中期,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并入战争信息办公室(OWI)。拉斯韦尔在这两个机构都担任有影响的顾问,因而可以观察到阿尔蒙德在心理战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60]1945 年,阿尔蒙德转至美国战略轰炸评估,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国内转移至敌人士气。该调查的目标是研究对德国轰炸的后果以将其经验应用于即将对日本的轰炸。阿尔蒙德的士气(morale)研究处承担了在纳粹被捕后德国人的即时态度这一样本调查。因此,能有机会获得调查研究的技能,这将帮助他实现将查尔斯·梅里亚姆的公民文化研究项目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这一梦想。[61]

1947 年,阿尔蒙德加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国际研究院。该院是一个美国外交政策建设的智囊辅助机构,其人员与政府机构关系密切。院里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是艾奇逊国务卿的朋友及耶鲁大学招募美国安全机构人员的最重要渠道。院主任弗雷德里克·邓恩(Frederick Dunn)因其频繁地被国务院委派出国而出名。历史学家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注意到:“尽管他们不该这么说,但(院的)学者正在为美帝国历史而工作,所有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国务院的利益。他们也从国务院得到大部分的援助。”[62]

阿尔蒙德在院里的工作也不例外,与杜鲁门政府采纳的坚强的反共产主义阵线靠得很紧。阿尔蒙德首先着手应对极右势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在西欧兴起的危险。他警告说,意大利和法国左翼政党日益增长的力量隐蔽地或公开地威胁着美国正在推进的“第三种力量”阵线的有效性。[63]与美官方政策保

持一致性在阿尔蒙德随后编辑的一本书里也是明显的，其中他倡导加速在德国的去纳粹化进程，出版了反纳粹德国抵抗的书。[64]这些建议支持了联邦德国应重新纳入反共西方阵营的观点。

《美国人及其外交政策》(*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是阿尔蒙德在耶鲁大学发表的最重要的著作。该书视美国人必须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为当然之事，是天降大任于美国人。因此他们必须抵抗“试图将所有价值从属于权力的反对者，后者主张无限制扩张，为图便利各种方法皆可用”。此书的目标是对美国人的“心理潜能”在这一抵抗中进行评估。[65]在典型的拉斯韦尔方式中，阿尔蒙德的分析将美国人分成大众与精英。

阿尔蒙德满意地报告了大众间存在的“一般心理共识”，精英间也一样。美国人通常同意他们当代外交政策的主题——“通过经济、外交、宣传，如果必要的话用军事方式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建立保护美国物质与安全利益的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秩序”。这种外交共识为国内关于自由价值及民众福利的共识所支撑。不赞同这种外交政策共识的集团是“另类”。另类名单中不仅包括共产党而且包括诸如总统委员会的华莱士的“渴望激进者”(radical appeasers)及诸如“现在建立世界政府组织”这样的“极端的国际主义者”。阿尔蒙德暗示，当它停止支持杜鲁门主义，反对强制服兵役时，即便产业组织联合会(CIO)1947年也处于另类的边缘。幸运的是，这种另类的势头在1948年随着产业组织联合会中共产主义分子遭清洗及亨利·华莱士竞选总统的失败而被遏止。[66]共识带来了安全。

然而，阿尔蒙德对美国形成和执行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的能力表示严重怀疑。这种悲观主义的原因根植于美国文化。基

于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t Mead)、杰弗里·戈尔(Geoffry Gorer)及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民族特色”研究(他们都加入到了对日本的心理战)的启发,[67]阿尔蒙德将美国大众文化描述为反理性的、充满了物质主义:“美国人倾向于为不断变化的目标而卷入无休止的竞争中。这些目标包括‘最新的’住房、‘最新潮的’旅行、‘最流行’的衣着与打扮。”因为美国大众“在私人的诉求中倾向于竭尽其情感与理性之所能”。阿尔蒙德进行了心理分析,认为他们倾向于带着无形的可塑情绪对外交政策问题作出反应,这种情绪会经常变化。注意到人类学家的洞察力会变得很主观后,阿尔蒙德通过提供更精确的数据分析工具而使他们信服。他对于民意调查的分析仅仅强化了他的观点,这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态度缺乏理性的结构和实际内容”。总之,阿尔蒙德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民众是喜怒无常和浅薄的,缺乏胜任制衡共产主义敌人任务的文化特性和“心理潜质”。[68]

阿尔蒙德发现精英只是比大众勉强更好地准备去推行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他批评这些精英只强调组织和技术而牺牲理性和长远政策计划,与民众一样存有非理性的偏见。他进一步坚决主张,“尽管精英阶层的政策思维更具有理智结构和实际内涵,但和民众思维一样也存在情绪不稳、将政治现实简单化的倾向”。即便专业的外交机构也受害于“目光狭隘的……智力”,并“模糊地理解宣传对外交政策的关系”。[69]

阿尔蒙德在书中得出结论,对“那些外交政策领域公共信息项目的形成和执行负责任的人”提供了建议。他反对向民众提供关于外交政策的详细信息,因为所有民众只关心“情绪反应的信号(*cues*)……不去听讨论的内容而是听声调”。更有效政策的关键在于“扩大关注的公众(attentive public)[一个比民

众(mass public)小得多的阶层]并培训精英骨干”,以给民众暗示,去保留共识,缓和民众的情绪波动。谁将在反共民意的大合唱中培训精英呢?

> 高等教育机构——及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具有不能被充分强调的潜在功能。有礼貌的公众……很大程度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众。政治、利益与社交精英主要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正是大学里的社会科学,使得民主的意识形态共识能够得以塑造,民主的精英纪律受到鼓励。

阿尔蒙德补充说,社会科学理论通过发展“一种在不同精英成员中的共同语言”[70]而能促进一个更加理性的政策决策过程。总之,社会科学对于推行美国外交政策的心理文化沉淀而言是最有希望的预防法。

在《美国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前言中,阿尔蒙德承认“要永远感谢哈罗德·拉斯韦尔引导美国政治学家在社会—心理学内涵下考察政治行为问题”。这一承认,尽管很慷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轻描淡写的,因为书中超越了按拉斯韦尔式只是“设立问题”的流行式。事实上,在阿尔蒙德的书中清楚阐明的看法和他的导师的社会看法之间存在实质性类似之处。两者描绘的理想世界都包含芸芸众生,这些人情愿受控于某一精英,而这样的精英是在社会科学家和宣传家所特意安排的“提示音”和“符号”中训练出来的。《美国人及其外交政策》基本上充实了十年前就已耳熟能详的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拉斯韦尔理论,即美国社会的精英应系统地掌握大众的情绪以保护民主免受其专制敌人的危害。

1951 年,阿尔蒙德及国际研究院的其他领导者从纽黑文移至普林斯顿,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国际研究中心。曾短暂担任国务院顾问的弗雷德里克·邓恩在中心成立初期担任主任一职。

邓恩的继任者,政治经济学家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由于长期效力于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部而被政府授予国家智力杰出贡献奖章。[71]

该中心与当时重要的外交政策关注点密切相关。阿尔蒙德在普林斯顿所做的第一项主要研究——《共产主义诉求》(*The Appeals of Communism*)一书的基调和实质,是向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讲述对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力量的持续担心,拖延(如减少)了对"美国和英国对小的背离运动"的影响的关注。例如,通过考察"为什么人们加入又离开共产主义运动",阿尔蒙德试图"增加我们对自由世界对共产党渗透脆弱性的理解",并帮助推动背叛共产党活动。阿尔蒙德的研究方法是拉斯韦尔式的:对共产主义出版物内容的分析,对共产主义背离者的访谈,对"视共产主义者为病人的一群美国心理学家的访谈。这些分析提供给我们35个客观的共产主义者历史的临床案例"。阿尔蒙德发现共产党的中产阶级成员,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包括"有心理问题和困难的大部分人,他们试图通过加入共产党解决这些问题"。然而,

> 这种在美国与英国以前党员间明显的过敏性影响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中产阶级的神经都对共产主义过敏。的确存在情绪化的问题,中产阶级习惯于通过或多或少的知识理性化复杂模式处理问题、冲突及情绪化的困难,并被迫以道德辞令去证实怨恨,比那些诸如直接表达怨恨,或通过心理上的麻醉,例如酗酒或性乱伦的人更敏感。这一再表明,我们的美英中产阶级材料揭示了这种知识化模式是一种应对异化和失控的感情与冲动的手段。[72]

阿尔蒙德使用心理学案例历史明显修复了拉斯韦尔在《心理学和政治学》中的精神疗法记录。但是拉斯韦尔在冷战前很

早写的东西将神经病及失调归因于所有派别的政治家。阿尔蒙德则把这些原因保留给了共产主义分子。

阿尔蒙德发现法国、意大利工人与农民的共产主义诉求更多地受贫穷和失业这些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所驱使而非神经质。他的政策结论相应地也别具一格。在美国,共产主义影响已经很边缘化。阿尔蒙德警告道,抹黑、骚扰、谴责以前的共产主义分子只能适得其反。相反,要原谅政党缺点及其前组织的过失,重新将其整合进美国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在法国和意大利,美国政策没能真正削弱共产党。它仍继续破坏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从而满足了苏联的政策目标。阿尔蒙德倡导一项大胆的美国运动——由美国贸易工会而非直接由美国政府推行——去支持非共产党左翼运动,以从共产党中策反民众的支持。这种运动通过好斗的工人阶级精英、致力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反共分子,要求建立"联系(应解读为宣传)和组织化网络。这样的精英将与聪明而顽强的敌人进行无数次激战,拥有不竭的耐心和努力这样的美德,一个个挣脱共产主义的控制,将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带到西方"[73]。

阿尔蒙德并不期待出版他的书以推行他的政策建议。美国心理战略部有一份阿尔蒙德 1952 年 4 月 16 日的备忘录,其中他敦促战略部去"监测这一研究……并从战略部的观点去估价我们在普林斯顿所做的工作"。由杜鲁门总统创建的这一战略部被指令在整个世界努力协调美国的心理与意识形态战。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其存在。和哈德利·坎特利尔(Hadley Cantril)、克莱德·克拉克洪、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哈罗德·拉斯韦尔及其弟子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莫里斯·贾诺威茨一道,阿尔蒙德被任命为编外顾问。[74]

根据已出版的传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阿尔蒙德频繁地在政府(或半政府)机构任职。先后在空军大学(1948)、国务院(1950)、海军研究部(1951)、兰德公司(1954—1955)担任顾问,1960—1961年是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委员。[75]这些名单是不完整的,传记材料并没有提及他在心理战略部的工作,也没有提及随后(1958—1961)成为一个秘密的"对非传统武器态度的工作委员会"成员,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伊锡尔·普尔及名扬四海的美国空军战略空中指挥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将军均是该委员会成员。社会科学家在委员会中关注,正如阿尔蒙德战时战略轰炸评估的部门所关注的一样,公民道德问题是社会科学家期望找到办法使在第三世界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的目标群众的不幸反应最小化。使用大规模的作物摧毁力量会造成普遍的饥馑,这是被递交给委员会的方案之一。[76]这样看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忙于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同时,正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取得领导地位。

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心理的学术研究及其国家安全背景两者之间的联系在那些资助他研究的人们和机构中也是明显的。《共产主义诉求》、《公民文化》的写作资助来自于卡内基集团(阿尔蒙德在前言中承认了这一点)。该集团领导人在20世纪40及50年代与国家安全机构密切合作;阿尔蒙德的资助人、卡内基高层人员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是在二战期间的心理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其后,在履行其卡内基集团义务的同时,加德纳在国防部第一委员会就科学的心理战方面担任顾问。[77]《共产主义诉求》中对外国共产主义分子的采访及《公民文化》的大规模外国调查研究都是由阿尔蒙德的朋友埃尔莫·威尔逊(Elmo Wilson)进行的。威尔逊领导了战争信息办公室的

调查处、阿尔蒙德战争期间的雇员，并建立了主要由美国政府机构雇用而维系生计的国际调查组织。威尔逊还是心理战略部的顾问，并且是政府发起的秘密项目的积极参与者。[78]最后，给予阿尔蒙德研究及/或手稿建议的大多数的同事（阿尔蒙德承认的）都是主动参与的，一些还非常深入地参与了心理战或情报工作。[79]总之，阿尔蒙德看来已成为在二战的情报和宣传机构中塑造起来的社会科学家、民意调查人、基金会管理人员中的一员，受到冷战期间从事意识形态与心理战的人员的不断支持。

在这种情形下，《公民文化》，更一般地说，此书提出的“政治文化”经典视角，可视作致力于赢得并控制民心的登峰造极之作。它记录了政治学学说与国家安全政治学之间相互掩饰和资助的轨迹。这一轨迹由一战期间的公民道德问题开始，通过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及 30 年代的“公民培训”及“宣传”，以及二战期间及冷战初期重新关注道德宣传，最后关注赢得新兴国家民心的问题。尽管政治文化的视角在今天仍基本上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学理论内在驱动力的过时的里程碑，但其支持者实际上部分将其提升至这种高度，即此概念有望“产生对有意改变某一政治文化以适应国家发展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更多理解”。正如艾伦·赫姆（Allen Herm）注意到的，“部分是由于其提供的在第三世界推动政治变革的蓝图”——而这正是多数美国外交与军事政策所首要关注的——因此，政治文化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成为一种支配性视角。[80]

白鲁恂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哈罗德·拉斯韦尔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培育了一批国防问题专家，其学生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也有同样的建树。在 20 世

纪50年代早期,阿尔蒙德已奠定了他在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并开始吸引一批有天赋的学生,他们中有一些成为了在政治文化领域的领头学者,其中包括:悉尼·维巴(Sidney Verba)、迈伦·韦纳(Myron Weiner)和白鲁恂(Lucian Pye)。白鲁恂在1951年完成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加入普林斯顿政治庇护团(institute's defector),是那种相对少见的不受"谁失掉了中国"政治迫害(witch hunt)污染的中国问题专家。1953年,在一份福特基金会文件中,他被提名为马来亚游击队研究的合适人选,这项研究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并由中央情报局局长阿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紧密协调的系列研究之一。[81]

在阿尔蒙德的密切指导下,白鲁恂在普林斯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完成了《马来亚的共产党游击队》(*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一书。白鲁恂在马来亚呆了六个月,其间他得到了英国殖民官的亲密协作。[82]该书主要描绘了殖民当局是如何赞许有加地为英国"反叛乱政策"(counterinsurgency)辩护的,以便使英国可以继续畅通无阻地开采马来亚的原材料。[83]

在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上,白鲁恂的书和阿尔蒙德的如出一辙。其视角扩及亚洲,对共产主义魅力作了深入的调查,并采用了拉斯韦尔-阿尔蒙德惯用的采集共产党人的"人生史"(life history)的方法,白鲁恂的书里,主要描绘了那些投降英国警察的共产党人。白鲁恂也赞同阿尔蒙德的观点——共产党人是为了它自身的原因而镇压暴力的,他们已"不为强烈的道德标准和高雅的礼节所束缚了"[84]。

阿尔蒙德曾说过,在美国,共产主义对那些神经质的知识分子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在意大利和法国,穷人和失业者比较拥戴它。在亚洲,白鲁恂认为,共产主义的繁荣是建立在不安全感以及民众不遗余力地争相成为现代世界一部分的焦灼迷茫上的。

白鲁恂认为那些他所采访过的共产主义叛变者(communist defector)是用直觉在思考,而非理性,他们对事务的因果关系缺少连贯且清晰的概念。在摆脱了传统社会习俗的束缚后,他们"缺少一定的标准以引导他们在这个未知世界中继续前进……正如那些深陷于文化同质化过程中的人们那样,他们更注重行为的形式、风格和过程,而非结果"。共产主义正需要这样的人,因为"共产主义只有在这样的人群的支持下才能繁荣:他们热衷于事务的过程,却缺少评判事务结果的标准"。白鲁恂认为,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抵制亚洲的共产主义威胁,除非同时进行"政治发展"。其中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亚洲民众的不安全感另外提供一条有组织的、非共产主义的出路,在那些(经济上)受惠的人群中塑造更强的集体社群意识。[85]

白鲁恂对马来亚共产党的研究标志了针对共产主义的心理战已从劝说和宣传逐步扩延到"发展"阶段。走在这个潮流前沿的是一群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IS)的武士般的学者们,白鲁恂也在 1956 年加入该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随后开始了一个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名为 TROY 的顶级秘密研究项目,其主要任务是向国会建议如何使美国的宣传有效地穿透共产主义的铁幕(Iron Curtain)。该项目的终结报告于 1951 年 2 月正式递交给国务卿,它强调了高度粘合美国高等院校、美国外交政策与情报部门三者间关系的重要性。报告的附件还指出国家应资助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以便协助政府展开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便是第一家这样的研究中心。它由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出资建立,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经济学家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亲自出任了中心第一届主任。鉴于研究任务的保密性,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大门一直由

带着武器的门卫把守，出入皆需证件。[86]

当1965年麻省理工学院正式建立政治学系时，其教职人员大多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事实上，在国防部的密切协助下，这群政治学家很快便成绩显赫，他们的政治学系在建立后不久便进入了学科前十名。[87]使该系声名鹊起的主要原因是其在数字计算模拟领域前沿作出的开拓性贡献，他们的研究方法又为政治学的科学性作了进一步的包装。

在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后，白鲁恂依旧致力于国防研究，并在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文化领域逐渐荣升为顶级学者（他于1988—1989年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在1961年于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内部战争”研讨会上，白鲁恂提交了一篇名为《起义的根源与叛乱的开始》的论文。与会的其他政治学家有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卡尔·多伊奇、拉斯韦尔、阿尔蒙德、维巴、李普塞特。据埃伦·赫尔曼（Ellen Herman）的观察，尽管此次大会在表面上显得极具理论性，但它其实根本没有远离现实的军事事务。会议的组织者哈里·埃克斯坦在向史密森学会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提交报告的几个月后，便因为向国防部提交军事行为研究策略，而遭到指控。[88]

差不多同时，埃克斯坦和白鲁恂正在为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el Research，ONR）准备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伊锡尔·普尔负责编辑，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为社会科学家提供合作协议，以便支持他们在“反叛乱”领域进行研究。关于反叛乱，白鲁恂曾在报告中指出：“这是一项较其他军事策略研究而言更容易出成就的（研究领域）。无需置疑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是一块制高地，它将为国内安全力量的设计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89]这种对于社会科学的战时潜力（war potential of social science）的高度自信在20世纪60年代并不少见，尤其在剑桥、

麻省理工区域。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的第一届主席普尔曾写道,“如果你觉得美国政府似乎并不能真正理解越南村民、多米尼加学生或是苏维埃作家”,那么“你应该强烈要求中央情报局雇用我们这些最好的社会科学家”。[90]国际关系的顶级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曾回忆到,在1964年的哈佛-麻省理工军控会议上,一位发言人曾宣称美国之所以取得了越战的胜利,是因为“我们有社会科学家而他们却没有”。[91]

肯尼迪政府遂采取了海军研究办公室报告中的建议,将“反叛乱”研究的大量经费都转拨给了社科研究所和咨询机构,白鲁恂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同事都是受惠者。白鲁恂在国务院教授“反叛乱”理论,同时为国际发展局进谏,正如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曾提到:“白鲁恂常为政府作针对亚洲的心理战的咨询。”[92]至少其中一次咨询任务将白鲁恂带到了越南,在那里他将其对马来亚共产主义叛变者的经验应用于“Chieu Hoi”项目,Chieu Hoi是一个鼓励越共人士反叛的大型心理战项目。[93]除此之外,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普尔和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发展的理论不断为中央情报局所用,包括设计屡遭质疑的凤凰计划,该项计划旨在解决是通过劝说还是数以千计的立即清洗方案来平衡越共的军队构成。[94]

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伊锡尔·普尔是一位“校园领袖和充满热情的托洛茨基者(Trotskyite)”。他求教于拉斯韦尔,二战期间在拉斯韦尔所在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室工作。这项战时的合作开启了他与国防机构紧密持久关系的第一章。在冷战期间,他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武器评估组(the Weapon Evaluation Group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国防部工程组以及欧洲自由电台都做过咨询工作。最后,普尔企图通过建立集权社

会传播计算模型来预测苏维埃听众的数量(这个项目遂被任命为 COMCOM 工程)。[95]

在 1966 年至 1968 年间,普尔作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的主要协议者在越南进行"反叛乱"的实地调查。他通过 Simulmatics 公司进行研究,这是一家于 1959 年创办的私人公司,当年作为共同创办人的普尔给肯尼迪竞选班底提供了可模拟投票者行为的计算模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与 Simulmatics 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研究性任务的合同,其中包括 Chieu Hoi 项目及对于平定郊区动乱和城区叛变的研究。为了完成这一系列的任务,Simulmatics 公司雇用了一些初级研究员,全职进行田野调查,此外还聘请了一批高级学者去越南进行短期研究性访问。[96]其中一位学者——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惠特克(James Whittaker),近期还描述了他是如何在 1966 年的夏天同普尔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一同飞抵越南,在那里他们被授予了模拟军衔,随后美国空军将他们送抵分布于越南境内的各个 Chieu Hoi 中心。除了评估 Chieu Hoi 中心的研究绩效外,惠特克还对在越南国内展开的战略性心理战进行了回顾。他还记得当他们一行返回美国后,5 个研究生还在越南继续呆了 6 个月,对越共的叛变者进行了"深度采访"。[97]

惠特克的描述暗示,Simulmatics 协议实则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源,抑或同时为研究生提供了工作机会。比如,由普尔指导的保罗·伯曼(Paul Berman)的论文,基本就是建立在对共产党叛变者的采访记录上的。[98]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普尔的另一个学生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身上。来自威斯康星北部的波普金是作为本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他回忆说,正是那颗苏联人造卫星才使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对于像有着他这样背景的年轻人而言,这样的选择

是非同寻常的。在他的记忆里,当时整个校园都弥漫着强硬的冷战气氛。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一位著名研究员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一本名为《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的书曾在校园里风靡一时。这位当初快要进入肯尼迪班底的政治学家曾在一堂人文课上说,苏联的学者们正在他们的图书馆苦读,思虑如何平定即将在民族诞生过程中爆发的动乱;我们应该竭力使用图书馆,罗斯托督促学生说,这样才能知道如何在争取自由的战役中捕获第三世界人民的心。

1965 年,当波普金还是一个研究生时,曾去纽约为 Simulmatics 做一个扶贫项目。作为一个民调专家,波普金当初对越南一无所知,但在 Simulmatics 接到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的合同后,他仍然决定前往,部分是因为合同提供了一份实地勘探的经验。波普金在越南乡间度过了一年,主要从事平定村庄暴乱的工作。他指导了一批越南学生采访村民与南越的国民自卫队,以评估当地民兵队伍的绩效。[99]

波普金对美国在越南当地大范围使用武力的程度感到震惊,他大失所望地发现,美军竟为了报复个人恶行而大举铲除了全村的人。他对越共所采用的斯大林式的行径也大惊失色。他个人的所见所闻使他开始批判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尽管他没有变成激进分子,也没有像其他激进分子那样转而支持胡志明政权。他于 1969 年针对越南乡村政治,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1971 年,当波普金在哈佛大学任教并着手准备出版论文时,他被联邦高级法院传讯,要求就非法散布五角大楼文件一案作证。作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朋友的波普金,拒绝承认任何有关五角大楼研究非法外传的事项,并拒绝给出他在研究中曾采访过的美国官员的名单。他于 1972 年 11 月因藐视法庭而被捕入狱,他的照片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由于哈

佛大学法学院对最高法院的“大举抗议”，波普金于14天后出狱。他迁往西部，重振其事业，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建立了政治学系，不久使该系晋升学科前列。[100]

波普金的一本重要的书《理性的农民》(*The Rational Peasant*)(1979年)主要建立在图书馆资料上，他因最高法院的指控，而不能在书中引用他在田野工作时的笔记。[101]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首次采用了“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方法。波普金认为亚洲农民是精明的，在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时并不示弱于他们西方的同行。在采取了这个理论框架后，他坚决反对渗有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学研究范式，虽然后者曾引领比较政府研究，比如白鲁恂曾断言马来亚的游击队一点都不理性。自从波普金出版了此书后，理性选择范式成了比较政治研究及当今整个政治学研究中的主导范式。在今天，正如一切正统信仰不可避免的遭遇一样，波普金的批判者认为他的理论使传统理论规范无效。[102]

在越南政治冲突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者不光扮演了公务员的角色，更是战争的支持者。1965年7月，普尔、白鲁恂、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威廉·格利菲思(William Griffith，他曾在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欧洲自由电台担任政治顾问，后于1959年转入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他们曾共同致信《纽约时报》的编辑，强烈支持约翰逊总统的开战主张。他们说：“史学家可能认为1965年是美国外交政策极富创造性的一年。美国所采取的行动传达了这样的声音：我们会反抗共产党秘密的侵略和公开的进攻。”白宫的一位助理曾告诉约翰逊说这封信是由几位“极富声望的人”写的，他们“坚决支持您的立场”。几天后，林肯·布卢姆菲尔德(Lincoln Bloomfield)从伦敦致信《纽约时报》，表示全力支持他同事

的态度。从国务院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卢姆菲尔德,批评“那些从学术圈传来的指责政府打击越南的声音,因为那些学者们似乎从未想起,也从未真正关心过那些针对南越而展开的野蛮、无情的屠杀阴谋”[103]。

麻省理工学院那些政治学家直率而顽固的主战立场成了校园里反战运动的攻击对象。1969 年 10 月,150 位学生安静地游行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大楼,要求当局立即停止普尔的 COMCOM 项目和另外两个心理战工程:由格利菲思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以及旨在发展计算机科技进行外部区域研究的剑桥工程。几天后,普尔、白鲁恂、格利菲思和米利肯被游行队伍的模拟法庭审问,并被定以“反人道主义”的罪名。普尔在 1971 年给拉斯韦尔的信中曾暗指此事,他写道:“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年中,我的血都快流干了。若你能来剑桥就打电话给我,我给你详述。”[104]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的强硬立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美国政治学者对于越战的态度呢?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政治学者于 1965 年后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反战,有一些甚至在越南进入美国人意识之前就提出了反战口号。芝加哥大学的汉斯·摩根索是其中最早、最尖锐亦最持久的反战者。(汉斯·摩根索作为一位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他那一代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却从未入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团,此事对该学会而言是一个不光彩的记录。)当 1963 年哈佛大学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公开发表他的反战宣言时,他声称自己已变成了一个“有待成熟的反战分子”。由康奈尔大学亚洲专家乔治·卡欣(George Kahin)和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撰写的《美国在越南》(*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书,它使美国学术圈逐渐转向了反战立场。[105]1968 年,摩

根索、霍夫曼、卡欣和阿尔蒙德(当时正为外交政策制定部门工作)都加入了麦卡锡外交事务智囊团,当时的麦卡锡是持反战立场的候选人,他输掉了当年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他们与布热津斯基、亨廷顿与其他学者一同站在休伯特·汉弗莱一边。[106]

尽管这些人和其他反战者的反战声音高涨,在专业方面,尤其在高层人事机构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者的观点并没有被边缘化。比较而言,政治学者相对其他美国知识分子更加支持政府决策。有三个证据,尽管不能完全证明,却也至少支持这个论点。第一个证据是在1965年7月由"全国支持政府政策的著名学者"签署的一封信,正如白宫总统备忘录上所记载的。"我要想法儿找些捐助人,"回忆录上写道,"他们必须愿意赞助刊登这份声明的报纸广告……这将充分显示学术界并没有被汉斯·摩根索的声音压倒。"这份声明由唐纳德·赫茨伯格(Donald Herzberg)起草,他当时是罗格斯大学伊格尔顿(Eagleton)政治研究中心的主席,还是美国政治学会创立时的重要成员(将在下文论述)。签名的67人中大部分都是政治学家,其中包括:白鲁恂、李普塞特、亨廷顿、默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琼·柯克帕特里克、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马丁·戴蒙德(Martin Diamond)和卡尔·塞尔尼(Karl Cerny)。[107]

第二个证明美国政治学者强硬的鹰派立场的是汉斯·摩根索发表于1966年11月的一篇论文:《真理与权力》。摩根索写道:"知识分子界中的大部分变得沉默而腐朽。对于那些职业立场与政府的行径相挂钩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比如,只要查一下反越战的学者名单,你就会为政治学者的数量之少而感到震惊。"摩根索继续对那些以"非同寻常的武力打击他们持不同政见的同事"的知识分子进行抨击,这些知识分子们"背着公众,暗暗为政府兼职工作"。摩根索继续说道,那些在政府协议

赞助的研究中心所产生的学术,“不过是对帮派立场的意识形态性维护,是知识阶层为权力上的光亮剂,却还都以客观真理的面貌示人”[108]。

摩根索的言论被一项由社会学家查尔斯·卡杜辛(Charles Kadushin)在1970年就美国知识精英阶层做的报告所证实。卡杜辛针对那时的棘手问题,抽样采访了110个知识分子,其中有学术圈里的,亦有学术圈之外的。他发现其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要么自始至终都反战,要么在20世纪60年代转至反战的阵营;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从未动摇自己支持战争的信念。对于后一部分人,卡杜辛观察后指出,“那些支持政府立场的主战分子都是政治学或公法学学者。其中大部分人都与政府保持官方联系”。当然尽管在卡杜辛的抽样里也有一些反战阵营中的政治学学者(他对采访人的姓名保密),不过支持政府越南政策的主战人士几乎全都集中在政治学者中,这一点不禁令人震惊。卡杜辛的研究构成了第三个证据:即使没有充分证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者的强硬的鹰派姿态代表了该领域高层的态度,并且在越南问题上,政治学者较其他知识分子而言,更容易持有鹰派主张。[109]

在第一章中,我曾写道,经政治学发展理论家哈里·埃克斯坦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启发创建的政治数据库(polity data set),“借用安东尼·葛兰西的话来讲,是一种将美德关系历史进程的轨迹不折不扣地移入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一项机制”。当冷战政治代替了美德关系后,这项发现也同样适用于由政府支持、在麻省理工学院研制的一系列数据分析模型。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者并没有掩饰他们的政府关系背景;事实上他们为自己能够效忠国家而备感自豪。不过现在的政治学研究者很少意识到,他们所应用的数据库、分析方法以及其所在的研究院大

都根植于冷战的政治环境中。

艾弗隆·柯克帕特里克的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学会

尽管艾弗隆·柯克帕特里克(Evron Kirkpatrick)没有发表什么特别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论文,不过作为美国政治学会执行主席的他,凭借其超凡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技巧成为了一名重要的政治学家。在他任职的27年(1954—1981)里,学会的会员量翻了倍,年会的章程重新被修订,且学会吸引了大量基金会的捐赠以赞助诸如当时十分流行的"国会奖学金"(Congressional Fellowship)项目。在马克斯·坎普尔曼(Max Kampelman)的帮助下,作为财务主管和主席的柯克帕特里克很快便将学会变成了华盛顿最富生机的专业学会之一。[110]

就柯克帕特里克的朋友和继任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观察,柯克帕特里克希望能用"科学的态度处理人类政治行径的理论和论据"。柯克帕特里克在把政治学囊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社科项目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是海军研究办公室扩展的产物。通过确保国家选举研究项目的经费以及支持高等院校间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发展,柯克帕特里克加强了政治学科学性研究的制度结构。尽管他的职位使其不能在理论争辩中有过分的偏袒意见,但私底下柯克帕特里克比较倾向于政治学的行为学转向。通过他在背后的支持,行为学家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接替了传统派学者哈韦·曼斯菲尔德(Havey Mansfield)成为了《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的主编;之后该刊物开始了其科学性的使命。[111]

尽管柯克帕特里克旨在把政治学塑造成一种客观中立的政治科学，他仍旧在三个互联的层面参与政治活动，它们分别是：美国政治学会，汉弗莱那一派的共和党以及心理冷战。

柯克帕特里克于 1939 年获得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在 1935 年作为讲师加入明尼苏达大学，并在 1948 年被提升为教授。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柯克帕特里克在明尼苏达大学被认为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随后他离开了激进运动，开始支持他的学生休伯特·汉弗莱创办明尼苏达大学的民主农工党。[112]

在二战结束后，柯克帕特里克的职业重心转向了华盛顿，虽然他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明尼苏达大学。1945 年，他成为了战略事务办公室研究分析中心的主席助理。当战略事务办公室在 1945 年末解散后，其研究中心的成员都转入了国务院。柯克帕特里克随即在国务院的情报部门呆了 8 年。起初，他是研究主任助理和情报研究项目控制官员，在 1948 年至 1952 年，他担任编外研究人员的主任，又在 1952 年至 1954 年担任心理情报研究组主任。1954 年，柯克帕特里克升任为国务院情报研究组副主任。他随后又从该职位转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113]

柯克帕特里克在国务院时的一项任务是精心策划以学术名义进行的政治宣传。他作为这个项目的中坚力量，秘密地召集了一些被流放的东欧学者，包括一些纳粹同谋者，表面上建立了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实则逐步形成了一条反苏战线。他也同意将自己的姓名和学术成果印刷在一些反宣传的书籍上，这些书表面上是由私人机构出版，实则都是由国务院的研究员执笔的。其中一位在柯克帕特里克手下工作的研究员，政治学家琼·乔丹(Jeane Jordan)后来成为他的妻子。[114]

学会的政治

柯克帕特里克可能会满意他死后获得的褒奖:他使(政治学会)“避免了政党化倾向”[115]。不过使政治色彩退出一个组织,这本身很难说是政治中立,因为这项主张是为该组织既存的领导层的利益服务的。相比那些任期有限的学会主席及委员会成员,学会的执行主席的任期是无限的。在其漫长的任职期间,柯克帕特里克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无视于其会员建议的权力结构,尽管他自己会否认这一点。

艾伦·沃尔夫对美国政治学会的政治结构有着尖锐的批评,他于1969年指出,“美国政治学会的选举过程和阿拉巴马州或苏维埃政权类似”。选举委员会受到学会条例的限制,以至于每次只能为竞选班底推选一名候选人,在1958年至1967年间的149人次提名中(主要指主席、副主席、委员会的候选人),没有一位候选人在事务性年会上遭到异议。这种事务性年会通常简短且出席人数较少,与其说它是决策性会议,不如称其只是一项具有批准提案功能的聚会。由于缺少实质性的选举参与过程,学会被一个“寡头政治团体”所控,他们通过分发一些足以促使受益者职业发展的奖项,诸如国会奖学金和会员卡,来巩固他们自身在学会的地位和威望。[116]

沃尔夫对这种状况作了机智的分析,他认为,这正是当时前沿学者的理论中所暗示的完美政治系统的实现。通过对阿尔蒙德、埃克斯坦、奥斯汀·兰尼和爱德华·班菲尔德理论的分析,沃尔夫写道:

> 在这种政治学的语境下,美国政治学会内部所面临的困顿纠纷也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这是一群具有寡头政治倾向的利益团体,不过对私人组织而言,这是不可避免的,

它同时也会使组内斗争变得更有效。学会的参选率很低，充盈着一种普遍的冷漠情绪，不过太多的群众活动都会破坏政治系统的纤巧的稳定，这样想来，这可能是它最好的地方。权力结构必须存在，但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选举的内涵趋于空洞，但这并不正确，因为选举的目的只是亚于选举人民。选举能够十分有效地说明政治走势。美国政治学会的整体气氛是反政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是幸运的，因为任何政治纷争都是聪明人应该避免的。由惟一的一项调查显示，学会的会员极端疏离其领导层，不过他们只是在表达他们对集权政治的好感。一个更加细致的调查将显示他们其实对现状十分满意。

沃尔夫的调查显示，受访者中，“大部分的政治学者都觉察到了这一机制的存在，这至少对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产生了重大影响”[117]。

在柯克帕特里克领导下的学会受狭隘的政治结构的控制这一说法后来也得到了戴维·伊斯顿的回忆录的证实。伊斯顿是行为科学运动的奠基人，他在越战期间对学会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深表同情。[118]在伊斯顿担任副主席（1967—1968）和主席（1968—1969）期间，他得以细致监督学会内部的运作。在伊斯顿出席的一次高层会议中，柯克帕特里克曾就其退休经费不足而抱怨，他随即离开了房间并请其私人律师出面解决。后来学会法律顾问团的马克斯·坎普尔曼进屋了，他提议美国政治学会为柯克帕特里克提供一次性退休补助。尽管学会中存在着明显的利益斗争，但组委会立刻就审批了这笔为数可观的经费，并且此事从未在随后的事务会议中被正式提及。

伊斯顿发现，柯克帕特里克习惯性地偏好那些他主观上觉

得做得对的学者,并极力支持他们。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在他周围形成了一圈“敬重他的小团体,而这群人同时又是柯克帕特里克在其事业发展过程中得以依赖的对象”。因此柯克帕特里克便成为了:

> 一个在圈内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我们这些具有行为学倾向的学者很快便意识到柯克帕特里克对我们的认同。在工作日程及学会项目的重塑上,柯克帕特里克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他积极确保了研究人员在项目组中的权力,使他们得以顺利加入工作。结果美国政治学会的编审权落入了一批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更具认同感的人手里。

柯克帕特里克的内部团体大多有行为学研究走向,其中包括杰克·佩尔特森(Jack Peltason)、理查德·斯卡蒙(Richard Scammon)、霍华德·彭尼曼(Howard Penniman)、马克斯·坎普尔曼、卡尔·塞尔尼、海因茨·尤劳、哈罗德·拉斯韦尔、唐纳德·赫茨伯格、沃伦·米勒(Warren Miller)、奥斯汀·兰尼和琼·柯克帕特里克。柯克帕特里克的家是他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尤劳最近指出:“沃伦·米勒和我以及我们的朋友诸如奥斯汀·兰尼和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年在柯克帕特里克于毕士大(Bethesda)的家中,共度的美好时光还历历在目。鸡尾酒会的时间被延长了,因为琼实在是一个完美的厨师和聊天的伙伴。”拉斯韦尔的文章里也经常提及这些奢逸的聚会。[119]

最近,在组内成员的一张讣告中指出,美国政治学会内部团体曾与那些代表反文化主张——企图在20世纪60年代使职业政治化的激进势力——相“抗衡”,那股反文化势力试图摧毁霍华德·彭尼曼十分热爱且勤力效忠的自由民主制度。(讣告上列举了彭尼曼曾经效力过的地方,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美国新闻总署以及心理战略协会。)这种和政府机构有密切

联系的事实与学会内部团体对于政治学价值中立的立场相左，对于这番冲撞，学会的成员却很少花时间反思。[120]

美国政治学会同休伯特·汉弗莱的特殊关系

柯克帕特里克有效地促进了政治学同美国国会的关系。他明白，正如伊斯顿所观察的那样，那些初出茅庐的立法者们“就像任何人一样。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常常感到孤独。所以（柯克帕特里克）主动去看望他们……他不但为他自己，也在整体上为他的学科，结交了很多好友”。柯克帕特里克所建立起的这些关系在说服国会将政治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管辖中起了促进作用，并且帮助维持了“国会奖学金计划”，而专业核心期刊中的大多数国会研究论文都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所发表的。[121]

柯克帕特里克同国会山的联系是超越党派界限的，学会的国会贡献奖（Congressional Service Awards）也同样授予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立法者。但仍然有一位参议员与美国政治学会保持了一种比其他立法机关成员更加亲密的关系，他就是明尼苏达州的休伯特·汉弗莱，民主党自由主义反共阵营的领袖。

这层关系始于明尼苏达大学。在那里，柯克帕特里克同他最喜欢的学生汉弗莱建立起了亲密而持久的友谊。柯克帕特里克为汉弗莱安排了一笔奖学金，使之能在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的查尔斯·海尼曼（Charles Hyneman）门下学习政治学的硕士课程。他还在1943—1945年间，汉弗莱在麦卡莱斯特学院任教时给予其帮助。在柯克帕特里克的指点下，汉弗莱在1943年到1945年的选举中获胜，成为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在那段时期，汉弗莱同许多麦卡莱斯特学院的政治学者成为了朋友，并且定期地同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交往，这

些人中包括赫伯特·麦克洛斯基(Herbert McCloskey,一个前托洛茨基主义者)、霍华德·彭尼曼、阿瑟·纳夫塔林(他在自己成功竞选市长之前为汉弗莱市长工作)和马克斯·坎普尔曼。[122]

出生于纽约的坎普尔曼(生于1920年)是社会主义领导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朋友。1942年,他获得了谨慎反对派的位置(a conscientious objector status)。他作为明尼苏达大学人类饥饿试验的实验对象,被政府派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在实验过程中,他拿到了法律学位,并开始从事政治学的博士研究。他由柯克帕特里克指导的论文批判地阐述了关于共产主义者试图控制产业组织联合会的问题。这篇论文的反共主题并非偶然,因为诺曼·托马斯的同情者对于斯大林的憎恶感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中的反斯大林主义者才能比得上。反斯大林主义恰恰是将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柯克帕特里克、社会民主主义者坎普尔曼和自由主义者汉弗莱联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基础。正如坎普尔曼在他的自传中所写的,在明尼苏达的政治学者的社交聚会中讨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怎样控制并加强由柯克帕特里克、汉弗莱、纳夫塔林和他们的同盟者在1944年组建起来的民主农工党(the Democratic-Farmer-Labor Party)。击败共产主义者和消灭他们的影响成为了我们的目标、热情和乐趣所在"。1947年到1948年间,当汉弗莱和他的政治学同行们将共产主义者从该党的领导层中驱逐出去时,他们的目标达到了。[123]

1948年,在汉弗莱当选参议员时,坎普尔曼跟着他来到了华盛顿,担任他的立法顾问直至1955年(之后他开始从事私人法律业务,同时任职于美国政治学会直到1968年)。汉弗莱1943年加入美国政治学会。在那几年中,他定期参加政治学领域的全国会议(profession's national conventions),并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研讨会。柯克帕特里克被选上执行主席这件事,给汉

弗莱带来了“内心的快感”(inner pleasure),并将汉弗莱与美国政治学会的关系引向了一种他所描述的“亲密关系”。“当休伯特在1955年成为了美国政治学会的副主席时,他就像是竞选到了国家公职(national office)一样高兴。”汉弗莱在1959年接受了国会杰出贡献奖(the Congressional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继续参加一年一度的会议,并活跃在国会奖学金计划顾问核心小组(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ongressional Fellowship Program)中。有超过30人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其中一些人是参议员和副总统。[124]

柯克帕特里克和坎普尔曼继续为汉弗莱的运动提供咨询。部分是出于他们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到汉弗莱的政治运动中来,其中一部分人是美国政治学会的核心成员。汉弗莱手下的活跃分子包括奥斯汀·兰尼、沃伦·米勒、杰克·佩尔特森、理查德·斯卡蒙、琼·柯克帕特里克,查尔斯·哈根(Charles Hagen)、赫伯特·麦克洛斯基、纳尔逊·波尔斯比、查尔斯·吉尔伯特(Charles Gilbert)、约翰·罗奇(John Roche)、诺顿·朗(Norton Long)、李普塞特、海尼曼、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125]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名的政治学家,其中五个(兰尼、米勒、李普塞特、亨廷顿和海尼曼)曾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两个(兰尼和波尔斯比)是美国政治学会的编辑。

可以这么说,20世纪60年代,虽然政治学家们的政治偏好普遍不同,但这个领域中精英们的政治观点同自由主义和坚决的反共主义是相符的,而汉弗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批政治学精英中的老一辈人大多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左翼阵线中接受了他们的政治学教育,并且在他们日后向自由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了这一主张。若干年后,一些汉弗莱支持者的自由主义主张有所削弱,但他们反共的主张却

没有被削弱。李普塞特、坎普尔曼、柯克帕特里克、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以核心人物的身份出现在“新保守主义”的舞台上,激烈反对以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减少反共力度,后者是1972年的总统候选人。当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继续领导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幕僚中的强硬派时,柯克帕特里克和坎普尔曼逐渐从民主党中游离出来,并在里根政府的外交部门担任要职。[126]

在反共的政治学家保卫民主免受共产主义侵害的努力中,他们有时对非共产主义的专制国家采取一种非批判的态度。20世纪50年代,胡安·林茨(Juan Linz)以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的身份,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来到李普塞特门下求学。1964年,他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在文中,他通过对佛朗哥统治的批判的描绘,发展了极权主义—权威主义(totalitarian-authoritarian)的理论。琼·柯克帕特里克(她的论文以充分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对于庇隆主义进行了温和的描述)在她后来对于卡特总统外交政策的著名攻击中,她重新明确了极权主义—权威主义的区别,由此引起了里根主义者的注意。[127]而正如在导论中提到的那样,亨廷顿警告不要将种族隔离统治当局逼得太紧,以免其被“非洲国民议会的革命者”所取代。

冷战政治中的柯克帕特里克

为了提升其政治利益,并推进政治学作为一门公正无私的科学的学科地位,柯克帕特里克将心理上的冷战(the psychological Cold War)作为第三个政治舞台。在领导美国政治学会后,柯克帕特里克并没有充分重视自己同情报机构的关系。1955年,他同坎普尔曼创办了一个团体——军事行动和政策研究(Operations and Policy Research)(OPR),并分别担任主席和副

主席。“军事行动和政策研究”邀请政治学者写书评,以指导美国新闻总署在全球图书馆的藏书。它还出版了大量关于拉丁美洲选举政治的实情书籍(factbooks)和分析研究。在 1967 年的早些时候,当媒体揭露出一个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的“私人”组织网络时,他们发现“军事行动和政策研究”受到中央情报局下属基金的大量资助,而“军事行动和政策研究”的工作除了公开宣传以外,还包括秘密调查。比如,政治学家阿莫斯·珀尔马特(Amos Perlmutter)曾受聘于“军事行动和政策研究”,在一份与美国空军的合同之下,研究如何“进一步理解在中东局势的稳定中,外国军事力量所扮演的角色”。[128]

在“军事行动和政策研究”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被揭露以后,一群政治学者提起了一份诉状,要求柯克帕特里克和坎普尔曼辞职。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罗伯特·达尔指定了四个前任主席来调查此事。调查者并没有在以下两者的紧张关系中纠缠,即政治学渴望成为一门公正的学科和政治学者在现实政治中的卷入。相反,他们将问题划入伦理学范畴,并得出如下结论:因为“军事行动和政策研究”在组织上是同美国政治学会是相互分离的,所以后者的诚实性并未受到损害。他们承认,美国政治学会经亚洲基金会同意,间接地从中央情报局获得了资助,但却表达了对于柯克帕特里克和坎普尔曼领导的“充分信心”。[129]

调查核心小组的报告并没有控制住不满的情绪。在越战、民权斗争和城市暴动等背景下,这种不满情绪在学会内部层层渗透。反对者们最初分成若干群体,代表诸如妇女、黑人和社会主义者这样的支持者,但在 1968 年年会前后,他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庞大组织,名叫新政治学核心小组(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纽约大学的马克·罗洛夫斯(H. Mark Roelofs)被选为这个核心小组的主席,而核心小组的积极分子包括

克里斯琴·贝(Christian Bay)、鲁思·霍金斯(Ruth Hawkins)、戴维·凯特勒(David Kettler)、桑福德·莱文森(Sanford Levinson)、西奥多·洛伊(Theodore Lowi)、迈克尔·帕伦特(Michael Parent)、马文·苏金(Marvin Surkin)、米歇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和阿伦·沃尔夫(Alan Wolfe)。虽然美国政治学会的当权派将这个核心小组看作是反文化的激进主义的温床,但学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宽容的。而核心小组发现,他们的盟友中还包括政治学理论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一些通常较为保守的追随者,而斯特劳斯可能是行为政治学领域最严厉的批评者。[130]

核心小组的抗议并不仅仅针对学会的管理。核心小组成员批评这门学科的政治不相关性。他们指出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政治学会只在城市危机方面发表了三篇文章,在种族冲突方面发表了四篇,在贫困问题上发表了一篇。核心小组抱怨,这个专业中新的行为主义的精英们,在试图实现政治学价值中立的过程中,"不得不在重大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中保持中立。相对于解释结构的弱点而言,他们更关心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正如同情他们的伊斯顿所说的,核心小组的斗争口号是"相关和行动"(relevance and action)。他们敦促政治学重新致力于"改变社会,而不只是解释和延续社会和政治现状"[131]。

1968 年,紧接着喧哗的民主党大会,美国政治学会年会在芝加哥召开。在事务会议上,一个阻止柯克帕特里克同时主持美国政治学会和"军事行动和政策研究"的动议遭到否决,而反对派的发言人一再被哄下去。越南是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大会最受欢迎的讨论组是"定义国家利益:越南的案例",这个组吸引了 750 个人。据伊斯顿回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越战达到了它的高潮,……学生运动同越战一起升级。而这极大地

搅乱了学会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显然,大多数会员都将面临着一场相当喧嚣的年会……有时候发生了暴力”[132]。

1969 年在纽约举行的年会以平静的方式结束。事务会议吸引了将近一千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还不时波澜起伏。新政治学核心小组在事务会议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会议以伊斯顿的主席发言开始,这份发言友好地对待反对者要求变革的呼声,并宣布了一场政治学领域内新的“后行为主义”(post-behavioral)的革命。与前一年的事务会议形成对比的是,被哄下去的事情发生得很少,各个派别的成员都有充分的发言时间,包括一个要求为刚刚去世的胡志明默哀的激进分子。一个动议要求将一大部分决定权从执行核心小组转交到一个由更广泛人员构成的核心小组,这个动议也获得通过了。[133]

1969 年的大会预告了学会民主的初步恢复。选举需要竞争,这是记忆中的第一次。官方的主席候选人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受到了核心小组候选人克里斯琴·贝的挑战,后者得到了 2816 张选票,大约占了总票数的三分之一(1969 年的投票是用邮递的方式进行的,这是柯克帕特里克的同盟策划的一个计谋,以免核心小组动员事务会议上的多数人)。第二年,核心小组候选人汉斯·摩根索输给了海因茨·尤劳。1973 年,当权派的候选人奥斯汀·兰尼以一定的优势击败了彼得·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134]

但是美国政治学会的民主复苏是短暂的,而在复苏的那段时期,核心小组的候选人往往是输多赢少。此外,他们没有能够赢得学会内部不参与选举活动的权力资源。奥斯汀·兰尼离开《美国政治学评论》编委会时,取而代之的是纳尔逊·波尔斯比,后者是个行为主义者(behavioralist)和汉弗莱派的民主党人。几年后,在兰尼担任主席期间,当编委换届时,如他所言地

确保了这个职位不会落入核心小组人手里。20 世纪 60 年代末核心小组的主要攻击对象柯克帕特里克在他的职位上一直呆到了 1981 年。这样,核心小组大量的议程大都没有实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政治学并不比 40 年前更具有社会相关性和行动指导性。[135]

今天的新政治学核心小组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个小型的边缘部分,而年轻的政治学者对于它的起源所知甚少。近来一个名为“改革”(Perestroika)的新一轮革命运动正在政治学领域中进行。其议程在很多方面同核心小组的相似:反对过度量化,要求更大的社会相关性以及在学会内部加强民主。“改革”运动的积极分子正确认识到,要想推进这些议程,他们就必须参与到该专业领域内部的政治行动中去。他们的领导人之一、芝加哥大学的苏珊·鲁道夫(Susanne Rudolph)被提名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这使得他们备受鼓舞。[136]如果说他们从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失败和行为主义的成功中还能吸取到什么更进一步的经验的话,那就是赢得美国政治学会高层的职位并不能确保成功;控制学会的持久政局同样重要。

越战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越战给政治学留下了两个印记:它通过塞缪尔·波普金的机构播种下了一些比较政治学理性选择方法的种子;它为 20 世纪 60 年代震动美国政治学会的捍卫者的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虽然这场改革以不成功告终。另外两个可部分追溯到越战的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是:向妥协主义者(accommodationist)(和程度略低的反对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的摆动,以及政治学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后越战时期意识形态的振荡

越战时期的混乱，连同诸如城市种族暴动和水门事件等其他同时期的危机一起，使得很多政治学者怀疑，多元民主作为世界的一个模式的可行性，甚至于它对美国而言是否足够。在一些亚洲和拉美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身上，这些怀疑表现为反抗的意识形态（oppositional ideological form）；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糜烂的，并要求进行社会主义的转型。

拉美研究在将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ies）的学科话语引入到政治学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个理论用资本主义剥削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来解释这些国家的不发达，并且认为革命是摆脱这种剥削的途径。20 世纪 70 年代，依附理论成为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中一个热门分析领域，但到 80 年代，这方面的兴趣就逐渐枯竭了。[137]

在亚洲研究方面，年轻的政治学者如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关注亚洲学者核心小组（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的活跃分子，该组织成立于 1968 年。出于对越战的愤怒和对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重要亚洲学者核心小组的成员倾向于毛主席的统治，而忽视了日益增多的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事实。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毛主义（Maoism）正在成功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保留在毛泽东所说的字面意义上，将权力从当局者手中转移到人民手里。弗里德曼写道：“毛对于深刻的政治危机总是用一种具有独特创造性和深厚道德性的方式作出反应。”然而在 1971 年和 1972 年两次集体访华之后，关注亚洲学者核心小组的大多数成员的幻想得到了纠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中关系好转时，毛派的激进角色反而被曾被关注亚洲学

者核心小组反对过的公认的资深亚洲通们(established Asia hands)所接替;当时中国研究的系主任费正清在1972年访华归来的报告中说:“总体来说,毛泽东式的革命是几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人民身上最好的事情。”弗里德曼和黎安友后来分别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高级中国研究者,并激烈批评中国的统治;近年来,黎安友被拒绝进入中国。[138]

于是,反抗的后越战浪潮很快到达顶峰。这股浪潮主要由地区研究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年轻政治学者所主导。更多资深学者,包括美国主义者(Americanists)和政治理论家在内,参与了一股多少更为持久的后越战潮流,这股潮流倾向于妥协主义。几本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重要书籍指出,尽管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是合理健全的,但它需要改革以进一步改善政治和经济的质量,并让更广大的公民参与进来。为了探寻改革思路,这些书的作者表现出了对于外国体制的广泛好奇,其中比较显著地包括了对南斯拉夫模式的好奇。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罗伯特·达尔试图在他的论文中达成政治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和解。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达尔发表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理想的迹象,但是在60年代后期,他的著作中社会主义情感开始重新出现。在他重新寻求一种更公正的民主理论时,达尔接触到了南斯拉夫体制中工人自我管理的内容,并且至少在当时显示出了喜爱之情。在《革命之后》(*After the Revolution*)一书中,达尔写道,自从铁托和斯大林决裂之后,“南斯拉夫成为了世界上惟一一个努力致力于将工业民主的旧梦转化为现实的国家,或者说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如梦所通常展现的那样的现实”。当然,他认识到,“工人协会绝对不是自治的”,但是“显然,(他们)远不是虚伪的表象,在那种表象背后,政党和国家官员在进行实质的经营”。

达尔指出:“如果说南斯拉夫的国家政府不如美国的民主,那么它的管理比美国的民主。”[139]

达尔的同事、前合作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批评多元主义理论,认为后者忽略了商业利益的优先地位,而这种地位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政治和市场》(*Politics and Markets*)一书中,正如该书的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林德布洛姆“仍然是一个市场制度的捍卫者,但是……反驳了那些(保守者和激进者)坚持认为市场体系和一个更加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体系之间无法调和的人”。就像达尔一样,林德布洛姆被吸引到了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他早些时候就想访问该国,以见证他所描述的那个利用市场机制为国家经济计划服务的有吸引力的例子。[140]这本书对于南斯拉夫的实验进行了广泛深入又富于同情的探讨,并得出结论:虽然这个制度是年轻而脆弱的,但是“南斯拉夫可能昭示了一个更高效和公平的经济秩序的逐步发展。通过破坏市场体系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历史联系,南斯拉夫可能——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将它自己和世界放在一个新的进程中”[141]。

政治理论家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同样发现南斯拉夫模式充满希望。在《参与和民主理论》(*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一书中,佩特曼批评了李普塞特、达尔、埃克斯坦、阿尔蒙德和维巴,以及其他同时代的民主理论家,认为他们以牺牲大众参与为代价强调政治的稳定性。作为针对这些同时代理论的解毒剂,她重新拾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卢梭和科尔(G. D. H. Cole)的民主理论,这些人认为在地方和工作单位层面上的政治参与对于公民民主和社会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英美却“尤其缺乏在民主条款(democratic lines)下组织起来的企业”,南斯拉夫提供了:

工人自我管理制的形式，是现存惟一一个试图在大范围内引进工业民主，并在整体上覆盖各种规模和类型企业的例子。

任何关于工业参与和民主的讨论都无法忽视南斯拉夫制度。它之所以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还因为从整体上来看，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和工业组织形式在很多方面（至少在形式上）同科尔的参与型社会（a participatory society）的蓝图惊人地相似。

佩特曼进一步极为详尽地探讨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她提醒说她的发现是试探性的，并总结道，“南斯拉夫的经验并不能使我们充分相信，工业当局结构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困难的和复杂的，虽然它可能的确如此”[142]。

对于佩特曼来说，达尔并不是惟一一个同样对南斯拉夫模式感兴趣又令她特别讨厌的人。悉尼·维巴领导了一个关于参与和政治平等的大型跨国研究项目，包括将南斯拉夫作为“另一种形式的民主”的案例进行研究。和其他人不同的是，维巴手下的研究人员实际上在南斯拉夫进行了彻底的田野调查。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维巴最终对于南斯拉夫工厂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的质量评价虽然不严厉，但不如佩特曼、林德布洛姆和达尔的评价那么高。[143]

对社团主义（corporatism）兴趣的剧烈增长是后越战政治学话语向妥协主义振荡倾斜的又一个重要证明。社团主义理论同多元主义理论一样，强调利益集团是政治集团架构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给“国家”——一个被多元主义省略的范畴——预想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协调利益，尤其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潜伏在对社团主义的众多表面上看来非价值判断的分析背后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美英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遭受的所

谓“非管制”(ungovernability)和“滞胀”问题,其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国家当局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自治角色,并增强其为大众提供福利的能力。

不少高扬社团主义旗帜的作品分析了欧洲大陆的民主福利国家,并指出自由的美国可以从欧洲的社团主义模式中汲取经验。[144]然而有趣的是,最初并不是欧洲的民主学者,而是那些研究拉美和伊比利亚专制国家的人,使得社团主义的优点引起了政治学者的普遍注意。[145]很多拉美研究专家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即类似庇隆(Peron)统治下的阿根廷、瓦加斯(Vargas)统治下的巴西或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那样的社团主义统治提供了“潜在可行的(即使是不令人愉快的)社会发展组织形式”[146]。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认为,那些统治不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为发达国家美国提供了样版。这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萨诸塞大学多产的拉美主义学者霍华德·威尔达(Howard Wiarda)。在关于葡萄牙的萨拉查(Salazar)专制研究中,他将其称之为一个社团主义的“试验”。他写道:

> 同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方式相比较,许多建立在社团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伊比利亚-拉美制度,在参与性、社会公正度和20世纪变化进程中的管理等方面的指数并不全是差劲的……或许类似“参与性”(participation),甚至“民主化”这样的术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可能北美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选举参与指数本身就受到自身文化的限制。进一步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它在类似贫困、种族主义、失业、排外、人道服务方面的缺乏等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或许伊比利亚-拉美模式以及他们在处理一些类似问题中的做法能够给我们提供借鉴。

威尔达认为,类似葡萄牙那样的伊比利亚-拉美社会在“没有丧失我们(美国人)所丧失的集体意识、个体意识、道德价值和国家目标”的情况下,实现了现代化。他们“适应了现代化,但又没有为现代化所征服的事实,或许可以为我们自身的发展困境和制度性不适应(institutional malaise)提供指导”[147]。

虽然社团主义和南斯拉夫模式比毛泽东主义具有更强大和持久的吸引力,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为之提供养料的国家性不适(national malaise)意识的退潮,对于这些模式的兴趣也逐渐衰落。现在,那个时代的社团主义作品可能还会出现在介绍性的研究生研讨会上,但它更被视作历史文物而不是切实可行的研究议程。从当代大多数美国政治学的教科书中来看,多元主义冲破了对它的批评并存活了下来,并且仍然是当今政治学领域美国政府的主导模式。

同国家的紧张关系

在下述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逆相关,即在政治科学理论中国家的受欢迎程度和该学科同国家实质上的紧密联系程度。冷战初期,政治学同国家安全部门发展出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国家却从政治学的话语中消失了。反之,一战前,当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理论概念时,该学科同实质存在的国家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接触。类似地,在后越战时期,当要求“将国家重新带回”到政治学分析中来的呼声在该学科内回荡时,该学科同国家的实质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148]国家对政治学的研究资助萎缩,而为政府的情报部门工作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基础设施曾接受国家机构的大量资助,包括来自五角大楼的巨额款项,后者希望行为社

会科学能够帮助他们赢得冷战的胜利。这样,国家向度(the Dimentionality of Nations)(DON)计划获得了高达120万美元的资助,这些资助主要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149]该项目由西北大学的哈罗德·戈兹柯夫(Harold Guetzkow)发起[后来由鲁道夫·拉梅尔(Rudolph Rummel)领导],旨在搜集国际事件的量化数据。由耶鲁大学的布鲁斯·拉西特领导的世界数据分析项目(the World Data Analysis Program)分别在1964年和1967年,收到了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的33万美元和来自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的35.35万美元的资助。在他写给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以"DOD的含义"为抬头的信件中,拉西特写道,该项目旨在"考察和测试能够被用于估测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形式的计量技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的资助支持了耶鲁大学的各类研究项目,包括博士论文和出版被广泛使用的世界数据手册。[150]

然而随着越战的拖延,以及社会科学未能兑现它的承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开始大幅削减给予行为研究的预算。由于战后美国国防预算的萎缩,五角大楼给予政治学研究的资助减少得更厉害,导致各类科研计划的流产或严重紧缩。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对于耶鲁大学的世界数据分析项目的资助似乎终止于1973年。国家向度计划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部削减了资助以后,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停止。[151]这样,越战的结束由于通过逐渐削弱了其制度基础而抑制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势头(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于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的重要资助在1986年恢复)。[152]

1975年,拉西特讨论了越战之后行为主义研究面临的困难。他认为,战士和学者"比他们所通常认为的要具有更多的共同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方面的差异不应该

蒙蔽任何职业领域内的成员，使得他们对于其共享的重要特征和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视而不见，而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或许能够互相学习”。其中的一个核心的共同问题是：

> 双方都感到自己近些日子有点被围困之感。他们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被社会给予高度评价……十年前，是一个学术顾问获得“政治学”丰硕果实的伟大时代……学者们认为他们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战争、癌症、贫困。
>
> 当然，他们不能。无论是对于学术生产者还是热情的学术消费者来说，令他们相信快速解决的方法唾手可得显然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现在……许多人不再相信学者们能够给出任何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的答案……同样，许多军队人士在他们的公开演讲中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越战是可以取胜的，因为这是一个他们可以解决的政治—军事问题。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却恰恰证明了相反的论点……士兵和学者可见的失败，连同外在威胁的可见的减少，将我们双方推上了一股前进的潮流。双方都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即来自社会的资源分配越来越少，而未来的前景越来越黯淡。我们的预算停滞了，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减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拉西特呼吁士兵和教授，

> 保持和加强他们同更广泛的社会的联系，包括在军事部门和民间大学中学者和士兵之间的联系。不论是那些将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驱逐出大学的人还是那些由于怨恨而阻止军官进入大学的人都不能良好地服务社会。专家不能生活在贫民窟里，尤其不能生活在他们自己建造的贫民窟里。[153]

这段摘要陈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间,政治学和国家安全部门间关系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像拉西特这样的学者,他们在越战期间发展了同国家的关系,不愿意割断这些关系。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学术界,这种关系被视为道德上的耻辱。在七八十年代爆发的几件丑闻显示,越战以后学界同国家安全部门的合作并没有终止,而同时这种做法又是被反对的。1976年,康奈尔大学的苏联研究专家迈伦·拉什(Myron Rush)在离开康奈尔休假时,公开接受了中央情报局驻地学者(scholar-in-residence)的职位。此事激起了康奈尔大学研究生的强烈抗议。他们声称,学校教员卷入中央情报局"有损于学术团体生存和基本学术自由所必需的信任感"。1984年,《纽约时报》报道,罗格斯大学对两名政治学者提出警告,这两人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呈交上来的论文运用到了他们给中央情报局的研究项目中。1985—1986年间,据报纸报道,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了两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的学术出版物:一篇是在《国际安全》上发表的塞缪尔·亨廷顿参与撰写的文章《死去的独裁者和暴乱的民众》(Dead Dictators and Rioting Mobs),一本是纳达夫·萨弗兰(Nadav Safran)撰写的有关沙特阿拉伯的著作。这些揭露在校园里激起了公开辩论,萨弗兰从哈佛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的职位上辞职。在1985年的中东研究协会大会上,谴责萨弗兰行为的决议以193票比8票通过。[154]

然而,通常在被违反时所显示出来的反对同情报机构合作的规范自冷战结束以后似乎蒸发了。最近的一项针对国际研究中的隐秘关系的调查发现,"过去依附在同政府情报部门的关系上的耻辱感已经多多少少地消失了"。据布拉德福德·韦斯特菲尔德(Bradford Westerfield),一位同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耶鲁大学政治学者说,教授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现在已经很

突出了……存在着大量事实上公开的咨询机构,和更多半公开的、广为认可的咨询机构”[155]。

针对2001年9月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所展开的反恐战争可能会增强政治学和情报部门的亲密关系。2001年10月,《纽约客》载文分析了近年来著名政治学者所作的内战分析如何对政府目前的战争起到帮助作用。其中的一个由马里兰大学的特德·格尔(Ted Gurr)[他同时主持“政体”(POLITY)计划]领导的“国家失灵”(state failure)项目是由中央情报局委托的。其他一些国内战争分析可能是独立于政府进行的,但是它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很可能受到政府基金的慷慨资助。[156]

但是即使政治学者个人突然拒绝与权力机构发生联系,这样的举动也并不一定能够擦去该学科中权力的痕迹,只要远离权力的学者(虽然可能他们自己就是权力本身)继续依赖由其他同政治利益密切相关的学者所生产的概念、数据组和发现,而这正是他们所不可避免的。更进一步来说,尽管研究人员怀抱着美好的意愿,但是只要这个专业还是镶嵌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结构中,我们就很难理解政治学会是公正的,因为这个制度结构严重依赖政府及其相关利益。认为政治的科学知识同政治是分开的这种明显错误的假设并不容易规避。我也不认为它能被规避。

注　释

1.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151;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0*), 引自 *How Harvard Rules: Reason in the Service of Empire, ed.* John Trumpbour (Boston: South End, *1989*), 104。

2. Michael Klare, *The University-Military-Police Complex: A Directory and*

Related Documents (New York: North American Congress on Latin American, *1970*), 50,57.

3. 参见 Michael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27。

4. 请检索 James William Fesler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以下简称 FP);与费斯勒的交谈,1998 年6 月26 日于哈姆登市; David Easton to Fesler, October 9, 1969, FP。

5. Remarks to the Yale and Government Committee of the Yale Club of Washington, February 25, 1958, FP.

6. 有关饶大卫见 Robin Winks, *Cloak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2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104; "David Nelson Rowe," in *The Complete Marquis Who's Who*, www. galenet. com; 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45—195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234。

7. Bruce Russett curriculum vitae, www. library. yale. edu/un/brusset.

8. Klare, *University-Military-Police complex*, 61.

9. Robert Dahl,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Science: Epitaph for a Monument to a Successful Prote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以下简称 APSR) 55 (1961): 763—772; "Gabriel Abraham Almond," in *Writers Directory*, 1998, www. galenet. com; "Karl W. Deutsch," *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 ibid.

10.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 Allan Richards to James Fesler, undated; Fesler to Richards, December 2, 1958, FP.

12. "Fred Warren Riggs," in *The Complete Marquis Who's Who.*

13. Riggs to Fesler, July 10, 1958;另见 Walter Mode (from Djakarta) to Fesler, August 13, 1960, FP。

14. Riggs to Fesler, June 5, 1957; Riggs to Fesler (from Manila), October 7, 1958; Riggs to Fesler, December 16, 1959, FP.

15. "Fred Warren Riggs"; Fred W. Riggs, *Thail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 Bureaucratic Polity*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966).

16. Fitzhugh Green, *American Propaganda Abroad* (New York: Hippocrene, 1998), 101;信笺抬头见 Edward Weidner to Fesler, December 21, 1964, FP。

17. 引自 Fesler to Red Somers, April 6, 1956, FP;与费斯勒的交谈。

18. Warren Hinckle , Robert Scheer, and Sol Stern, "The University on the Make," *Ramparts*, April 1966, 52—60, 引自 54; John Ernst, "Tutoring Democrac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South Vietnam, " in *America's Wars in Asia: A Cultural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Memory*, ed. Philip West, Steven Levine, and Jackie Hiltz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8), 233—244。

19. Hinckle, Scheer, and Stern, "University on the Make"; Ernst, "Tutoring Democracy"; Kenneth J. Heineman, *Campus Wars: the Peace Movement at American State Universities in the Vietnam Er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46—48.

20. Hinkle, Scheer, and Stern, "University on the Make."

21. Ibid., Ernst, "Tutoring Democracy"; 与费斯勒的交谈。

22. Ernst, "Tutoring Democracy"; 与费斯勒的交谈; Arthur Naftalin to Fesler,. September 9, 1957; Fesler to Naftalin, September 16, 1957; Walter Mode to Fesler, September 24. 1956, FP; John D. Montgomery, *Cases in Vietnamese Administration* (Saig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1959)。

23. Fesler to Red Somers, April 6, 1954, FP.

24. Fesler to Allan Richards, September 13, 1956, FP.

25. 与费斯勒的交谈; "Some Reflections 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Saigon), September 1957, FP; "Field Administration in Vietnam: A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21, 1956, FP。

26. Fesler to M. A. Anderson Jr., March 17, 1961;另见 Fesler to Fred Riggs, November 19, 1958, FP。

27. 与费斯勒的交谈。

28. Transcript of "Scholars Views the World," broadcast on WTIC Radio, December 12, 1956, FP.

29. John W. O'Danial, to Fesler, September 6,1957,约翰·奥丹尼尔是"越南之友"俱乐部的主席;Fesler to Luis Andretta, July 5, 1960,路易斯·安德烈塔是"越南之友"俱乐部的执行秘书长; Fesler to Anderson, March 17,1961,FP。

30. Ernst, "Tutoring Democracy," 239—240.

31. Heineman, *Campus Wars*, 132, 137—138; Eric Thomas Chester, *Covert Network*; *Progressive, 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and the CI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5), 163,156,176.

32. "Gabriel Abraham Almond," in *The Complete marquis Who's Who*, 1999.

33.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David Laitin, "The Civic Culture at 30," *APSR* 89 (1995): 168—173.

34. Laitin, "The Civic Culture at 30"; Carole Pateman,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1971); 291—305;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80).

35. Ellen Herman, "The Career of Cold War Psycholog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no. 63 (Fall, 1995); 70.

36. Notable expectations are Irene L.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Westview, 1985); and Michel D. Shafer, Deadly Paradigms; *The Failure of U. 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37. 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4.

38. Ibid.,503; Samuel P. Huntington, *Instability at Non-Strategic Level of Conflict*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of Defense Analysis, 1961). 亨廷顿的研究是受国务院委托的。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很好地注意到了肯尼迪政府对第三世界的关注,*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39. 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vii.

40. Gabriel A. Almond, "The Civic Culture; Pre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1995 年 4 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所宣读的论文; idem, *Plutocracy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Boulder; Westview, 1998), preface.

41. Almond, "Civil Culture: Prehistory," 2.

42. 参见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hafer, *Deadly Paradigms*。

43. Harold D.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s in the World War* (New York: Konpf, 1927); 引自 Michael J. Sproule,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Media and Mass Persua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8。对拉斯韦尔作为宣传大师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参见 Robert Horwitz, "Scientific Propaganda: Harold Lasswell," in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ies of Politics*, ed. Herbert J. Stor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1962), 227—304。

44. Harold Lasswell, "The Function of the Propagandi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38(1928): 258—268;引自 James Farr,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Democracy, Propaganda, and Civic Training," mimeograph,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8;另见 Sproule,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69。

45. Lasswell, "Function of the Propagandist,"引自 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56;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s*,引自 Farr,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10; Horwitz, "Scientific Propaganda,"277。

46. Harold Las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173, 178, 179, 197, 203.

47. Harold D. Lasswell,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Whittlesey, 1935), 25, 237.

48. Ibid., 283.

49. Christopher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23; Sproule,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193—194.

50. 拉斯韦尔 1941 年 7 月 12 日致其父母的信,Harold Dwight Lasswell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ereafter LP), box 56, folder 787。

51. Gabriel A.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90), 299;拉斯韦尔 1941 年 5 月 25 日致其父母的信,LP, box 56, folder 787。

52. Farr,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Sproule,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196; Marc C. Smith, "Lasswell, Harold Dwight," in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www. anb. org; Nathan Leites to Lasswell, October 3, 1941, LP, box 57, folder 790.

53. 在 Simpson 的 *Science of Coercion* 一书中提到了希尔斯、贾诺威茨、贾尼斯、普尔、莱斯和乔治;在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 Christopher Simpson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186 一文中提到了尤劳。

54. Peter Coleman, *The Liberal Conspiracy: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nd of Postwar Europ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160; Albert Lepawsky to Lasswell, February 23, 1953, LP, box 57, folder 793.

55.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56. Lasswell to Bill Fox, November 7, 1951, LP, box 35, folder 469; Lasswell to Robert E. Lane, December 20, 1967, LP, box 56, folder 774.

57. Lasswell to Almond, March 9, 1967, LP, box 3, folder 29; Harold Lasswell, Daniel Lerner, and Hans Speier,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58. Gabriel A. Almond with Harold Lasswell, "Aggressive Behavior by Clients on Public Relief," *APSR* 28(1934): 643—655; Almond, *Plutocracy and Politics*, *preface*.

59. 梅里亚姆拒绝推荐毕业论文的出版,除了心理分析部分外。该部分坦率面对社会科学的主要受益者,遗漏了一些阿尔蒙德不愿做的事情,参见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317。尽管阿尔蒙德不满于梅里亚姆的审查,但看来梅里亚姆或许还会帮助他。卡内基基金会给阿尔蒙德提供了战后研究的大部分经费,包括《公民文化》。该毕业论文最终于 6 年后出版,参见 Almond,*Plutocracy and Politics*。

60. "The Nature of the Enemy in American Domestic Information Policy," a 1942 OFF memo signed by Gabriel Almond, LP, box 3, folder 29; "Davis Is the Man," newspaper clip dated June 15, 1942, LP, box 83, folder 727; Lasswell to David Rowe, March 11, 1942, LP, box 83, folder 1033; Sproule,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188; "Gabriel Almond," in *The Complete Marquis Who's Who*, 1997.

61. Almond, "Civic Cultural: Prehistory."

62. Robin Winks, *Cloak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 2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0—43; 引自 43。

63. Gabriel A. Almond, "The Christian Parties of We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1948): 30—58;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54.

64. Gabriel A. Almond, E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German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9);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54.

65. 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0), 3.

66. Ibid., 159—59, 160, and in general chap. 9.

67.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6).

68. Almond, *American People*, 49, 53, 69, 3.

69. Ibid., 149—150.

70. Ibid, 10, 232—233, 234—235; 另见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34—35。

71. Klaus Knorr obituary,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1990; John Ranelagh, *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683—684.

72. Gabriel A. Almond,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foreword by Frederick Dunn, vii, ix, xiv; and 245, 246—247.

73. Ibid., 394, chap. 13.

74.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166 n. 23; Scott Lucas, *Freedom's War: America's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Herman, "Career of Cold War Psychology," 59; Christopher Simpson, "U. S.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unterinsurgency and Scientific 'Reality'," in *Ruthless Criticism: New Perspectives in U. S Communication History*, ed. William S. Solomon and Richard McChesne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313—348.

75. Gabriel Almond entry, *Writers Directory*; *and The Complete Marquis Who's Who*, 1997.

76.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184—185n . 18.

77.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59—60;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299—300; Martin Oppenheimer, "Footnote to the Cold War: The Harvard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Monthly Review* 48, no. 11 (1997):7—11.

78. Jeane M.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Roots and Emergence, 189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72—173, 408, 468; Simpson, "U. S.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 59, 66.

79. 他们包括(《共产主义诉求》——参见前言)哈德利·坎特里尔、弗里德里克·邓恩、白鲁恂、罗格·赫尔希曼、戴维·杜鲁门、亚历山大·乔治及克劳斯·诺尔、弗兰克·博尼伦斯、哈里·埃克斯坦、赫伯特·海

曼及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大多数名字在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中提及。

80.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vii;引自 Herman, "Career of Cold War Psychology," 71。

81. 与罗伯特·霍尔特在明尼阿波利斯 1999 年 5 月 7 日的交谈;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168—169. 关于福特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在那些年的合作,参见 France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141—144。

82. Lucian W. Pye, *Guerrlla Communism in Malay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在第 ix 页中,白鲁恂表示了对阿尔蒙德的深深感激之情。他的对英国殖民官员的长长的感激名单,见第 ix—xi 页。

83. Gendzie,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99.

84.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foreword by Frederick Dunn, and 8—9.

85. Ibid., 334, 126, 245, 349.

86.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84; Allan A. Needell, "'Truth is Our Weapon': Project TROY, Political Warfare, and Government-Academic Relation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17 (1993): 399—420; David Wise and Thomas B. Ross, *The Invisible Govern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4), 243; John 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U. S.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Russian Military Strength* (New York: Dial, 1982), 46.

87. Dorothy Nelkin, *The University and Military Research: Moral Politics at M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23; Lloyd Etheredge, "Ithiel de Sola Poll,"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88. Herman, "Career of Cold War Psychology," 85; Harry Eckstein, ed., *Internal War: Problem and Approach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89. Eric Wakin, *Anthropology Goes to War: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Thailan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for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1992), 24—25.

90. 引自 background, August 1966, in Loch Johnson, *America's secret Power: The CIA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02 n. 31. According to Johnson, Pool actually severed his ties to CIA in 1965 on grounds that the agency's insistence on keeping the ties secret was unethical. 91.

91. 与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交谈,波士顿,1998 年 9 月 5 日。

92.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7;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190.

93. Lucian W. Pye, *Observations on the Chieu Hoi Program: Memorandum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nd 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69).

94. Simpson, "U. S.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3—15;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186. On Phoenix, 见 Douglas Valentine, *The Phoenix Program* (New York: Morrow, 1990)。

95. Etheredge, "Ithiel de Sola Pool"; Ithiel Pool sketch in "About Our Author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8 (May 1965): 44; Sig Mic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New York: Praeger, 1983), 211; 引自 Etheredge。

96. Seymour Deitchman, *The Best-Lain Schemes: A Tal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Bureaucrac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6), 310—20; Klare, *University-Military-Police Complex*, 55; Ithiel de Sola and Robert Abelson, "The Simulmatics Project," in *The New Style in Election Campaigns*, *ed.* Robert Agranoff (Boston: Holdbrook, 1972), 232—252.

97. James O. Whittak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Vietnam,"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18(1997): 165—179.

98. 该论文作为著作出版了;参见 Paul Berm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 Building with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ed Forces* (Lex-

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4)。

99. 与塞缪尔·波普金的交谈,华盛顿特区,1998 年 6 月 22 日; Walt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00. 与波普金的交谈; Samuel Popkin, "The Myth of the Village: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Vietnam" (Ph. D. diss., MIT, 1969); "Ellsberg Denies Guilt, Will Fight," *New York Times*, August 17, 1971; "Scholars Seeming Right Not to Disclose Sources," ibid., October 25, 1971; "Harvard Specialist on Vietnam: Samuel Lewis Popkin," and "Harvard Professor Jailed in Pentagon Papers Case," ibid., November 22, 1972。

101. Samue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02. Emily Eakin, "Political Scientists Leading a Revolt, Not Studying On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00; Kurt Jacobsen, "Unreal, Man: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Turned Guerrillas," Guardian (London), April 3, 2001.

103. William Griffith obituary, *Independent* (London), October 15, 1998; "Standing Firm against Communism,"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Pool, Pye, Wood, and Griffith, *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65; David M. Barrett, ed., *Lyndon B. Johnson's Vietnam Papers: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1;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Bloomfield, *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65; "Lincoln P. Bloomfield," *Writers Dictionary*, www. galenet. com.

104. Nelkin, *University and Military Research*, 110—111; Caroll Bowen to Pool, with a handwritten comment by Pool, 1971 (no exact date), LP, box 35, folder 473.

105. Hans Morgenthau, *Truth and Power: Essays of a Decade, 1960—1970* (New York: Praeger, 1970); Stanley Hoffmann, "A Retrospective," in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Thirty-four Academic Travelers*, ed. Joseph Kruzel and James Rosenau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 1989), 271; George M. Kahin and John W. Lewis,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New York: Dial, 1967); George Kahin Obituar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2000.

106. "McCarthy Sets up Foreign Policy Unit,"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68; "Humphrey Backs Draft Lottery as Fair to Youth", ibid July 16, 1968.

107. Barrett, *Lyndon B. Johnson's Vietnam Papers*, 211; "67 Professors Back Policy in Vietnam," *New York Times*, July 19, 1965.

108. Morgenthau, *Truth and Power*, 24, 26.

109. Charles Kadushin,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135.

110. Austin Ranney, "In Memoriam; Evron Kirkpatrick,"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1995):543—544.

111. Evron Kirkpatrick Obituary,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5;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67), 154; Ranney, Evron Kirkpatrick"; 对 E. 彭德尔顿·赫林(E. Pendelton Herring)和沃伦·米勒的采访,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Oral Histories of Discipline*, ed. Michael Baer, Malcolm Jewell, and Lee Sigelman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1), 39, 246; David Easton, "Remembering Herb: A Tribute to Herb Simon," www. apsanet. org/new/simon。

112. "Evron M. Kirkpatrick," *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 1999*; 戴维·伊斯顿采访录音, APSA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y, folder 5。

113. "Evron M. Kirkpatrick," *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 Kirkpatrick obituary, *New York Times.*

114. "Chester, *Covert Network*, 76—77;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98—108; Lucas, *Freedom's War*, 117.

115. "Kahns Establish KSG Professorship to Honor Kirkpatrick,"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October 9, 1997, www. news. harvard. eud/gazett.

116. Alan Wolfe, "Practicing the Pluralism We Preach: Internal Processes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tioch Review* 29 (1969): 353—374.

117. Ibid.,371—372; 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therton, 1964), 101—102; 引自 ibid. 365。

118.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Knopf, 1953).

119. 伊斯顿口述史访谈, folder 5; Heinz Eulau, "Good Bye to Two Dear Friends: Warren Miller and Dwaine Marvick; A Personal Memoir,"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2 (1999): 279; LP, box 52。

120. Charles Lichtenstein, "Howard R. Penniman,"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1995): 547—548.

121. 伊斯顿口述史访谈, folder 5; Wolfe, "Practicing the Pluralism We Preach"。

122. Max Kampelman, "Hubert H. Humphrey: Political Scientist,"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1 (1978): 228—236; idem, *Entering New Worlds: The Memoirs of a Private Man in Public Lif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54, 59—60.

123. David Remnick, "The Evolution of Max Kampelma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3, 1985; Kampelman, *Entering New Worlds*, 65.

124. Kampelman, "Hubert H. Humphrey," 236.

125. Ibid., 230; 伊斯顿口述史访谈,folder 5;对奥斯汀·兰尼的采访, in Baer, Jewell, and Sigelman, *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 230; "Humphrey Backs Draft Lottery as Fair to Youth"。

126.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Michael Lind, *Up from Conservatism: Why the Right Is Wrong for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Seymour M. Lipset, "Out of the Alcoves,"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1999.

127. 参见 Ido Oren, "Uncritical Portrayals of Fascist Italy and of Iberic-

Latin Dictatorship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2 (2000): 87—118; Juan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Cleavages,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ed. Erik Allardt and Yrjo Littunen (Helsinki; Academic Bookstore, 1964); Jeane Kirkpatrick, *Leader and Vanguard in Mass Society: A Study of Peronist Argent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1); idem, "Dictatorship and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 68 (November 1979): 34—45。

128. Neil Sheehan, "Aid by CIA Put in the Millions: Group Total Up,"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1967; William Blum, *The CIA: A Forgotten History* (London: Zed, 1986), 410—411; Kampelman, *Entering New Worlds*, 161—162; Klare, *University-Military-Police Complex*, 60.

129. Marvin Surk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Battle for Integrity," *Nation*, September 2, 1968, 180; David Horowitz, "Billion Dollar Brains: How Wealth Puts Knowledge in Its Pockets," *Ramparts* 7 (May 1969): 43.

130. Surkin, "Political Science," 180; 伊斯顿口述史访谈, folder 6; Evron Kirpatrick to James Fesler, 1969 (no exact date), FP。

131. Surkin, "Political Science," 181; David Easton, "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PSR* 63 (1969): 1051, 1057; Kirkpatrick to Fesler, 1969.

132. Surkin, "Political Science," 180; APSA memo, "Attendance Data in 1968 Annual Meeting," FP; 伊斯顿的口述史访谈,folder 6。

133. 伊斯顿的口述史访谈, folders 6—7; "Unconventional", *Newsweek*, September 15, 1969, 69—71。

134. Announcement of Results of the 1969 Elections, *APSR* 63 (1969): 1354; conversation with Kenneth Waltz; 奥斯汀·兰尼的采访录音, APSA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ibrary,230。

135. 兰尼口述史访谈, 230。

136. Eakin, "Political Scientists Leading a Revolt"; Jacobsen, "Unreal, Man."

137. 参见 Ronald Chilcote, "Dependency: A Critical Synthesis of the Lit-

eratur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 (1974): 4—29; idem, " A Question of Dependency,"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2(1978): 55—68; James A. Caporaso, "Dependence, Dependency,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System: A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1978): 13—43; Behaviour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1978):13—43; Raymond D. Duvall," Dependency and *Dependencia* Theory: Notes toward Precision of Concept and Argu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1978):51—78; Steven Jackson, Bruce Russett, Duncan Snidal, and David Sylvan, "An Assessment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Dependenci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4 (1979): 7—28。

138. Michael Steinberger, "The China Syndrome," *Lingua Franca*, May/June 1998, 47—56; Edward Friedman, "The Innovator," in *Mao Tse Tung in the Scale of Histor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ed. Dick Wil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00; 引自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 4th ed.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98), 327; John K. Fairbank, "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2; 引自 Hollander, 278。

139. Robert D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rev.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8—109; idem,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30; 引自 William R. Schonfeld, "The Meaning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World Politics* 28 (1975):149。

140.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1977); Joseph Lawrence," Democratic Revisionism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981): 169; Lindblom to Leon Lipson, June 3, 1966, FP.

141.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343.

142. 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86, 88, 102.

143. Sidney Verba,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0; Sidney Verba and Goldie Shabad, "Workers' Council and political Stratification: The Yugoslav Experience," *APSR* 72(1978):70—85.

144. 对欧洲社团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有:Peter Katzenstein, *Corporation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eter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145. 例如,菲利浦·施米特在研究欧洲的社团主义之前,研究的是巴西的社团模式。参见他的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az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The New Corporatism: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Iberian World*, ed. Fredrick Pike and Thomas Stritch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4);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and Regime Governabilit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Pluralism, Corporat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s*, ed. Suzanne Berg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6. James Malloy, "Authoritari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Modal Pattern," in *Authoritarianism and Co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ed. James Mallo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7), 3. 参见 Oren, "Uncritical Portrayals"。

147. Howard J. Wiarda, *Corporatism and Development: The Portuguese Experienc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7), 6, 10—11.

148.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另见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9. R. J. Rummel, "The Dimensionality of Nation Project," in *Comparing Nations*, ed. Richard Merritt and Stein Rokkan (New Haven: Yale Uni-

versity Press, 1966); idem, "Roots of Faith II," in Kruzel and Rosenau,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317—318.*

150. Herbert Kaufman to James Fesler, December 17, 1964, FP; Bruce Russett et al., "Quarterly Management Report, World Political Data and Analysis Program," ARPA contract no. Noo14-07-A-0097-007, September 30, 1972; Charles L. Taylor and Michael C. Hudson,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al Indicators*, 2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1. Russett to William Foltz, July 14 and December 7,1967,LP,box 83, folder 1038; Bruce Russett, *Power and Community in World Politics*(San Francixco:Free-man,1974),viii, Rummel, "Roots of Faith II."

152. Claudio Cioffi-Revilla, *The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0).

153. Bruce Russett, "Warriors and Scholars: Fellow Professionals in Hard Time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28 (1975):87, 89, 91.

154. Johnson, *America's Secret Power*, 167; "Two Are Admonished on CIA Projec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1984;"Scholar to Quit Post at Harvard over CIA Ti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986; "Secret CIA Research on Campus: Harvard Reweighs Guidelines of 1970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1986; Trumpbour, *How Harvard Rules*,68—69.

155. Chris Mooney, "For Your Eyes Only," *Lingua Franca 10*(November 2000):36.

156. Nicholas Lemann, "What Terrorists Want: Is There a Better Way to Defeat Al Qaeda?" *New Yorker*, October 29, 2001.

结论　走向沉思的政治学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挑战了美国政治学是一门附属于民主的独立科学这一自我形象。而在实践中，政治学并没有体现出对民主的持久忠诚，也没有跳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社会科学知识“总是某特定观点的知识”[1] 这一窠臼。政治学是以特有的美国观点而书，它附属于它的国家而非民主本身。

政治学家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来描述人类思想以避免反映它所生成的环境，或它所服务的利益。但是他们几乎从不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他们自己的学科。他们准备分析信仰、观点的社会根基及非学术行动体的态度，但是，他们很少考察他们自身知识所努力形成的政治与社会的深层原因。

美国政治学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其不被承认的支柱和理想就是“美国”。其貌似客观的理论话语反映了与“他者”（特别是那些成为美国主要敌人的国家）身份相关的美国身份的继续重塑。在美国的主要国际冲突中，政治学的学术性按照极为夸大了两者差异的方式而重塑美国及其敌人。在这些修正的冲突后，高度极化的形象一直映射到过去，比当前的理论更能消除美国及尚未成为其敌人（yet-to-be enemies）的更早画像的相似性。

在所有本书分析的个案中，美国及其随后敌手的相互塑造

的形象从妥协主义向民族主义变动。冲突前,杰出的美国政治学家将外国政权形象作为修正美国错误的潜在模式;冲突后,美国的缺陷被重塑为优点,其敌人政权先前认为的优点倒成了缺陷。

内战老兵约翰·伯吉斯将州的权力及非日耳曼移民视为美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将"德意志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Germany)视作在高度同质化领土上集权式政治秩序的榜样。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各代公共行政学者将德国的有效官僚体制视为以牺牲狭隘的政客为代价,来振兴美国及强化具有公共意识的行政官员的影响。然而,其后与德国两度交战,美国的弱国家、多元利益集团的政治及多元化开始被视为力量的源泉,至少美国体制的那些特征大多与德国不同。同时德国的强国家及日耳曼身份成为极大的缺陷。于是,一种"特别道路"(special path)的理论描述出现了:将德意志帝国描绘成纳粹主义的先驱,将盎格鲁—美国(及法国)政治发展与德国(日本)反动的发展轨迹相对照。这种矛盾的理解仍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大多数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对其学科的日耳曼理论基础一无所知。他们未能意识到伍德罗·威尔逊对普鲁士市政自我管理的羡慕,更明显地对他们学科关于纳粹主义的现代观点熟视无睹。

政治学术语中的美国与苏联的彼此体制经历了从妥协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同等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顶尖的政治学家看好斯大林苏联,把它视为通过国家指令的工业化和智力集中计划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模范。其他政治学家,既苦恼于美国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又虑及停滞的经济增长,展望了美国的自由及苏联经济平等的未来趋同。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政府主导计划与免于匮乏的自由——保护美国人民免受纳粹主义侵害的著名四大自由之一———从国家的政治话语,包括

政治学的话语中消失了。[2] 苏联于是和德国一道并最终取代德国成为集权主义的“他者”,这使美国的身份被反衬出来。但苏联现在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美国是只有社会没有国家,其原因在于国家主义的更早集权以及为集中计划与官僚效率所吸引。集权主义者为意识形态所指引,美国人实用性地按利益行事;苏联的意识形态强调主观组成的阶级斗争,而美国是依其行为界定的利益集团间的友善竞争。美国政治学的这种多元主义图景在“极权主义”政坛消失后继续支配学科的话语十多年。美国政治学起初就是因反对这些政权而形成的。于是,为了重新解释葛兰西,它构成了一条实质性痕迹,在这条痕迹中,美国外交史加入到政治学中,却没有留下详细记录。

其他主要敌人的形象也从妥协主义向民族主义摆动。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苏联一道被标识为“极权主义”之前,一些顶尖的政治学家对墨索里尼的社会组织与控制“实验”颇感兴趣。同样,在 1889 年,伍德罗·威尔逊建议日本领导人“专注于”参照普鲁士的模式规划宪法。但当日本转而对外扩张并与德国联手对付美国时,以前的精明变成了历史的负担,日本和德国一道落入政治发展“特别道路”的描述中。[3]

美国身份的重塑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民主概念的成功再述而展现出来的。当前对民主作为一种程序性领导机制的主要理解,在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多党设置中发生了改变。当时美国要对抗受某一政党控制、至少名义上承诺社会平等的自我标榜的“人民民主”。然而,在冷战前,政治学家倾向于以低估选举程序重要性的方式来定义民主。约翰·伯吉斯反对普选,不愿承认选举是选择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最佳办法。[4]

伍德罗·威尔逊,因其作为一名总统承诺世界因民主而安全而在今天闻名于世,更早他是作为一名学者而奋斗,通过将民

主纳人专业管理阶层而让民主使世界变得安全。在威尔逊看来,公民服务的考验是领导选择的非常民主的方法,因为“它从这一部分人中去除所有的统治原料……正如他们所愿”。相对于程序产生的某种结果,威尔逊更按其结果定义民主——这种结果就是受不同流派、训练有素、赋予特殊使命、合适的人来统治。[5]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威尔逊概括的对民主的管理观点在梅里亚姆的“芝加哥学派”的政治学中获得支持,被梅里亚姆在科学权威方面新发现的信念所阐述。在“民主社会控制”的旗帜下,梅里亚姆和哈罗德·拉斯韦尔把美国描述为这样一个国家:人民(demo)被社会计划者(planner)中某一受启蒙的以社会科学家为顾问的精英,引导着走向进步的民主的终点。后来,梅里亚姆受日益增长的纳粹主义流派刺激,名义上捍卫了民主。他主张民主并非“惟一的形式”,也并非一“政治合作模式”,凭此人性会找到对人的价值最好和最丰富的表达。这些价值不只包括政治自由而且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更加平等的分配及文明所得的公平分配。[6]

更年轻的政治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热衷于将民主与社会正义相联。默尔·芬索德相信“民主就意味着减少贫穷,生活工资的保证,失业救济,正如普适性的选举权”。弗雷德里克·舒曼认为真正的民主保证经济平等与政治自由。罗伯特·达尔的博士论文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捍卫。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博士论文对美国的资产阶级给予高度如实的描绘。其题目是《纽约市的富豪统治与政治学》,反映了阿尔蒙德的信念(1938),因为富裕阶级的过度的政治影响,“说美国政治体制是民主的,这是一个错误”[7]。

这些关于“民主”的见解——换句话说,美国——落入了不

利境地，因为使得美国看来与其敌人太相像。伯吉斯对于民主的见解使宪政主义成为第一次德—美冲突的牺牲品。因为有悖于其标准，非成文宪法的英国民主比德国水平更低（换句话说，更不像美国）。威尔逊的可管理的认识经历了大战，融入梅里亚姆的“民主社会控制”中，不料受到第二次德—美战争的沉重打击。这场战争在行动效率危险方面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教训。不管二战后复活的梅里亚姆的看法前景如何，都由于冷战的爆发而消失了。这在学者当中引起激烈反响，使他们担心：“民主社会控制”及“民主计划”可能成为集权主义专制的前奏。在美苏冲突的紧张气氛中，不管是梅里亚姆的有计划的民主，还是默尔·芬索德所幻想的工业/社会民主，年轻的达尔、阿尔蒙德，都很有可能有效地驳斥这种说法，即正如弗兰克·奈特所指出的，苏联“只是各处包括我们自身国家发生的一个极端案例，采取民主意味着达到特定的终点而非自由……人们总是给予新的任务和把越来越多的权力给了政府，直至目前政府成为所有事情的主宰而非仆人”[8]。

总之，支配今天学科话语的对“民主”的理解，在不同“政权类型”下的科学数据库中都有严谨的描述，是一个微妙、复杂和凌乱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和其敌人一样的民主概念被遮掩，而美国与其敌人的最主要区别则成为特权。对民主的程序的理解之所以流传，更多的不是因为其理论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冷战。这使相互竞争概念的说服力很大程度上黯然失色。

尽管我并未像彻底考察他们对“民主”的理解的变化一样，考察政治学家对“科学”的理解的演化，但以前各章节显示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对“科学”的理解和“民主”的理解在同时变化。冷战的压力促使政治学家从协会到观念去

纯化这些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查尔斯·梅里亚姆充当了将政治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这一运动的动力。但是他的科学概念与他探索达到改革目的的设计方法而非客观事实本身密不可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价值取向的概念让位于以价值中立的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的概念。正如特伦斯·波尔(Terence Ball)注意到的:“与某种具有实证内容的事物一样,这种作为行为革命和朝向‘科学’的发展仍被视作……该学科对(冷战)时代气候和特性的理性和自私的反应。”[9] 通过使深信不疑的参议员与基金会领导人确信,和自然科学一样客观,政治学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对真理的无私追求,而对真理的客观追求正是民主的标志。美国政治学的领导人从私人基金和联邦政府机构处为他们的学科赢得了大量的资助。这种慷慨的资助,更广泛而言,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学科偏向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

简言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按照改革主义理想去理解,政治学被看作这些理想的仆人。与冷战的背景相反,民主开始从程序意义上去定义。政治学被重新塑造为一门无理想的科学(ideal-free science)而适合于无理想的民主(ideal-free democracy)。这种转变为本书开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怎样解释这一学科的自我形象的内在不一致性?一旦我认识到政治“科学”与“民主”的概念均已渗入美国不断变化的国际敌手的情景之中,这一学科的基本悖论——即它既一般认定是客观的,同时又与民主相关联——就变得不那么自相矛盾了。

我们的研究对于从事政治学研究有什么启示呢?政治学认识论应该如何对美国政治学已经从一种特别的美国视角而述这一观点作出反应呢?更一般地,学科方法论该怎样屈服于韦伯

的观点，即社会科学知识总是具有一特定的视角？

一种可能的反应是对政治学采纳韦伯本人的认识论立场。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探索不可避免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家的价值，受他们在一定时间与地点的立场的影响，影响他们寻求的问题以及他们隶属于身边现象的重要性。但是他坚持认为，“很明显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文化科学研究仅在这种情形下才有结果，即在它对一人有效而其他人无效这种意义下是‘主观’的”。[10]韦伯指出，换言之，尽管社会“事实”不可避免地包含价值，但那些事实某种程度上可以验证独立于赋予它们重要性的价值。这样，尽管他拒绝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观点，但韦伯坚持主-客体分离的预先假设。[11]

但是韦伯试图结合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努力并非没有逻辑问题。韦伯看来没有能够全部知道下述观点的启示意义：社会科学概念的建构根植于历史（我明显同意的观点）。如果概念真的由历史塑造，如果正如美国政治学经常发生的那样，历史是研究者的概念得以证实的数据（或“例子”）的资源，那么除了发现数据有效地支持概念外，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呢？毕竟，概念是服务于证实其有效性的相同历史的产物。

而且，即便韦伯的认识论方法从抽象论上完全有道理，它也并不足以描绘政治学在 20 世纪中的美国实际操作的方式。毕竟，正如我在这种研究中展示的，主-客体相分离的预先假设是由政治学纠缠于其研究的政治这一事实所掩饰的。政治学的学术与其研究的政治相分离的观点很难与以下事实相一致：这一学科的专业协会主张紧密与国会相连，多数对国会的研究都是由受美国政治学会资助的学者承担的，多数对美国外交政策研究都是由这些研究者自身参与所完成，尽管只是边缘性地参与到塑造外交政策；或与以下事实相一致，即通常用来检验与历史

事件相悖的假说的数据库包含这些同样历史事件的轨迹。

这样,韦伯的认识论并不对涉及其研究客体的学科提供安全庇护。政治学应通过采纳将明确予以考虑的方法而习惯于它叠加于政治的事实。换句话说,我提议,政治学朝向反思性的方向发展。具有反思能力的政治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即有意识地考虑到其自身学术性的历史位置;按照阐明这些过程与其理论本身关系的方式而将历史上的政治进程理论化。

在20世纪,许多杰出的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发展了思考的反思模式。[12]但是这些理论在美国政治学界特别是其实验性分支领域反响很小。[13]在任何情况下,并不清楚在哲学和人文科学中发展出来的反思理论模式自然可应用于政治研究。更极端地说,如果政治学要转向反思方向,它可能不得不开辟自己的道路。这种反思道路的方面是很难想象的。在剩余的篇幅中,我列出几种可能,而以我自己最近工作的两个例子开始。

首先考虑"民主和平论",即认为民主国家几乎不会相互打仗。近年,国际关系学者使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去分析有关"战争"和"政权类型"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如果没有就如何解释民主和平论达成共识,那么就其实验有效性也几乎达成了共识。国际关系学者在许多场合重复引用一位并不经常夸大其词的同事的说法:"民主国家间不打仗接近于我们针对国际关系的实验方法的任何事情。"[14]这一说法在大多数案例中也得到了支持。

反思的方法导致将民主和平的学术(scholarship)视作其意欲带来曙光的国际政治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非脱离于这一进程。反思引导我们去探询分析概念的历史。这些概念中包括"民主"。该学科用"民主"概念来计算、分类并定位其事实顺

序，而不是如国际关系学者所普遍做的那样去研究“民主和平的事实”[15]。反思引导我们去思考包括“民主”这些分析概念的历史，这一学科采用这种方法去检测分类和安排它的“事实”。它指导我们思考这些概念以及它们排列的相关数据，是否包含与国际冲突正好相同的历史痕迹，这种国际冲突可以用于理论的实验检验基础。

在我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中，我认为“民主”应该解释为“美国的”，政治学家的民主和平论观点于是应被理解为有关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间和平这种更一般观点的特殊例子。对民主的定义（这就是美国）明白无误地显示在国际关系学者所采用的数据集中，是微妙历史进程的产物。在这种历史进程中，正如我们以上解释的，我们与敌人相似的概念方面被抛弃，我们与我们敌人差异的方面则流传下来。当这些“政体类型”数据被投射到造就它们的国际关系史中后，“像我们那样的国家不相互打仗”这些观点假定了“实验法”的出现就毫不奇怪了。毕竟，民主和平论的概念是由战争与和平同样的历史模式所塑造的。该模式转化为“数据”或“例子”，用来有效地支持此概念。我的观点因而揭示了民主和平论观点具有累赘的特质。政治学家将国家分为“民主”既是这些国家相互间（过去）和平的产物，也是它们共享民主性质的产物。这样，反思的转向会通过产生从这门学科的主流方法的观点，反直觉和非常规的洞察力而充实政治学。[16]

考虑到美国政治的又一中心观点——“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的概念。政治学家特别将“政治文化”具体为影响一些政治结果的独立变量。例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提出这样的问题：“政治文化如何影响本身作为其一部分的政治体系？”罗伯特·帕特南极好地调查了意大利地区公民文化的变化如何影响

代议制机构的运作。一些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近来考察“文化”如何改变“国家安全”的不同方面。这些研究及许多其他研究使用着政治文化的概念，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相区别，但都承认这一预先假定，即研究者及其所属的学科与所研究的文化与政治过程相脱节。[17]换句话说，学者是政治文化的学者但又不属于这种政治文化。

对政治文化的反思方法，不是（或与之相关）去问政治文化如何影响社会与政治结果。而是去探寻政治文化概念是如何历史性地演变的，以及何种程度上其学术性体现在环绕政治文化的文化与政治关系之中。例如，不是去问一个国家的公民凝聚力如何影响民主政府的运作与稳定，而是人们可以从历史角度说，出于培养公民凝聚力（和动摇敌人社会凝聚力）的民主政府利益或许已塑造公民文化研究的过程。同样，不是去问用“身份”来定义的文化如何影响“国家安全”，而是人们或许会问（正如我在第四章和其他地方所做的）的美国，国家安全政治学是如何影响政治学家对美国文化身份的想法，或更广泛地说，他们对“政治文化”的理解的。[18]如果（正如我已经发现的）对公民文化的学术兴趣已持续地与国家安全机构的宣传与心理战中的利益相互交织，那么就可以认为“文化”既是国家安全的产物又是它的决定因素。

“公众舆论”或许是从反思方法中获益的政治研究的又一核心领域。公众舆论学说的一个实质性分支讨论了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讨论了突出世界事件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19]反思方法将探询突出的世界事件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及公众舆论的概念。它还将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的考察转移至外交政策与“公众舆论”的关系。以往研究者的概念化与重新概念化公众舆论的方式是如何受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利

益影响的？对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支持和与这些机构有密切联系的基金会在建立公众舆论研究的制度性安排上有多重要呢？[20]是否可以说“公众舆论”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正如公众舆论是政府政策的塑造者呢？

这些反思研究观点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涉及国际关系学者的利益问题以及我本人的大量利益领域。但是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包括美国政治学，或许会同样对反思式的理论化负有责任。以美国的金钱与政治关系为例。不是去叹息法人金钱对选举政治的影响，而是通过关注美国学术界进而以相互启迪的方式调查金钱在选举政治中的流向以及在学术研究/政治中的流向，我们可以拓宽对美国政治系统的理解。多大程度上这些流向会相互交叉？如此反复的姿态与其他事情一道会引导我们去探索，为什么该学科或多或少地回避去“批判地”调查美国的法人金钱与政治的关系，尽管近年来这一问题已被（选举政治家如约翰·麦凯恩参议员而非学者）列入优先考虑的国家公共议程。

最后是关于“客观性”的问题。如果正如我已试图在本书中展示的，美国政治学的实际运作已经从科学客观性规则极大地转向，那么政治学应如何解决这一客观性危机呢？假定我的批评被人听进去了，我想政治科学家的直接倾向，将通过寻找认识论的草案来试图解决危机，这一草案将“控制”本书讨论的“倾向”，通过寻找一种新的认识论方法来一道取代客观性。鉴于政治学在理论灵感方面看待其他学科的长期倾向，或许可以预期政治学家为这种认识论修正或其他认识论标准去发掘科学文本的哲学。不论哪种方式，如果政治学家仍然有自己在认识论思想方面的习惯，他们可能将以某种抽象及非历史方式争论主体性问题。

但是为什么要从上面颁布的其他规则或从其他领域引进以

支撑或取代该学科的既有认识论规则呢？为什么我们期望除了已经遵循的科学客观性规则政治学还要去遵从更多新的规则呢？我提议政治学相反应该以一种弹性的方式去处理客观性问题。我们应当拓展我们对以往事件的研究，在这些事件中，知识主张与政治兴趣同时为同样的学者或思想流派所推进。我们应该仔细研究政治学的意义如何产生变迁，过去的政治学家是如何捍卫及辩护这一学科拥有客观科学的地位的声明的，“科学”的涵义（或为其辩护）在美国或世界上是如何与社会、政治、经济过程有关的。正如这些规则本身的主张或通过演绎判断而颁布其他规则一样，重新构造使特定规则获得其优越性地位的方法，使服务于伦理学科目的。

阿克顿勋爵敏锐地观察到：“很少有发现能比揭示观念根源更令人激动的了。”[21]我已经把阿克顿的箴言作为本书的座右铭，因为预计一些政治学家不会全部欢迎我的阐述。[22]但是如果不是愤怒地作出反应，政治学家或许希望去考虑其他的精明陈述。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言：“伟大的真理期待批评而非敬慕。”[23]如果美国政治学是伟大的、兴旺的、民主的科学，正如美国领导人所描绘的，那么就算不同意我的批评，其实践者至少也应该去倾听。而我并不希望我的批评得到立即的认可，我希望它将引发一场关于美国政治学之身份的长期争论。

注 释

1. Max Weber, “‘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and ed. 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49), 81.

2. Eric Foner, “American Freedom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 (2001): 1—16.

3. W. Wilson to Daniel Coit Gilman, April 13, 1889, 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ed. Arthur S. Link et al., 69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1994)(以下简称 *PWW*), 6:169—72

4. 伯吉斯说道:"很难明白为什么最优越的政治体制不将是一个民主的(按:宪政的)国家,拥有一个贵族政府,提供的仅仅是贵族的真正缺点而非人为特质。如果没有真正政府的共和制(按:美国)的组织原则,那么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这一原则是什么。"John Burgess,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Science* (1933;reprint,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94), 75—76.

5. "A Lecture on Democracy," *PWW* 7:356;"Notes on Administration," 1892—1895, *PWW* 7: 92—93.

6. Charles E. Merriam, *What is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92; idem, *On the Agenda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98—99.

7. Arnold Lien and Merle Fainso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A Textbook for Students in Introductory College Courses and for the Active Electorat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4), 441; Gabriel Almond, *Plutocracy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Boulder: Westview, 1998), xxii.

8. Frank Knight,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1950): 513.

9. Terence Bal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in Its Postwar Political Context," in *Discipline and History*, ed. James Farr and Raymond Seidelm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207.

10. Weber, "Objectivity," 84.

11. 参见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sota Press, 1992), 23。

12. 参见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 i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Continuum, 2000);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

lected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1995)。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是人文学科反思主义的典型例子。

13. 三个明显的例外都在国际关系领域,参见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Roxanne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chap. 7; Isabelle Grunberg, "Exploring the 'Myt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1990): 431—477.

14. Jack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in *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ed. Robert Rotberg and Theodore Rabb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8.

15.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16. 参见 Ido Ore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hanging U. S. Perceptions of Imperial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995): 147—184。

17.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337;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 Katzenstein,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Ido Oren, "Is Culture Independ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How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Shaped 'Political Culture'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2000): 543—573.

19. 例如,参见 Philip E.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ed. David Ap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Ole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6* (1992):

439—466; Robert Y. Shapiro and Benjamin Page, "Foreign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Politic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d. David Deese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216—235; 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Constraining the Coloss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 一调查研究历史表明,这种政府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参见 Jeane M.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Roots and Emergence, 189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1. 引自 Acton's *History of Freedom* (1907) in 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6), 71。

22. 关于对我怀疑的试探性证实,参见"Forum: Responses to Ido Oren's 'Is Culture Independ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2001): 399—408。

23. 引自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50。

译 后 记

本书是继2003年翻译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之后两位译者的又一次合作。这部书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系伊多·奥伦教授2003年出版的一部新著，它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探索美国政治学的形成，是一部取材独特、视角新颖的书。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书的翻译出版，为我国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奉献绵薄之力。

本书翻译的具体分工是：唐小松承担英文版前言、中文前言、扉页介绍、封底书评、导论、第一章及第二章的翻译；王义桅翻译第三章、第四章和结论部分。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曹沛霖教授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晓研究员的鼓励，书中一些政治学专业术语的译法请教了二位先生。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范蔚文先生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范先生的敬业精神和对国际关系学的持久热情，令我们敬佩。责任编辑潘丹榕女士和徐晓明先生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心血，他们专业知识扎实，编辑非常仔细认真。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唐小松　王义桅

2004年6月